

三联
耳关

生活周刊

® 2016.5.9
2016年第19期
www.lifeweek.com.cn

年度报道
影响世界的人

与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对面
苏维埃人的「一手时间」



885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新科学家》2016.4.40

异状：表象背后的科学真相

本期《新科学家》盘点了七个最新科学研究，其结果或有别于我们的常识认知，或是我们认知的灰色地带，如：噩梦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作力的助推器；不易解释的波扰乱了宇宙大爆炸遗留下的平静世界，它们可能是我们无法看到的宇宙混乱的证据；为什么地球上的引力如此之小，不足以把一块磁铁从冰箱门上撕下来呢？



1 《新闻周刊》2016.4.29 月经平等

在美国，很多生活必需品不被征税，却有 40 个州都在对女性经期的卫生用品征税，这一情况正在因进步人士的奔走呼号和“月经平等”这一运动而有所改善。月经是一个似乎从来都不便于公开讨论的话题，甚至在一些国家被视为禁忌，而它本是一项基本人权，易受忽略，却与性别平等、女性主义和社会变革紧密相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5 年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球至少有 5 亿女性在经期都缺乏足够的清洁卫生用品和护理条件。

3 《纽约客》2016.5.2 精神失常的犯人

1996 至 2014 年，在佛罗里达州的监狱里，有精神障碍的囚犯数量增长了 153%，甚至有精神病的犯人折磨，被迫自杀，或被守卫杀死。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最新的报告中显示，监狱工作人员会努力确保精神病患者被判有罪，一旦囚犯被定罪，监狱会切断他们与一切服务机构的联系。对于医学伦理学家、监狱辅导员和心理学家来说，他们需要有一种“双重忠诚”的责任感，去同等对待狱警和犯人。

2 《大西洋月刊》2016.5 美国中产阶级的尴尬

根据美联储的调查显示，如果突然生病去医院，47% 的美国家庭一时付不出 400 美元的急诊费，除非去借钱或者变卖东西。当然，这与美国人长期形成的透支消费习惯有关。但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一直在萎缩。对正常工薪阶层而言，扣除房贷车贷和生活必需，大多数家庭都是“月光一族”，随着信贷的不断增加，美国人的储蓄已屡破新低，这其实是货币政策失效的微观表征。

4 《福布斯》2016.5.10 逆转衰老的尝试

位于美国圣地亚哥的生物科技公司 Samumed 正致力于研发可逆转衰老的药物。其创始人兼 CEO 奥斯曼·其巴最近入选了《福布斯》杂志评选出的 30 位全球规则变革者榜单。这家公司的第一批试验药品分别针对特定的器官系统，以期在消除皱纹、生发及还原发色、治疗膝关节炎促进软骨再生等方面发挥效用。之后他们还将在治疗失明和阿尔兹海默症领域做出尝试。该公司现已筹措到 2.2 亿美元的投资，最新一轮融资估值为 60 亿美元。



P38

封面故事

与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对面

苏维埃人的“二手时间”

44 “红色人类”的命运：记录与思考

60 “将每个人的名字一一说出”

专访阿列克谢耶维奇

64 切尔诺贝利，苦难之后

86 莫斯科苍穹下：记忆与日常生活的复调

118 圣彼得堡：一座双重人格城市的文学记忆



P156 时尚：社交媒体时代的符号组合

社会

逝者：威本禹其人其事 134

经济

市场分析：债券违约潮 132

收藏：芬兰的“中国人” 140

文化

话题：NTLive：隔岸观“戏”有多火？ 150

图像：“我唯一的欲望” 152

时尚：社交媒体时代的符号组合 156

思想：回到休谟 164

书评：政治秩序的中层理论 166

专栏

邢海洋：卫星 Wi-Fi，但愿不是玩笑 24

袁越：抗衰老基因疗法靠谱吗？ 160

张斌：27 年，真相一直都在 162

宋晓军：奥巴马的军事遗产就是“撒胡椒面”？ 164



P162 体育故事：27 年，真相一直都在

(本期封面摄影：张雷)

环球要刊速览	4	声音	29
读者来信	14	生活圆桌	30
天下	18	好东西	34
理财与消费	26	个人问题	168
好消息·坏消息	28		

2016年第19期，总第885期，2016年5月9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翔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李东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晴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龚融 Gong Rong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美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阿润 A Run 邢宇 Xing Yu 孟佳 Meng Jia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尤帆 You Fan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不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017749
-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波音
- 2~3 · 雅居乐
- 5 · 霞公府
- 7 · 中国石化
- 9 · 央视慈善之夜
- 11 · 科勒
- 13 · 力度形象
- 15 · 一汽大众
- 17 · 巴斯夫
- 133 · 猎聘
- 135 · 周刊征订
- 147 · 野生救援
- 151 · 莎士比亚杂志广告
- 152~153 · WWF
- 封三 · 智联招聘
- 封底 · 国家旅游局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鼠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五每日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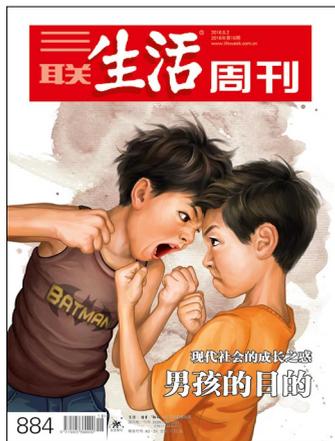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男孩的目的

“现代社会的成长之惑”，的确是这一代家长的心中大惑。在这个和平富足的时代，生命诉求不同于战乱饥荒，有可能追求更好的人生，但要成就一个高品质的人，家长该做些什么，社会该提供些什么，相信大多数人并不明晰。最简单的是模仿，和自以为是的超越：你孩子高中出国，我孩子要初中出去；你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得上一所好小学，我孩子要从幼儿园就完成“择校”。这一代家长聚在一起，除了学区房、名校排名、孩子的名次，罕见交流孩子的品行、个性和独特爱好。实际上，男孩问题并不孤立发生，扭曲现象女孩身上也存在。说到底，还是社会对孩子的期望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

青岛 武大维

用什么来传承匠心

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农村文化活动。活动现场摆了一些摊，其中的手工剪纸摊吸引了我。女匠人50左右年纪，从小喜欢剪纸，痴迷此道多年，她说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开剪，乐此不疲。我问她销售情况怎么样？她笑笑说，剪出一件自己满意的作品就心满意足了。言下之意，我是听明白了。但现在大多数“非遗”保护项目，大致就像手工剪纸一样面临着类似的状况，叫好不叫座，市场之路极不光明。表象上它是“活”的，实则是“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非遗”项目是以“人”作为载体来传承的，一旦人走了，一切就消亡了。

剪纸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独具匠心的“非遗”项目。但它有来自科技的巨大挑战，譬如印刷技术、激光雕刻技术、照排技术的到来，人工剪纸的式微是不可避免的。也许花几天用手工剪出来的作品，机器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几十年后，随着剪纸艺人的离去，剪纸也就消失了。那么我们损失的不仅是某种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寄寓在“非遗”中的宝贵智慧和精神血脉。剪纸的现状其实就是许多“非遗”项目的现状。

但悲观之中，我们似乎也还可以找到希望的曙光。譬如篆刻，其历史与文字的发展一致。现在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篆刻了，但机器篆刻仍然没有办法取代人工篆刻。原因在于在全球华人地区，有一大批喜欢篆刻的人群，并且它还是一种艺术形式。可以这样来做个判断，在漫漫历史长

河中，人工篆刻必将继续与汉字同行，不太可能会出现断代。再如书法艺术，它带动了中国传统书画纸制作技艺、笔纸砚等产业的发展。如果来看教育部出台的“书法进课堂”，那就是文化产业方面的一项“顶层设计”，意义非凡。

从这些事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传统文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那如何让它“活”着？其实就是让它有“市场”，努力创新，让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而不能把“非遗”保护仅仅停留在“固态”的保护上，如果停留在博物馆里，少了市井气，那么这不是保护，而是保存。

现在许多“非遗”保护工作，大都停留在保存状态，最后很可能只剩下一个标本。“非遗”的生存空间变窄，是因为这些手艺日益远离当代生活，而要把“非遗”真正保护起来，必须以创新的姿态，融入人们的生活中来。譬如海南的椰雕技艺，是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具有千年历史。海南一位名叫张必弟的人，把椰雕制成了音响，植入了蓝牙、NFC、音频线、Wi-Fi等，椰雕蓝牙有源音箱已获得了“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椰雕音响既实用又好看，同时又有文化底蕴，一举多得。作为“非遗”传承，事实上应该努力地让“非遗”与当前的生活结合起来，让非遗“活”在当下。只有这样，才能传承匠心，传承文化。

杭州富阳 流沙

冷漠的背后

星期天，几位文友相邀去一

酒家小聚。远远地，街道有一大堆人在围观，细看之下是两个女人在打架。其中一位年长的女人摸出一把榔头，照着年轻女人头部狠狠砸去，年轻女人几个踉跄，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无法动弹。女人撕扯之时，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就是没人出来相劝。发现年长女人行凶，眼见得要出人命，刚才还指指点点的人，一下没了声息，多人露出惊恐神色，纷纷四散闪避。只有两名街拍爱好者远远地用手机录像，也没有劝阻的意思。年轻女人被击倒后，行凶女人从容收拾好工具，叫骂着扬长而去，一路上没遭到任何阻拦。

行凶女人走后，散开的围观者再度聚拢，其中还包括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看着不省人事的女人，有人小心嘀咕：“赶紧打110报案啊！”“还是先报120吧，救人要紧！”可是，无论是报案还是求医，围观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迟迟无人肯出手。我取出手机，正想帮着打个120，这时朋友过来了，拉着我的手说：“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听说这是原配整‘小三’，你不了解她们打架的内幕，贸然打110，有可能得罪人，弄不好自己挨上一记，谁来救你？再说，凶手已经离开，举报者还要被带到派出所取证，你有那么多时间陪着耗吗？打120，你是她家属吗？能给她担保、交住院费吗？素昧平生之人，谁愿承担这

些风险？”

朋友的话似乎句句在理，可看着地上血流满面、昏迷不醒的女人，还是觉得于心不忍。权衡再三，觉得及时联系上她的家人，才是最稳妥的处置办法。将想法跟围观者一说，许多人纷纷给女人拍照，在微信群扩散，过了大约半个来钟头，终于见着有人前来，大伙儿才松了口气。但这个时候，女人已在血泊中躺了一个多小时，能否脱离生命危险，会不会留下后遗症等都是个问题。

网络上有人做过一个测试，让一老一少两人假装拐卖儿童，测试路人的反应，结果数十名目击者的冷漠表现令人寒心：许多人不是一脸惊愕，便是采取闪避态度，他们更多的担心是怕连累自身、误事误时。有了这次围观的经历和体验，我才明白其间的原因，其实围观者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冷漠，当街头出现行凶事件时，无人敢出来制止，主要原因还是保护“见义勇为”行为的机制不完善，怕当了英雄后流血又流泪；当受害者需要及时医治时，无人敢出面联系医院，是源于社会救助体制的缺位，怕做了好事还要倒贴钱。这些机制和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各界人士呼吁了多年，但至今都没有取得实际性的进展；一些推行了救助与保障的地方，过度复杂的手续及程序，使得各项公益活动流于摆设，举步维艰。

凡此种种，让很多热心肠的人，在顾虑重重中，止住了助人的脚步。

湖南 蒋平

维修的猫腻

因为现在的住宅都注意安全，小区家家都安装了可以对讲、可以控制楼下单元门锁的对讲器。平时来亲友也好，接快递也好，都可以先通过可视对讲器看看，很是方便。前两天，家里的对讲器坏了，我爸爸就打电话给物业报修。物业很快就派来了维修人员，不一会儿换了一个配件，说可以用了，收了50块钱。维修人员走后，老爸注意到这个配件明显是旧的，就又给物业打电话，问为什么给换了个旧配件。物业居然问，旧的可以用，大家都用旧的，你要新的吗？爸爸说坏了的配件当然要新的，旧的能用多久！他又提出来上次维修人员收的50块钱没有收据，提醒物业再来维修的时候要把收据带上。

一会儿物业维修人员就又来了，解释说新配件是50块钱，如果用这个旧的，只要30块钱就好了，他愿意退20块给爸爸。还说，当然如果爸爸还要换新的，也可以换新的。这下子爸爸知道自己前面被骗了，很生气。告诉维修人员一定要用新

的，而且强调要有正规的收据。物业维修人员走了，稍后回来，立马给换了新的配件，还递上了收据。爸爸接过收据一看，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新配件居然只需要20块钱！维修人员抱歉地拿出30块钱还给爸爸，还递了一支烟，说老伯伯最好这个事情就不要投诉了。

我下班回家爸爸跟我说这个事情，他最开始是气愤，继而是感慨。气愤的是，这个事情一定是维修人员最开始就想用旧配件自己赚钱，才欺负他年纪大骗他。如果爸爸没提出来收据的事情，或者没有注意配件是旧的，那么维修人员就自己拿了这50块钱了。感慨的是，仔细再想想，物业也是一定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每次电话打过去都是物业值班人员先接的电话，然后派人来修，如果说物业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一开始也不会帮着说大家都用旧的。

我们住的小区很大，几百户人家，如果家家都碰到我们这样的问题，自己又没有防范意识，那么就只能上当受骗了。区区一个20块钱的配件，物业和维修也想通过各种手段把钱装到自己的腰包。老爸不理解，难道社会真的是硕鼠太多了，真的是防不胜防？看来国家打了“老虎”，也要整治“苍蝇”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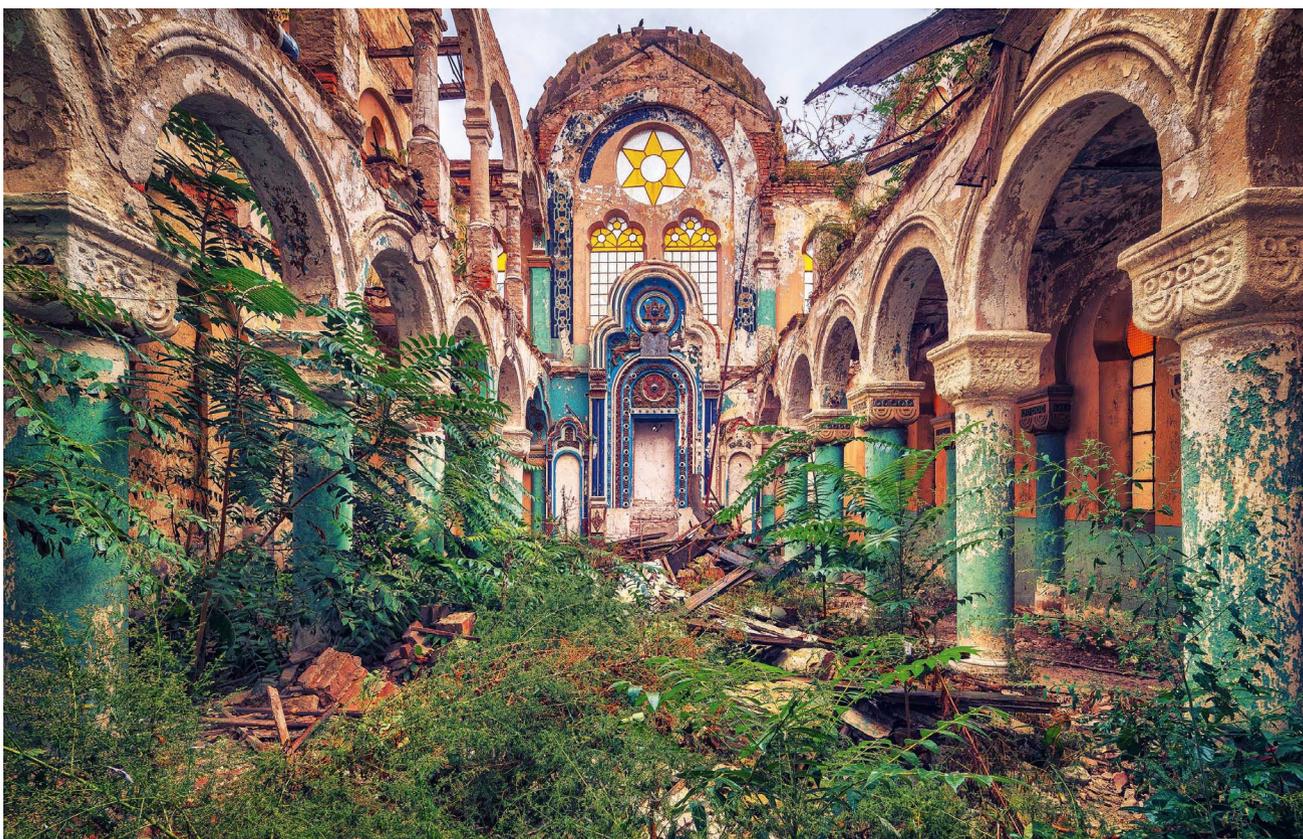
上海 姜女士



土耳其 | 牧羊人

4月25日，土耳其东南部尚勒乌尔法省(Sanlıurfa)，一名牧羊人在使用手机打电话。牧羊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高原放牧，他们在随行的驴身上背一块太阳能电池，来解决在高原上给手机充电的问题。





墨西哥 | 科罗拉多河

(右图) 科罗拉多河在墨西哥巴哈半岛流入太平洋，主干和众多支流在航拍照片中如同一棵大树的树杈。



西班牙 | 婚纱周

(左页上图) 4月27日，在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模特展示西班牙著名婚纱品牌 Jesus Peiro 的作品。2016 巴塞罗那婚纱时装周于4月26日在巴塞罗那开幕，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1个品牌推出最新款婚纱。

德国 | 荒废的教堂

(左页下图) 4月29日消息，来自德国波茨坦的摄影师马赛厄斯(Matthias Haker)以“荒废的教堂”为主题，拍摄了一组亦真亦幻的教堂照片。他的镜头里既有金色的礼拜堂，也有杂草丛生的犹太人教堂，还有曾经用作祷告室现在却荒无人烟的建筑。这组照片最神秘之处在于，无人知道马赛厄斯是在哪里取景，他也从不会透露建筑的拍摄地。





土耳其 | 难民潮

(左图) 生活在土耳其伊兹密尔郊外难民营里的叙利亚难民。无论是从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还是从地理便利上，土耳其都符合“就近安置”叙利亚难民的要求。土耳其是叙利亚难民潮涌向欧盟国家最便捷的通道。根据欧盟—土耳其遣返协议，欧盟将出资 30 亿欧元，供土耳其接收被遣返难民。土耳其政府表示，第一批资金将用于在基利斯省难民营修建诊所和学校。

尼泊尔 | 地震周年祭

(下图) 4 月 24 日是尼泊尔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人们在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点燃蜡烛悼念地震遇难者。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 8.1 级强烈地震。尼泊尔境内造成约 9000 人死亡、2.2 万多人受伤，全国受灾民众达 800 万，约占尼泊尔总人口的 1/4。



卫星 Wi-Fi，但愿不是玩笑

文 / 邢海洋

4月1日愚人节，一条腾讯正尝试与NASA等机构合作，打造Wi-Fi卫星计划不胫而走。据“脸书”上曝光的细节，该工程要实现联通全球Wi-Fi，未来使用任何电子终端通过腾讯Wi-Fi管家都能连接上无线网。事后证明，这的确是一个愚人节笑话，一场愚人节营销活动。腾讯的机敏之处在于，它深知中国网民的敏感点，一个小新闻，引发一场网民的大狂欢。

网民的纠结不难理解，和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机器人、自动驾驶等未来科技在国内的进展相比，火箭发射和卫星技术更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短板。埃隆·马斯克的Space X和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都不仅把火箭送上了天，还实现了安全回收，中国的BAT甚至连涉猎都没有。中国的民营航天连第一步都还没有迈出，在未来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争夺岂止是失去了先机。

《金融时报》上刊载了一篇文章，指出在对未来的科技与市场竞争中，中国已经找到了对付西方王冠上仅剩的宝石“FANG”的办法。“FANG”指Facebook、Amazon（亚马逊）、Netflix与Google（谷歌）四家互联网公司。“FANG”中不包含苹果，原因是只有这四家才是美国资本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企业，去年，虽然美国股市普遍呈现跌势，但FANG的股价平均大涨逾70%。FANG代表着长远敏锐的眼光，独到卓越的技术，一言以蔽之，它们集科技与市场为一身，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的探索。而中国，这个一直在技术与财富的台阶上亦步亦趋地追赶的国家，已经有了对抗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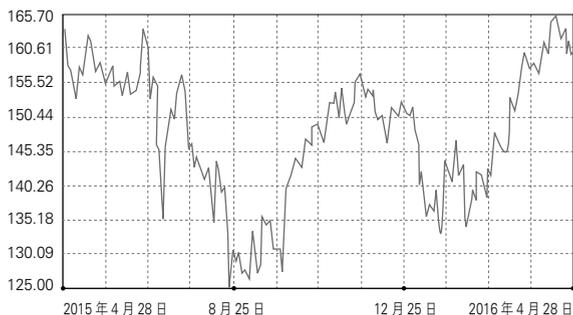
国最顶尖科技企业的方法。《金融时报》的答案是：“BANT”——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网易（Netease）与腾讯（Tencent）。用以佐证作者判断的事实是，过去一两年，来自西方的资本在这四家中国科技公司的配置剧增。

但中国的网民并不买账，“BANT”之所以能够如此强势，一大原因是市场基数，在一个13亿人口，且传统服务业不发达的市场，任何一项对准传统产业的竞争策略都会奏效，这就是BAT热衷于在O2O、线上金融等诸多市场空隙跑马圈地的原因。但如果未来有一天，BAT不得不与FAG（这里将视频网站Netflix去除）直面竞争，BAT的后劲在哪里？BAT中，百度无疑是最注重技术研发的，不惜重金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都上了拥堵的北京五环路。3月，Alpha Go赢得人机大战的时候，面对网友对于百度和Google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上的对比调侃，百度回应“已将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应用到了百度外卖中”，“用于送外卖的人工智能和用于下围棋的人工智能本质上并没有优劣之分”。诚如所言，但人工智能用在给大街小巷呼啸奔驰的电动摩托派活，还是让人颇有“穿越感”。

2007年1月苹果发布了其首款苹果手机，屈指算来已有10年，在互联网领域，10年一个周期。今年4月底苹果第二财季季报推出，2013年来季度营收首次回落。这一期财报颇具象征意义——发轫于苹果的智能机和移动互联网迈过了高速增长期，进入了不那么让人激动鼓舞的普及平台。英特尔裁员1.2万，微软财报不佳，上一波PC时代的两大巨头被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后起之秀追赶得疲惫不堪。即使是移动互联网领域两大巨头谷歌和苹果也没有了昔日灼灼逼人的动力。未来10年，划时代的产品又将出现在哪一个领域，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电动汽车，还是虚拟现实？未来掌握在科技巨无霸的手中，可惜的是，所有这些，中国互联网巨头都慢了半拍。

回到火箭发射与回收这件看似与互联网企业不沾边的事。无论何种科技，最确定无疑的盈利模式是扩大用户基数。目前全球有27亿人可以上网，只占全球人口的1/3，很多贫穷偏远的地区，没有能力大幅

腾讯股价（单位：人民币元）



度提高基础通信设施建设水平，也无法架设通讯中继塔。未来继续深耕互联网的企业，这一部分潜在的用户将提供企业扩展的方向。今天，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网络渗透率几近饱和，下一个十年数十亿网民，90%都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以更了解发展中国家网民需求著称的BAT似乎有着确定无疑的优势，但西方企业凭借技术上的优势，从未失去对互联网核心技术的控制。未来一旦在网络接入上跨越地理意义上的边界，鹿死谁手也未可知。

当然，把网络建到人口稀疏、人均收入不高的广袤的地球腹地，此前性价比上不可能，未来也需要技术突破后成本大幅度降低后才会实现。对此，谷歌一直试图用高空气球提供免费网络，Facebook则希望通过太阳能无人机覆盖。Facebook推出的“天鹰座”(Aquila)的大型太阳能无人机，翼展超过波音737，重量却小于一辆小汽车。机翼上铺满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在空中长时间巡航。6万英尺的巡航高度是Facebook经过精心测算的结果，既可以充分提高覆盖地面的面积，也不会损失过多Wi-Fi信号强度。谷歌也在尝试无人机Wi-Fi，它收购了拥有太阳能无人机技术的Titan公司，名为“泰坦”的无人机拟于今年首飞，阶段性目标是连续飞行5年不用落地。但与无人机和高空气球比起来，由数百个近地卫星网络组成的移动网络对地球表面的无缝隙覆盖才是谷歌与Facebook的雄心所在，凭借卫星，互联网巨头才能最终攫取传统电信服务商盘踞的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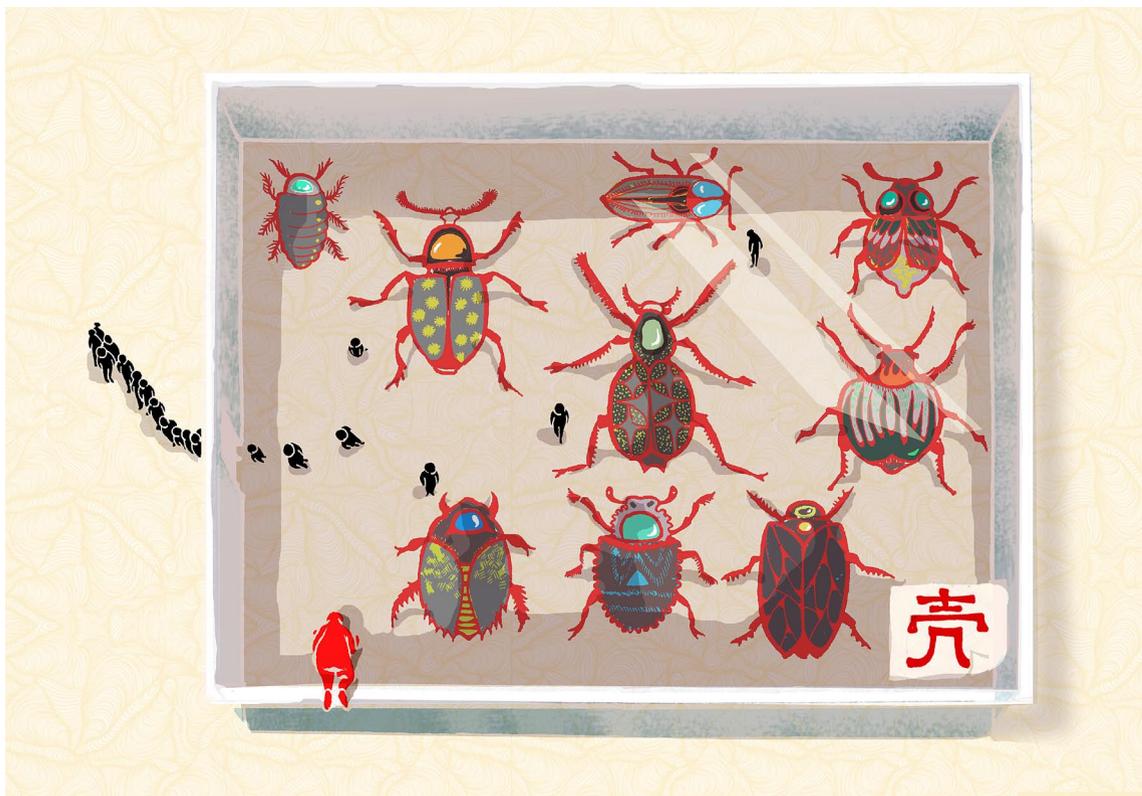
卫星接入互联网，技术上并非不可行，只是现阶段费用惊人。并且，手机、电脑等终端与卫星互动时，信号发射功率远达不到卫星，使卫星Wi-Fi更像单方向传输信号的卫星广播。腾讯卫星Wi-Fi的消息一出来，“知乎”上一众技术达人就对技术障碍进行了探讨，有人还在飞机上追寻Wi-Fi信号的来源，证明通过卫星上网的可行性。实际上，以现有的科技水平，选用特定的信号传输波段，可以极大降低信号在大气层的衰减，只要功率足够大，距离并不是问题。剩下的最大障碍，也就是卫星发射的费用了。

早在制造电动车前，技术狂人马斯克就已经投身太空探索、制造火箭了。他挤进这个由政府一手操

办的领域，一个基本的判断是，虽然这个领域技术上已经相当成熟，可因为安全的需要，这里面充斥着技术保守主义和四平八稳的工程技术人员，建造火箭的成本远高于同时代技术进步带来的可能性。降低成本的最大可能性还不仅于此，而是来自于火箭的回收和重复利用。发射一次火箭，最少也要6000万美元，大部分的成本用在了一次性的、推进后即坠毁的火箭上，而全部燃料的价值不过几十万美元。以Space X的“猎鹰九号”为例，其燃料价值仅20万美元。据测算，对第一级火箭实现回收重复使用，能将发射费用节省80%；如果加上第二级，费用可节省98%。此前，NASA的航天飞机也在尝试重复回收利用硬件设施，可回收的是飞行器部分，如今这个回收推进器的夙愿被来自互联网的偏执狂贝索斯和马斯克了却了。

说到此，还需要顺带提及中美两国的太空战略。“猎鹰九号”首次完成海上平台着陆后，美国空军授权Space X发射一枚美国国家安全卫星。在Space X艰难的创业期，它的很多技术来自NASA的让渡，大部分合同同样来自NASA的赐予。太空探测深奥枯燥，早不像当年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能激起公众的热情，近年来国会批准的NASA经费逐年减少，NASA索性支持私营企业如Space X担当起很多此前政府机构完成的工作。中国的航天事业则完全是一种不同的景象，据《财富》报道，堪称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人造物体，耗资高达1500多亿美元的国际空间站很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初期资金来源耗尽，可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却有望完成自己的空间站建设。中国在航天工程上雄心勃勃，载人飞船、登月等巨大的航天工程和马斯克百万人移民火星的宏大构想相映成趣，美国政府却日渐低调了。

中国的航天事业历来国家主导，美国航天工程项目一直采取的都是主承包合同制，不同的发展路径早决定了私营企业开发太空的空间。但愿这次的Wi-Fi卫星计划并不全是愚人节玩笑，而是中国互联网企业迈向全球互联的一个确定的信号。毕竟近几年腾讯在Wi-Fi领域逐步加大力度，从互联网接入端口主宰用户的雄心早就显示出来，对卫星Wi-Fi的关注与研究，相信不会懈怠。■



栏目插图 | 范薇

千万见面费

注册制、战略新三板推出未达预期，渴望回归 A 股的企业排成队，且都财大气粗，壳市场堪称疯狂，甚至疯狂到跟壳公司老板见面也要千万“门票”。A 股约 47 家具备壳资源潜力公司，自 3 月份以来股价普涨约四成，一些垃圾壳公司、僵尸企业股价被炒上了天。壳公司的典型特征是：主营业务低迷或者没有多少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差；公司股权分散，控股股东持股比最好低于 30%，否则，控股股东的话语权太强；市值则越低越好，最好不高于 50 亿元。

沪伦通

据《信报》报道，作为 G20 主席国，在 9 月的峰会上中国将宣布“沪伦通”（上海与伦敦互联互通）。沪伦通以最直接和快捷的发行 GDR（全球存托凭证）模式，中国企业会发行 GDR 在伦交所挂牌，英国富时指数成分股亦可能发行 GDR 在上交所挂牌。作为起步，中方 GDR 不会超过 10 只，内银、内险及石油股有机会抢闸。证券界认为“沪伦通”的最大意义，是显示内地有条件绕过香港自行与国际市场接轨，对香港 H 股的股价有一定影响。

财报季的裁员

美股一季报的大潮流是裁员和重组。油田服务公司哈利伯顿（Halliburton）裁员 6000 人，一季度共支出重组成本 21 亿美元，部分即用于支付员工解约费用。英特尔宣布将裁员 1.2 万人，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 11%。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净削减员工 2500 人。裁员企业多受累于大宗商品低迷、对中国前景忧虑以及美元坚挺。一季度过后，基本面有所改观，裁员不足为虑。





二线狂奔

3月沪深楼市新政后，一线楼市受压，二线楼市却成为楼市主角。3月，二线城市成交量同比增98.3%，一些二线城市如苏州、合肥、珠海、东莞等同比上涨了30%以上。截至24日，4月二线城市住宅土地市场成交量虽然不高，但土地价格明显上涨，平均溢价率高达72%，刷新了历史纪录。成交平均楼面价达到4519元/平方米，同比涨幅高达183%。一线供地日渐稀少，二线成为房地产主战场。20家大型标杆房企九成资金奔赴二线城市拿地。

远高于东盟的劳动力成本

全球咨询公司韬睿惠悦(Willis Towers Watson)发布的研究报告表示，新兴的东盟经济体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正在侵蚀中国的竞争力。印尼是东盟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国家，而中国各行业的基本工资比印尼高出5%~44%。中国初级白领平均的基本工资是2.1万美元/年，高出印尼相同阶层雇员的30%。专业的和中级的管理阶层，中国专业人员的平均薪资是越南和菲律宾的1.9倍到2.2倍。高层管理和最高层管理薪资，中国比印尼高28%和5%。

债市冰冻

4月1日至25日，至少有103家发行人取消或延迟了共计1173.8亿元债券发行计划，金额是去年同期的约3.4倍。4月11日，中铁物资突然公告旗下168亿债券全部暂停交易，成为压垮债券两年大牛市的最后一根稻草。中铁物资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评级在AA+，属于仅次于AAA最高级的债券评级。去年以来，信用风险深入债市腹地，信用风险爆发路径已从民企行至央企。央企的违约，使投资者失去了对债市信心的最后一道屏障。

日本央行买买买

负利率效果存疑，日央行可采取的措施越来越少。买股票以释放流动性成为常用的政策工具。按现行刺激计划，日央行每年买入约3万亿日元(272亿美元)的ETF。据彭博汇编的公开数据，日本央行已跻身日经225指数约90%成分股的前10大股东之列。下一步宽松中央行购买量还可能扩大，并可能在2017年底成为约40%的日经225家成分股公司的最大股东。目前，日央行已持有优衣库约9%、酱油生产商龟甲万近5%股份。





樱花上山

面对气候变暖导致的生存环境恶化，许多动物都会选择出走避难。日本茨城森林综合研究所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没长脚的樱花树虽然自身无法移动，但却可以利用熊的帮助让后代生活在更宜居的地方。研究者指出，以樱桃为食的熊在向气温较低的山上迁徙时，藏在其粪便中的樱桃籽也会随之被搬运到高处，在那里生根发芽。在调查中，子代樱花平均比其上一代向上迁移了307米，而高海拔处的温度比山下低了2摄氏度。这足以抵消数十年的气候变暖影响。

好消息

音乐之声

在婴儿游戏的时候播放背景音乐，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更早地开口说话。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学习与大脑科学研究所针对39名9个月大婴儿的观察试验显示，接触音乐能帮助婴儿觉察和预测话语中的韵律模式并做出反应，这对语言学习十分有益。



蓝光的祝福

手术之后的血液再灌注问题常常会导致器官损伤，但美国匹茨堡大学的研究小组针对小鼠的实验显示，如果在手术之前让小鼠在模拟强化日光的蓝光中停留24小时，出现免疫细胞过度反应、攻击自体器官的概率可以显著下降。

坏消息

女人拒绝夜班

英国萨里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指出，当正常的睡眠—清醒周期被人为打乱时，女性受到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男性。对34名志愿者进行为期28天的跟踪调查后，研究者发现，女性在夜班工作后认知能力的下降和情绪波动的幅度都要超出男性。



告别红床单

在旅游成潮的时代，床虱成为困扰众多常在路上之人的大问题。如果不想成为传染链中的一环，根据发表在《医学昆虫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结果，最好离黑红两色的床品远一些，而选择色彩明亮鲜艳的白色、黄色或绿色的床品和行李箱。

在这样一个夜晚，一个诗人使劲拉着他的弓，寻找一个词，能够包含台风的威力，血与种子的秘密。

——普里莫·莱维，《韵律反击》

做有用的事，说勇敢的话，沉思美好的东西，人生有此三者足矣。

——T.S. 艾略特

HBO 的电视剧大多非常美国化。一名泰国观众观看新泽西州的托尼·索普拉诺与家族争斗，有什么意思呢？但《权力的游戏》是奇幻题材，以一个想象中的王国为背景，讲一些普遍问题——权力和家族、爱情和责任，诸如此类——的确很能迎合许多不同的文化。

——乔治·马丁谈《权力的游戏》何以成功

疯狂好歹是一种本质的力量，而愚蠢是本质的一种衰弱，无法弥补。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

如果你是一位正要去面试的女性，而你的面试官恰好也是女性，那或许就不应该过度炫耀自己的奢侈品，因为这有可能对你不利。

——美国卡罗来纳海岸大学市场营销教授卡罗尔·梅格希表示，品牌标志在多数情况下都会带来明显的好处，但女人之间却会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至少，嫉妒心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插图 山羊胡)



只有表面的气质才能持久，深层的秉性很快就会被别人看穿。

——王尔德，《自深深处》

+/-

数字

13

%

财报显示，苹果公司今年一季度营收为 50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这是该公司自 2003 年以来季度营收首次出现下滑。库克向分析师表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市场、特别是我们自己，会再次呈现增长。”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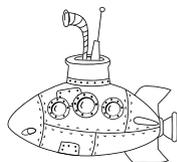
名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近期公布 2016 年富豪排行榜名单，伦敦是全世界诞生富豪最多的城市，共有 77 名亿万富豪。亚洲城市中，香港名列第四名（49 位），北京排名第七（33 位）。美国则有三个城市挤进榜单前八名，分别是纽约第二（61 位）、旧金山第三（57 位）以及洛杉矶第六（35 位）。第五名是莫斯科（38 位），第八名是巴黎（30 位）。

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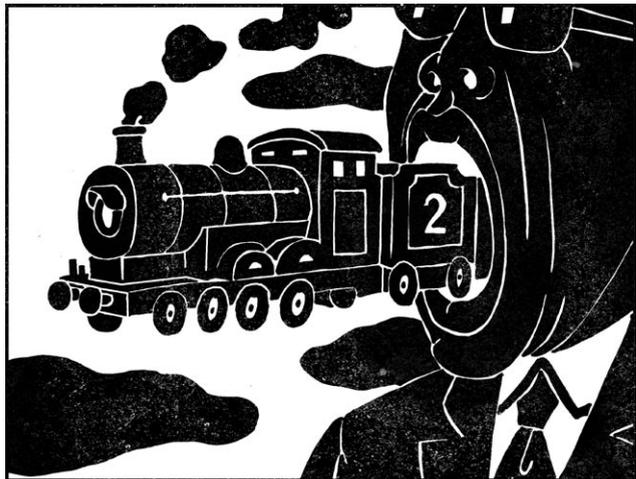
亿美元

法国军用造船商 DCNS 公司夺得澳大利亚新型潜艇招标项目，为皇家海军建造耗资 386 亿美元的新一代潜艇。合约中的 12 艘潜水艇将在阿德莱德建造。法国成功中标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公司的设计将采用能降低噪音的泵喷射推进技术。



浮夸

文 / 阿之
图 / 谢驭飞



老K是个很浮夸的人，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刷存在感。逢年过节是他刷存在感的高峰期，他在端午节扮过屈原、儿童节扮过吴宗宪，摆好姿势后发一组自拍到朋友圈去，总能引发一阵文字上的嘘声。某明星公布恋情那天，为了应景，他在微博上上传了一张在国外夜店和一群兔女郎的合照，并打上“我们”的标签。他身高1.85米，皮肤黝黑、满脸粉刺的壮汉插在半打多袒胸露背的白人妹子中，还特地给这条微博配上一句：“你们猜猜我是哪个？”了解他习性的基友们都只转发不评论，谁知一传十、十传百，那条微博的转发量数日内直逼四位数。

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王娇蕊有句名言：“如果你有门手艺，你总舍不得不用。”勾引男人之于王娇蕊，就如同刷存在感之于老K，不但是技能，还是本能。别看 he 外表粗糙，这不修边幅的外表下却有颗细腻的心。老K从小热爱模仿，因为擅长捕捉人物特征和细节，总能模仿得惟妙惟肖。别人问他：“那么有天赋当初怎么不去考电影学院当演员啊？”他淡然地答道：“功夫在诗外。”然后就进了和电影稍微沾点边的动画设计专业。

老K的大学时光并未像他预想的那样叱咤风云，原因是枯燥的上机操作和速写练习压制了他荷尔蒙的发散。他喜欢和人打交道，从人群中寻找温暖，哪怕是陌生人一个眼神的肯定，他也觉得有意

义。是的，大学有很多文艺汇演，但那是街舞和摇滚乐队的天下，从小缺少文艺训练的他，上台讲话都会结巴。他曾经在系里的英语演讲比赛上事故性结巴过一次，结果评审老师都以为他在模仿阿甘，差点临时为他专门设置一个“最佳表演奖”。

据老K自己透露，他谈过三个女朋友，三次都是女方提出分手，理由都是“没有安全感”。每当别人和他谈到感情问题，谈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别人还真不会再追问些什么，可见人民群众对于老K的终身大事，还是充满信心的。毕业后的老K进了某家新兴的文化产业公司，那个公司当时做的项目是一档辩论型的网络脱口秀节目，这档节目每期都有个辩题，嘉宾辩论前，都会播放一段动画短片预告辩题所涉及的故事场景，而老K的工作，就是制作这段短片。

经过一期期节目的积累，节目组的总导演发现老K编故事的水平要远远高于制作短片的水平，求贤若渴的他立马把老K拉进导演组，这可把老K高兴坏了。马拉松般的录像过程累坏了好些选手，老K拼命地在旁边给他们讲戏，引导他们的情绪，原本筋疲力尽的选手们被老K一启发，纷纷都来了灵感，于是这档节目的点击率节节攀登，成了炙手可热的节目。以老K的性格，肯定按捺不住寂寞，说不定到了下一季，你就会看到他以辩手的身份在这档节目上出现，困扰他多年的结巴都给治好了。☑

大师

文 / 小L
图 / 谢驭飞



在一片鸡飞狗跳中，她见到了大师本尊。

从深圳来这座无名小镇，要搭一班飞机、一趟大巴、一辆小巴和一台电动三轮。花的时间，几乎够她去趟悉尼或者巴黎了，但她偏不，谁让她是文艺青年呢。大师是民谣歌手，和他的一批追随者，隐居在这小镇的僻静处。院子不大不小，除了他们，还能容下些慕名而来体验生活的知识青年，也是笔收入。收入并不可观，但在这无名的小镇，自给自足是远远够了。师母从农家厨房灰头土脸地迎出来，笑意盈盈的，顺便撒了把米，这才引发了见面那一轮的鸡飞狗跳。

这日子是多么惬意啊，她想。吃完了师母掌勺的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她和大师以及大师的追随者们，在烛光辉映下唱起歌。也曾仗剑走天涯，看过了世界的繁华。怎么她就一定要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做着让她日益麻木的工作呢。赖在这间小客栈里，她几乎哪也不想去了。大师似乎有意无意地对她表现出了非一般的关注，她尴尬地挡着，毕竟有师母在。

大师追随者口中的大师，真的很厉害。不仅在“文艺界”小有名气，当地为数不多从事旅游业的司机啊、餐厅老板什么的，都主动介绍游客到这里来参观游览。一线城市来的白领，特别是

女性，来了就啧啧称奇，没想到世间还有这样充满仙气的所在。

恰好赶上大师起头并组织的无名小镇音乐节，她也好奇跟过去看了。舞台是农村婚丧嫁娶时搭来唱戏的野台子，台下三三两两的观众，看上去也似乎分不清民谣和民歌的区别。她尴尬地站在大师旁边，扯出个笑容。大师问：“不错吧，这设备、这台子，都是我搞起来的。”音乐节开始，大师的追随者热了场大师才上场，兴致很高。几首过后，大师一把把她拉到台上，让她和他一起摇摆。

演出归来，是她旅行的最后一晚。师母问她，怎么样，听大师说演出很成功啊！她只得敷衍几句。饭后大师趁着酒意正酣，握住了她的小手摩挲着。在火光中她看到大师那张中年大叔微瘫的脸。她一阵作呕，抽回了手。

还好第二天一早就要走了，她离开小院的时候没有看到大师。只看到一群刚从上海风尘仆仆赶来的时髦女青年，叽叽喳喳的，其中一个骄傲地给同伴们介绍着大师的音乐。也许大师只是醉了吧，她想。顺便把修好的图片发上了朋友圈，配了文字：精神之旅结束，要回归世俗生活了。☑

与牛先生有关的

文 / 红酒提子

图 / 谢驭飞



和牛先生在一起的那个初春，我18岁零6个月，而他刚刚过完19岁生日。他大概是想少送一份礼物，特意挑选了情人节过后来表白。牛先生对此说法感到委屈，因为2月中旬是他的生日，他只是不想我破费。那时候，学校的小吃店里卖一种脆脆的红薯干，我喜爱至极，直吃得口舌生疮。就在我决定肃清嘴里面的火泡时，牛先生约我去校园里散步，手上攥着一包刚买的红薯干。小吃店开发了新品紫薯干，牛先生很兴奋地捧到我面前。几口下去，火泡依旧疼痛，嘴唇还变成了紫色。牛先生看着第一次约会的女生活像中了毒，尴尬得走起路来都顺拐了。

牛先生自诩有点文艺情怀，端了奶茶背了吉他在寝室楼下等我。从阳台上望下去，他笔直的身体像在拔军姿。我自然欣喜，却又忸怩着小女生的姿态问他：“我们去哪里呀？”牛先生漆黑的眼睛里似有火焰，紧紧盯着我说：“我们去操场数月亮吧。”他或许是计划好的，那晚果然没有星光。初入学时，他与几位同学建立了一个公众平台，通过飞信来发送热点新闻和校园动态。一开始是抱着帮附近商铺打广告的营利心态，渐渐的就变成了大家的天气预报。牛先生给我弹吉他的那晚，平台推送的消息上写着：

“今夜晴朗无风，非常适合看星星数月亮等活动。小编一只牛祝大家晚安。”我把那条信息收藏在直板诺基亚里，却怎么也不能倒入新买的智能手机。

牛先生很喜欢他这个姓氏，也喜欢这种动物。他说按照家里的辈分，他的孩子要随“满”字辈。我想了想说：“那你多生几个，分别叫牛满天、牛满地、牛满教室、牛满操场。”那时候是真的青涩，所想到的地点尽是学校场所。牛先生送我的东西，台灯镜子充电宝，无一例外都是奶牛的造型。我看着自己桌上床上铺天盖地的黑白色块，默默地咬一口他刚刚给我买的“巨牛”牌牛轧糖。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带着这些小花牛和牛先生分手，还把所有黑白颜色换成了自己喜欢的维尼熊。可是牛先生的痕迹还是无处不在。他毕竟是精通计算机的工科高材生，我电脑上有有趣又实用的软件都是他给装的。或许牛先生的痕迹永远也不会消失，因为看到他的名字，我就回到青涩的十八九岁。而梦里明媚又青葱的校园，又总是有他的身影为衬。牛先生发来的文件夹里，还有一些他原来为我拍的照片。然而单反这项“撩妹”技能，受用之人却不再是我了。☑

一只不会说话的羊

文 / 绮一
图 / 谢驭飞



杨先生不会说普通话，这也没什么，大家都可以理解。然杨先生却又是那个实诚得过了头的人，人们对他的统一评价就是：这位先生说话太难听了。

杨先生说话总是很真实，感情又很真挚，不掺一丝的虚假和矫揉造作。杨先生原先有个朋友叫吴先生，吴先生离过婚，后来又找了一位妻子，于是摆酒设宴庆祝二婚之喜。杨先生作为吴先生的朋友被邀请到酒席上，酒过三巡后，平时寡言的杨先生话也多了起来，他对着吴先生的妻子说：“嫂子，你是不知道老吴原先的妻子有多么貌美，老吴今日娶了你，你们二人一定是真爱啊！”杨先生言语间又是满目的真诚，大家倒希望他是胡言乱语的酒后疯话，但是当时杨先生的模样又清醒得很，大家都尴尬地低下头夹起菜来，没人再去理会他，吴先生的妻子则转身去别的桌敬酒去了，再没来杨先生这一桌。

这些年来杨先生得罪过的人不少，因为说话难听，人们都觉得杨先生还不如他那哑巴儿子呢，起码安安静静老实本分，不像杨先生走到哪儿只要一开口，就涌起一阵微妙的尴尬气氛，让大家都不快活。杨先生时常对他的哑巴儿子说：做人要诚实，不可弄虚作假、故弄玄虚，是什么就是

什么，唯真实是唯一追求。

杨先生的儿子被人贩子拐走了，人贩子和杨先生不同，能说会道、舌灿莲花是他的拿手本事。楼上的胖女人是目击者，那天她买完菜回来走在楼道里时，人贩子领着杨先生的儿子正从楼上下来，人贩子和胖女人擦肩而过时，她甚至往边上让了一下。杨先生的儿子为什么会跟着一个陌生人走了？胖女人心里当时也有这样一个疑问，但是很快她就不想了，反正这不关她的事，她也不想和杨先生说一下。后来警察问到她时她才说出了自己看到的，杨先生双目睁红地对她吼：“你这个死胖子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胖女人白了杨先生一眼，说：“你一张嘴说话就这么难听，我躲你都来不及呢，才不要和你说话！”

后来杨先生没再说过一句话，也没有人知道杨先生的儿子究竟找到了没。人们只看着他时常背着一个印有聋哑学校字样的书包出现在小区内，他总是神色木然地快速走过，风吹过他如羊毛一般的细密和雪白的头发，杨先生的嘴没再张开过。■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玫瑰金手镯

伯爵 (Piaget) Secrets & Lights 高级珠宝的 18K 玫瑰金手镯，镶饰了 1 颗枕形切割红宝石，以及马眼式切割的 8 颗红宝石、6 颗粉红色尖晶石、8 颗柑橘色石榴石、10 颗黄色绿柱石等。马眼切割方式始于法王路易十五时期，象征着诗意与性感，令钻石闪耀独特光芒。

森林灭火无人机

由 Charles Bombardier 设计的 Firesound 无人机外形类似飞碟，其独特性在于其能够通过声波将可燃物质与氧气隔离，从而消除一些小型火情。该无人机由氢燃料电池提供能量，还配有四个电动旋翼增强飞行稳定性。



Dolfi 香皂洗衣机

这款形似香皂的小装置其实是一款可通过超声波技术秒变洗衣器的设备。其使用原理与“热得快”相似，只需给它通电，并把装置丢进洗衣容器中，Dolfi 就会利用超声波转换器自动形成高压泡沫和旋转水流，完成洗衣过程。其耗电量仅有普通洗衣机的 2%，简易便携实属居家小助手。



智能戒指

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学生利用 3D 打印技术将自己名字打印在这款形似戒指的“可穿戴交通卡”上面。他们将 RFID 芯片集成到可随身佩戴的“Sesame 戒指”里面，协助完成传统公交卡片充值扣费等一系列功能，优化出行，免去了翻找公交卡的困扰。



最小心脏起搏器

这款 Micra 导管心脏起搏器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一款起搏系统，仅有普通起搏器大小的 7%，约为一颗大粒维他命胶囊大小。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款不需要使用导线植入的起搏器，有助于避免由导线而引发的并发症，为患者降低了使用风险。



充气照明灯

由美国建筑系学生安德里亚 (Andrea Sreshta) 和安娜 (Anna Stork) 发明的可充气式简单便携的户外灯具 LuminAID，能够利用太阳能光照高效充电，使用时长高达 30 小时。同时这款灯具还使用 IPX7 级专业防水材料，可用作水上浮标。为了增加功能实用性，照明灯还配有紧急闪亮模式，以备危急求救时使用。

夜行背包

这款 Meet Aster 夜行背包的独特之处在于背包尾端置有 LED 红色转向灯箭头和自动刹车指示灯，能使后方车辆在 250 米的距离内清晰辨识，避免追尾，也摆脱了打手势的传统提醒方式。这款背包的最大创意在于其附带的“急救信息插槽”，可显示用户血型、过敏原和紧急联络人等个人信息，以便在发生意外时提高救援效率。





夏日花田

瑞士 DeLaneau 品牌的“花田”女装腕表，大明火珐琅表盘如同一幅微型的印象派绘画，细腻地表现出夏日郁金香和罂粟花田柔和朦胧的色彩。

清新帆布椅

Caracas 帆布椅是 20 世纪 60 年代露营椅的更新版本，纯白色的金属支架搭配几何色块的彩色帆布，传递夏日海滩般自然清新的氛围。



玻璃鱼盘

意大利设计师波拉·纳沃内为 Serax 设计的“鱼”系列餐盘，制作时使用了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传统模压玻璃技术，轻微染色的绿色玻璃传递出复古的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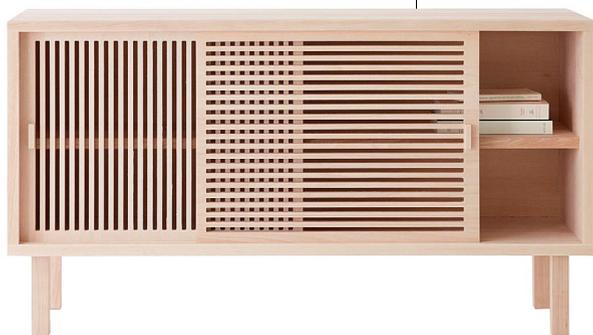
天堂主题

迪奥 2016 年新款“天堂”主题包袋，白色小牛皮的表面装饰浮雕图形的 Dior 徽章以及纤细的花朵图案，让经典的 Lady Dior 手袋变得面目一新。



马戏团吊灯

Louis Poulsen 的“马戏团”吊灯，多彩条带装饰着铝质灯罩的表面。它的设计是受旋转木马的启发，木马旋转起来的时候，各种色彩合并在一起变成水平的条带。



京都边柜

Colonel 的“京都边柜”以自然色的实心山毛榉木为材质，创意来自日本传统旅馆的推拉隔断。边柜的两块面板可以滑动，交叠的线条形成了全新的图案。

几何阶梯

阿富汗珠宝有着超过 3000 年历史，Turquoise Mountain 的 Pippa 项链取自古阿富汗和土库曼的设计灵感，黄金外框的青金石以三角形、圆形和长方形呈阶梯上升。



与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对面

苏维埃人的 “二手时间”

文 / 刘怡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学楼，并不像该校的其他建筑一样坐落在明斯克市西南方的近郊。自1967年投入使用以来，这幢六层楼房就成了首都市中心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标。我从火车站附近的卡尔·马克思大街一路摸索而来，当看到那座简洁的现代主义建筑时，突然产生了一个意外的联想：阿列克谢耶维奇入读新闻学院是在1968年，也就是这座大楼建成的第二年。不知不觉已经是整整48年前的事了。

在实行12年义务教育制的白俄罗斯，大部分大学新生的年龄不过17岁，相较中国大学生要稚嫩一些。授课结束后，他们中的一些会聚集在走廊里，三五成群地讨论着课业和娱乐话题；另一些则有秩序地集中到教学楼背后的一条走廊里，分享“明斯克牌”和“爱克特帕牌”香烟——作为全欧洲卷烟价格最低廉的国家，白俄罗斯大、中学生里的烟民比例超过65%。我就在这条烟雾缭绕的走廊里开始了发问。

“你们听说过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吗？”

回答“是”的学生比例之高，与真正读过其作品的人数之少，形成了鲜明反差。不止一位学生告诉我，他们曾听自己的老师说起过这位著名校友，也知道在将近半个世纪前，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经像今天的他们一样，在这幢六层楼房里进进出出。但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的那些话题，对他们来说似乎过于陌生。一头金发的“大二”学生尤里安告诉我：“只有老年人会追忆苏联时代的往事。未必是因为他们爱苏联，只是因为他们在苏联治下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缅怀青春。对我们来说，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身处独立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土库曼斯坦人分开，好像没有什么不好。”

采莉纳在两年前从新闻学院毕业，任职于一家广告公司，在我的采访对象里，她是唯一一位完整阅读过《二手时间》的年轻女性。也是在那条烟雾缭绕的走廊里，她冷静地告诉我：“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是唯一一位从我们的阅读书目里消失的白俄罗斯





在白俄罗斯南部小城莫济里市中心的列宁广场上，两位师范大学的女学生且弹且唱。这里曾是受切尔诺贝利核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张雷摄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外的“斯大林防线”军事主题公园内，依旧会有人给斯大林的半身像献上花环

作家。大部分学生的年纪还很轻，他们在大学时代的阅读趣味，取决于中学时代老师对他们的教育和影响。倘若将一位作家从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名单里剔除出去，他们也许一生都不会接触到这位作家的任何作品。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个幸运儿——通过诺贝尔文学奖，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也会有人尝试从俄罗斯购买她的书。但更多名气更小的作家，或许将永远被隔离在一般大众的接触范围之外。”

24个小时后，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她并不感到意外，而是报以微笑：“白俄罗斯人与波罗的海三国或乌克兰的人大有不同。在基辅，大学生们的眼睛已经完全睁开了；但在白俄罗斯，‘红色文明’僵死的躯壳乃至‘红色人类’本身都还实实在在地存活着。”“对大多数白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

个混沌的年代，他们看不清未来。年轻人里最有活力、最具备独立思考意识的那个群体已经去了国外。”

在“烟草走廊”的那个奇异下午，最终把这次采访变成了一场奇特的寻找之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白俄国内的微妙处境，她的著作主题与年轻人之间的代际疏离，乃至弥漫在白俄罗斯全国的“政治冷感”，使得我们完全无法像描述奈保尔、帕慕克或多丽丝·莱辛那样，细致而精妙地勾勒出她与她居住的国度及其动荡历史之间的有机关联。我们选择前往三个国家，从三个不同的维度重新寻找她的生活和创作轨迹：我们往返于白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之间，探访她曾经定居和工作过的那些处所，倾听人们关于她的各不相同的回忆。我们前往已成废墟的普里皮亚季小城，在她曾经饱含感情地描写过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地，

回想 20 多年前《切尔诺贝利的祷告》的创作历程。我们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俄罗斯—苏联文学的思想谱系中，寻找她本人的写作渊源之由来，以及她的作品在这条汹涌大河中的位置。我们试图还原她在创作每一部作品时的处境和心情。

就像 31 年前率先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引入中文世界的翻译家吕宁思告诉我的那样：“她是‘最后一位苏联作家’。她所记录的人物和事件，她惯用的写作笔法，乃至她本人的文化观和世界观，都带有极其明显的时代印记。”甚至可以断言，被视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特色之一的复调写作（Polyphonic writing），也存在于她对记录题材的选取中。就像她本人告诉我的那样：“我希望记录和探究的是同一类人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在‘二战’时是如何，在将近 40 年后又是如何。”我们对她本人的“寻找”，同样遵循这一轨迹。

时间中的寻找

从布列斯特开往戈梅利市的 BCH-21 次卧铺列车，在卡林科维奇地区（Kalinkavichy Raion）设有一站。从那里乘汽车继续往南，穿过莫济里地区，便可到达人口不足万人的边境小镇纳罗夫拉（Naroulia）。整整半个世纪以前，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从这里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我们找到了 1966～1968 年她供职过的《普里皮亚季真理报》报社，两条街外就是她曾短暂担任过教师的本镇第一中学。比起讲话字斟句酌的明斯克人，这里的居民似乎拥有更多关于女作家的鲜活记忆：围坐在报社后门的几位老人肯定地告诉我，这排不起眼的小楼在此矗立已超过 50 年之久；与第一中学一墙之隔的小镇文化宫负责人也热情地向我们证实，尽管她本人在镇上只居住了 20 年，但曾经从许多人口中听闻过那位女作家、女记者许久之在此生活和工作的往事。

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对此地的态度颇为耐人寻味。她会饱含深情地谈起青少年时代在乡村生活的记忆，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在那些农忙之后的夏夜，失去了丈夫的农妇絮絮叨叨地对她讲述战争时期的经历。但她也善意地提醒我们：“那里的人们对外来者有些警惕之心，也会把想象掺杂在真实中讲给你们听。去年他们曾告诉几位西欧记者：‘诺贝尔文学奖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发给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种心理上的封闭和距离感，同样表现在当地的建筑风貌和生活方式上：分布在小镇中心的列宁广场、政府办公楼、文化宫和学校忠实地保留了苏联时代的原貌，人们依旧用马耕作，中老年居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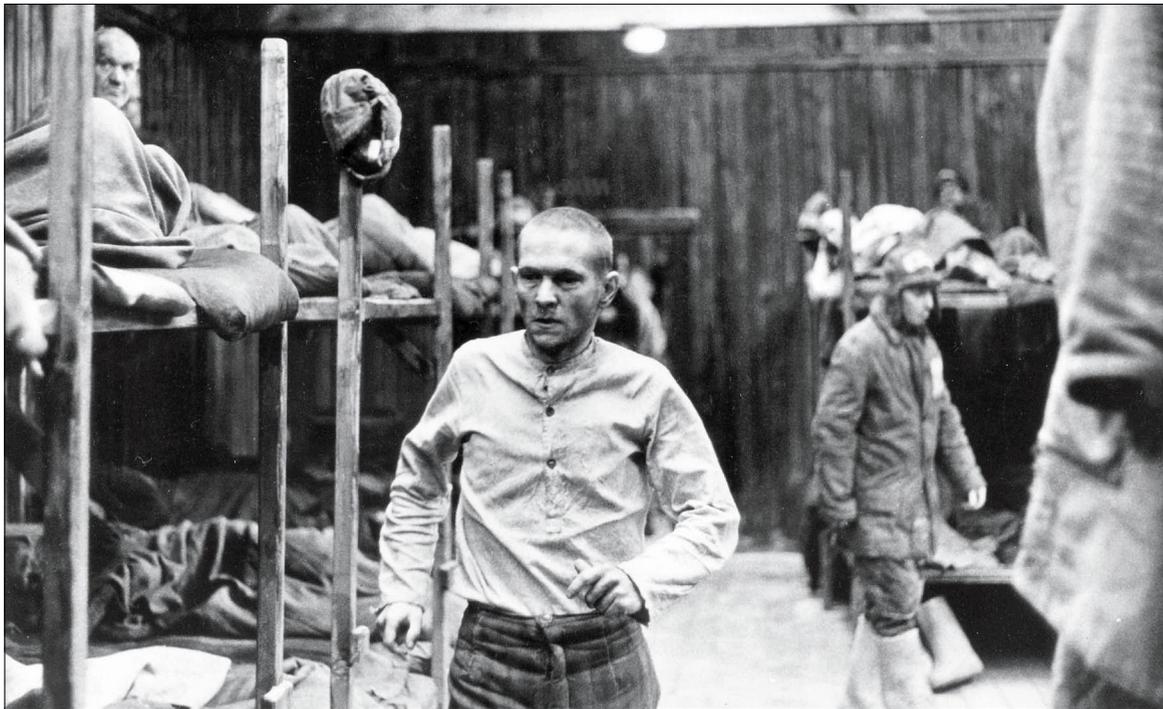
数量明显多过年轻人。即使是在相对繁华的莫济里地区，晚上 10 点以后街头也往往空无人烟。你可以看到 30 多年前生产的“奥迪 80”和“奥迪 100”型二手车在四处奔驰，而在两天半的探访经历中，我们甚至 3 次召到了同一位出租车司机：时间在这里仿佛早已凝固了。

在明斯克和布列斯特，我们与大学生、铁路工作人员、商人、司机反复交谈，从他们的回答中捕捉世道变化的印记。唯独在纳罗夫拉和莫济里，只有年轻人和老人愿意与我们稍作攀谈。但这种时间上的凝固性并非主观选择的结果——整整 30 年前，发生在国境另一侧、仅仅数十公里之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永远终止了纳罗夫拉开发和扩建的可能性。在小镇东南方的波莱谢国立放射生态学保护区，70 年代末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工业大学的老司机指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道路右侧，奶牛和马匹依然在田间悠然行走，黑色的土壤已经有春耕翻犁过的痕迹；而在道路左侧，绿草茵茵对应着的是一片死寂。被辐射污染过的土地在数百年里都将无法耕种，也永远无法再像 1986 年之前那样，充当白俄罗斯全国的粮仓。灾难发生后的几个月里，15 个村庄、超过 2300 户人家从这里迁出，留下的只有随处可见的黑黄双色放射性标志。时间被强制定格在了那一刻。

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对 20 世纪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其影响甚至超过了纳粹大屠杀和苏联解体。因为它永远改变了我们居住的星球：被污染过的土地、河流和森林在成百上千年内都将无法摆脱辐射残留，‘冷战’和‘铁幕’从空间维度侵入了时间维度。”而发生在那个曾经的统一共同体中的灾难，在 1991 年以后，将主要由新诞生的白俄罗斯共和国的人民来承受。于是，女作家在年近半百之际，重新返回到 18 岁时生活和工作过的纳罗夫拉小镇，与那些她曾经熟悉和亲近的人们交谈，留下了关于那场悲剧的最震撼作品《切尔诺贝利的祷告：留给未来的编年史》，也给我们在时间维度中的追寻，留下了醒目的指示标。

地理中的寻找

从波莱谢保护区继续向东南方深入，越过白乌两国国境，便靠近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第一发生地。与素来人烟稀少、因之不容易为人们所关注的白俄罗斯乡村相比，废土化之后的乌克兰边境城市无疑更令人触目惊心。整整 26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隔离区，切尔诺贝利城和普里皮亚季城的 12 万居民被彻底清空，留下钢筋铁骨的房屋、体育馆、工厂和游乐场在风吹日晒中慢慢朽坏。为预警核打击而建造的 DUGA-3 型超



1970年，根据索尔仁尼琴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挪威上映

视距雷达的接收天线依然矗立，但和整座城市一样，在30年前就已丧失了动力来源和灵魂。

与地理标识相比，人的记忆是更善变也更脆弱的。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我们与许多当地居民交谈，但即使是亲身经历过灾难之后恐慌和牺牲的人们，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的记忆也在渐渐淡化。“上帝在庇佑着我，”一位虔信东正教的老妇拉着我的手说，“我的生活没有受到辐射的影响，依然健健康康地活在世上。”但她似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初上帝会让那场灾难发生，又会让她的许多同龄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莫济里的另一位老人也以极其超然的态度描述着他记忆中的灾难：“最初的几个月有不少人死去，后来陆陆续续有人因辐射而患病。我们在老城中心建造了一口纪念钟。”他的手指向地区政府对面的一角——“但生活还要继续。”

“生活还要继续”，何其轻飘飘又何其沉痛！因为人们从未感觉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命运沉重到令人窒息，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在迷茫中选择了忘却。涌入切尔诺贝利周边的外国记者，似乎比积聚在当地的遗民更加熟悉和关注这片土地的历史。而在遥远的明斯克，只有少数迁出“核城”的后裔会在每年的4月26日举行纪念活动，凭吊死去的亲人。但我们几经打听，也没能觅得例行纪念活动的举办地：仿佛那一

切从未发生。

整个苏联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红色人类”（The Red Man）并非天然形成，他们是一些伟大人物为着一种崇高、超越的目的，对自然人进行强制性引导和改造的产物。这些伟人并未告诉他们的“产品”，有一天这种改造可能失败；他们也没有告诉那些勤劳、质朴但本质脆弱的人们，当全部努力付诸东流之后，如何在一个时间轴不再指向“人间天堂”的国度里生活下去。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将近70年时间里，所有‘红色人类’都坚信我们即将由社会主义迈入共产主义，任何形式的倒退或逆转都是不可能的。但最终我们得到了什么？资本主义！”1917年的革命被斥责为阴谋，“白匪”邓尼金的画像和“纳粹走卒”乌克兰反抗军的旗帜重新出现在了街头，人们惊慌、失落、压抑，急于跨过两种时间维度之间的巨大鸿沟。

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和莫济里师范大学，学生们听到列宁、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时，已经不会再流露出任何特殊的感情。“斯大林看上去和今天的那些领导人不太一样，”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位小学弟告诉我，“仅此而已。我对他没有特别的好感，但也不会特别厌恶。”2.87亿人为伟大的事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

象的巨大代价，随后事业失败了，牺牲也被遗忘了——一个残酷的笑话。所幸还有一个阿列克谢耶维奇，从80年代写作《战争中沒有女性》开始，她就致力于为那些亲身经历了大时代并被时代留下了难以磨灭印记的普通人保留个体记忆。“我希望让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那些在历史中默默出现、默默消失，以至于历史学家都不屑于在著作中为他们保留些许痕迹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我要让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人物来叙述他们的经历，叙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拼搏，叙述他们对那些伟大思想和伟大人物的看法。”

亲历者未经修饰的口述，与残留历史地标的结合，方能使我们回到曾经的历史情境中，回到那些正在被重构和遗忘的时间点，回到与翻云覆雨的宣传材料或教科书截然不同的现场。我们在切尔诺贝利重新感知灾难发生的一刹那、人们的恐惧和英勇，在白俄罗斯随处可见的“列宁广场”和“十月广场”回顾红色文明曾经的宏大叙事，在莫斯科街头遐想1991年8月20日白天，怀抱理想主义情结的市民阻挡政变集团派出的坦克。这些零散但真实的场景结合起来，才构成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的“历史的本来面目”。

思想中的寻找

在采访问隙，阿列克谢耶维奇向我展示了她旧书房的照片，台灯上方悬挂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眼神深邃的画像。在《二手事件》一开篇，她就引用了这位“黄金时代”伟大作家的名句。

“我愿意不厌其烦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他的小说和其他伟大俄罗斯文学作品一起塑造了我的人生观。”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以及阿达莫维奇的作品，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严格说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对苏联中后期“异见文学”的批判传统的继承。在技法和题材上，她受萨拉莫夫和阿达莫维奇的影响更大，与前革命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人有着明显的区隔。但青少年时代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农民在战争年代命运的自发关注，使她意外地延续了19世纪伟大俄罗斯作家一以贯之的主题——对土地的情感，对动荡年代人之境遇的关切，以及对“改造人”这项宏大实验可能招致的灾难性后果的担忧。这种暗藏的担忧，随后被索尔仁尼琴和萨拉莫夫作品中关于劳改营的惨烈记述所证实，并使整个反思的源头，

由父辈所执著的对斯大林的批判上溯到革命爆发之前，上溯到“白银时代”文学家和第一代革命文人曾经爆发过的那场论战中。而后苏联时代俄国人对自由的误解和滥用，以及充满理想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转轨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则为当初的“革命狂热”提供了一种逆向参照，加深了反思的力度。

“我们以为自由就是话语权的解禁，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人是无法健康地理解和享用自由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认真地说道，“萨拉莫夫说过，‘监狱会在健康和精神上彻底毁掉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哪里承受得起理解和接受自由需要付出的那种巨大代价！”

而她本人，最终选择了记者职业以及兴起于70年代的口述纪实文体，来开启关于红色文明和“红色人类”的记录。与那些急于和自己在苏联时代的经历划清界限的“新俄罗斯人”不同，阿列克谢耶维奇珍视曾经的工作经历，“那毕竟是一段充满趣味、令人怀念的经历”。“即使是在一个封闭的体制里担任记者，我依然获得了少有的机会去观察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与官方宣传的差异之处，去验证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否合于‘红色人类’脑海中的想象。即使只凭这一点，我也想说我沒有虚度那将近20年的光阴。”

是的，光阴没有虚度，努力没有白费。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像她所形容的“黑匣子”一样，忠实地记录下了从伟大卫国战争到后解体时代，整整50年间几代苏联人的独特个人史，延续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以来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传承，“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留下了一座纪念碑”（语出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奖词）。

更重要的是，作为红色文明的亲历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也在她的写作和思考中，完成了个人精神的再造和自由。在后解体时代，她曾投入白俄罗斯国内的民主化事业中，并因此被迫流亡海外，新书也在国内遭禁。但经历了10年的西欧生活，她在2011年最终回到了明斯克，重新尝试与这个错位了的时代相处。“获得自由需要经历漫长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人不应舍弃与祖国的纽带以及对它的责任。所以我又回到了白俄罗斯。”

采访结束后，我们把女作家送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车。中年司机认真地打量了一下乘客，扬起了眉毛：“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我正在接待的这位贵宾，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瞧，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人们一直都记得您！☑（感谢吕宁思、罗利伟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2



3



4



6



5

1. 生活在毗邻波兰的白俄罗斯边境城市布列斯特的一群年轻人

2.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外的“斯大林防线”遗址公园内一位身着军服的工作人员

3. 布列斯特铁道科技博物馆内展出的旧式蒸汽机车

4. 布列斯特要塞纪念公园内的保卫者巨型石像

5. 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中文译者吕宁思在布列斯特

6. 流经白俄罗斯莫济里城区的普里皮亚季河。下游100公里处就是切尔诺贝利

“红色人类”的命运：记录与思考

文 / 刘怡 摄影 / 张雷

这位曾经的乡村姑娘、地方报纸记者，在为宏大而脆弱的红色文明树碑立传的过程中，连带也完成了个人生命的追问和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延续。但她的精神世界，同样长久地处于过去时态。





今日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街头景象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整整6个半月以后，阿列克谢耶维奇依然没能学会像一位名人一样生活。

没有出国演讲邀请和采访邀约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会待在南部农村的小木屋，闭门写作。出门会客时就穿一件简单的粉色毛衣，外罩绿色夹克，自己开车，点一种味道奇特的本地奶酪当晚餐。“和之前的许多获奖者一样，我用一部分奖金在明斯克买了间新公寓，但还没有时间搬完家。”她略带歉意地告诉我，“书很多，堆得很乱，所以没法邀请你们去做客。”唯一的小小享受是学会了喝红酒——“在巴黎和柏林居住时，当地的朋友会用葡萄酒招待我。这让我记住了几家酒庄的名字。”

在和每一位记者交谈时，她都会提起同一个话题——获得那个奖项给她带来的眩晕感，以及在她之前获奖的四位俄语文学巨人：伊万·蒲宁（1933）、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956）、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70）以及约瑟夫·布罗茨基（1987）。自己的名字得以和这4位前辈并列，她感到“是一项巨大的责任”。有意无意地，列举中漏过了唯一一位始终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联系紧密的作家：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肖洛霍夫。尽管后者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系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出生地乌克兰为背景，但女作家在谈及自己的阅读经历时从未提到过这部巨著。

某种意义上，女作家的惶恐并非故作谦辞。到今天为止，口述式纪实文学是否能算一种文学创作依然遭到诸多评论家的质疑。典型的意见包括：口述事实留给记录者在文体空间内继续发挥的余地极其有限，而文体通常被视为文学创作的核心部分；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原始材料的震撼性和道德意味的突出，似乎也更近于历史文献，而与诺贝尔文学奖历来对创作技法的强调不甚一致。而为女作家辩护的声音几乎全部来自俄语文坛，则令人怀疑外国读者对这种独特的撰述方式究竟能接受到何种程度。

更令人扼腕和慨叹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似乎也永久地陷在了1991年之前的过去时态里。尽管她真诚地告诉我：“随着每一本书的撰写完成，我都变得越来越自由了。”但她频繁谈及的那些关键词，“红色人类”、自由、“冷战”，都带有浓厚的上世纪80年代意味。4个小时的采访和晚餐时间里，我从未听她提到过“全球化”或类似的新鲜词语；大部分话题和关注点，始终围绕从1917到1991年的苏俄历史而展开。尽管那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穷尽的厚重话题，但对

当下现实的疏离——或许是有意为之——正在向我印证：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笔下的讲述者一样，具有根深蒂固的道德偏执。

是的，和那些在今天丧失了时间感的“红色人类”一样，阿列克谢耶维奇也生活在她的“二手时间”里；某种意义上，处于流亡历程晚年的蒲宁和去世之前的索尔仁尼琴亦是如此。同主题下的复调写作不仅构成了她一系列作品的叙事方式，甚至也构成了作品题材本身。在对历史亲历者的发问和自我追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时时浮现——要自由和爱，还是秩序和面包？在俄国历史上，似乎从来不曾有过两者可以得兼的时代，这使阿列克谢耶维奇发出了“我们或许永远等不到人类实现完全自由的那一天”的感慨。个体经历在真实感以外异常尖锐的残酷性，乃至清醒者面对真实历史的无力感，都从她的话语中清晰地流露出来。而在谈话接近结束时，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念出了涅克拉索夫长诗《铁路》中最著名的一段：“忍受完这一切——他会用胸膛 / 给自己铺一条光明大道 / 只可惜这个美好的时代 / 你与我都不能见到。”

死亡·土地·生活

1991年之前，位于苏联领土最西端，奥德河—尼斯河一线与明斯克—洛夫诺—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一线之间的狭长土地，曾经有过一个特殊的波兰语名字“东部边界地”（Kresy Wschodnie）。1918年波兰第二共和国重生后，与同样羽翼未丰的苏俄红色政权展开了惨烈的波苏战争。1921年，大败于华沙城下的苏俄政权被迫签署《里加合约》，承认包含维尔纽斯、格罗德诺、利沃夫等历史名城在内的“东部边界地”为波兰固有领土，白俄罗斯西部、乌克兰西部以及立陶宛东南部因此被划入波兰境内。1939年苏德联手瓜分波兰之后，“东部边界地”重新并入苏联版图。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苏联西部边疆的安全问题，斯大林提出了苏波国界问题的最新安排：奥德河—尼斯河一线成为新的苏波国界，此前居住在“东部边界地”的波兰居民整体向西迁徙；作为补偿，原属德国的波森、西普鲁士、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划入波兰境内。经此调整，波兰版图整体向西移动了170多公里，18万平方公里的“东部边界地”完全成为苏联领土。

1948年5月31日，退伍红军士兵亚历山大·阿



某种意义上，女作家的惶恐并非故作谦辞。到今天为止，口述式纪实文学是否能算一种文学创作依然遭到诸多评论家的质疑。

列克谢耶维奇的女儿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在“东部边界地”南方的古城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1962年更名为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今属乌克兰）郊外诞生。和当时的许多苏联人一样，这是一个多民族混血家庭：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实际上，鉴于“东部边界地”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假如斯维特拉娜早生10年，完全可能成为波兰公民。1941～1945年4年残酷的战争期间，“东部边界地”作为苏德两军控制区的最前沿，蒙受了惊人的人员伤亡，斯维特拉娜的家族也不例外：她的奶奶加入了敌后游击队，因伤寒不治而死；父亲和两个兄弟一同参军，只有自己活到战争结束。母亲的家族中，外祖父参与了红军的后期反攻，但在胜利到来前死在了匈牙利。有11位家族亲戚和他们的子女死于德军在占领区执行的“焦土政策”，以至于斯维特拉娜最初的记忆完全被关于死亡的一切所包围。

在乌克兰文尼察州的乡间，斯维特拉娜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父亲和母亲在乡村学校任教，她由外祖母照顾。日常生活中，她接触最多的是那些失去了丈夫、父亲和兄弟的妇女。“那个村庄差不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村。人们总是在回顾战争，翻来覆去地讲着：在学校和饭桌上讲，在结婚礼堂和婴儿的洗礼上讲，在节庆时和葬礼上讲。”即使是懵懂的儿童也会模仿德国兵走路的步子和说话腔调，玩着“红军打纳粹”的游戏。每当夜幕降临，劳累了一天的村妇们会聚到农舍边的长凳上讲故事，她们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与亲人最后分别的瞬间，倾诉着自己愿意无休止地等待征夫归来的心情，最后唱起悲伤的歌曲——“只要他能回来，哪怕丢掉了胳膊和腿，我也愿意背他啊！”

牺牲和爱，这对别扭的组合差不多是少年斯维特拉娜关于人间的一切印象。她的国家和人民是胜利者，但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人们根本没有心情回味胜利的喜悦。但妇女们在提及爱人时那些热情似火的陈词，她们在重建家园和抚养孩子时表现出的惊人韧性和可贵美德，又是那样的真切和震撼人心。斯维特拉娜告诉我：“当我成为一名记者和作家之后，曾经不止一次回想起童年时代听到的农妇们对战时经历的絮叨。那些凌乱、不完整的絮叨，在趣味性和力量上都超过了我在青少年时代阅读的许多书籍。”即使是那些书籍，毫无例外也是关于战争、英雄和死亡的。

当斯维特拉娜长到该进小学的年纪时，老阿列克谢耶维奇决定把全家人迁回他在白俄罗斯南部的故乡。这里位于戈梅利地区（Gomel Region）西部，靠近铁路干线，依旧是平原农耕区。斯维特拉娜在她熟悉的乡村继续成长，从区图书馆借阅和苏联历史相关的书籍，也听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讲述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崇拜。在她印象里，父亲似乎没有提起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或许是因为她年纪还太小。17岁那年，她从彼得里科夫区（Pyetrykaw Rajon）下属的科帕切维奇镇高中毕业，随即在莫济里区以南的纳罗夫拉镇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担任本镇第一中学的历史兼德语教师。

即使是在21世纪初的今天，人口刚过8000人的纳罗夫拉也显得极为萧条和乏味。60年代虽然是战后新定居者的子女开始进入校园的高峰期，第一小学小小的校舍也不过能容纳不到10个班级。斯维特拉娜的教学任务并不沉重，这使得她能有更多的闲暇阅读文学著作，例如中学时还无法理解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她也在寻找机会发挥自己引以为豪的写作专长：1966年夏天，即结束教师工作的第一年，她拜访了离学校不远的莫济里市市委机关报《普里皮亚季真理报》（*Pripyat Pravda*）编辑部，获得了一份通讯员的兼职，任务是跟踪本地区农民生活的动态。仿佛冥冥中有天意，日后构成她写作乃至思想渊源的几重关键要素——记者的观察力和沟通技巧、对土地和农民的情感，以及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滋养，在这个边陲小镇形成了奇异的交集。而在纳罗夫拉东南方数十公里外，一座以切尔诺贝利命名的巨大核电站也正在规划当中。

将“土地—人民—道德”这组三位一体视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核心要义，对“神圣的泥土”加以狂热歌颂，构成19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青年阿列克谢耶维奇所钟爱的赫尔岑，正是土地德性最热烈的鼓吹者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在《群魔》中间接质疑了赫氏及其追随者的观点，但他笔下的梅诗金、索尼娅、沙托夫等代表人物，同样具有淳朴、仁爱、虔敬等典型的土地德性。这种对土地的浪漫化歌颂，实际上还暗含着对缺乏灵魂根基的纯粹知识（代表人物是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质疑：大地的德性正蕴含在农民的朴实和愚昧中，而与机巧复杂的人造学问绝缘。

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无数俄国文学



1. 明斯克市郊外的“斯大林防线”遗址公园内，一辆“二战”时被击毁的德军装甲车

2. 阿列克谢耶维奇记者生涯的开始地：《普里皮亚季真理报》报社

3. 1965-1967年阿列克谢耶维奇任教的纳罗夫拉镇第一中学

家围绕土地德性的确实性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而它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则表现为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冲突。前者作为更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代言人，相信依靠后天努力建成“人间天堂”的可能，相信可以通过对人的内在思想以及社会性的改造，造就一种超我的“新人”。后者则以传统道德和民众（尤其是农民）的代言人自居，相信人民本身构成一种精神有机体，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俄国人能自己的心灵里指出欧洲苦闷的出路，把各个兄弟间的情谊带进心灵之中”。尽管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带有民粹色彩的社会革命主义遭到了全面压制和禁绝，但在后斯大林时代微妙的思想真空期，它们正在暗中复活。

阿列克谢耶维奇无疑是土地德性和民众德性的歌颂者。尽管她不曾像索尔仁尼琴一般大张旗鼓地提出“俄罗斯精神”问题，但青少年时代与农民的交往以

及在纳罗夫拉的阅读岁月显然给出的是不同于推崇列宁主义的父辈的回答。她告诉我：“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可以出生在农村。农村的人们离土地更近，也更真诚。当你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表达的是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不是从书本中学来或借由他人灌输的浮夸说辞。”这样的观念，已经和赫尔岑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念相当一致。而1967~1968年全职担任《普里皮亚季真理报》记者的经历，又使她进一步贴近了农民生活中的日常性。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宏大叙事中，建成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已经成为每个俄国人必须伏膺的历史宿命；每一种思想、每一项活动，都构成通往终极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终极事业和个体命运之间，存在着与宏大叙事完全无关的巨大偶然空间：稻谷丰收、雨雪雷电、生老病死，既不必然和“人类的最终解放”联系上，也很难说与这种终极目标全然对立。



2



3

斯大林主义死灰复燃的年代，也是“灰衣主教”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掌管全苏联意识形态的年代。正是后者提出了关于“新苏维埃人”（New Soviet Man）或者说“红色人类”的经典定义：世界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种——资本主义的“智人”与苏维埃式的“新人”。“新人”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实验的基干，全社会的生产关系将以“新人”的道德为基准加以重新安排，最终建成善尽美的人间天堂。在此过程中，暂时的挫折和困难都必须忍受，因为历史使命的神圣性高于一切。为了实现这项最终目标，“苏维埃人”将不惜做出任何牺牲。

不过，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对此倒处之泰然。在她看来，和斯大林时代兼具神圣感和恐怖色彩的气氛相比，勃列日涅夫乃至苏斯洛夫的卖力宣传不过是装腔作势。“经历了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意识形态在政治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已经远不像‘二战’之前那么大了。斯大林在世时，官方宣传对年轻人世界观的形成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我在写作《战争中没有女性》时，曾与许多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女兵有过交谈；她们在十几岁的年纪毅然投身沙场，完全是因为政府和领袖的号召。在那时的她们心中，‘俄罗斯母亲’（Rossiya-Matushka）是世间最神圣的词语，值得付出一切代价去捍卫。她们丝毫不计较吃穿、医药这些物质待遇，单单把为祖国服务视为最崇高的人生理想。”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国家经济状况开始改善，市面上出现了新家具、新公寓、汽车这些代表日常物质生活的符号。人们已经很难再被抽象的、与物质割裂的政治口号所打动，他们意识到了‘人首先是为自己而活着的’，也愿意去过那样一种安定、舒适的日常生活。”阿列克谢耶维奇微笑着告诉我，“许多人已经不在乎官方那空洞浮夸的意识形态宣传，也不相信他们宣传的内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苏联在1991年轰然崩塌时，并没有几个人站出来维护旧政权——当时全国党员总数超过1900万人，但愿意用生命捍卫苏维埃的连10个人都没有。”

这位有过乡村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女学生，比她的同班同学要大上几岁，才思更敏捷，气势也更咄咄逼人。为了反驳那些从未读过马列原典却照本宣科地大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师，她认真阅读了不少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并在课堂上提出质疑。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并不能算一种稳妥之举。有一次，

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社会控制，无从左右这个偶然空间的命运，它主要存在于人们的日常情感当中，在那些不为国家机器所注目的瞬间悄然绽出。而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对话者和记录者的角色，恰恰能够进入农民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空间，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而在与纳罗夫拉镇上那些内向闭塞、有着无数家族故事却不懂如何表达的农民们的交流中培养出的沟通技巧，对她日后成为一位记者和文学写作者无疑意义重大。

我的大学，我的老师

1968年，即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前一年，20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考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学系（2008年升格为新闻学院），来到了她大半生生活和工作的首都明斯克。那是勃列日涅夫的新

系领导甚至反常地取消了她的列宁奖学金参评资格，担心这位“不可靠”的学生会乘机叛逃。但她的专业成绩始终相当优异，也和许多同学一样，对记者这一职业抱有理想主义的憧憬。

也是在大学时代，在年轻人当中广泛流传的异见文学开始进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视野。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以斯大林时代残酷的个人经历质疑“苏维埃人”伟大实验的合理性，继而破除关于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神话。首先是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和《癌症楼》；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古拉格群岛》以及瓦尔拉姆·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也开始流传。萨拉莫夫曾经参加过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因此于斯大林时代两次被关入劳改营，在西伯利亚的不毛之地科雷马（Kolyma）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岁月。他在《科雷马故事集》中以短篇小说的形式记录了在劳改营中发生的一切：杀戮、死亡、求生、告密……以人性的真实、残酷和震撼力消解了官方宣传中一切故作神圣的要素。他也是第一位预言“人间天堂”的梦想必将破灭的作家，曾直白地写道：“我是这场宏伟斗争的亲历者，我们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复兴而战，最终却输掉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坦言：《科雷马故事集》是对她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直接指引了她的写作方向。

但在毕业之初，这位优秀的新闻系女生还是首先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记者生涯当中。1972年夏天，她首先进入别廖扎镇（Byaroza）的地方党委机关报《共产主义灯塔报》，作为通讯员实习一年，随后在《白俄罗斯农村新闻》担任了三年基层记者，1976年又转入明斯克的通俗文学杂志《涅曼》（Neman），负责撰写社评和社会观察。这段时间里，她的旅行和观察范围依旧没有脱离自己最熟悉的白俄罗斯西部和南部农村，但和纳罗夫拉镇的轻松岁月相比，已经多了些许压力。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在那时，我感兴趣的选题，报社领导往往不甚满意；他们喜欢的那些浅薄、俗套的话题，我又不感兴趣。我最关心的是人们心灵深处的想法，而在我供职的报纸和杂志，要将如此抽象的主题灌注在日常报道中终究是不容易的，所以一直存在障碍和摩擦，也会受到来自官方宣传政策的压力。”

不过站在人生后端，她依旧把12年记者生涯看作一段充满趣味、令人怀念的经历：“我去到白俄罗斯

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有了更深刻也更全面的了解。这为我后来的写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记者这个职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机会：尽管是在一个封闭的体制里担任记者，我依然获得了少有的机会去观察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与官方宣传的差异之处，去验证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否合于‘红色人类’脑海中的想象。”

也是在这一时期，阿列克谢耶维奇开始尝试以记者的视角进入文学写作领域。1976年，即转职到《涅曼》杂志的同一年，她出版了关于农村青年进城问题的报道集《我离开了村庄》，这本以口述体写就的纪实文学试图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白俄罗斯青年正在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这种趋势又会给传统的乡村秩序以及生活方式带来何种影响。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向我解释她的创作动机：“我在农村长大，对乡村有着天然的感情。当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成群结伴地离开农村，再不回返，便希望探究背后的原因。我找到了许多这样的青年，记录下他们的回答，然后有了这本小书。”她也不无自得地表示：“当时我还没有接触到严肃文学界对口述纪实文体的诠释，之所以采用那种写法，完全是出于巧合。从这个角度说，我对口述体的偏爱完全是一以贯之的。”

小书在当时的反响并不热烈——苏共中央的几位高官早早拿到了样书，斥之为大逆不道，认为暴露城乡差异和进城潮是对社会主义“人人平等”观念的亵渎。大部分新书在上架销售前就被销毁了，只有少数进入读者的视野。但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因此感到遗憾，因为就在任职于《涅曼》杂志期间，她读到了对她的早期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并结识了该书作者、大学学长阿列斯·阿达莫维奇。

出生于明斯克州的阿达莫维奇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21岁，在战时曾是一位英勇的游击队员，后来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哲学系以及莫斯科国立大学编辑进修班，成为颇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电影编剧。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异见文学异常勃兴、官方文坛则死气沉沉的背景下，他提出了以纪实文学作为观照现实突破口的号召——“正如阿多诺所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经历了战争期间那些空前残酷的噩梦，用散文来记录时代已经成为一种亵渎。”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纪实文学，通过对亲身经历苏联历史上那些难忘过往的当事人回忆的采集，形成一种具有严肃感的文学体裁。

阿达莫维奇决定将对伟大卫国战争记忆的重构作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母校——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学院

为切入点。1945年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官方宣传强调的仅仅是统帅的伟大、高级将领的明智和普通士兵基于忠诚感的英勇事迹，而对普通民众承受的代价，特别是一度生活在德军控制区、没有进行“英勇抵抗”的那部分民众做出的牺牲，并无多少作品曾经正视。阿达莫维奇以他在敌后游击区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在1972年写出《卡廷故事》，率先突破了这一禁区。1977年，他又出版了《从乡村烈火中来》，记录那些从纳粹占领军的“焦土政策”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对战时经历的回忆，记录那些村庄、学校、教堂乃至活生生的生命被烈火吞没的真实场景。年轻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一读到这本书，立即就被其中的真实性和熟悉感所吸引——她回想起了在文尼察和戈梅利度过的青少年时代，回想起了那些苦等丈夫归来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孩子、孤独死去的老人。这些场景是多么相似！她在许多场合承认：“阿达莫维奇那本书独特的口述体例和对待真实历史的严肃态度对我产生了巨大震撼。”两人随后相识，并结为终身好友。

作为苏联后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阿达莫维奇对纪实文体的强调实际上还有

另一层深意：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洗脑和意识形态宣传，包括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劳改营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在大多数苏联人的心目中已经被正当化，并且经由报纸和教科书的组织，形成了一套逻辑严整的体系。任何企图建立一套截然相反的理论或逻辑观念、对其加以颠覆的企图，都将招来官方的打压和封禁。但基于个人体验的纪实文学却不存在此问题：它的出发点不在于立即颠覆官方的整套逻辑，而是以每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故事，激发起民众及其家族成员的感同身受，从而在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一个个小孔。而这种与空洞的宣传口号风格大相径庭的文体，显然比后者更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这也是整个80年代，苏联纪实文学创作异常兴盛的主因之一。

苦难的纪实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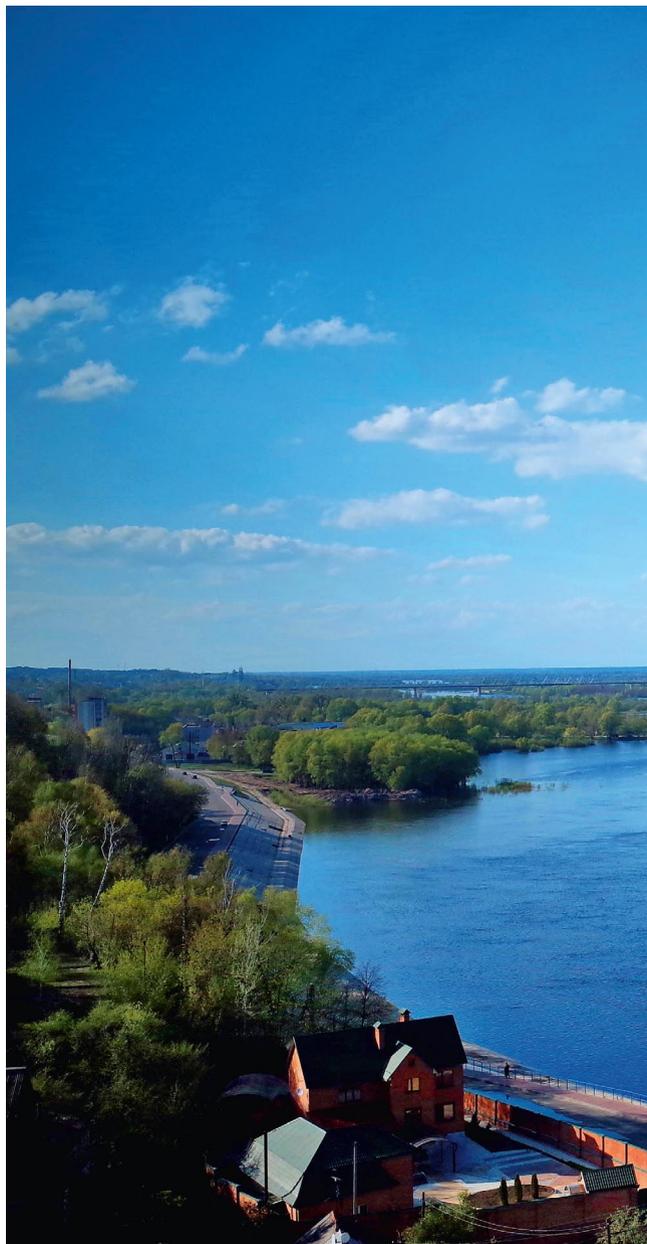
1983年，阿列克谢耶维奇35岁，在《涅曼》杂志任职已经到了第7年。一年以前，苏斯洛夫和勃列日涅夫相继去世，带走了一个停滞的时代；改变尚未

发生，但已在酝酿之中。她申请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女性与卫国战争的关系着手，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这便是《战争中没有女性》(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一书的缘起。她告诉我：“我没有兴趣了解一名士兵在战争中杀死了多少敌人，某场战役的伤亡数字又是如何；我只想知道，一个女人——一个有感情、活生生的女人，对那场战争的感觉究竟如何。”而她所描写的对象，首先是女人：渴望爱与被爱、喜欢漂亮衣衫、想念爸爸妈妈、具有恐惧本能的普通女人；随后才被严酷的环境锻炼成战士。

青年时代与战争遗民们交谈的经验，以及身为女性的天然优势，使阿列克谢耶维奇比阿达莫维奇这样的男性更容易走进访谈者的内心世界。她告诉我：“我可以很自然地 and 一位女性讲述者谈论爱情，和男性就不行。他们会逃避，会欲言又止，有时会无法直面自己的内心。而女性更感性、更直白。”同样具有独特优势的还有身为女性的同情心——当那些受访者最初被问及战争的意义时，她们无一例外地遵循了官方口径，强调苏联人是最后的胜利者。“但这些苦难什么也没有换来啊！是啊，‘胜利’，它可曾有一丝一毫被化成自由！”阿列克谢耶维奇感慨道。而她的工作，就是通过层层递进的追问，将她们在那一时刻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揭示出来，和最初那种空洞的胜利主义表态形成对照：苦难真的是值得的吗？她们在内心真的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吗？她们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吗？无怪乎当最终的采访记录集结出版时，一些当事人矢口否认自己说过那样的话——她们本身也在神话中沉迷太久了。

当然，纪实书写亦有其内在的缺点和局限性。基于个人体验的历史时刻，往往是全然碎片化并且带有主观情绪的。在80年代的苏联那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以基于个人回忆的口述纪实作为追寻真相的切口，有其独特的合理性。但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一种完全基于点状记忆、缺乏全局观和内在平衡的文学作品，是否能对因为长久身处和平时代而充满怀疑主义情结的读者产生足够的说服力，始终是值得怀疑的。况且第一人称口述体因其天然的主观色彩，留给记者和创作者的发挥空间无疑极其有限，这使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在文法编排和技巧上，难以超越萨拉莫夫、巴别尔等先人。

但无论如何，《战争中没有女性》在当时都属于一部具有轰动效应的著作。当全书的最初几个章节撰



成时，白俄罗斯的所有文学杂志都拒绝刊载，理由是“文中流露出过多和平主义色彩和露骨的自然主义描写，诋毁了红军战士的形象”。在阿达莫维奇的帮助下，阿列克谢耶维奇把稿子寄到了莫斯科，经过一定程度的删节处理，开始在军事文学杂志《十月》(Oktyabr)上连载。新晋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得到了这本书的试印版，随即热情洋溢地为其做义务宣



流经莫济里地区的普里皮亚季河，下游邻接乌克兰一侧的切尔诺贝利镇

传。在这位大人物的站台下，单行本《战争中没有女性》在5年里卖出了整整200万册，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因此获颁苏联荣誉勋章、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奖、《十月》杂志年度最佳作品奖以及列宁共青团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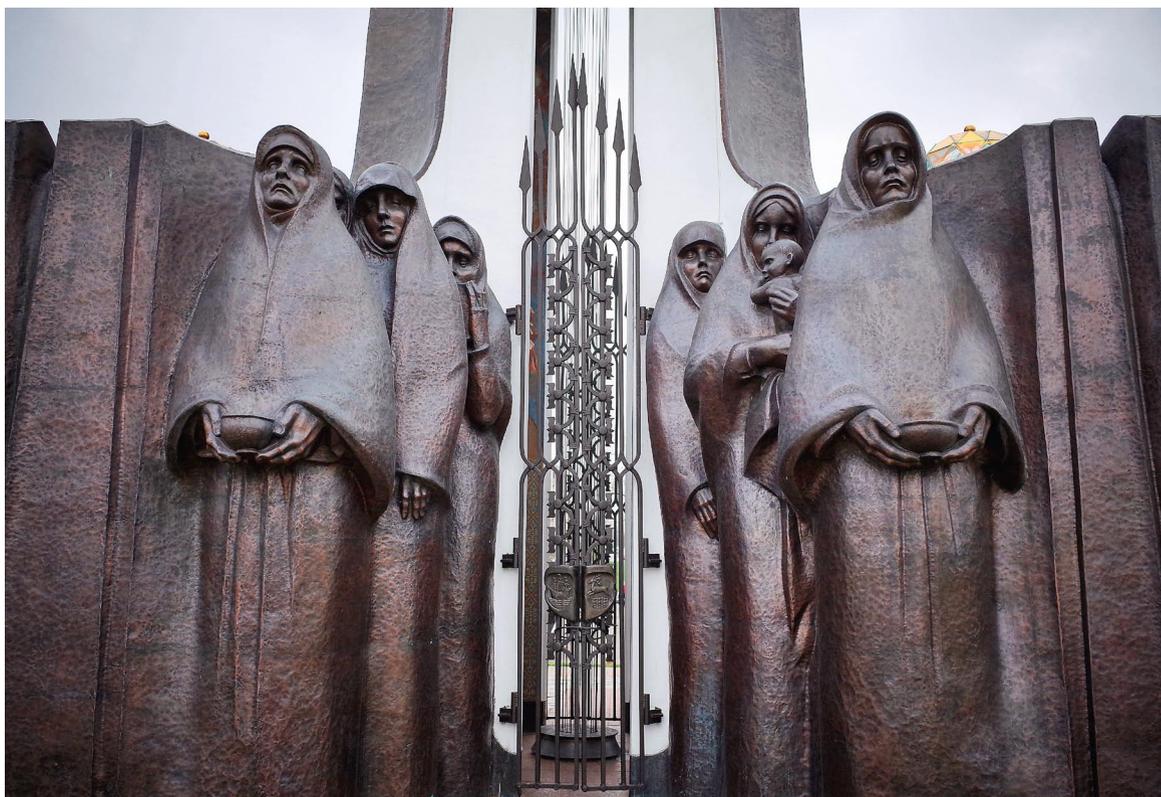
《战争中没有女性》的初步成功使阿列克谢耶维奇下定了专业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她辞去了《涅曼》

杂志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作家。从1985到1987年，她一面为白俄罗斯电视台写作《士兵》《说出他的时代》《战争中没有女性》等几种口述历史系列专题片的脚本，一面将采访女兵过程中搜集的另一部分资料修订集结成一本关于战时儿童的新书——《最后的见证者：一百首儿童不宜的摇篮曲》(*The Last Witnesses: A Hundred of Unchildlike Lullabys*)。尽管阿列克谢



上图：位于莫斯科眼泪岛的阿富汗战争牺牲士兵纪念教堂

下图：纪念教堂正面的悼亡者铜像，神情悲哀



耶维奇本人至今未婚，但她很早就收养了去世的妹妹留下的一对儿女；身为女性和母亲的同情心，以及少年时代与乡村孤儿们共处的经历，使她具备了特殊的交流技能，去促使那些在关于战争的恐怖记忆中长大、时常身感孤苦伶仃的成年人们，揭开心头的疮疤，回忆起痛苦的往昔。而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以及《最后的见证者》相继完成之后，她最终决定完成一整个书系的写作，主题就是“乌托邦之声”（Voices of Utopia）。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是唯一一种能够讲述一个大国实施一场以人为载体的巨型社会实验的文学，”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而实验的最终目的是造就一个2000年以来为无数思想家所热切盼望的乌托邦。”在她看来，乌托邦不仅存在于过去，存在于关于卫国战争和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神话中，它也发生在80年代的当下，发生在苏联的全部内外政策中。“我不认为上一代人的历史和当代史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红色人类’依然存在，一切就不曾改变。”

1987年，女作家飞往阿富汗，开始第一次尝试记录尚未结束的、活生生的乌托邦历史。两年的采访和写作，最终汇成了拷问心灵的《锌盒中的男孩》（Boys in Zinc）。整部作品的冲击力在标题中就一览无余——那些还是孩子的苏联娃娃兵，悄无声息地被装进劣质的锌皮棺材，用飞机从阿富汗运回来。和《最后的见证者》的主人公不同，他们并非被动卷入战争，而是在官方关于“正义事业”的宣传下，懵懵懂懂地往此生从未得见的中亚山地，并在那里断送性命的。和前两本书里中老年人回顾历史时的感伤情绪不同，在喀布尔前线，阿列克谢耶维奇见到的是一群陷入迷茫、绝望和崩溃的年轻人。一个接受她采访的年轻人当面吼了起来：“你是个女人，你懂什么战争？你以为成千上万的人是怎么死的？昨天我的朋友被打死了，他脑袋中枪，随后还跑了几米，想接住被打出来的脑子……”

年轻生命的无谓消逝、幸存者绝望的哀号、官方宣传机器的麻木不仁，这些真实的记录不仅打动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读者，也让她本人经受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在那以前，她曾经认真地相信过父亲的历史观：如果不是斯大林，苏联本来可以建成一种更完善、更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但当她从阿富汗归来时，已经再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期待。她告诉父亲：“你从小教导我要信仰共产主义。但我在阿富汗看到那些年轻

的孩子，他们和您当初在乡村学校里教育的学生没什么两样，却跑去外国、杀死无冤无仇的人。教育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凶手啊，爸爸！”老父亲哭了起来。

“接受这一事实之后，我便不再为自己曾经的‘苏维埃人’基因所困扰。我在精神上实现了完全的自由。”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而她从1989年起筹划的“乌托邦之声”的第四部曲，直到1997年才全部撰写完毕，那便是《切尔诺贝利的祷告：留给未来的编年史》（Chernobyl Prayer: A Chronicle of the Future）。在她看来，这本书是采访过程中遇到阻碍最少的——无论苏联是否解体，都不会有人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或荣誉感为整个悲剧文过饰非。但对她个人来说，这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心折磨：事故发生地距她热爱的南部乡村仅咫尺之遥，她青年时代生活和工作过的戈梅利城以及纳罗夫拉镇都在辐射污染区内。她亲眼看到那些熟悉的人们面对肉眼看不见的灾难，不知所措、惴惴不安；亲眼看到那些安土重迁的农民，含泪杀死家养的猫和狗，将外观完好的鸡蛋、土豆和苹果埋入地下，随后逃离家园。而那些在灾难中失去了亲人和一切的人，宁可留在无法生存的土地上，和所爱的一切一同死去。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一切，同样属于红色文明乌托邦实验的缩影。核电站是苏联政府为了向人民和敌人展示自己的强大、富足而修建，最终却反噬了文明自身。红色文明的废墟渗透进了时间维度，使土地、河流和森林在成百上千年内都无法摆脱其影响。联盟分崩瓦解之后，长久的代价将由白俄罗斯人民独自承担——“我们，白俄罗斯人，成了切尔诺贝利民族，成了第一个触碰未知的民族。”

在二手时间里

对苏联中后期历史上那些曾经的大人物，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十分感冒：“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这些老人政治家在短短几年里一个接一个地去世，我并不很关心。”只有对争议人物戈尔巴乔夫，她始终怀抱欣赏和感激：“在他执政之初，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件的划时代意义，但至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很不俗：他年富力强，讲话时从不念枯燥的稿子。”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戈尔巴乔夫终究是一位



今日的白俄罗斯莫济里城中心公园。阿列克谢耶维奇仍不时来此探访

伟人。“不少俄罗斯人骂他是叛徒，说苏联解体完全是因为他的责任，这不是事实。他为苏联人做了许多好事，包括给予他们自由。至于我们为何没能理智、审慎地运用这种自由，那是另一个问题。”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启动时，她也曾经和恩师阿达莫维奇一样公开表示支持，并在明斯克的列宁广场上高呼“自由！自由！”的口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激动是完全真实的。我们以为自由就是话语权的解禁，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人是无法健康地理解和享用自由的。萨拉莫夫说过：‘监狱会在健康和精神上彻底毁掉一个人。’只有站在历史后端，才能理解这句话是多么的深刻和沉痛。”

1991年“8·19”事件发生时，女作家正在南部农村的木屋里写作。“我记得很清楚，自己当时非常害怕。害怕改革带来的一切就此付之东流，害怕顽固

派重新坐稳江山、把国家带回到封闭停滞的时代。当政变失败后，莫斯科、基辅、明斯克的人们兴奋地涌上街头庆祝，那种死里逃生的庆幸感是发自内心的。”但整整25年后，她认为那场政变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成功了——“俄罗斯又回到了自己的过去。”红色文明的废墟上没有生出任何新事物，只有不同类型的旧幽灵在游荡。

白俄罗斯独立之初，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德高望重的人民作家瓦西里·贝科夫（Vasil Bykov）都曾充满热情地投入到方兴未艾的民主运动中。他们加入了温和派政党白俄罗斯人民阵线（BPF），认真地研究起了参政议政，并希望与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以及波兰结成文化和经济上的共同体。阿列克谢耶维奇感慨地告诉我：“当初的我们只是一群天真的浪漫主义者，我们把自由想得太简单了。自由不是轻飘飘的，接受和承载它都需要付出莫大的代价。

可惜整整要过 25 年，我们才痛苦地、完整地认识到什么是自由。”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就扑灭了知识分子的希望之光：威权政治家卢卡申科上台后，舆论环境开始收紧。所有白俄罗斯国营出版社都拒绝接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稿，1997 年《切尔诺贝利的祷告》付梓时，不得不首先在莫斯科出版，随后由明斯克一家较小的私营出版社购入版权、少量印刷。到了 2001 年，越发逼仄的言论空间最终迫使阿列克谢耶维奇决定出走西欧。

在法国、瑞典和挪威旅居期间，女作家写下了她最近一部也是最厚重的一部著作《二手时间》(Second-hand Time)，用以记录解体时代那些失却了乌托邦式终极时间感的“红色人类”的境遇。自由终究回归到了这个曾经被驱策、被驾驭、被当作实验品的民族，但人们却因为丧失了时间的终末性，丧失了值得作为苦难之代偿物的缥缈希望而陷入虚无。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孤独，感到天堂被生生夺走，感到屈辱、愤怒和危险。当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揭去，所余的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人们突然感到曾经的匮乏、压抑和装腔作势——假如是以一种被许诺的乌托邦作为前提的话——好像还是可以忍受的。最终降临的是一种“二手时间”：不仅指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后退，也指对“大国”和强人领袖的崇拜在 20 世纪末最终卷土重来。应有的未来最终没能出现。

2003 年，病重的贝科夫最终决定叶落归根，返回白俄罗斯并在一个月后去世。他的家庭成员散布在西欧，逐渐和祖国丧失了联系。这个事件对阿列克谢耶维奇有着极深的触动。在亲朋故旧相继离世之后(阿达莫维奇病逝于 1994 年)，她和白俄罗斯祖国最深的羁绊只剩下了少年时代热爱的土地。“我开始更深刻地体会到：获得自由需要经历漫长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人不应舍弃与祖国的纽带以及对它的责任。所以在 2001 年，我又回到了白俄罗斯，重新在明斯克安下了家。”

但她对卢卡申科的批评，并未因此就有所收敛。“我们有理由羡慕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他们在摆脱旧时代的印记方面是最坚决也最成功的，现在他们享有更充分的自由。乌克兰也是如此。前几天我造访了基辅，在那里的大学，年轻人生机勃勃，对未来满怀憧憬。从十几岁的学生到人过中年的部长，许多人都在学习外语，他们告诉我：‘我们希望融入更大的世界。’乌克兰人不像白俄罗斯人那样依旧畏畏缩缩、

瞻前顾后，他们的眼睛已经完全睁开了。”

就连不那么令她欣赏的普京和俄罗斯，看上去也还更有新鲜的活力：“25 年过后，俄罗斯相较苏联时代已经有了显著变化，它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更高——尽管未必是资本主义中那些好的方面。而白俄罗斯还没有从苏联的历史遗产中走出：红色文明消失了，但社会主义制度僵死的躯壳在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延续了下来。更重要的是，当你和这里的人们交谈时，你会发现：他们和 25 年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那样一种‘红色人类’。成为不自由的人是有多么可怕啊，人们已经僵化在了过去的体制投下的深重阴影里，再也无法摆脱。”

更令她担忧的是年轻一代的命运：“新一代白俄罗斯人里最有活力、最具备独立思考意识的人，几乎都在国外。他们曾经在明斯克的广场和街头集会反对卢卡申科，因此被开除了大学，在国内无法立足，只能前往西欧和北美。而当更年轻的一代人成长起来后，又会遭遇相同的命运。对白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个混沌的时代，他们看不清未来。”

某种意义上，甚至连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也被永久封禁在了她笔下的“二手时间”里。在那些充满道德意味而高潮迭起的记录里，在她对卢卡申科的激烈批评中，我分明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的影子。为什么人们最终选择的不是爱，而是鞭子加面包？她似乎始终对未能把握住 90 年代的浪漫主义岁月而耿耿于怀。在骨子里，她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渴望被拯救。

离开前的最后一分钟，我问了那个酝酿许久的问题：“曾经的‘冷战’结束了吗？历史会终结吗？”

“我们一度认为同一、均质的时代已经到来，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新的‘冷战’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看看今天的俄罗斯吧：它的政治家整天忧心忡忡，把周边国家统统看作敌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民族。这不就是‘冷战’思维吗？其他国家也不遑多让：西方世界依旧对俄罗斯感到恐惧，‘北约’正在强化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部署。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希望和期待，在 25 年之后重新被恐惧和担忧所取代了。”

“可惜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太短，我们或许永远等不到人类实现完全自由的那一天。最后我想说，历史没有终结，历史也不会终结。”

说完这句话，她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感谢张伊、马德、张润嘉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将每个人的名字一一说出”

——专访阿列克谢耶维奇

文 / 刘怡 摄影 / 张雷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苏联时代度过了大部分人生年华，亲历者和反思者的双重身位使她尤其易于理解和内化采访对象发自内心的告求。她的撰述方式也不同于职业历史学家，更多是基于对人类天然情感的怜悯。

阿列克谢耶维奇迟到了 35 分钟——在时间观念不强的白俄罗斯，这并不算一种失礼行为。但因为前一晚她已经更改过见面时间，当我提前站到明斯克“白俄罗斯”酒店的门廊下时，依旧没有把握作家本人是否会如约前来。这种不悦和焦虑，最终被一幅极富象征意义的画面所打破：在细雨蒙蒙的斯维斯拉奇河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沿着斯托罗热夫斯基大街拾级而上，抬手向我们致意。没有专车和随从，没有经纪人，也没有熨烫齐整的大衣或名牌皮包，一切都是简单而质朴的，就像她那些粗粝深沉的作品本身。

喝下一杯加了双份糖的热咖啡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认真地解释了迟到的原因：她从南部农村赶回，被糟糕的路况耽误了时间。她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 1989 年造访中国的经历，提到自己在斯托罗热夫斯基大街另一侧用诺贝尔奖金购置的新公寓，并表示《三联生活周刊》是第一家当面采访她的中文纸质媒体。当我提及对白俄罗斯大学、莫济里乡间乃至普里皮亚季废城的探访计划时，女作家的眼中流露出了温情。一个多小时的专访过程中，这样的眼神只有在触及那些令她由衷热爱或激动的话题时才会出现。

这不仅是一次诺贝尔奖得主叙述其人生阅历的采访，它也涉及一位苏联历史亲历者基于感性体验的反思，以及对纪实写作之形而上目的的追寻。我想起了与女作家亦师亦友的白俄罗斯文豪阿列斯·阿达莫维奇，他在 1988 年曾引用阿赫玛托娃长诗《安魂曲》中的一个句子来描述基于个体记忆而非观念建构的历史：“我愿将她们每个人的名字一一说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便是如此。

三联生活周刊：你出生于乌克兰，在白俄罗斯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俄语写作，也曾在苏联治下生活过 40 多年。在内心，你愿意把自己界定为哪种身份：白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还是“苏维埃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准备诺贝尔奖的答谢词时，我就想到了你提及的这个问题。我也愿意在一切场合重复我当时的陈述。我有三个祖国：在籍贯和出生地上，我是乌克兰人；我非常热爱我的乌克兰外祖母，也爱乌克兰的语言。白俄罗斯是我父亲的祖国，我在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

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人生。第三重故乡则是俄罗斯文化，我的世界观完全是从俄罗斯文化中产生的。至于苏联，我曾用40年时间去记录那段红色文明——假如追本溯源，它的存在其实可以回溯到将近100年之前。到了今天，红色帝国已然消失，红色文明荡然无存，但某些“红色人类”（The Red Man）依旧存在。而这些“红色人类”乃至整个红色文明，一直操的是俄罗斯语言，因此我选择用俄语来记录它们。但我不愿说自己是“苏维埃人”，因为我始终跟随时代的脚步在变化。

当然，我并不惮于承认：当我本人在青年时代开始写作生涯之际，的确具有许多与“苏维埃人”毫无二致的特征。但随着我亲身经历苏联中后期那些重大历史事件，随着个人写作历程的递进，我身上属于“苏维埃人”的印记变得越来越少。1987～1989年撰写《锌盒中的男孩》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对阿富汗战争真相的探寻和重构中，我发现官方宣传完全是一派谎言。苏联军人绝不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在阿富汗牺牲生命，而是恰好相反。接受这一事实之后，我便不再为自己的“苏维埃人”基因所困扰，在精神上实现了完全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乌克兰乡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对那段生活，你有什么回忆可以和我们分享吗？我知道你的父母曾是乡村教师，他们是否属于你笔下充满理想情怀和爱国热忱的“苏维埃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真是个幸运的人，可以出生在农村。农村的人们离土地更近，也更真诚。当你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表达的是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不是从书本中学来或借由他人灌输的浮夸说辞。直到今天，我依然愿意和农村人打交道，尤其是和老年农妇们攀谈。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格外喜欢倾听人们的日常言谈。在农村的夏夜，人们结束了工作，就会三三两两聚到一起谈论一些陈年往事，而我是其中最好奇的听众。在撰写第一本大书《战争中沒有女性》时，我曾不止一次回想起童年时代听到的农妇们对战时经历的絮叨。那些凌乱、不完整的絮叨，在趣味性和力量上都超过了我在青少年时代阅读的许多书籍。

我的父亲在几年前去世了，只差几天就可以活到90岁生日，他到生命最后一刻为止依然是共产党员。弥留之际，他要求把自己的党证带进棺材。在我父亲看来，一切悲剧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如果不是斯大林，我们本来可以建成一种更完善、更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持有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他们谈论的那

些词语在今天已经无法激起更多人的共鸣。时下人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些截然不同的概念，比如“民主”。

三联生活周刊：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的四年学习经历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回忆？你接受的新闻理论教育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那个红色文明至少在形式上依旧占据主流的时代，我所接受的新闻学教育的确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式的。不过我本人并不属于典型的好学生：我读很多书，提很多问题，乐于怀疑而不是盲信，这在某些时候带来了一些小麻烦。有一年，因为学习成绩不错，我获得了列宁奖学金，这项基金会资助优秀大学生前往列宁在西欧流亡过的那些城市进行旅行和探访。但系领导怀疑我这个人“不可靠”，给上级打了小报告，于是我的奖学金被取消了。这在当时并不是个案。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新闻系的很多老师每天照本宣科地大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他们从未实际研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而我在当时一度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原典，并在课堂上对老师提出质疑，所以他们不很喜欢我。在这些老师看来，十月革命胜利已经超过50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苏联公民生活和心灵中的存在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既不必怀疑，也无须深究。鲜活的思想变成了空洞的口号，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所以在苏联面临瓦解的危机时，马克思主义没能庇佑他们。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是苏联共产党员吗？我注意到你在1983年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并获得过苏联荣誉勋章、列宁共青团奖章等官方性质的表彰。那么今天的你是如何评价自己在苏联时代的记者生涯和写作业绩的，你依然为之感到骄傲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本人不是苏共党员。这并不是说我不曾信仰过共产主义——在当初，我和大部分“红色人类”一样笃信共产主义的前景，也受到相同的文明基因的滋养。我们在一个封闭的体制里生活，沉醉于自我想象，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着什么。但记者这个职业本身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机会：尽管是在一个封闭的体制里担任记者，我依然获得了少有的机会去观察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与官方宣传的差异之处，去验证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否合于“红色人类”脑海中的想象。即使只凭这一点，我也想：当初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白费，我没有虚度那将近20年的光阴。

三联生活周刊：在青少年时代，对你影响最大的苏联或俄罗斯作家是哪位？哪本书给你的印象最

为深刻？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我的青年时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大学生中流传广泛，影响巨大。而我最喜爱的作家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的书房里一直挂着他的画像。瓦拉姆·萨拉莫夫则是苏联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科雷马故事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短篇小说大师。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许多场合提到过阿列斯·阿达莫维奇对你的影响。你在什么时候读到了他的书，他对你的影响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读书时，阿达莫维奇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校友。1977年他出版了《我从乡村烈火中来》，记录那些从纳粹德国占领军的“焦土政策”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对战时经历的回忆，记录那些村庄、学校、教堂乃至活生生的生命被烈火吞没的真实场景。当时我刚刚结束学业、开始记者生涯没几年，这本书独特的口述体例和对待真实历史的严肃态度对我产生了巨大震撼。后来我见到了生活中的阿达莫维奇，他逐渐成为我在写作方面的导师和亲密朋友，直到1994年他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前两部有影响力的著作《战争中沒有女性》和《最后的见证者》都是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故事，但1989年出版的《锌盒中的男孩》却是以刚刚结束的阿富汗战争作为记录对象，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什么促使你把目光从上一代人的历史转向正在发生的当代史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地说，上一代人的历史和当代史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是在我写作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两本书时，我也不是以一种职业历史学家的姿态在工作。我记录的不是抽象的时间、事件或者伤亡数字，而是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红色人类”。我希望记录和探究的是这类人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在“二战”时是如何，在将近40年后又是如何。当然，话题方向的变化确实存在具体的诱因：阿富汗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在官方话语中对其大加褒扬，同时在每一个具体层面却又严格限制人们获得真实的信息。这使我产生了疑惑，我希望从亲历者的口中探知关于这场战争的真相，于是有了《锌盒中的男孩》。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戈梅利州读完了高中，也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戈梅利州南部的普里皮亚季河流域非常靠近后来的切尔诺贝利核辐射污染区，这种对地理环境的熟悉感和对南部农村的感情，

是不是你写作《切尔诺贝利的祷告》的重要动因？写完这本书后你的心理状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地理环境的熟悉的确是我写作那本书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我是希望破解当时混沌而压抑的社会心理状态——事故发生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大部分普通民众并不清楚他们面临的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官方公布的消息也总是语焉不详。我观察到人们普遍的心理是不知所措和惴惴不安，却不知那种不安从何而来。于是我亲身去到普里皮亚季河流域，亲眼看到人们逃离家园，亲耳听到他们讲述如何杀死家养的猫和狗，如何亲手将外观完好却已遭受辐射污染的鸡蛋、土豆和苹果埋入地下，那真是一种巨大的震撼。当时人们在报纸和杂志上很难读到这类报道，我感到自己有义务把如此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对20世纪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在那之前，“冷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空间概念，发生在国家和大洲之间；在那以后，“冷战”的影响渗透进了时间维度。被辐射污染过的土地、河流和森林在成百上千年内都将无法摆脱其影响，而发生事故的甚至还不是军用核武器、而是民用核电站！切尔诺贝利之后，对核能用途的辩解变得苍白无力：无论你是出于战争还是和平用途去利用核能，只要事故发生，影响就是永久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切尔诺贝利的影响甚至超过苏联解体本身：我们居住的星球已经永远被改变了。

今天，许多白俄罗斯人把自己称为“黑匣子”——他们为将来的人们保存下了关于苏联时代历史的各种信息。我认为我自己也是一台“黑匣子”，我所做的工作也是在记录和保存关于人类永久记忆的信息。

三联生活周刊：《二手时间》成书于你在西欧居住的那几年，但书中的记录跨度超过10年，从苏联解体之初一直到进入21世纪。你本人曾经提到，这是一部与之前的所有作品都不大相同的书。在你看来，这种“不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之前的几本书都是以单一事件作为阐述对象。尽管一场战争的规模可能相当宏大，但依然是一个单一事件，多数俄国人对伟大卫国战争的评价也具有共性。但苏联解体就不同了，帝国崩溃造成的影响，乃至不同的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极其多元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想象一下吧：将近70年时间里，所有“红色人类”都坚信我们即将由社会主义迈入共产主义，任何形式的倒退或逆转都是不可能的。但最终我们得到了什么？

资本主义！时间轴出现了错乱——被认为是早已死亡或已经被超越的东西，却真实地复活了！太不可思议了，苏联人从来没有为迎接这样一个时刻做好过准备。人们惊慌、失落、压抑；而我的任务，就是把他们面对“不可能发生的历史”时的真实感受记录下来。

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在从事的是自己愿意也希望从事的工作。我自己也想搞明白那个问题：既然社会主义是一种相当不错的理论，为什么实践的结果却会是这样？人们为它流血、为它付出，最终却一无所获。我甚至也敢断言：有一天共产党人还会回来，会有新的革命、新的尝试、新的实践出现。到那时，他们将如何面对上一场革命的废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留下的思考和记录。

三联生活周刊：从80年代末到现在，将近30年时间，你都在记录苏联末期或者联盟解体时代已经产生乃至仍在投射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在这个过程中，你所听到的故事、见到的人是否会改变你在青年时代对苏联体制形成的看法？

阿列克谢耶维奇：随着每一本书的撰写完成，我变得越来越自由了。我开始理解：所谓真理，并不是过去记载在书本上或者借由宣传和灌输散播的东西，真正的真理是人们内心未经修饰的想法。

为了完成每一本书的写作，我都要采访几百位当事人，每次交谈可能要持续几个小时之久。他们都是充满激情的人，我不仅关注他们口头上的回答，也观察他们在思考时的表情和状态。某种意义上，这和记者的工作不完全相同：记者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直接和有效的信息，然后写成文章；而我会和自己的交谈对象聊得很久、很深，每一段出现在我书中的口述，通常都需要和当事人聊上5次到7次。

我对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改变了历史”的大人物没有那么热衷，而更希望让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那些在历史中默默出现、默默消失，以至于历史学家都不屑于在著作中为他们留下些许痕迹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为他们留下记录。我让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人物来叙述他们的经历，叙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拼搏，叙述他们对那些伟大思想和伟大人物的看法。不是伟人的才智，而是每一个真实地生活过了的小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才构成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联生活周刊：能谈谈你正在撰写的新著吗？它们是否依然延续了你对“红色人类”在今日生存处境和思考？

阿列克谢耶维奇：“红色人类”的命运依然是我

的新书会继续挖掘的主题。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社会意义上的“人类”“人群”，而是哲学层面的“人”，希望把自己的探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

目前我有两本新书正在撰写，一本是《永恒狩猎的奇妙之鹿》，关于爱情；还有一本是关于老年和死亡。我希望通过这两本书的记录和思考，把关注点回到人的本质上。《永恒狩猎的奇妙之鹿》会描写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人的爱情：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战争时期的、和平时期的、动荡年代的，学生的、商人的、军人的……通过爱情，我们可以进入每个人的自我的深处。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这一奖项对你个人而言有何意义？

阿列克谢耶维奇：老实说，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从当初的惊讶和激动状态中回过神来。要知道在过去，诺贝尔文学奖在俄国可是和伊万·蒲宁、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今这个奖项授予我，在我个人看来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它对我的生活和写作轨迹好像也没有什么根本性影响。每天我依然会坐到书桌跟前，面前放着一沓白纸——我依然会从一片空白中开始日常写作。☑



白俄罗斯波茨谢国立放射生态保护区内的辐射警告牌。此处被污染的森林距离切尔诺贝利只有60公里

切尔诺贝利，苦难之后

文 / 李菁

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苏联之所以解体，这个灾难事件包含了所有促成解体因素。



1990年，一名母亲陪同因遭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辐射而患白血病的女儿在诊所接受治疗



目标：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从北京出发之前，几乎每一位知道我此行目的地的朋友，第一反应都是瞪大眼睛、用充满惊疑的口吻念出这个词，甚至还有人建议买一身防护服。1986年4月26日凌晨发生的那场爆炸，使得“切尔诺贝利”自此与“末日”“鬼城”“地狱”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再上网查阅相关资料，各种眼花缭乱的信息更是真假难辨：“切尔诺贝利巨鼠”、1945年投到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辐射量的100倍、900年才能衰退的辐射物……我得承认，在诸多善意的叮嘱下，我是以忐忑的心情开始切尔诺贝利之旅的。

动身去乌克兰之前，便在当地媒体朋友的帮助下，预定好了去切尔诺贝利的行程。早在2001年，乌克兰方面就开放了私人参观切尔诺贝利的行程，但因为某些地区至今仍存在大量辐射物，所以游人不能独自前往，而必须通过获得资质的旅游公司，否则将视为非法。也因为有些地方辐射仍很严重，所以网上有人建议穿一身旧衣服去切尔诺贝利，行程结束即抛弃掉，以免不小心将被辐射过的污染物带出来。思想斗争了好半天，最后还是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在基辅一家类似于家乐福的超市，买了一件外套和一双鞋子，加起来刚刚过100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同行的摄影记者关海彤则显得非常淡定，表示不被任何“谣言”所动。

4月14日早上7点，我们准时到达指定集合地点——基辅火车站前。旅游公司有英语团和俄语团，我们参加的是一个5人团的小型英语团，团费价格不菲，每个人108美元；其他3位团友皆是欧洲人：来自柏林的吉尔伯特，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机长，虽然常年在欧洲各国飞，但这是他第一次飞基辅，中间有两天倒休时间，他第一选择就是切尔诺贝利。问他原因，他说，自己向来对历史和物理感兴趣，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德国也遭受到了辐射，当时他正在读大学，物理老师带他们天天测量辐射值，也给他们讲解相关理论。所以这次飞基辅，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过来亲眼看一下。爽朗的卡尔同样来自德国，他一上车就对导游进行各种穷追不舍的提问，这让我立即嗅到了相似的“味道”，一问果然遇到了同行：卡尔退休前在法新社工作，是一位资深的政治记者。这一次来基辅探望从事外交工作的女儿，也第一选择来切尔诺贝利。卡尔对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历史很熟悉，对时政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告诉我，明天还要去基辅郊区看一下逃到俄罗斯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

豪华别墅。第三位年纪稍轻的雷恩来自伦敦，自己开了家私人旅游咨询顾问公司，平时也喜欢在东欧诸国游览一番，不过他特地强调，这一次来乌克兰看切尔诺贝利，纯粹是个人兴趣，与自己的生意无关。

尽管之前旅游公司在通知里建议要尽量穿着长袖衣服，以免污染物附着在皮肤上，但健硕的英国人毫不在乎地露着胳膊。“你们担心辐射吗？”听到这个问题，三位男士互相看了看，摇摇头，耸了耸肩：“要知道，你在城市里一样会遭受各种辐射。”机长说：“其实你回去把衣服和鞋多洗几遍就可以了。”看他们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再打量自己特地买的外套和鞋子，暗自有点羞愧。

年轻的乌克兰导游拿出一堆类似于安全须知的文件，让我们签字画押之后上了车。途中他一再叮嘱，因为切尔诺贝利隔离区遭受过严重辐射，所以不能擅自行动，必须跟着他，在指定区域内参观，开辟出来的路线经过无数次的清理，可以确保安全；另外，目前还有一些工人在辐射区工作，人员走动自然会带来辐射物，所以尽量少接触地面，切记不能把背包或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在地面上，以免不小心沾染上污染物。导游说，来切尔诺贝利参观的人60%是国际游客，而他喜欢带国际游客，因为他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像俄语团的人，更热衷于到几个“著名景点”拍几张照片。

切尔诺贝利在基辅以北110公里处。也许因为这几年的政治动荡，乌克兰的很多建筑和基础设施都有些破败之相。熟悉路程的司机在不平整的公路上把车开得飞快，窗外是春意盎然的乌克兰大地。一个多小时之后，远远地看到了几幢有军人把守的低矮建筑，前面横着一道栏杆，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举世闻名的切尔诺贝利。第一道关卡就设在离核心区30公里处。导游把我们的护照和报名表交给穿制服的军人，等待他们审核后放行。

隔离区外，还有好几辆和我们一样等着审核的车辆，其中有一辆还有某电视台的标志。导游说，因为临近30周年的纪念日，现在切尔诺贝利游也成了“旺季”，来这里的参观者明显增多。他说，基辅现在大概有七八家公司有经营这个业务的执照。我问导游：既然基辅人平均月收入只有200~300美元，那么我们100多美元的费用，是否其中一大部分捐给了类似“灾区重建”的某基金，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导游有点尴尬地否认：“司机、车、导游，我们公司运营需要成本，还要付这里一笔钱；



4月26日，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爆炸之后，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这里的村民撤离，而是一直拖到5月4日才做了决定。

还有，其他旅游公司只能在这里待到下午6点，我们的车可以在7点离开。这多出来的一个小时不是没有原因的，是我们花钱买来的——在乌克兰，任何事情你都要花钱买。”他耸耸肩。

申请表确认无误之后军人抬起横杆，示意放行。此时，手里的盖革计数器显示0.11微西弗，与我们在基辅的数值差不多。

“冷战”的遗迹

乌克兰核电站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乌克兰境内共有5座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在1970年开始兴建的，全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1977年开始供电，到1986年核事故发生时，已经建成了4个机组，为乌克兰提供10%的电力供应。

电站建成后，政府相应地从乌克兰各地迁入很多专业技术人员，与当地村民混合，形成一个大的居住区。Zallisya是进入隔离区的第一个小村子。与后面看到的电站核心区相对城市化的建筑格局相比，这里更保持着一个典型的乡村小村落特色，居住者也基本都是当地村民。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爆炸之后，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这里的村民撤离，而是一直拖到5月4日才做了决定。废弃小诊所里的工作记录、乡村商店的半虚半掩、木房子前遗落的布娃娃……眼前的景象，让每位参观者好像一下子超越了时空，感受到了当年的惊恐和慌张。这里的导游说，当时很多村民都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辐射”为何物；还有人以为像“二战”一样，遭受到了侵略。

意外的是，小村子里还有一户人家，院子里花草生机勃勃。推开门进去，里面堆放的衣服和食物虽然杂乱无章，但显示着这里罕见的人的气息——导游说，房子主人是几个月前刚刚去世的老奶奶，她活到了87岁。当年有一些村民拒绝离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而这里离爆炸发生的地区有20多公里，也许她幸运地躲过了辐射。想起来切尔诺贝利之前，看到网上有人介绍这位老奶奶，每次有参观者路过，大家都愿意去找她合影；有时候，老奶奶还热心地拿出自家果树结的苹果送给他们，大家只是礼貌地收下，当然没人敢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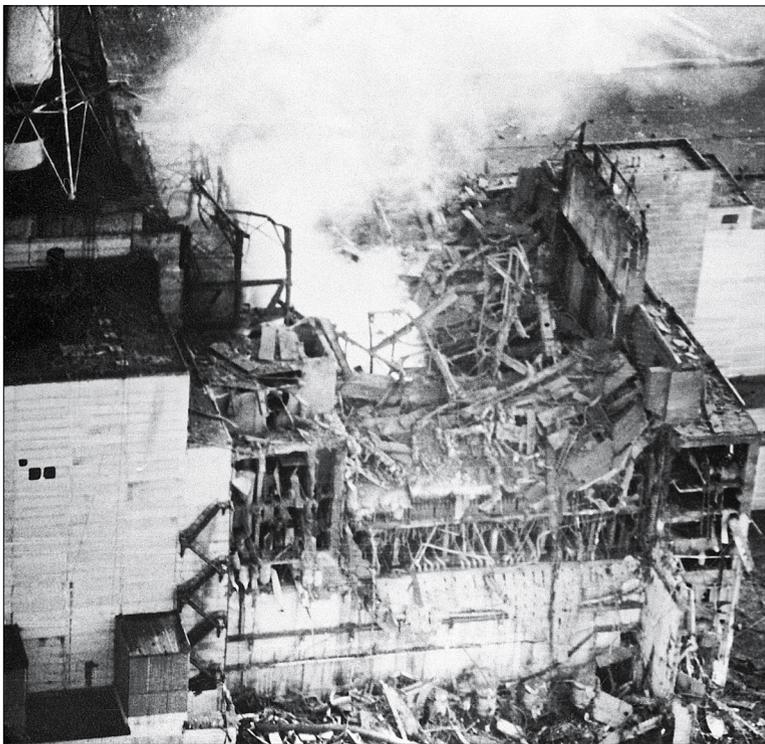
“当时从切尔诺贝利撤离了很多人，其中很多人年轻、有文化，他们迁到别的城市后，依然可以找到工作、过上好的生活，但那些村民就比较悲惨，他们

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土地，也很难找到新的工作，生活很艰难，所以后来有些村民又偷偷搬了回来，陆陆续续有2000人左右，他们起初是非法地住在这里，后来政府给他们一些资助，允许他们回去，但严格限定他们的生活区。”切尔诺贝利博物馆馆长安娜说。《切尔诺贝利的祷告》里也记述，部分“核难民”会偷偷地穿过军方封锁回家，在夜间穿越积雪的森林和沼泽，躲避直升机与军车追捕。老一辈人说：“这跟以前德国人入侵时没两样。”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次事故，让当年一位名叫尤里·莎拉波夫的乌克兰人下定决心带着妻子离开肥沃的故土，远赴西伯利亚去投奔自己的父母。第二年，他的女儿在西伯利亚小城雅尼干出生了，莎拉波夫为她起名为玛利亚·尤里耶夫娜·莎拉波娃，她后来成为女子网球大满贯得主。从某种角度，是否可以说是切尔诺贝利“造就”了莎拉波娃？

30平方公里的隔离区显得特别空旷，除了偶尔几组参观者之外，人影寥寥。广场上的一处列宁像依然崭新，昂首挺胸“检阅”着每一位路过的人——基辅市内已经很难觅到有如此强烈政治符号意味的建筑或雕塑，苏联的痕迹几乎消失殆尽。而在这里，处处可以见到提醒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时代的那些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隔离区里也有很多美苏“冷战”时期的遗留物，只不过它们的存在被切尔诺贝利的巨大“名声”所遮蔽。对此有兴趣的人，完全可以单独开辟一条“冷战遗迹之旅”。从隔离区的主路拐进一条不起眼的岔口，一座锈迹斑斑的大门挡在眼前，导游一脸神秘地说：“你们现在已到达原苏联最神秘的导弹部队的营地。”原来，这里曾驻扎着苏联战略火箭军第43集团军第46“下第聂伯河”师第309团。本刊“军事大百科”的刘怡告诉我：“第43集团军是苏联解体后唯一一支留在乌克兰境内的核力量，1991年时配备的核弹头总数超过英、法、中三国。如果乌克兰选择保留该部队，它将拥有全球第三大核武库。但为了宣示和平主义和防核扩散的决心，基辅当局从1994年起，历时3年移除了该部队的所有核武装，并在2002年前完全销毁。这是国际裁军和军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为了吸引游客，2014年，切尔诺贝利之旅还增加了全球独一无二的项目——参观原苏联战略火箭博物馆的发射井。这个曾经的军事要地，如今已经改成了博物馆，在这里可以亲眼看到被“北约”称为“撒旦”的R-36M2型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射程超过1万公里，曾经威胁到美国和安全。当然，最著名



还是 R-12 型中程导弹，1962 年正是因为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这种导弹，差点引发了美苏两国的核战争。

曾经的神秘兵营如今已空空荡荡，在小路上行走着，只听得见我们窸窣的脚步声。忽然间眼前出现一个钢铁搭建的巨大无比的怪阵，遮天蔽日，原来这就是“冷战”时期苏联“出品”的著名的 DUGA-3 型远程雷达系统接收天线。“DUGA”在俄语里是拱形或弧线的意思，因为它的发射功率极为强大，对全球短波通信都形成了干扰，无线电爱好者把它称为“俄罗斯啄木鸟”。“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各自的领土上部署了一系列远程预警雷达，以监视对方弹道导弹的发射情况，并为本方的反导导弹提供预警信号。苏联的雷达系统在国土东、西两侧各有一套，我们眼前的这套巨型接收天线，便是西部 DUGA-3 雷达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负责监视从欧洲射向莫斯科的导弹。因为 DUGA 雷达的运转需要大量电力，加之辐射影响，切尔诺贝利出事之后不久，这个在全球军事迷中名气很大的雷达站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旁边的空地像一个巨大的钢铁坟场，钢铁支架、发报机和各种零件散落一地而无人问津，这个曾经散发着令人生畏的神秘信号的怪兽，如今只留下残破不堪的空架子，像一个巨大的隐喻，映照着他曾为之服务的一个政治庞然大物的倒塌。

切尔诺贝利的死与生

在切尔诺贝利参观其实也是个体力活，很快就感觉饥肠辘辘。尽管进切尔诺贝利之前看到的一条建议是，尽量避免在隔离区吃东西，以免不小心摄入落在上面的辐射尘，但看见德国人卡尔豪放地啃三明治时，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拿出包里的香蕉吃起来以补充体力。

作为移动性最强、同时也是可吸入的放射性污染



(来源:新华社)

左图：1986年4月26日，爆炸发生之初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

右图：被石棺从上方封闭的4号反应堆

物，灰尘到今天依然是切尔诺贝利地区存在的威胁。每一栋建筑物都安装有放射性探测门，来探测人们的脚上或者手上是否有放射性尘埃。乌克兰大妈们每个小时都会拖一遍地，在穹顶的建筑现场附近巡逻的洒水车不断喷水，以防止尘土四处飘散。隔离区里的野猫和野狗也不会得到游人的爱抚，因为粘在它们的皮毛上的灰尘中含有大量具有放射性的铯-137、锶-90和钚-239。

午饭是在附近的另一个小镇 Slavutych 吃的。事

故之后，因为还有很多后续工作需要处理，所以在切尔诺贝利以外又建了一个小镇，以供参观者和建筑工人的生活需要。为了保证不把污染物带入，很多工人和参观者进餐前，必须通过站在门口的一个辐射检测仪，双手贴在两边的感应器上，几秒之后，绿灯亮，示意可以放行。

下午的全部参观都集中在普里皮亚季这个遭受辐射最严重的小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大批核电专家和工人陆续到来，就在这里建了这座小城。

随着人口陆续迁入，到1986年事故发生时，小城已有5万多居民。

进入普里皮亚季，感觉像进入一部被按了暂停键的时光机，一切定格于30年前的春天。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过的一位士兵用语言向她描述的场景，正是我现在所看到的：墙壁上贴着海报——“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全人类之幸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终将胜利”，“列宁思想永垂不朽”；办公室里排列整齐的介绍伟大领袖的横幅；教科书上的伟人头像……一切似曾相识，恍然回到自己童年经历的环境。

看得出，普里皮亚季是一个功能完善的小城，文化宫、游乐场、游泳馆、宾馆，一应俱全。因为核能是苏联政府全力扶持的一个领域，所以这里的工作人员享受着很好的福利和津贴；加之很多高级知识分子

的迁入，城市虽小，文化生活水平却相对较高。音乐厅里的大三角钢琴，体育馆的跳箱、跳马，还有配备跳水高台的游泳馆，看得出，当年在这个远离首都基辅的小城，很多人也过着他们悠然自得的生活。普里皮亚季儿童乐园的摩天轮成了切尔诺贝利极具象征性的拍摄场景之一。有讽刺意味的是，摩天轮刚刚建好，准备在“五一节”投入使用，结果生不逢时，变成了一个纪念物。

他们的美好生活结束于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在一次核电站的停机测试中，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爆炸。反应堆1200吨的顶盖瞬间喷入高空，一股超强辐射气流蒸发，在核电厂方圆几百米释放铀与石墨，火花从裂开的缺口喷溅，携带熔解的辐射粒子，喷向几千米高空。

可是那时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还记得那耀眼的深红色光芒，反应炉看起来像在发光一般。那光芒太过耀眼，并不是一般的火灾。那景象看起来很美，就算在电影里也看不到这样的画面。”当晚，所有人都跑到阳台上，家里没有阳台的，也去了朋友家的阳台。还有人抱着孩子出来看，说：“看啊！要记住这景象！”

普里皮亚季是距离爆炸的4号反应堆最近的居住点，但直到爆炸发生30个小时之后，当局才下令开始执行第一批安全措施。当天，1000多部大巴抵达普里皮亚季，戴面具的军人也随后出现在小城里。当时居民们得到的信息是，这只是暂时撤离，3天后他们可以重返故园。很多人只带着应急物品匆匆离去，但没想到这是一次永远的告别。也因为普里皮亚季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较高，他们撤离之后，附近一些对“辐射”毫无概念的小偷潜入进来，偷走不少东西。甚至还有人将被消防员遗弃的头盔偷走，全然不知那已经是沾满辐射物的危险品。

尽管之前通过影像资料已多少建立起对这座空城的概念，但真正置身其中，还是被眼前景象深深地震撼。散落一地的防毒面罩，飘着破棉絮的座椅，穿过水泥板的雨水滴嗒声……一个仍有鲜亮颜色的漂亮洋娃娃醒目地躺在一堆尘土里，吸引着每一个人争相拍下这极具视觉效果的一幕。“我不能保证这里的每一样物品都是真实的。”导游坦率地说，因为这几年有摄影者不断涌入，有的想制造更具戏剧色彩的效果，便从外面带来一些“道具”。

冷却池里的鱼群，是切尔诺贝利的一个标志性“景点”，其中那只1.5米长的鲶鱼更是名气最大的“明星”。



(关海彤摄)

切尔诺贝利博物馆馆长安娜：“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对抗对切尔诺贝利的遗忘”



(关海彤 摄)

1



(关海彤 摄)

2



(关海彤 摄)

3

- 1. 切尔诺贝利小镇幼儿园里被丢弃的洋娃娃
- 2. 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展出的防化面罩
- 3. 因遭辐射而变异出生的多肢体小狗



(关海彤 摄)



2



3



(米海影摄)



(米海影摄)

1-2. 切尔诺贝利地区废弃的 zalissya 村人家

3. 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最近的普里皮亚季小镇, 是核电站的生活区, 建有旋转木马和摩天轮

4. 切尔诺贝利镇的雕像

4

参观者的第一反应，自然会与辐射相联系，但导游并不确认这种推测，他说，因为辐射，这里绝对禁止钓这些鱼，所以它们可以无拘无束地活到“寿终正寝”，甚至据说这鱼群里还出现了消失多年的珍稀鱼种。实际上，30年的时光也使得切尔诺贝利变成了一个野生动物的天堂，有野狼、野兔、鹿，甚至还有熊。导游介绍说，爆炸之后，身体虚弱的小动物经受不了辐射而迅速死亡，剩下的一些强壮的物种会继续繁殖，但其中不少都发生了变异——我们后来在基辅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看到了长有很多条腿的小狗标本，现在还有一些生物学家在专门观测和研究切尔诺贝利的生物种群。

走出阴气森森的楼房，被外面灿烂的阳光照耀时，每个人都不自觉地长舒一口气，仿佛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有意思的是，在大自然里，你并不会觉得这里是一个阴森可怖的“鬼城”，相反，因为人类活动的完全退出，使得树木和植物在这里无拘无束地生长——在这里，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棵白杨树在30年里可以长到多高。如果不是导游提醒，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置身其中的这个被小树林环绕的空间，竟然是学校一个环形操场。穿行其中，听不见人类制造的各种噪音，而只有林间小鸟快乐的鸣叫声，偶尔会忘了这里曾是发生如此悲剧之地。

实际上，大多时候，我都忘了背包里还有一个辐射测量仪。整个行程当中，它几次响起，数值最高时是在切尔诺贝利幼儿园门口的土壤上，显示到了11。这大概也是组织者有意留下的一块地方，以提示当年土壤的污染程度。不过到了后来，大家也都不以为意。离开时，导游给我们每一个人填了一张“证书”，在受到的辐射值一栏里，他不假思索地填了一个数字0.002mSv（毫西弗）。他说，相当于坐一个半小时飞机受到的辐射。回来上网查阅，有资料说，接受一次胸部X射线检查，要承受的辐射量为0.023毫西弗；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人一年受到的最大辐射量，不能超过1000微西弗，也就是0.1西弗。

切尔诺贝利的祷告

有如打开潘多拉之盒的4号反应堆，是整个隔离区，甚至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地方。但我们也只能在几百米之外的小广场上驻足观看。广场上的一座纪念碑，铭记着为了这场灾难而付出生命的牺牲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事故。发生后，第一批赶到的消防员，在没有防护



的情况下紧急出动。当时，4号反应堆旁边的汽轮发电机厂房顶被喷射出的火焰引燃了大火，如果火势控制不住，会随时危及邻近正在运转的3号反应堆。消防员们一边用水龙带灭火，一边用消防锹把致命放射性的反应堆残骸扔下房顶。此时房顶的辐射照射强度为2万伦琴，被炸开的反应堆内部是3万伦琴。在如此高辐射下，消防员们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在搏斗。当天晚上，即有2名消防员死亡；几个月后，28人相继丧命。被这批消防员保护下来的切尔诺贝利3号反应堆一直工作到2000年12月，才在欧盟的巨额现金补偿下被乌克兰政府关闭。

一位消防员遗孀的口述回忆，成为阿列克谢耶维奇最牵动人心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祷告》的开篇之作。短短几天，一对“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要牵手”的新婚夫妇经历了人间最惨痛的离别——当天，只穿着衬衫出去灭火的丈夫瓦西里遭受到了1600伦琴的巨量辐射，他去世后，尸体也成了放射源，被放在密封的锌制棺材里，再盖上厚厚的水泥砖，作为一种荣誉，被埋在莫斯科的公墓里。

这实在是一次艰难的阅读，尽管一再控制，但还是读到几次被泪水模糊了视线。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4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才下定决心动笔写它。以记



者的身份，阿列克谢耶维奇用3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被迫撤离的人、重新安置的人……阿列克谢耶维奇自始至终隐藏在文字后面，将他们的声音绘成一部纪实文学史上令人无法忘记的不可或缺的作品。就像《纽约时报》那句评价一样：“她的作品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

事故发生30小时后，一大批士兵从阿富汗战场被调回来，其中包括直升机驾驶员和化学部队。当时因为反应堆的顶盖被炸飞，所有放射性物质就在露天中熊熊燃烧，辐射物肆无忌惮地向空中扩散。苏联派出了80架直升机编队前来灭火，他们其中还有不少是特地从阿富汗前线调回来的。参与救援的直升机直接飞进放射性烟尘，从空中向暴露的反应堆残骸倾倒了近5000吨碳化硼和沙子后，才停止了反应堆内的核裂变反应。这批年轻的飞行员也成为受害者当中的一部分。

“很多年轻飞行员刚从阿富汗回来，那些人都觉得自己在阿富汗打够了，却还得坐在反应炉附近的森林里吸收辐射。那是命令！”一位参与者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而离开切尔诺贝利之前，这些士兵们都得到警告：“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好不要到处告诉别

人我们看到的情况。”

在4号反应堆底部，当时还有195吨的核燃料在燃烧，由此产生的热气，逐渐熔化了沙子。专家们担心，如果反应堆核心内的高温铀与水泥熔化而成的岩浆，穿透厂地板进入地下，不但会造成第聂伯河——乌克兰母亲河的污染，而且岩浆可能会与水发生剧烈反应，发生第二次爆炸，那时将有1400吨的有核石墨熊熊燃烧，离切尔诺贝利320公里的明斯克将会被夷为平地，整个欧洲都会被危及。当时情势特别紧张，苏联在明斯克以及基辅等地，已备好火车并加挂车厢，准备疏散所有居民。

此时，3名志愿者承担了必死无疑的任务：潜水进入被高放射性废水淹没的地下室，打开排水闸门。排水闸门打开后，消防员们抽出了2万吨的高放射性废水；其次，向堆芯空投吸热效果良好的铅以降低堆芯温度，此后2天内600名驾驶员向堆芯投放了2400吨铅块，铅吸热熔化后也更好地封住了洞口，并且起到了阻止辐射释放的作用。

一位从阿富汗回来的士兵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从阿富汗回来，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这里正好相反，它在你回家后才把你杀死。”还有一个人说：“老实说，我觉得死在阿富汗还比较好，在阿富汗死

左图：1986年5月，核能工程专家在切尔诺贝利使用机器人测算辐射强度

右图：2006年，停放于切尔诺贝利禁区的直升机、坦克、军用客车、救护车、运水车、公交车、消防车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它们都参加过对辐射污染区的清理和填埋作业，只有少数经洗消处理后继续使用，大部分就此遗弃

掉是很正常的事，至少你可以理解。”

到了事故第17天，为了在反应炉底部放置冷却装置来减少地底的温度，切尔诺贝利急需一条地下通道。5月13日开始，苏联从俄罗斯与乌克兰矿区，调集了1万名矿工进地道工作。他们有简单的防护装置，可地底接近50℃的高温让这些防护成了累赘，没有人带着它们工作。一个多月内，从发电厂的3区到爆炸的4区，150米长的地道终于被挖通，最后在隧道内灌满混凝土后封闭。后来有人统计，这1万多名矿工，有四分之一左右在40岁前死亡，而官方没有将他们的名字收录在切尔诺贝利受害者名单中。

隔离区的某个角落，还有几个模样怪异的机器人。当时为了清除爆炸时从反应堆喷射出的落在附近建筑物屋顶和地面上的强放射性碎片，这项工作开始是计划用机器人进行遥控作业。苏联政府第一时间想隐瞒这个惊天秘密，但为了处理事故，他们不得不向当时的联邦德国寻求帮助，询问是否有能清洗辐射污染物的机器人。德国人问辐射程度有多高，苏联方面回答：“有点高。”德国人运来了几台机器人，但是因为辐射太强，机器人的电路马上瘫痪，工作人员无法远程操作，最终不得不放弃。

留给他们的，最后只有人工清理这种最残酷、也是最无奈的方式。当时很多现役军人和后备军人被征召到切尔诺贝利，负责清理所有放射性物品，他们有了一个专门的历史名称——“清理人”（Liquidator），又被称为“生物机器人”（Bio-robots）。一共有210支部队被派往切尔诺贝利，虽然他们穿着铅制上衣，但是辐射却来自下方，而他们的下方没有保护，只是最普通的廉价迷彩鞋。可是沉浸在英雄主义情绪里的士兵们，却豪迈地称，他们是“用铲子对抗原子”。也不是所有的士兵都是服从的，一位受访者向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忆，有的士兵当场抗议被派往切尔诺贝利，长官当场宣布：“要么进监狱，要么军事法庭见。”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祷告》一书里，让人不忍卒读的，还有这批“清理人”的故事。因为强辐射，每次他们只能工作40秒到3分钟的时间，超出这个限度，他们就有可能当场毙命，这意味着他们只能挖两次。一组8人，连同军官一起冲到屋顶清理瓦砾，像蚂蚁般严格按照程序工作，一批下去，另一批接上来。他们捡起1500伦琴的东西，强辐射下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手臂。许多人几乎虚脱，有人刚从屋顶下来就开始流鼻血。在这种辐射中眼睛几乎睁

不开，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牙齿，嘴里都是铅的味道。

昔日的荣光

在基辅寻找与切尔诺贝利有关联的人并不太难。当年，戈尔巴乔夫发布了电视广播后，整个苏联几乎都进入一场全民动员状态。人们纷纷受到征召：要不计成本地投入这场救援。

67岁的维克多·季特金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维克多是乌克兰师范学院的一名声乐教授，也是著名的男中音。回忆过去，他不无自豪地说：“当年我赢得了好多比赛，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地方都拿过奖。”

1986年的时候，他还在基辅一家歌剧院工作。他回忆说，事故发生后，很多艺术家都曾到切尔诺贝利去慰问——“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完全自愿的。”他数次强调。

维克多还记得，自己是5月12日第一次去的切尔诺贝利，同行者还有其他几位艺术家，包括乌克兰的一位著名女高音，还有一位钢琴家，他们组成一个小慰问团一起去了切尔诺贝利慰问演出。“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辐射有多严重，也不知道有什么后果。”他有点自嘲地笑着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是发着一股纯粹的爱国心，像当时教育的那样：爱国、爱人民。”

基辅5、6月都空了。孩子们和女人们基本上都离开基辅，到外地躲避，城里只剩下男人和老年人。每两个小时，就有洒水车出来喷水冲洗街道。维克多还记得，他们这一行人从基辅出发前往切尔诺贝利的时候，迎面而来的路上都是从切尔诺贝利出来的混凝土搅拌车。而公路两边排满了洒水车，当从切尔诺贝利出来的车经过的时候，喷水车不断地朝它们的轮胎喷水——因为轮胎上沾满了放射物质；道路两边挂满了有辐射标志的小旗子，提示大家已进入危险区域。

为了我们这次采访，维克多特地从家里带来他保留多年的纪念物，其中一部分是他获得的各种奖章，最珍贵的应该是一张微微泛黄的纸，打开来看，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密密麻麻写着一串字符，他特地解释给我们，上面记录的，是他每次去的时间。纸上写满了半页，他认认真真地数了一下，一共去了20多次，这大概是他去切尔诺贝利的官方证明。有时当天去、当天回，有时住一晚上。每次去慰问演出，他们都穿特殊的防护服，上面有仪器，可以测进去一次受多少辐射；离开的时候，再看受了多少辐射。



(关海彤 摄)



(关海彤 摄)

“第一次演出是去医院，现在想起来有点滑稽的是，所有的观众都穿着防护服、戴口罩，但我们要唱歌，没法戴口罩。”每次去，他们都会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也会收到特别多的花。“士兵们把最好吃的东西都送给我们。有一天，他们让我们去餐厅吃饭，到了之后，他们拿出一个有可乐标志的杯子让我们喝——你知道那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喝可乐，觉得难喝。可是带我去的人压低声音说：喝，一定要喝！我喝了一口发现里面原来是酒。”沉浸在回忆里的维克多脸上浮出了笑容，原来当时在现场是不允许喝酒的，而士兵们之间又传言，伏特加会“杀死”辐射，所以这位好心的士兵就带他来偷喝酒。

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后，维克多时常隐约感到嗓子疼，但没有多注意。1988年的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失声了，检查后才知道他的声带被放射线灼伤。这30

年中，当时一起去的很多同行都去世了。

也许是身为功勋演员，维克多得到了精心治疗。他后来还是恢复了歌唱的能力，从那一年以后每年开始疗养。维克多带来的物品里还有一个证明他参加过救险的红色小证书。他说，乌克兰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只要是在切尔诺贝利受过伤害的人，都可以在上面注册。有了证明文件后，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还包括水电费、公交等优惠，还有一年一次的免费疗养。“不过因为目前乌克兰经济不好，这些优惠都取消了。”维克多看着小本子的眼神，多少令人心酸。

如今那些文件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维克多每年还要继续接受治疗，但药费要自己付。“虽然这些文件和奖章对我来说，是一份特别珍贵的记忆，它们都是莫斯科颁发的，这是最高荣誉，现在肯定没什么价值，但这是我的青春，我生活的一部分。看到这些，

左图：乌克兰师范学院声乐教授维克多·季特金：“如果再回到过去，我还是会选择去切尔诺贝利的”

右图：乌克兰基辅大学历史系主任伊万·帕特雷利亚克。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时他刚好10岁

我就能回想起我的青春岁月。”

“如果你当时知道真实的辐射值的话，还会去吗？”面对这个问题，维克多陷入了简短的停顿，然后又突然坚定地说：“还是会去的。那时比我们年轻很多的小伙子都在那里，不顾生命危险地抢救，我被感动了，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事情，让他们好一点。当然也有点后怕，但那时我们受到的教育就让我决定要去，我不后悔，因为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了。去那里是危险，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既然需要，为什么不我去？而且跟那些更年轻的人比，我还是很幸运的，这就是生活。”

当被问到子女会怎么看他当年的举动，是英雄行为还是一件不值得的事，维克多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在他们眼里我肯定不是英雄；但是我希望他们会以我为傲。”即便是苏联解体了，他也坚定地觉得自己的举动是值得的：“这些付出都不是白做的，虽然国家没了，但人民在。我们想保护的人，最终还是保护了。再说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成长的一部分，这是我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如果再回到那时候，我还是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无知与谎言

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后，云层所携带的放射性粒子，随着雨水降落。我们现在再观察切尔诺贝利的辐射图，会发现那些辐射点像花豹斑点一样，散落各处。其实不被外界注意到的是，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离明斯克约320公里，但因为当天的风向，60%的放射性物质都被吹向了白俄罗斯。这个小国因此成为这次灾难最大的受害者，23%的国土受到了核污染（乌克兰为4.8%，俄罗斯为0.5%），26%的森林及河流也处于污染带内。包括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都生活在污染区内，很多人健康受到危害，她的母亲因此双目失明，在这个地区长大的孩子中有250~300人得了甲状腺癌。

所以阿列克谢耶维奇其实是以双重身份进入这场灾难的。作为亲历者，她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作为记者，她又用职业的冷静记下他们描述的每一个细节，她没有运用过多的写作技巧，只是忠实地记录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苦难。如果不是她的记录，我们不会知道，鸡冠因为辐射变成了黑色，牛奶也因此变成了白色粉末——完成于1997年的《切尔诺贝利的祷告》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著名的作品，也为她建立了国际声誉，也成为了了解切尔诺贝利的必读之书。



苦难是文学离不开的母题，也是人类长久生存中无法忘却的主题。这一系列口述的最后一篇，是一位失去丈夫的妻子的泣诉，她悲愤地追问：“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谁有这个权力？”

这位“清理人”妻子的追问，其实也是阿列克谢耶维奇隐藏在文字后的追问：谁该为这场灾难负责？尽管外墙已残破不全，仍能看出普里皮亚季宾馆



1998年6月1日，科学家在切尔诺贝利辐射污染区检测经土壤渗透进树木的放射性同位素的剂量

当年在小城的中心地位。发生爆炸48小时后，这里已经成了一座空城，而第一批赶来的专家与军方人员就把指挥总部设在这里，开会讨论应急方案。“这说明他们也不了解辐射有多危险。”导游摇摇头叹了口气。这群专家们当时还甚至乐观地认为，反应堆到5、6月就能恢复使用——如果说，30年前普通民众对核辐射的防范和危害缺乏一定了解的话，彼时苏联专家们对核

灾难的认知水平和安全性的轻慢、自大令人意外。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坚决否认苏联最高领导层隐瞒事故的说法。事实上，直到爆炸发生两天后，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4月28日，布满放射性粒子的云层飘到了瑞典。瑞典一家核电厂侦测到了一路飙高的辐射值，政府甚至为此派出一个战斗机中队，测量云层的辐射。他们反过来向苏联方面询问，



(关海彤 摄)

左图：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意识渐渐觉醒

右图：基辅清晨的城市景象

苏联高层才彻底了解到发生了什么。

戈尔巴乔夫后来检讨说，“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使得无论领导层和公众，都对核知识知之甚少。此前，苏联的一位著名核专家告诉戈尔巴乔夫，反应堆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过程跟煮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在7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痛心疾首地说：“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

专家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的认识更是有限。而且在当时的宣传下，很多人坚信凭着俄罗斯人的英雄气概，战胜核辐射这个根本看不见的敌人更不在话下。有一位受访者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忆，当时厂里有一群来自东德的专家，他们从自己的渠道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回国，而他们的举动遭到了切尔诺贝利人的

嘲笑：“他们都是懦夫！他们竟然还测量罗宋汤和绞肉的辐射量，真是可笑！我们的人，都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儿！”

比灾难更可怕的，是谎言。

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时，伊万·帕特雷利亚克刚好10岁。如今身为基辅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他，仍然记得那年春天，突然“谣言”四起：“有人传切尔诺贝利发生了爆炸，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基辅。伊万记得，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暗地里偷听国外广播。

伊万的父亲是苏联一位非常有名的化学家。他在家开始用仪器自己测辐射，发现阳台的辐射量远远超过正常标准。“那时候基辅的天气跟现在一样好，我们小孩子也不懂什么叫辐射，因为阳光、蓝天都是正常的，所以根本不听大人的话，还是跑到院子里踢球。”他笑着回忆。伊万特地从家里带来一张照片，10岁少年穿着胸前有英文得克萨斯大学标志的T恤，他笑着说：“我父亲经常出国开会，这是他到匈牙利

出差时给我买的。别的小朋友都没有，他们很羡慕我。”

5月1日，由于风向转变，基辅地区位于风口的正面吹袭，辐射值是正常值的几千倍，但“五一节”游行仍然照常举行。当时的乌克兰第一书记谢比尔斯基，也带着家人和孙子一起参加庆典。拍摄庆典的摄影师伊戈·克斯汀后来发现本该是五彩缤纷的照片蒙上了一层黑色，那是底片因辐射而致。很多孩子在游行的时候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而遥远的莫斯科，切尔诺贝利的爆炸阴影也被欢天喜地的庆典所掩盖。庆典持续4天，红旗和彩带装点着莫斯科的桥梁和道路，戈尔巴乔夫频频对经过他面前的那数十万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孩子们放假，伊万照例和小朋友们在操场上玩。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夏天基辅街头每天都出现很多洒水车，不停地用水喷洗街道。那段时间，各种消息不断，让大家都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

5月初，伊万的学校宣布所有学生疏散到南部黑海边上的城市敖德萨，也如实说了因为切尔诺贝利污染，但没有透露规模和严重程度；几天后，学校又突然宣布取消疏散，一切照常。伊万推测说，政府的本意大概是还想让群众感觉一切正常，但没想到，一宣布取消疏散，大家反倒恐慌起来。伊万的班里只剩下8个孩子来上课，其他的孩子都被父母送到外地。

因为从官方那里得不到真实消息，所有的消息都是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尽管官方对消息保密得很严格，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我的姨夫是大巴司机，他开车到切尔诺贝利参与当地居民的疏散工作，从监督疏散到撤离，所以都是从这些渠道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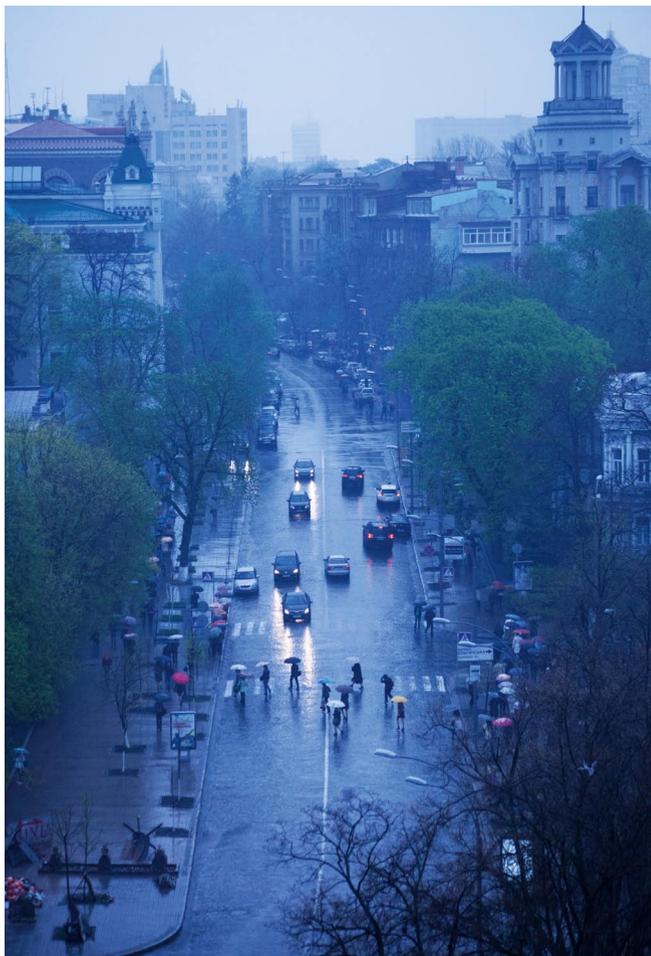
到了秋天，伊万的父亲也被派去切尔诺贝利参与处理——伊万特地带了一张父亲那时的老照片过来，穿了一种类似于厚夹克的外套，别无其他特殊装备。每天回来之后，父亲把衣服脱下，用塑料布包了好几层，放在阳台上，自己洗干净之后，再与家人见面。

父亲的眼睛很快看不见东西了，那一年他49岁。伊万说，他的爷爷、奶奶分别在83岁、95岁高龄去世，但他父亲只活到76岁。“可是我们也没有证据说这与切尔诺贝利有直接关联。”说到这里，伊万抬起头，努力掩饰住伤感，勉强一笑。

“但我父亲当时还是非常积极地去，除了知识分子受到的爱国主义的感召，当时政府还给特别高的津贴。“作为一名化学家，父亲的工资本来就很高，可是在那一个星期的工作可以挣回来半年的工资。”伊万记得，有一次父亲一下子拿回家5000卢布。“拿回来都

是崭新的钱，像是刚印出来的。”他转而略带讽刺地一笑，“不过几年后苏联解体，卢布迅速贬值这些钱也不值钱了。”

事故爆发那年，作为一名1岁婴儿的母亲，安娜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身边的妈妈和准妈妈们急切地想知道真实的辐射信息，“可是当时所有的信息都是保密的，政府对外公开的资料，可信度也不高”。安娜是一名建筑师，她开始利用自己的渠道，向环保专家和医生们偷偷打探真实的数据。“我们知道一些信息后，再跟其他妈妈们讲，彼此分享信息，再讨论如何应对。”在当时做这个工作，要面对来自政府的很大压力。她们后来把在1986年前后生孩子的妈妈组织起来，自称为“86母亲”(Mama-86)。随着影响力的扩大，1991年，它成为苏联解体后在基辅成立的第一个非政府组织。“那几年，基辅市内孩子们甲状腺肿瘤爆发率增长



（摄影）

了许多，受伤害最大的是1985、1986、1987年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年纪小，受影响最严重。”至今这个组织还在帮助因切尔诺贝利受影响的那些孩子们。

尤里科·萨莫连科当时是基辅市环保监督局局长。“那时候对事情的危害性非常清楚，但没人敢说。”“如果他们当时不保密，及时处理的话，后果不会这么严重。”让尤里科至今提起来还很愤慨的是，“当时乌克兰和基辅的领导人，几天之内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都送走了，而基辅的普通孩子在一个月之后才疏散，这是我最不能原谅他们的地方。”

他说，苏联解体后，切尔诺贝利的两位设计师后来在电视或媒体接受采访，不断接受各种质询。基辅人民都熟悉了他们的面孔，他们走在大街上，经常有人冲过来指责甚至谩骂他们。久而久之，他们也闭门不出了。“虽然他们没有受到法律形式的惩罚，但来自社会公众的审判已经足够了。”尤里科说。

《谎言与真相》，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祷告》里对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的采访标题。看得出，即便时隔几年，他依然不无悲愤：“我们要面对上千吨的铀、碘、铅、钍、镭、铍、硼，还有未知数量的钚，一共450种放射性物质。这相当于35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他们应该讲物理学，谈物理定律，而他们却反倒归咎敌国，开始寻找敌人。”

爆炸当天，瓦西里倾尽全力，联系上了白俄罗斯第一总书记斯柳尼科夫，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视，但徒劳而返；为了不让他得到一手数据，研究所里全部的辐射测量装备也都被取走。之后四处投递报告的瓦西里开始收到恐吓电话，他又给莫斯科写信，但被警告把他关到精神病院或是以“从事反苏联活动”告上法庭。一位官员告诉他，不发防毒面具的理由是，避免恐慌。

让瓦西里愤怒的是，“他们”并非不知情。“他们”为了自己的健康，都私下里服过抗辐射的碘剂，私下里把孩子们送走；“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和穿上特制的外衣”；甚至为了保证食物不被污染，“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有的家畜，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这本书里记录了太多的谎言。一位“清理者”回忆，当时规定超过25伦琴辐射量就可以领一笔补贴，但很多人的医疗卡上总是显示24.8或24.9，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真正的辐射数值是军事秘密，一位记者想报道他从专家那里得来的真实数字，主编警告他：我们的报纸不需要危

言耸听，只需写些英雄事迹。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者，也包括一位苏联某地区共产党第一书记。他替自己辩护说，“你不能怪我们当时隐瞒了实情”，“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收到来自党的上层机关的重重来电，要求他们“必须阻止民众发生恐慌”。在此要求下，隐瞒真相似乎成了当权者唯一的选择。

尽管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切尔诺贝利的采访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进行的，但并不是所有受访者都对这个政治巨人的倒塌表示欢欣鼓舞。更有甚者指责她乱写，这位“无名氏”对她吼道：“没错，我就是在为苏联政府辩护！”“在苏联政府的统治下，我们很强大，所有人都对我们感到惧怕。全世界都关注着我们的举动！”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忠实地记下了这个人对她的污蔑：“散布不实思想、谣言，你需要政治资金，对吧？”

我采访的歌唱家维克多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他说：“我是在东部的一个小乡村里长大的，我身边没有一个会唱歌的人，如果不是苏联培养我、教育我，我怎么会成为一名歌唱家？”他沉吟了一下又说：“我个人非常遗憾苏联那么大的国家突然解体了。切尔诺贝利爆炸时，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人都过来帮助，可是今天的乌克兰如果再出类似的事，谁会来帮我们呢？”

最昂贵的灾难

切尔诺贝利事故，有超过8吨强辐射物泄漏，核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这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戈尔巴乔夫后来说：“这是个苦涩的胜利。这个国家将永远无法复原。这耗费了我们180亿卢布，在当时1卢布等于1美元，180亿，这可是一笔巨款。”

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其实当年切尔诺贝利电厂并没有停止运作，而只是关闭了4号反应堆。因为缺乏能源，乌克兰政府让其他3个机组继续运作。1991年2号反应堆发生一场火灾，因无法修复，也停止工作；1996年11月，在乌克兰政府与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协议下，1号机组停止运作；2000年12月，时任乌克兰政府总统库奇马正式宣布关闭3号机组。至此，整个切尔诺贝利发电厂才算永远成为句号。

大火熄灭后，为防止辐射继续扩散，在一位工程师的提议下，当时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建造了一座



1996年8月20日，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市的地区急诊医院，4岁的安德烈被确诊因受辐射危害而患上白血病

钢筋混凝土石棺，以盖住整个损坏的反应堆和其他强放射性废物，容纳74万立方严重污染的放射性碎片。可是这个在短时间内突击建成的石棺非常不稳定，日久月久，石棺已出现裂缝，鸟儿甚至都可以从裂缝中进进出出，将放射性污染物散布到其他地方。苏联解体后，破败不堪的石棺移交给了乌克兰政府。而乌克兰政府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能力对其进行维修。随着时间的推移，切尔诺贝利石棺面临坍塌和放射性物质再次泄漏的危险。

2004年，乌克兰政府组织切尔诺贝利新石棺建造项目的国际招标，2007年法国诺瓦卡（Novarka）公司与另外两家工程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负责新石棺的详细设计和建造——新的保护罩虽然叫Arch（拱），但外界还是更喜欢称它为“新石棺”。2012年4月26日，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6周年纪念日，新石棺开工建设。新石棺耗资10亿多欧元，大多数

资金来自世界各国政府的捐赠。这个项目中堪称天才构想的地方并不是穹顶的设计，而是选择在石棺以西不到300米处一个放射性较小的地方进行穹顶建造。新石棺的穹顶就像一座巨型半圆形活动房屋，宽274米、长146米、高105米，足以装下一座体育馆和自由女神像。一旦完工，新石棺两个穹顶会滑到旧石棺上方合拢，工程师再利用遥控起重机将旧石棺一块块地拆除。新的石棺将是有史以来人类建造的最大的可移动建筑物。

2016年4月26日，乌克兰举行了切尔诺贝利事故30周年纪念大会，总统波罗申科主持了仪式，整个仪式就是在新石棺形成的庞大空间里举行的。目前，隔离区4号仍然有1000多名员工在工作，他们全部属于乌克兰建设集团的员工。作为新石棺的建设方，乌克兰国家建筑公司的总裁马克西姆·维克托罗维奇坦承压力很大。“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工程，在全世界

是独一无二的。”马克西姆说，新石棺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就是在辐射区工作。正因为处理难度大，新石棺的工程进度也一再延期。

马克西姆说，事故发生后，为了清理现场而铺设了厚度高达4~5米的水泥。为了安装新结构，首先需要拆卸这一层水泥。这个工作都是人工操作，“工作地区都充满高辐射，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介绍说，乌克兰建设集团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努力加固墙体，拱环合拢之后下一步工作则是从4号反应堆里取出核燃料废物，放在1号废放射燃料库里。

“这个项目很难。我想再次强调，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连以往日本福岛的工作都跟我们做的工作没法比。”马克西姆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工作环境的辐射特别高。为了保证员工们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他们每天必须要通过两个检查室、测量身体中工作前后的辐射水平。另外，员工身上也带着两个辐射剂量测定仪，一个是测量一天的辐射量，另一个是‘存储器’，也就是一年累计的辐射量。”员工工作时都戴上防毒面罩，某些区域，一天只能工作不到5分钟。平时是轮班工作模式，两个星期工作、两个星期休息。

对于新石棺的建设，马克西姆还有另外一重情感因素。马克西姆1980年出生在普里皮亚季市，6岁那年他也成为疏散人群中的一个。“我的生活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有很深的渊源。”他的父母是切尔诺贝利的第一批“技术移民”，从电站筹建期时就在那里工作。

1986年4月26日深夜两点，有人接走他的父亲去处理事故。等再次见到父亲时，已是整整一年后——父亲因遭受辐射而失去意识，住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好。两个星期前，这位老工程师因癌症去世。“这当然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有关系，我们家人和医生尽管竭尽全力，但终究抵不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几乎每个参加的处理者都因事故受到影响，给未来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可治愈的创伤，几乎每个普里皮亚季的人都是这样……”马克西姆说，父亲去世前，也经常会询问他的工作。“他对那里非常熟悉，所以会经常给我很好的建议。我就是切尔诺贝利人，所以我对我的工作有特别的使命感。”说到这里，他有点动情。

切尔诺贝利的“遗产”

30年前的切尔诺贝利爆炸，留下了这样令人触

目惊心的结果：普里皮亚季市成了死城，100年之内不能住人；13万居民成了核难民，终生不能返回故乡；60万抢险大军中，超过一半的人已经在过去20年里死去，剩下的人余生都将饱受病痛折磨。

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首先引发了民众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基辅大学历史系主任伊万回忆，“很多人开始追问煤矿、河流、电站等等的保护和安全问题”。切尔诺贝利事故本身是一次单纯的环境灾难，但是因为苏联政府处理措施不当，从而使事故变成一场政治危机。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苏联内部，其信用都遭到严重质疑，隐瞒事故、欺骗人民、组织抢险混乱低效，而且修改和销毁相关档案，使得有些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大白于天下。它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仅仅5年以后，苏联就解体了，有人感慨地说：“一个希特勒都无法打败的政权就这样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祷告》里不仅仅是灾难史，也是剧变前的苏联史。

“由对生态问题的质疑，进而到一种全面性的不满。‘切尔诺贝利’成为一种象征，一种隐喻。”伊万说，切尔诺贝利首先引发了乌克兰知识分子对苏联体制的不满，而在对这种体制的反思和控诉之后，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民族意识也渐渐被唤醒。在这次核灾难之后，乌克兰的作家和记者在讨论苏联对乌克兰语言和文化长达70年的实验时，开始使用“语言学的切尔诺贝利”或“精神的切尔诺贝利”的字眼。简而言之，对乌克兰人来说，切尔诺贝利已经成为苏联体制表里不一、信用破产的象征。

1991年，庞大的苏联轰然解体。而切尔诺贝利这个巨大的创口却仍然矗立在那里，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继续吞噬着难以计量的财力，成为乌克兰政府沉重的财政包袱。让乌克兰独自承担这个后果，公平吗？

“乌克兰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试图想让原苏联的所有国家都来承担这笔费用，但现在太晚了，特别是现在与俄罗斯关系不好的背景下，提了也徒劳。我们乌克兰有句俗语：吃饭的时候不要勺子，吃完饭要勺子有什么用呢？”基辅大学历史系主任伊万一脸无奈地说。

“像中国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一直是独立国家，你们也理解不了我们的感觉。而我们1000年来没有自己独立国家的人，也很难向你们表达我们的心态。有自己独立国家的人，和没有自己独立国家的人，完全是两个世界。”伊万的表情和语气一时间竟然有些

悲怆。片刻他又自嘲半安慰自己似地说：“虽然我们经常在批评自己的国家和领导人，但是有一个‘自己的坏国家’，总比有一个‘别人的坏国家’要好。”

“乌克兰至今还没有出现过我们喜欢的政客。”说这句话时，为我做翻译的安娜脸上出现了与她年龄不相配的严肃与沉重。出生于1994年的安娜在基辅语言大学学汉语，曾经为中国人熟悉的“美女总理”季莫申科和她的丈夫做过翻译，不过她坦承也并不喜欢她。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客高官们借私有化之机入股或收购国有企业，凭着政策照顾，大发其财。每个政客都有自己的家族生意，比如煤炭、能源，比如季莫申科就有“天然气公主”的绰号，而现任总统波罗申科是身家上亿的“糖果大王”，基辅很多商场都有他家的品牌“RS”。乌克兰民众因此对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很低。

我们在基辅住的宾馆，在其最著名的地标式建筑——独立广场附近。广场四周的很多地方都摆放着照片，他们是在2014年广场运动中的遇难者，其中不乏很多年轻面孔。在乌克兰采访的一周时间里，我们也遇到了几次街头游行和抗议活动，但示威者和警察彼此都很平静，民众也见怪不怪。因为政治动荡，乌克兰的经济也停滞不前。在基辅买当地手机卡时，

店员见我换出来的手机卡有“4G”标志，一脸艳羡地看着，然后特地拿来向同事展示一下。

像安娜这样的年轻人，更关心与自己前途有关的事情。她说，身边稍有能力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乌克兰，而到国外谋发展，这是未来乌克兰发展的最大问题。不过多少令人欣慰的是，在基辅市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我看到了一拨又一拨年轻的面孔，或者自己，或者由老师带领，仔细地看那里展示的每一件物品和照片，一脸沉重。博物馆女馆长说，她从1992年建馆起就在这里工作。“我们会定期组织‘清理人’聚会。向孩子们讲那时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些年轻人过来找他们爷爷的照片，她也很希望这里能成为乌克兰年轻人了解自己过去的地方。不过当地媒体记者告诉我，乌克兰今年专门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祷告》一书翻译成乌克兰语出版，据说卖得并不是很好。但也许这并不重要，像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一样，“我们努力做的，就是抵抗人们对切尔诺贝利的遗忘”。■

（此次乌克兰采访，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肖甦老师、中国驻乌克兰使馆程宏刚参赞、中央电视台驻乌克兰记者刘景、《法制日报》驻乌克兰记者史天昊的大力帮助，特此感谢）

《读书》2016年第五期目录

江晓原 穆蕴秋 “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

李大兴 抚琴弦断上高楼

黄纪苏等 庙堂高耸，人间戏场

李喆 “数”拓新土 道不远人

短长书

人的大脑何以研究人的大脑？（王一方）一个人，一辈子，一件事（陈飞）反学校文化与工人的子承父业（彭斌）

傅谨 红伶残稿，可留真香

顾昕 印度版的市场与政府之争

张治 “法漫”中的古物写生

李建军 丹齐格对抗塞利纳：文学阅读与国家欺许

许志强 谈论卡佛时我们在谈论谁

余婉卉 《吴宓日记》中的老温德

品书录

记忆、爱与死亡（刘倩）·怡情悦性

天天读（王正宇）·粉红系，治愈系（黄钰）

潘家恩 双面的浪漫与多维的乡愁

赵稀方 从未到来，却已过去

蒋晖 “逆写帝国”还是“帝国逆写”

励轩 民国的汉藏佛教与现代国家

赵志勇 百年风雨《春之祭》

钟乔 《我的诗篇》：纪录电影与诗歌的对话

丁宁 关联性：艺术史思考的一大纽结点

刘潞 “清明画谏”千古谜



《读书》
生活需要读书，
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莫斯科苍穹下 记忆与日常生活的复调

文 / 蒲实



2015年5月9日，一位“二战”老兵与孩子们在莫斯科红场庆祝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



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无法接受另外一种幸福。不能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把渺小看成伟大。人类其实都愿意单纯地生活，哪怕没有伟大的思想；但这在俄罗斯生命中却从来没有过。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钟爱自己的奴性。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这些自由的人能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能反抗他的意见。

——巴赫金

与基拉和马克这对夫妇第一次见面，是在莫斯科莫斯科和平大街地铁站附近的 Vapiano 咖啡馆，正对着斯拉瓦·扎伊采夫的服装设计大楼。第二次见面，是在莫斯科 V. D. N. H. 地铁站附近她的家中。

“关于祖父母，我们可以谈论爱情与美好的东西吗？”

人在失去一切时，记忆在自己的秘密花园里保存的是对一个消逝时代的缅怀。怀旧之情在我们心里徘徊不去，自有另一种芬芳。它不是隐藏着“思乡病”，而是感念今日已不再存在的邻里相濡以沫的友情。从前，每个院子都响彻孩子的叫声。几位保姆照看着小孩子，大孩子放学回来，也参加进来一起放松疯玩，直至父母归来。大家毫不迟疑地端出桌子，放上瓶酒和冷盘庆祝某人考试成功，另一人晋升或订婚。大家一起为死者哭泣，试图调解家庭纠纷。成年人分享他们匮乏的食物，在厨房里重造一个天地，心头时时担忧制度的威胁，如同达摩克利剑悬挂在他们头上。我的两个朋友，一个叫安娜托尔，要做诗人，做不成就酗酒，年纪轻轻就死去。另一个叫沙夏，他死得很可怕。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营，跟其他两名囚犯越狱逃了出来，在途中被他们两人吃掉了。事情常是这样：单独脱逃，最终还是在辽阔的草原里饿死。

——弗拉基米尔·费多洛夫斯基

我叫基拉，1967年出生在莫斯科，曾当过政治记者和编辑，也写过女性小说，讨论女性的事业与健康问题。我也写过关于中国的书，介绍黄道十二宫。我很痴迷成龙，2013年他来俄罗斯的时候，我曾采访他。我的外婆是从乌克兰来到俄罗斯的，我的母亲出生在莫斯科，从此我们一家一直在莫斯科生活，从未离开。大学时，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心理学，毕业后，我做德国天然气公司的销售总监，后来又在俄罗斯国际商贸协会做公关总监，曾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提供投资事务的咨询。后来德国媒体巨头 Burda 旗下的时尚杂志 Lisa 邀请我做德语版杂志的编辑，我就一直做了12年。

我的外婆1913年出生，外公是1916年出生。外公去乌克兰基辅的军事学院学习拖拉机技术时，他们在一次舞会上相识，一见钟情。但那时外公就要离开乌克兰回莫斯科了，于是舞会分别时，他对外婆说：“1938年7月20日，我会在莫斯科车站等你。”那一天，他们真的在莫斯科车站见面了。他们住在莫斯科的小公寓里，公寓很朴素，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简单却又充满爱。1939年，舅舅出生了。斯大林的政治并未投射到我们的生活里，我的记忆中，都是关于爱的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公作为军官去参加战争，外婆留在莫斯科。外公给外婆写了很多信，我都保存着。1941年的新年将至，他的部队经过莫斯科，就驻扎在河运码头地铁站附近，与带着儿子住在莫斯科的外婆仅仅隔着一条莫斯科顿河（注：1932至1937年由古拉格囚犯修成，连接莫斯科与白海、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以及黑海，1947年前被称作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冬天，运河水面上全部都结了冰。虽然与纳粹军队离得非常近，他仍然跨过运河与外婆相聚。那时他给外婆写了很多信，比如这封信，是1942年的圣诞节写的。他在信中说，还有一年战争就会结束，他就能回家与她团聚了，信里洋溢着高昂的斗志，虽然那是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信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只有部队的代码40495，我猜想应该是从苏维埃边境的白俄罗斯或波兰写来的。然而他太乐观了，战争又持续了3年多才结束。1944年的圣诞节，他写来的一封信里，带着焦急追问外婆：“很久都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都在忙什么呢？多给我写信吧，你的信对我来说很重要。”

战争结束后，外公作为空军上校回到莫斯科，和外婆住在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与厕所的楼房里。5年以后，他们又有了自己的一个公寓，不久又有了第二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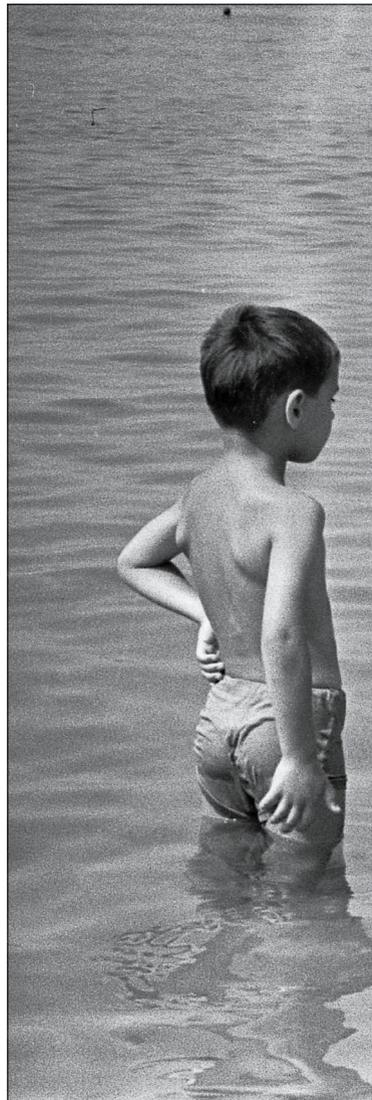
2



3

1. 1986年，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右）访问古比雪夫一家工厂，并与工人们交谈

2~3. 生活在莫斯科的年轻人马克讲叙了他父母（图2）经历的岁月。幼时的马克和父亲（图3）



个公寓，那时外公是莫斯科工业设计研究院的人事主管。1947年，我的妈妈出生了。我对父亲没有太多记忆，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父亲母亲就离婚了。我是外公带大的，他就是我事实上的父亲。舅舅离开了莫斯科，去一个科学研究院工作；母亲非常爱外公外婆，她留下来与他们一起生活。我的童年是快乐的。那时的莫斯科，城里有一半都住着参加过“二战”的军官，每家人都相互熟悉和认识，我时常串门，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现在，与一些人做了很多年的邻居，我们也从未相互认识过。

妈妈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历史和俄语，毕业后成

为教师。她离婚的时候，外公已经有了第三套公寓，就在那个他跨过运河与外婆相见的运河码头车站边，那个公寓里有了很多新式家具。我们住了过去，我就在那附近上学。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公寓都是国家或单位分配的，你可以有自己的家具和汽车，但房子属于国家。虽然不是私有财产，但是在公寓居住的人去世后，他的家庭可以继承他的公寓，继续住下去；如果没有亲人，也可以立遗嘱将房子赠予朋友。苏联解体时，你可以付一部分钱，买下你当时正在住的房子，但政府不再管房子的任何基础设施，比如供暖、水电和修缮等，而且如果当时你分了几套公寓，你只能买



左图：1960年前后，几位女士在莫斯科革命广场的零售摊前购买冰淇淋

右图：1975年夏天的列宁格勒，一位画家在水中作画

下其中一所；或者你可以不买下来，继续住在国有的公寓里，现在你如果要卖出去，就要找律师来处理产权事务。现在，我拥有我外公当年的房子。这所公寓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小了一些，也比较老旧，但我一直住在这里，从没有离开过，这里有我太多的记忆。

当时的莫斯科有三所最好和最有声望的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外交学院和莫斯科外国语大学。这些大学非常难进，即使你学习成绩再好，有很高的分数，也不一定能进去。虽然没有官方的法律规定，但政府高干、政治家和外交官的子女事实上拥有特权，能够在这些地方读书。我们不属于权贵家庭，但妈妈

一直梦想让我去莫斯科外国语大学读书。她当时是莫斯科一所技术学校的副校长，收入不算高，但她还是从中学起就给我请了私人教师，给我上德语课，每周两次课。那个时候的国有经济体制下，私人教师是非法的，我只能悄悄上课，但其实很多家庭都这么做。高中的最后一年，我一直在一个非常昂贵的私人教师那里补课，以保证我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外国语大学。

进入大学不久，外公退休了。不久，他的身体开始变得不好，外婆很快也跟着生病了。妈妈辞去了工作，留在家专职照顾他们。那是家里一段晦暗的时光，有很多焦虑，财务总是难以维持，总是欠下很多债。

在大学里，我靠奖学金生活，每个月有35至45卢布的补助，同时我也在校外兼职当初高中生的家庭教师，以补贴生计。我的大学时光，成绩一直是班里最好的，但从没有什么好衣服、好鞋子，一直都处在一种生存焦虑中。1988年，大学的第四年，我获得了公派去东德留学的机会，第一次来到东柏林，在洪堡大学学习。虽然东德那时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我还是看到了很多好东西，他们在消费和生活方式上都比莫斯科先进很多。我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满载而归。1989年，我作为苏联冰球队的翻译再次去到西柏林。那个时候柏林墙还没有倒塌，勃兰登堡门的那段墙还耸立着。我第一次看到西方国家，冲击很大，带着仰视。后来我也曾在俄国的德国冰球运动员做过翻译，他们都认为我的德语水平非常好。这也说明，20世纪80年代苏联大学教育的水平是不错的。真正“失落的一代”，是70年代初至80年代出生、90年代上大学的那一代人。他们的大学时代伴随着政局瓦解和校园里各种动荡，课程体系也在瓦解，所有人没有工作，教授无心教学，学生无心上课。一片混乱，他们在大学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他们所经历的青年时代，是身边所有人都在为生存问题挣扎的时代，所有人都只想赚钱，都变得很有攻击性和冷漠自私。这一代人因此也没有什么同情心，不知道温情为何物。

我很喜欢读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维克托·普罗斯库林、谢尔盖·多甫拉托夫、尼古拉耶娃这些苏俄作家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出了很多好电影，那时我很爱看《未付费的假日》（*Неоплачиваемый отпуск*）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还有《两个人的车站》《爱情与鸽子》这样的喜剧电影。我还记得，苏联拍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连英国女王都非常喜欢，她说这是她看过的最好的版本。那时还有一部苏联电影，叫《老新年》（*Старый Новый год*）。传统上，俄罗斯的宗教日历与欧洲不同，欧洲每年先过圣诞节，再过新年，而俄罗斯是东正教，在俄罗斯传统里，每年1月7日是东正教的节日，1月13日是旧历新年，所以1月13日被称为“老新年”（旧历新年），1月1日被称为“新新年”。苏维埃革命后，很多教堂都关闭了，宗教也是被公开禁止的。经历过苏维埃时代的老人如果告诉你，他们信仰宗教，顶多也就是指他们会定期去教堂，过复活节、圣诞节这样的节日，也就如此了。那时的苏联商店里会在复活节那天卖一种蛋糕，不能叫“复活节蛋糕”，就讨巧地叫“春天的蛋糕”。苏联解体后，宗教很快就回到

了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中；危急时刻，我们总是从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渡过难关。

1988年，外婆去世了。那时外公的身体非常虚弱，“改革”正在进行，但他已经不再与我们讨论比较过去与现在之类的话题了。1991年，他去世了。他去世后几天，一些人正想取代戈尔巴乔夫，让他交出权力；没过不久，苏联就解体了。我很高兴外公没有看到这一幕，对他来说，这一定是巨大的悲剧。他真诚地相信苏维埃，是一个诚实而正直的普通人。我们现在住的这间小公寓，是外公留给我们的。那时他曾有机会分一套有五间房的大公寓，但他拒绝了，他说他想和普通人过得一样。他在工业设计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那个机构当时在所有苏维埃共和国都有分支机构。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过斯大林时代，但他们有他们的信仰来应对这一切，这是连经历过阿富汗战争与车臣战争的一代人也无法理解的。我至今保留着外公的军装。他的肩章有三颗星，制服上挂满了勋章。每年的5月9日，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会庆祝“胜利日”，这是我们最隆重的节日。每一个俄罗斯家庭，都有亲人参加过那场战争或在战争中死去，我们与那场战争有强烈的情感联系。

2014年，母亲去世。在教堂举行葬礼的告别仪式上，我遇到了马克。他是我母亲生前的朋友，我们以前只是相互认识。他走过来安慰我，就在两分钟的时间里，我们相爱了，于是我们至今生活在一起。爱是奇迹，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能吃饱肚子了，但发生变化的也许是头脑”

俄罗斯的人民，哭泣吧，饥饿的人民！

——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

你可以叫我马克。我1971年出生在距莫斯科不远的小城奥金佐沃。我的外公13岁就开始工作，他先是一个工程师，曾在那里的兵工厂制造武器，后来这个兵工厂也生产修路的机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作为炮兵参加了整个战争，但他不常给我讲故事。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有老兵到学校里来做演讲和讲座，讲述他们是如何打仗，如何攻占柏林的，但外公很少说。我回家就去问外婆，外婆说：“炮兵就是炮兵，战争就是人杀人。”外婆是个很虔诚的东正教徒。她说，苏联之前，每打一场仗，你就要忏悔一年，当兵的人打完仗后一年是不能去教堂的，只能在家祈祷，直到洗清罪恶。十月革命后，宗教完全



上世纪 70 年代，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一家餐厅内设的吧台是年轻人喜爱之地

被禁止，大部分教堂都关闭了，只有一些老人仍被允许去教堂。不过大概在“二战”中，传统的信仰就在人们心中复活了。外公、外婆告诉我，莫斯科之战时，人们私下里全都传言，斯大林在每一次重大战役之前都会乘飞机视察莫斯科上空，飞机上还载着一位牧师，为莫斯科祈祷。

战争结束后，外公继续在机械制造厂工作。他曾经去过加拿大和伊拉克，在国外工作了 5 年，因为那

时俄罗斯出口机械给这些国家。要问哪个国家他最喜欢，他说是伊拉克。伊拉克的人民非常勤奋，那里夏天天气非常酷热，人们在 12 点到 15 点根本没法干活，但伊拉克人还是在全国都修建起了公路和基础设施，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某种程度上比加拿大还好。那是在 1968 年。可惜现在在伊拉克什么也没有剩下。

我的外婆是俄罗斯人，她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开始工作的，最早种植棉花。她的棉花种得越来

越多，越来越多，得了特殊劳模奖。那时的棉花工人就睡在田地里，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做成棉线弹成的被子，可以把蜘蛛和昆虫都赶走，他们竟然睡得很安稳。外婆有很多关于饥饿的回忆。她曾有过40天没有任何食物吃的经历，大概那是在“二战”前，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清楚了。宿舍的一个室友每天给她一杯水，她就是靠这杯水活下来的。她记得在很长时间没有东西吃以后，有一天，村子里有人送来了面包，每个家庭一个一公斤的面包，大家都站在村舍前面领取。有一家人，妈妈拿到了面包，对孩子说：“让爸爸先吃吧，他还要工作。”爸爸拿起面包，就狂啃了起来。他太久没有吃东西，饿坏了，所以吃得狼吞虎咽，结果当场他就死掉了。如果你太久没有吃东西，你的身体是无法适应进食太快的。外婆得到了一些钱，可以到商店里去买一点吃的。商店离她的住地很近，她却走了很长时间，大概有大半天吧，才挪到了那里。她知道自己一次不能吃得太多，所以开始时很多天，她每天只允许自己吃一粒花生和一片饼干。就这样，她活了下来。

后来，外婆去牛奶厂工作，她还拿到了大学文凭，成了牛奶技术工程师。她总是被评为优秀员工，后来成了工厂的首席技术员。必须承认，苏联时代的婴儿食品和奶制品质量是很好的。那时工厂的奶酪被运到莫斯科，我问外婆，如何能做最好的奶酪。外婆说，除了牛奶的质量，包装也是很重要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儿童食品特别好，即使食品并不多元的时候，蔬菜、奶制品和面包却总是有的。小时候，我记忆最深的是到处都有一个苏打水饮水机，饮水机上永远都放着一个杯子，从没有人顺走。一分钱可以喝一杯白味苏打水，三分钱可以喝一杯甜味苏打水，每天我可以喝上两升水。我的奶奶也很会做蛋糕，她能做特别好吃的“拿破仑”。爷爷不会做蛋糕，他会做各种与鞋子相关的东西，还有一个大鱼缸。爷爷也参加了“二战”，战争结束后，他一直在一家医院的急诊部工作。他去世时下葬的仪式很隆重，有一队军人对天空鸣枪，但我并不清楚原因。我的一个姑妈是奥金佐沃的第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女人当出租车司机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另一个姑妈则是奥金佐沃的第一位女性摄影师。

我很喜欢生病不用去上学的日子，外婆会给我送来奶酪和果酱，给我打开电视。小时候我最喜欢“特别教育频道”上苏联物理学家卡皮赞主持的科教节目，很像今天大家熟悉的*Discovery*探索节目。那个时候还有一本杂志，叫《科学人生》，人们都非常喜欢读。苏

联曾经有过很多好的卡通作品。小时候，我最爱看的卡通是《魔法戒指》（*Волшебное кольцо*），《英雄村》（*Простоквашино*）也是特别有名的苏联卡通。那时好多年轻的父母，只给自己的小孩买苏联漫画，因为觉得它们宣扬的是一种团结互助和统一的精神，比迪士尼的动画还要好。我的少年记忆里，那时也有很多给孩子们玩的电子游戏，比如《狐狸追兔子》，就是基于同名卡通的电子游戏，和今天人人都知道的迪士尼动画《猫与老鼠》很像。我的少年时代有很多免费的课外活动。我参加了飞机和舰船俱乐部，有遥控的飞机和船只；还参加了天文学俱乐部，可以晚上一起观天象；我还学习音乐，音乐启蒙老师非常严格和强硬，总是让我更加努力地弹琴，所以后来我去了音乐学院。我的母亲是一个音乐理论家，在学校里教书，舅舅是一位乌克兰的长笛演奏家。小时候我经常去乌克兰他所在的那个剧院，看很多舞蹈家、音乐家排练，听他们讲后台故事。父亲当时是一个大工厂的电子供应商，家里总有一些芯片、刻度盘之类的东西，与微电子相关，我很喜欢研究那些小小的芯片。

那个时候，很多城里人都有夏季度假的房子。我们在奥金佐沃城郊的“夏屋”，种了一些苹果树和梨树，我们常去那里度假，可以捉蜥蜴，可以在邻居的玉米地里偷玉米。外公有一根很长的打苹果的棍子，可以伸到树上去摘苹果。我帮外公收苹果、做苹果汁和果酱，够吃一年。妈妈说，她怀着我的时候，喝的都是自家苹果榨成的苹果汁。今天我们不再有“夏屋”了，就从莫斯科市郊的果园里摘来苹果自己做果汁。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父母非常努力地工作，家里相对比较富裕，但即便是相对穷一点的家庭，也从未缺过食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是幸运的一代人。很多年后，当我回顾那段岁月，我觉得当时我们在食物与物质生活上没有多大问题。我们可以吃饱肚子了，发生变化的也许是思想与大脑。

“相信一种神秘的力量”

凭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
她不能用普通尺度衡量。
她具有独特的气质，
对俄罗斯只能信仰。
——费奥多尔·丘特切夫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表面上死气沉沉，其实野

性十足。青少年在边门里拥抱接吻，但少女也可能遭到强暴。我那时大概十一二岁，沙夏告诉我我怎么跟其他三个男孩奸污了一个同龄的女孩，她叫玛丽娜。这个小流氓集团跟那些“称王称霸的小偷”（当地人对“教父”的称呼）形成两个平行的世界。他们组成一个与苏维埃社会完全不相关的社会，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法官和自己的宗旨。好几年以后，我在瑞士一次豪华招待会上偶然遇见玛丽娜。她已变成一位出色的女性，嫁给了一位美国亿万富翁。她说，她给一位在涅瓦河畔旅游相遇的青年提供商务咨询，这个青年正是从前负责保护她的“教父”的孙子。

——弗拉基米尔·费多洛夫斯基

基拉在德国时尚杂志《Lisa》工作的时候，曾经写过占星学的专栏，也介绍过中国风水。你看，我们餐桌边这幅画着丰盛食物的油画，就是她根据风水理论来布置的。但我是一个基督东正教徒，我觉得这是与风水很不一样的精神力量，所以挂画的这面墙上，还挂着一支东正教的十字架。我11岁时住在奥金佐沃，人们都说我的邻居是一个巫婆。俄罗斯人有一个带神秘主义色彩的传统：如果你放一根针在大门顶上，就可以让整个房子不受巫术的干扰。有一天，我趁邻居女人出门的时候，溜进她的家门，在她大门的门楣上放了一枚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从外面回来，靠近了门，我正从门缝里看她。她看见了我，愤怒地做了一个要挟我的动作，却没有进门。她转身找来了丈夫，最后他们是用斧子砸坏了门才进去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只能挂条被子在门上作为遮挡，直到最后安装了新门。在最亲密的谈话氛围里，俄罗斯人就会开始讨论神秘主义的事情，一向如此。在我很小的时候，大约6岁吧，我便开始在黑暗中祈祷，后来我感到了教堂中某种宗教精神的力量。基拉在她一次考试前做了祈祷，取得了好分数，她也从此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但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她才最终接受了东正教。

我的妈妈是个很信宗教的人，外婆在妈妈6岁之前经常带她去教堂，这是她最重要的童年记忆。无神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宗教，有时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毕竟没有人能证明是否真的有神存在。外婆说，“二战”的时候，有一天她劳动的棉花地上空太阳明朗，万里无云。她们能够看到远处的一座山，那天，她还看见了山上的基督像，山后面的光比太阳还强。她与她的同志们都停止了工作，开始凝望那座山。她说，她看到基督的形象好像正在哭泣，痛苦的表情呈现在天际。时间就像延展了一阵子，然后那个形象消失了。

大家开始讨论这件事，原来并不是每个人都看见了，但看见的人都看见了同样的表情和人。她们后来都忘记了这件事，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外婆才开始明白其中的含义：那些看到基督形象的人，家人最终都回来团聚了；没有看到的人，家人都在战争中遭受了不同的苦难，有的人丈夫或儿子未能回来，有的房子在战争中被炸毁。没有人能够解释，这是为什么。外婆的宗教体验对我影响巨大，我的姐姐在15岁时也不断梦见圣母玛利亚。在俄罗斯，人们因为痛苦或快乐的情感而来到教堂，而不是为了做生意之类的世俗目的。我想，重要的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而是那种神圣的感觉打动了我。教堂即便很破旧也没有关系，就像祖母的照片，虽然很久远，有点泛黄和破损了，但还是能在我心中唤起神圣的感觉。当年，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俄罗斯人来说也有很多宗教元素，比如集体主义，为社会服务等。虽然没有上帝，但本质也是一种信仰，很多人曾经甘愿为之献出生命。在俄罗斯，每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人几乎都有信仰。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了。改革开始时，我十来岁，正在专心学习，偶尔有一些食品的短缺，生活也有一点艰苦，但总体还好。那时我也关注新闻，发觉突然冒出来很多激进的言论和报纸。那时我很喜欢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也还记得所有人在俄罗斯的奥运会闭幕式上动情地大哭。虽然那届奥运会美国人没有来，但我们很喜欢。即使是在自由化改革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仍然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荣誉感和自豪感。但那个时候，苏联与中国就像两辆火车，开始驶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俄罗斯有邓小平这样的人物，今天也许又会是另一番情形了。两年前，我们举办了索契冬奥会。但我们不再谈论它，不再与它有情感上的联系，也不再为它感到激动和骄傲，因为那是一场完全商业化的体育赛事。

1990年，父亲的电子芯片业务萎缩了，他搬去了另一个城市。他的业务萎缩，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一些关联。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够有效，就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但他没有什么管理经验。他想提高工厂的效率，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共产党人也不理解。苏联解体，将遍布整个苏维埃各个村、镇和城市的共产党组织体系，都连根拔起和摧毁掉。这个组织体系，可是用了70多年时间才建立起来和扎根的。那些基层党员干部是当地的实际管理者，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大多数都有经验，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地方，但戈尔巴乔夫激进地破坏了这个组织体



无神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宗教，有时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毕竟没有人能证明是否真的有神存在。

系。过去，我们的工业体系是一体的。机械制造业的零件一部分在乌克兰生产，一部分在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一部分在俄罗斯生产，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苏维埃，从宇宙飞船、航空航天到舰船的生产，莫不如此。叶利钦摧毁了这个国际市场体系，很多工厂消失了。今天，我们有很多私人所有的石油天然气公司，比如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卢克石油（Lukoil）和尤科斯石油（Yukos）。这些能源都是与土地相关联的，不应该让那几个寡头拥有全苏维埃人建立起来的工厂。

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就离开了苏联，离开了俄罗斯。他对俄罗斯人真实的生活没有实际的贡献。在俄罗斯生活和挣扎的人，没有人对索尔仁尼琴有太大的兴趣，也没有人对古拉格有强烈的兴趣。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小的、封闭的精英圈子。也许这就涉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哲学问题了。个人主义真的那么重要，集体主义真的那么不重要吗？在俄罗斯和苏联，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有受过政治压迫的人。基拉祖父的堂兄过去住在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在他被当局逮捕的10分钟前，有人来向他通风报信，告诉他有警察要来逮捕他，让他赶快离开。堂兄在祖父的床下躲了整整6个月，一直没有从床下出来过。6个月后，他逃走了，却再也没有过任何音信。他就这样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另一方面，苏联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能读到异见者的书，虽然并不能够通过官方渠道出版和发行，但通过非官方渠道，只要你想读，就都能读到。就像给基拉补课的私人教师，虽然国家公开反对，但你却可以做，大家都这么做。我们一直有两层生活圈，一层是公开的、公共的，还有一层是私密的、非正式的。不同层次的人也获得不同的信息。你如果去工厂与工人交谈，他们一定会问你：“索尔仁尼琴是谁？他在哪个工厂工作？他养孩子吗、养了几个？”那些在工厂工作的工人，他们的生活很辛苦，他们的家庭也曾有人受到压迫，但他们不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思考。我们一直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生活，又不断有战争，天性里有集体主义的东西。基拉曾采访俄罗斯最有名的芭蕾舞演员玛娅·普丽谢斯卡娅。她说，她还记得有一次芭蕾舞演出，乐池第一排的位置坐的是尊贵的牛奶女工劳模。就在演出进行中，女劳模站起来，呵斥指挥家，让他“停下”，因为“你不断地挥手臂，我看不见舞台上的表演了”。你看，不同的人看到的

是不同的东西。

我最想回到的年代是20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我认为我们是人性的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战争教会了人们很多，巨大的痛苦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国家与个人是融为一体的；加加林也进入了太空。我们感到自豪，生活有意义，存在有意义，不像今天，充满着虚无。我们一直没有特别强烈的“世界强国”的感觉，也从未想过要跟美国平起平坐，只是感到苏联已经是一个大国了。虽然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很多同学从战场上回来，都对那场战争感到非常失望，但我们仍然觉得自己是有人性的人。回过头看，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了。啊！可那是跑在前面的文明所引领的，俄罗斯依旧跟随其后。

“西方曾把他称为苏联的‘红色 Dior’”

我们始终摆脱不了匮乏。我指的不是资源稀缺问题，而是说，后工业社会在本质上带来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作家们从未想到过的新匮乏。……后工业社会不是促进“上层建筑”变化的“下层结构”。它是社会的一个重要尺度：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造成同传统的对立，新的社会集团出现以及社会地位低下的集团出头露面，在社会上提出了权力问题和特权分配的问题。……高度集权的结构越来越无能力管理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

——丹尼尔·贝尔

我们现在这个咖啡馆对面的这栋大楼，叫斯拉瓦·扎伊采夫大楼。扎伊采夫是苏联时代很有名的时装设计师，现在也是俄罗斯最有声望的设计师。那栋大楼里，有他的服装设计展，也有他的工作室和专业模特公司。前面提到，我曾在时尚和消费类杂志做过很多年主编，所以我与扎伊采夫熟识。1996年，我第一次去他的工作室，并开始从他那里定制衣服。现在他年事已高。我正写一本关于他的品位和审美观念的书，每周三和周五与他见两次面，由他口述，我做记录。

我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有部苏联电影里，有一句大家都认同的流行语：“没品位，毋宁死。”在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梁赞诺夫的喜剧电影《办公室的故事》里，都能看到女性对穿着打扮的追求，对欧洲时尚的向往。苏联时代，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得到了苏联很多工业机械方面的赞助，但一直没有什么出色的消费品。我的母亲一直非常爱美。她没有什么漂亮的衣服和高级化妆品，就用简单的衣服搭配出

很多样式。她也用很朴素的方式做面膜：在鸡蛋的蛋清中加一点柠檬汁搅拌，敷在脸上做第一遍；再用橄榄油敷在脸上做第二遍保湿补水。这个方法我现在都还在使用。我仍然相信，公寓和着装在可以非常朴素的同时，也很有美感，很有品位，不需要什么奢侈品和意大利家具的点缀。物质不能完全决定审美，消费和享乐主义不是品味的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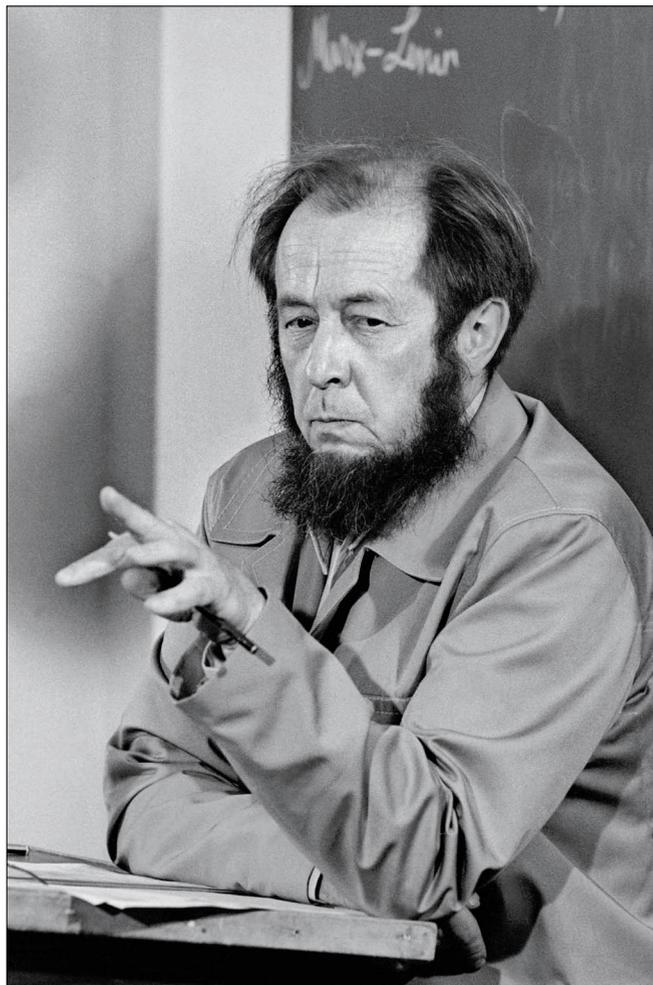
1965年春天，在莫斯科索菲亚餐厅的时尚晚宴上，扎伊采夫与皮埃尔·卡丹、CD的总设计师马克·博昂（Marc Bohan）坐在一起。法国时尚圈从此发现了扎伊采夫。那场晚宴之后，法国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把扎伊采夫称为苏联的“红色迪奥”和“时尚之王”。可惜就像俄罗斯人的宿命一样，快乐的结局永远像隐现的地平线，你可以看见，却永远无法到达。扎伊采夫曾经有过一个时尚品牌店，与香奈儿、迪奥等品牌开在一起。后来，他成为苏联“时尚屋”（Fashion House）的负责人，给苏联的一些高官和军队设计过时装，但却得罪了不知道哪位政治局委员，曾一度被撤去了职务。很多有才能和天赋的人，在那个时代都受到了一些政治压力，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这些有才能和天赋的人，在性格上难免有棱角，甚至有一些挑衅性。创造力伴随着打破陈规，就强烈地要求个性的自由，这在苏联是比较难存活的。年轻时，他曾在想象的世界里无数次走过香榭丽舍的橱窗和巴黎的街道，却没有机会受到那个世界空气的滋养。他学习过俄罗斯古典艺术和服饰，也越来越回归到历史和传统里去表达。另一个受到打压的例子是芭蕾舞演员玛娅·普丽谢斯卡娅。她也曾受到过政治上的压力，但她从来也没有离开苏联。后来，扎伊采夫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个欣赏他的官员给他重新安排了工作。他现在仍然是俄罗斯最有声望的时装设计师，普京总统的前妻普金娜的时装很多就是他设计的。但他却没有成为国际时装品牌，他只是俄罗斯的设计师。有一本写他的书，叫《美的怀旧》（*Nostalgia for Beauty*），他主要是从俄罗斯的传统艺术中汲取设计灵感的。今天，俄罗斯有很多设计师，他们相互之间都认识，每年也有两次俄罗斯时装周。但没有哪一个俄罗斯设计师是国际知名的，甚至连俄罗斯人都不认识他们。

我代你问他问了问题，他做了如下回答：

我从未想过离开莫斯科。我爱这座城市快速的韵律、节奏和它独特的魅力。每天都有很多新鲜有趣的事情发生，我喜欢快节奏的生活与工作。新的东西不过是被忘记的过去。我在过去的文献和记录中，发现

了完全现代的迷人美学。但我知道我无法回到过去，那是不可能的。我目前正在设计的服装系列中，我尝试着回到20世纪90年代，但却做不到。

今天，民族服饰在世界上流行起来，俄罗斯也不例外。俄罗斯的设计师成功地掌握和运用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遗产，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道路，因为我们的民族传统是如此的丰厚，历史文化又这么古老。几十年前，我就在巴甫洛夫·波萨德采购公司提出了这个审美方向，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上走，从衣服到鞋的设计都是如此。奇怪的是，外国人特别喜欢购买我的设计，反而是俄罗斯人不敢穿这些鲜艳的民族服饰。俄罗斯人在心理上就害怕与大众显得不合群，害怕与众不同。现代街道看起来是单调无趣的。我热爱美与和谐，无法相信在第三个千年到来的时候，这种单



1974年，索尔仁尼琴在瑞士苏黎世讲课。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左图：1960年4月1日，电影《窈窕淑女》剧组成员游览莫斯科

右图：上世纪20年代，小说《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与妻子和儿子在一起

调还将统治我们的审美。我相信，我的服装仍是个性的表达。

二

对维克多的采访一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莫斯科国立大学附近的一个咖啡厅里，第二次是在地铁西南站他家附近。

“阅读塑造了我”

在微妙可感的张力中，可以发现（俄罗斯）个性的存在。这里存在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现象，比如井然的帝国秩序和潜在的混乱，日常琐事和怪异事件，现实和非现实。

——哈罗德·布鲁姆

我今年51岁，196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玛丽乌波里，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人家庭。10岁时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家里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我有一个大我12岁的哥哥，住得离我们不远，他帮助父亲一起抚养和教育我。几年前，哥哥也去世了。我的妻子也是乌克兰人，我们非常相爱。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开始对戏剧感兴趣。我参加了一个青少年剧院，这个经验为我打开了文学的大门。苏联时期，各个共和国都非常重视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学的教育，尽管在乌克兰，我也从小就能读到很多俄罗斯文学的书籍。我还记得，《命运的捉弄》的电影上映那一年，我们都去看。电影里很多歌曲的唱段都是俄罗斯著名作家的文学和诗歌作品，其中一些作家的作品还没有到被当局封杀的地步，但也并不出版，



其中就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他们的书在苏联时代实际上并未公开出版。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白银时代”的杰出代表。我也阅读阿赫玛杜琳娜，她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写作。也是通过《命运的捉弄》，我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很被这些歌曲所触动，就去图书馆找他们的书来读。市面上买不到，但图书馆里却找得到，还有读者自助出版和传阅他们的作品。我开始背诵他们的诗歌，第一次与我现在的妻子见面时，我记得我一直都是在给她背诵他们的诗歌。整个晚上！

中学时，我阅读了很多经典作品。那时我对法国文学很感兴趣，法国的戏剧、绘画在乌克兰非常流行，就像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代起，俄罗斯人就一直对法国的文化和艺术心怀向往一样。根据外国作品改编

的电影在苏联时代也非常多，在当时的年轻男孩中间很流行。我还记得我阅读了几乎所有大仲马与小仲马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关于男人间友谊与忠诚的小说，在当时都是翻译成俄文的。在成套的青年阅读系列中，有俄罗斯也有外国作家的书，叫“冒险图书馆”系列，书店不容易买到，我是在图书馆读到的。学校里的意识形态指导是推崇革命作家，学校是国立的，由教育部制定阅读清单，文学考试也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标准来。那时我们所有中学生都背诵过的作家是普希金，连苏联偏远农村的人都知道他，他是一位俄罗斯贵族和大文学家。今天，我的儿子和孙子也还是背诵他的诗。在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我也收藏了很多的书。苏联时期，好书非常稀少，买书要花很大力气，有时要排很长的队。那时我阅读布尔加科夫、伊伏圭尼·加布里尔诺维奇 (Evgueny Gabrilovich)、伊伏根尼·彼得洛夫 (Valentin Pikoul)、瓦伦丁·卡塔耶夫 (Valentin Kataev)、瓦西里·舒克申等人的小说，还有索尔仁尼琴当时在苏联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з жизни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这些书在当时都不容易买到，有时要托熟人帮着买，一旦买到，我就很高兴。

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白银时代”的作家。当时推崇的一些作家，比如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苏联解体之后已不再受到推崇，今天的中学也不再使用带有宣传因素的文学作品，而采用讲述永恒价值的文学作品了。“二战”的战争文学仍在继续，这是为了让“二战”的记忆能够延续下去。有一些关于战争的作品，不仅讲述苏联的成功，也讲述苏联在战争中的失败和巨大损失，这在苏维埃时代是不允许的，但现在都可以读到。一些关于战争中普通人与普通家庭命运的书，在苏联时代并未得到出版，现在不仅出版，有些还拍成了电影。这些作品包括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В окопах Сталинграда)等等，从更现实、真实的角度去看待战争。从这些作品里我们知道，苏联不总是获胜的，我们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战争胜利背后的巨大代价。过去我们对这些代价保持缄默，现在则说出了这种代价，更让人信服。在这些作品里也出现了很多幽默的场景，不再只是悲剧和苦难。比如《热尼亚，热尼奇卡与喀秋莎》(Женя, Женечка и Катюша)，在刚出来的时候不太受苏俄政府的待见，因为它采取了幽默的态度对待战争。现在，这部作品在俄罗斯非常流行，它的导演弗拉基米尔·莫德尔

(Vladimir Motil)是个很擅长讽刺幽默的人。俄罗斯人一直是很喜欢幽默的。但我们的上一辈人很难有幽默感，他们严肃、沉重，生活对他们来讲，也的确太艰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迎来了最好的喜剧时代。虽然那个时候制作和发行一部现代的喜剧片难之又难，但幽默的水平却非常高。那个年代，我们不仅有梁赞诺夫，还有列昂尼德·盖代(Leonid Gayday)、格奥尔吉·丹纳利亚(Georgy Danelia)和最好的苏联单口演员。他们直到现在也很有名，比如米哈伊洛维奇·耶娃涅茨基(Mikhail Jvanetsky)和全国上下人人都知道、都在谈论的阿尔卡季·赖金(Arkadiy Raykin)。相比之下，今天的电影虽然发行很容易，但幽默的水平实在很低下，能够算得上佳片的大概也就三部：《选举之日》《男人们在谈论什么》和《男人们还谈论什么》。回过头看，我觉得自己在天性的发展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和压抑。那时苏联有审查机制，对有些作品会删改或限制出版，但只有非常小圈子的自由作家对此感到特别不满意。但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在文学艺术上是非常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和共产党委员会的官员们一样高兴。

现在是我职业上的“创作休息期”，我有了更多时间去做当年我梦想做却又没有时间做的事。现在我正在读《战争与和平》的第一卷，也看很多过去没有太多时间看的电影，同时关注我的专业领域——俄罗斯的经济和法律变动。我学习历史和艺术，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俄罗斯圣像画、法国印象派、后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当我阅读《圣经》的时候，我并不把它作为一本宗教书籍来阅读。它与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讲的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以及善如何战胜邪恶的故事。当然，在文学作品中，善经常都不能战胜恶。在我看来，所有的书也许主旨都是相似的，那就是善与恶的两分法。善恶斗争的过程，取决于作家的才华，有才华的人会将它写得非常精彩。在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里，沃伦打算从莫斯科飞走时，眼前出现了善的力量的代表——列维·马特维。沃伦说：“如果没有我这个恶的存在，你所代表的善还有什么意义。”

父亲是1991年3月11日去世的，他并没有看到苏联剧变。他是一个淳朴的工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年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思考，苏联的政治制度是好还是坏。那时对苏联的反叛，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这样激烈——知识分子、艺术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主要反对者。对我和我父亲这样简单的普通人来说，我们一直觉得生活是开心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从没有想过，生活还会是另一番模样。有一些描写苏联日常生活的作家，比如拉斯普金，亚历山大·凡彼洛夫(Alexander



1970年10月，法国总统蓬皮杜(右三)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





1956年2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Vampilov)、亚历山大·弗洛丁 (Alexander Volodin)、维多利亚·托卡列娃 (Victoria Tokoreva) 和瓦西里·舒克申等。我阅读他们所有人的作品。我对人生和国家的观念，是由所读过的每一本书，看过的每一部电影和每一场戏剧所塑造的。

我18岁就结婚了，19岁有了小儿子。儿子10个月时，我去苏维埃参军，苏联实行义务兵役制。回来后，我的生活非常忙碌。那时我很喜欢读弗拉迪米尔·维索夫斯基的诗。他是一个很强硬的诗人，他的短诗，比如《战斗的歌谣》(Баллада о борьбе)、《爱的叙事曲》(Баллада о любви)、《空战之歌》(Песня о воздушном бое)、《猎狼》(Охота на волков) 等，帮助我渡过很多生活的难关——他的诗书写爱情、工作、战争和战争中的人，以及人们在艰难困境中的生存。那种渡过难关的精神，鼓励我面对自己的未来之战。安东·契诃夫也给予我很多慰藉，《万妮亚舅舅》和《普拉东诺夫》这些作品，都教我坚强，要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如

果你在道德问题上做出妥协，就会完全被摧毁，所以永远不要做出妥协。我也很喜欢《一首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是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导演的一部电影，讲的是普拉东诺夫的故事。这部电影告诉我，在道德问题上做出妥协的男人，最终会多么的不快乐。20世纪70年代还有伟大的苏联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他的《潜行者》告诉我，人如何在艰难处境中生存，以及当你看不到生存的意义时，如何找到生存的意义。

“我不断思索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但至今也没有答案”

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行政大权，社会关系类似国家资本主义。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阶级形成了。……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党和党的领导阶层以及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创造出来的。一度生气勃勃、组织

严密和充满首创精神的党正在消失，而逐渐转变为这个新阶级的传统式的寡头统治。

在革命得胜国家中的统治官僚集团，早已在武装斗争中有了独立地位，并尝到了权力在握和财产“国有化”的甜味。他们已察觉到“自己的国家”与自己的权力，而以此为根据要求平等了。……在苏维埃各共和国所设立的政府中，如乌克兰、高加索，都有民族主义存在，而在东欧各国所设立的政府中则更为强烈。

——密洛凡·吉拉斯

1982年，我从职业高中毕业——职高是苏联正规教育的一种。接着，我结婚了。18岁时，我还想进莫斯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继续学习。但我的职高学历是进不了莫大的，所以就推迟了几年。1988年，我第一次来莫斯科考试，没有考上；我继续准备，1989年继续考，还是没有考上；1990年，我第三次参加考试，终于考上了。

对于我来说，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改革，像我这样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的人，是不会有机会在莫大国关学院学习的。1985年以前，要通过国际关系学院的考试，你需要非常复杂的手续，不是学习好就可以进入学院的。你需要所在单位党委的推荐信、共产党区委、市委和地区党委的推荐信。对于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弄齐这些推荐信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莫斯科国立大学基本上都是特权家庭子女才能上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领袖的子女、高干的子女、大人物的子女。1985年以后，我虽然还是得收集齐这些推荐信才能上大学，但至少我有可能去找这些各级党委的人，可以与他们讨论了。这些党员干部的心态至少开放了一点。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它对所有的农民、工人和普通人都曾是开放的。大概是在1955年之后，特权开始出现，苏共成了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特权化的政党。苏联普通人的生活非常朴素，但共产党精英、重要的商贸和工商业官员的生活却非常奢侈，与普通人很不相同，普通人想要改变生存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困难。1971年，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还保留着一些共产主义的装饰，比如少先队的红领巾等。但那时我们就已感知到，像国家的管理者勃烈日涅夫这些人，都不相信共产主义。没有人再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入党只是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罢了。

我从此留在了莫斯科，也一直视自己为苏维埃公民。今天的乌克兰是由三个部分的组成的：东南部乌

克兰、中部乌克兰和西乌克兰——这是1939年从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划出来的乌克兰领土，一直倾向西方。我出生在东南部乌克兰，也就是“新俄罗斯”（帝俄地区）。我上的学校完全用俄语教学，一周只上两次乌克兰语课，从来都不受重视，就像一门外语。教学的重点从来是俄罗斯文化和俄语。这个地方的人就有一种概念：从来没有什么乌克兰人，从不知道什么是乌克兰人，而只有苏联公民。

1976年，我曾跟青少年剧院的人一起去乌克兰的利沃夫演出。我想在那儿的商场里买一副太阳镜，就用俄语与商场的售货员交谈。她当然能听得懂俄语，但却装作听不懂。我想了很久，想用乌克兰语和她交谈，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乌语的“太阳镜”这个词怎么说，我在学校里学的乌语实在也不够好。20世纪80年代我参军的时候，部队里有一种不成文的传统：战士们相互接近、要好，与他们从哪里来有很大的关系。我所在的部队，有一个小伙子来自利沃夫，有一个从乌克兰的波兰部分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来。那两个小伙子相互问候和要好，却认为我是莫斯科人（Moskal），指那种俄罗斯影响下的不纯正的乌克兰人。这件事发生在1983年。我想，它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我是在1997至1998年间拿到的俄罗斯国籍。苏联解体后，我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有一件也许值得一提的小事。我在乌克兰住了27年，虽然我加入了俄罗斯国籍，但是苏联解体后，我仍把乌克兰视为自己的妹妹。在最近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中，我是支持乌克兰的，就像各种体育赛事上，我也是乌克兰队的“粉丝”。我还记得，1999年乌克兰与俄罗斯在莫斯科的卢什基尼体育场争夺欧洲杯决赛圈入场券，全场有8万观众。我与夫人还有另外五个朋友一起去，我们都是出生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公民，却都支持乌克兰。乌克兰赢得了那场球赛。在乌克兰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周围的人都静静地看着我们。然而现在却是另外一番情况了，我为现在的乌克兰感到遗憾和难过，她受到了误导和错误的影响。也许就像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里所写的那样，为了让钢铁更加坚硬，就需要经过不断的锤炼吧。不过，这本书在苏联解体后，就变得过时了。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工业化的乌克兰小城。小城有三个大工厂，都与机械制造有关。我对法国文化的热爱，是从这个小城开始的。俄罗斯文化在历史上与法国文化联系紧密，但我并不确切知道，自己是如何与



1989年2月15日，一名土库曼斯坦女孩给进驻该国的苏军士兵系上红领巾



法国文化发生联系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小城的电影院上映着很多法国电影和苏联电影，法国电影当时在苏联非常流行，几乎没有美国电影。当时法国左派和共产党在法国影响比较大，苏法关系也很好。我看了很多法国喜剧片，听了很多法语歌曲。就是在乌克兰小城的电影院里，我看了让·马莱、路易·德·菲奈斯、让-保罗·贝尔蒙多和皮埃尔·理查德等演员演的法国电影。经常有法国电影明星和歌星来苏联，他们会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我很喜欢法国文化，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情感的方式。电影的具体情节和人物很多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帧帧图像和轻松的氛围：时尚的女人、历史悠久的名城、美丽的海滩、炫酷的汽车和幽默的对白。20世纪70年代，苏联也有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名导演，他非常受欢迎，但很多人还是不太能看懂他的电影。相比之下，法国电影轻松易懂，更重要的是，那些图像带给我们对生活的向往和渴望，故事本身甚至不重要了。20世纪60年代制作的詹姆斯·邦德电影《来自俄罗斯的爱情》在苏联也风靡一时，漂亮的男人女人，豪车美酒，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上大学的时候，我可以从五种语言中选择自己的外语：芬兰语、阿拉伯语、瑞典语、法语和波兰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语。

那时，我还没有特地思考过电影里的生活与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的差距。我是在苏维埃的教育下长大的，我知道自己国家的优点与缺点，我热爱我的国家。那时，并没有“我们是最好的”“我们最幸福”这样的宣传，电视、报纸和学校里的老师从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最强大的国家”，而是说我们可以“保卫自己安全的强国”。我们知道自己在军事领域和美国差不多，但从从不认为在经济领域可以和美国相媲美；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捷克、匈牙利、东德和波兰的轻工业也比俄罗斯发达。苏维埃在重工业、军事和太空领域有很大的投入，维持苏维埃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体系花费也很大，没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其他经济领域里。今天看到中国的发展，我也在想，当年我们的国家管理者也许是能找到平衡轻重工业、平衡经济与国际关系的道路的，但他们却不够有魄力。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那时我认为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与利益，也是为了帮助阿富汗发展他们的经济而去战斗的。后来和现在，很多政治家告诉我们，那场战争是错误的、不道德的。我难以分辨，这场战争对我来讲变得很敏感，毕竟有那么多苏联人曾

在战争中牺牲。

我完全没有想到苏联会在1991年解体。那时我在莫大学习，不分日夜地读书，既学习法律专业书，也学习法语，同时还要为工作忙碌，家庭也随我来到了莫斯科，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公寓，得非常努力地攒钱买房子，几乎没有时间睡觉。我那时还没有去认真想过这个历史性的事件会带来什么后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不断思考，为什么苏维埃会解体，但至今仍然没有答案。俄罗斯人的性格里有一种爱走极端的东西，戈尔巴乔夫也没能够找到最好的平衡点。他的性格既极端，也过于懦弱——俄罗斯历史上的统治者，他可以残酷，可以仁慈，可以智慧，可以愚蠢，但他绝不能懦弱。戈尔巴乔夫没有赢得对叶利钦的战争。我看了很多关于1991年历史剧变发生时，每一天、每一分钟记录性报道，他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扳回局面，但他没有。我想，如果不是这种极端的方式，如果那些前共和国的政治领袖能够一起合作、有一些妥协精神，我们今天的情况会好得多。我完全不是叶利钦的推崇者，他一手摧毁了我们的经济，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政治领袖一起破坏了苏联。叶利钦和那些共和国政治精英在乎的是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国家。

我不认为国家是邪恶的。它是“不可避免的邪恶”吗？不，我也不同意“邪恶”这个词。国家规定我们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即使在《圣经》里，上帝也没有给人完全的自由，而是给了人类十诫。我不喜欢索尔仁尼琴，很多像我一样的俄罗斯普通人都不喜欢他。他过于激进，对俄罗斯人民也并未敞开心扉。我喜欢布罗茨基和普宁这样的俄罗斯作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或不喜欢苏联，而是因为他们极富才华。

“新的秩序”

雾月十八日拿破仑的俘虏物是自由资产阶级。他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

——卡尔·马克思

我在莫大读书的时候，苏联的经济一度完全停滞。那时苏联的国民经济理论被摒弃后，大学里引进了西方经典，比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凯

恩斯，以及福特经验等。记得那时我也阅读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的《黑天鹅效应》，阅览《哈佛商业评论》，一切都换成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如今回过头去看，苏联的经济是一种完全由国家控制的极端，但完全的自由主义又走到了另一种极端。在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黄金分割点”，俄罗斯人性格里却缺少一些中庸的东西去发现它。我相信自由是很重要的价值观，但却不是终极的。有一部1988年的俄罗斯与德国合拍的电影，叫《屠龙》（*Убить дракона*），讲述的就是人在完全自由状态下的表现，与我们从1991年起所经历的历史与生活非常相似。1996年，我完成学业，在一家小型法国律所工作。两年后，去了一家法国国际大型供应商公司。1998年8月，俄罗斯发生了一场经济危机。幸运的是，那一年的4月我已经转到了这家法国大公司，是法国公司的高级律师。虽然有裁员的情况，但并没有降临在我的身上，收入总体来讲还有保障。之后，我去了一家北欧国际基金投资公司，做俄罗斯农业土地的投资，这家公司现在已在瑞典上市；再后来，我在美国一家投资俄罗斯农业土地的美国国际基金公司工作了7年，直到最近，我决定有一个“创作的休息期”。

1998年的那次经济危机，俄罗斯恢复得很快。从1998至2008年，俄罗斯经济一直比较平稳地发展。200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俄罗斯也从2009年下半年就开始恢复了，直到2014年因为与乌克兰的冲突而来的经济制裁。这次制裁让俄罗斯的一些经济领域失去了发展的工具，变得很艰难，比如外部融资——有一些俄罗斯银行是通过从海外获得资本来开展业务的，现在这些领域的经济都开始衰退。俄罗斯试图寻找替代方案，比如与中国的国家投资基金建立关系，我也在密切关注着动向。

在后面这两家公司工作的9年里，我作为高级法律顾问，参与了58万公顷俄罗斯中部农业土地的交易，这些土地或者被长期出租或者出售给国际公司。我开始工作生涯的时候，俄罗斯的商业刚刚开始兴起，却没有什么法律和规范，是一个极度混乱的年代。我的职业生涯伴随着俄罗斯联邦立法的完善和新市场秩序的形成，现在法律的完善程度又比5年至10年前深化很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先后引入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慢慢发展出了一套保护投资者和财产的法律规范。今天，在俄罗斯做农业生意和购买土地，甚至比在乌克兰容易得多。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土地，可以先租给私有公司，公司享有49年的租期，但在

使用3年后可以购买，一旦获得产权，就是永久产权。

今天，通过一套复杂的法律和公司结构，一些跨国公司是俄罗斯中部大片农业土地的实际拥有者。通常，外国国际公司有一个注册在离岛的公司，下面有一个荷兰公司，因为荷兰与俄罗斯签署有互相保护投资的协议。在荷兰公司下面，有两个俄罗斯公司，一个公司是俄罗斯土地的产权所有者，另一个公司是土地运营与管理者。因为土地运营存在着风险，所以设立了两个俄罗斯公司。根据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外国公司在这些土地买卖的公司只能持有49%的股权。跨国公司为了保证是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就分别持有两个俄罗斯公司49%的股权，这两个俄罗斯公司再交叉各自持有对方51%的股权，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属于国际投资公司了。俄罗斯联邦法院对这种交叉持股表示过异议，我曾经历过官司从一级一级法院最终打到最高法院的全部过程，但最终最高法院判决，这种安排是符合俄罗斯联邦法律的。不仅如此，因为这些俄罗斯公司各自有51%的股份是由俄罗斯公民持有的，仍然享受到国民待遇，即使在2008年危机之中，它们也能够在农业青黄不接的时候，申请到俄罗斯国家银行的农业贷款。

三

对伊万和他的朋友及家人的采访，分为四次进行。第一次是在莫斯科国立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里，伊万向我讲述了他的家庭故事。第二次是在地铁特列季亚科夫站不远一家隐蔽的酒馆里与他的朋友聊天，我们喝啤酒、抽水烟，聊至深夜。第三次是在地铁巴布什金站附近，见到他的一对恋人朋友斯坦尼斯拉夫和安娜，那是一次简短的访谈。第四次是在地铁青年站附近的购物中心，讲述者是他的妻子塞尼娅和岳母安娜。

“我仍选择自己成为俄罗斯人”

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人造物”。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是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



1. 出生在摩尔多瓦已加入俄罗斯国籍的伊万（后排中）和他的家人
2. 伊万的曾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被错误执行死刑，50年代法院宣布死刑判决为非法，1991年才获得平反
3. 伊万的外公外婆，居住于乌克兰偏远村庄
4. 伊万的母亲

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

世界性帝国的兴起创造出种种相异的旅程。……为他规划其旅程方向的是才能，而非死亡。在眼前他所看到的是一个顶点，而不是中心。他得沿着山壁的小径一圈圈地盘旋而上，越接近山顶，他所要绕的圈子会越小越紧凑。他在V职等时被派到A镇，然后也许在W职等时被调回首都；在X职等时再前往B省赴任；Y职等时奉派到次级国王领土C；最后在首都以Z职等完成他的“朝圣之旅”。在这个旅途中，没有可以确保安身之处，每一次停留都是暂时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我叫伊万，今年25岁。苏联解体的时候，我才1岁，还没有记忆。我的母亲一家是乌克兰人，父亲出生在摩尔多瓦（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我也出生在摩尔多瓦。奶奶是摩尔多瓦人，但爷爷是俄罗斯人，所以我有1/4的摩尔多瓦血统。苏联时代，我们一家可以自由地在苏维埃各加盟国旅行。苏联解体后，我们就留在了摩尔多瓦，不能再回到俄罗斯了。我在摩尔多瓦读完初高中，大学时来到莫斯科国立大学。现在我已加入俄罗斯国籍，在这里结婚、买房、定居。我的父母也一起来到俄罗斯，与我的哥哥定居在罗斯托夫。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我从小接受的是俄罗斯文化的教育，学的是俄语，读的也是俄罗斯的文学作品。苏联解体后，和其他非俄罗斯的前苏维埃国家一样，摩尔多瓦也开始培养憎恨俄罗斯人的意识。摩尔多瓦的官方语言现在是罗马尼亚语，不过仍有50%的人在使用俄语。1991年后，去摩尔多瓦的政府工作必须要说罗马尼亚语，大部分的年轻人现在从小学到大学都学习罗马尼亚语，以便成长为摩尔多瓦人。过去，摩尔多瓦有两类学校：一类是俄语学校，但也要学习罗马尼亚语；一类则是罗马尼亚语学校。现在，俄语学校的数量在大幅下降。有时我坐公交车，用俄语对公交车司机说，我要去哪一站。虽然他几乎百分之百听得懂我说的什么，但也会很不屑地瞟我一眼说：“这是在摩尔多瓦，难道你不会用罗马尼亚语说吗？”为什么是罗马尼亚语？说起来是个有段纠缠不清又有点讽刺意味的历史。摩尔多瓦人现在认为，300年前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是一个国家，引用这段历史可以和俄罗斯撇清关系。但如果引用另外一段历史，其实早在1917年前，摩尔多瓦就在俄罗斯的帝国版图里了。

我的爷爷也叫伊万，他有12个兄弟姊妹。他们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被逮捕和枪决，他们的母亲看着13个孩子，觉得独自无力承担，就自杀了。他

们13个人就成了孤儿，被送到俄罗斯各地的孤儿院里，从此分散了。爷爷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孤儿院，那年他7岁。等到他16岁成年，该离开孤儿院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于是他就直接参战，去乌克兰打仗。爷爷很少向我们回忆他在孤儿院的经历，只是说那段经历并不愉快，他们从未被当成孩子对待过，所以他没有童年。他跟着朱可夫元帅的部队，解放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他的记忆里，士兵们非常喜欢朱可夫，他是一个异常严厉，但又极其公正的人。打到摩尔多瓦的一个村子里时，他遇到了我奶奶，当时她15岁，他们相爱了。“二战”结束后，爷爷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分配，先在黑海边乌克兰的敖德萨待过一段时间，是朱可夫元帅的部下；几年后，他被派到摩尔多瓦，成为摩尔多瓦一个省的军长，直至在摩尔多瓦退休。

爷爷会给我讲一些关于战争的回忆，但他会讲比较有趣的故事。还记得爷爷说，有一次，他们的部队正靠近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边境森林，离敌方阵营很近。他们被要求保持绝对的安静，不能发出任何声音。这个时候，爷爷听到厨房里有奇怪的声音，去那里一看，发现一些从森林里来的可疑军人正在找东西吃。他们张口就用德语说话，原来把这个营地当成了德国军队的营地。爷爷捉住了他们；从这些德国人那里，苏军得到了不少有用的情报，爷爷也因此得到了提拔。那时，爷爷他们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进入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的，人们夹道欢迎，用鲜花迎接他们的队伍进城，感谢他们赶走了纳粹。他们可以住在任何人家，受到的是最好的招待。而如今，在这些国家，“苏维埃人”等同于俄罗斯人，已被视为占领者，而不是解放者了。爷爷有非常多的军功章和制服，他曾很以此为自豪。苏联解体后，他再也不敢穿这些制服上街，害怕被打。但每年的5月9日“二战”胜利日，仍然是我的家庭最隆重的节日。这是俄罗斯的家庭都过的节日，因为每个家庭都有人参加过战争，都有亲人在战争中死去。现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为了与苏联保持距离，将这一天改在5月8日庆祝了，因为8日那一天是欧洲的胜利日。

1989年，爷爷收到了一封苏维埃政府的“恢复名誉信”，是关于他被枪决的父亲的。这封信的扫描件就在我的电脑里，它是这样写的：

你的父亲布洛霍夫·莫伊谢（Болохов Моисей），出生于1892年，被证明是清白的。很抱歉他因被错误地指控为宣传反革命思想被杀害。他于1937年9



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居民（摄于1968年）

月20日被非法执行极刑。1958年的苏维埃法院将此案视为非法，因为没有犯罪的证据。在此恢复你父亲的名誉。

我的曾祖父是一名普通的矿工。听爷爷说，他被捕是因为邻居检举告状，认为他有一些他不应该赚的钱。那个时候，任何人都处于任何人的监控之下，任何人都可以被任意逮捕和杀害。当爷爷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主要还是感到欣慰，觉得事情最终水落石出，父亲的名誉得到了恢复，也算是一个交代。这件事倒并没有太影响爷爷对苏联的态度。家里还有一位下落不明的亲戚。父亲的哥哥曾经去俄罗斯当过空军，回到摩尔多瓦一段时间后，他决定继续去俄罗斯为空军效力，但却一去不返，失踪了，从此了无音信。父亲寻找过他很长的时间，给各种政府部门、电视台写信，至今却没有任何音信。我们猜测，他可能已经牺牲了。

人们对苏联的态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发生大转变，这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很大关系。他的改革开始后，苏联各共和国的地方政治精英就希望获

得更多的权力，因此鼓舞民众的民族主义态度，这对他们获得权力是有利的。在摩尔多瓦、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当地的政治精英都将对现状的不满归罪于苏维埃的统治。其实，在苏维埃之前，摩尔多瓦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任何工业基础；苏维埃时代，工厂、铁路和基础设施都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来。因此，地方政治精英对苏维埃全面的指责性宣传，不完全符合史实。但在20世纪80年代，苏维埃经济的确下滑得很厉害，没有工作机会，食品极度短缺，这种政治宣传非常容易获得民心。即便如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事情在不断变得糟糕，却没有人相信，会变得这么糟糕。当解体协议在白俄罗斯签署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不相信这个协议真的能够得到执行，不相信它会变成现实。

苏联解体前，我的母亲在摩尔多瓦的一家糖果工厂工作，父亲是共产党员，曾希望从政。他当时是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的共青团主席，如果苏维埃没有垮掉，他或许能有不错的政治生涯。1991年，他的



乌克兰基辅“解密的记忆”主题展览中公布的一张照片：30年代大饥荒期间，一群孩子在集体农庄捡土豆

政治生涯还没真正开始就结束了。他成了商人，经营自己的农产品贸易公司，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人做大米、小麦等粮食的买卖。对于他来讲，做生意是完全新鲜的，他没有任何经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冒险。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年代，到处都是犯罪，法律完全不管用，黑帮团伙遍地都是。私有化的过程也很有戏剧性；一些工厂把股份合同分配给工人们，有一些有信息的聪明人就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工人们手中的合同，有时用一瓶伏特加就能换来他们的股份。那是一个或者一夜暴富，或者被干掉的动荡年代。父亲的生意刚开始很顺利，我们的家庭也一度很富裕。在我6岁的时候，家里就有了四辆车，我去上学都由私人司机接送。但90年代末，幸运离开了父亲。有一个土耳其商人的钱一直没有到账，而那个时候所有的商业交易都是没有官方正式文件的，得不到法律保护，就算有，土耳其的法院也不承认，不予受理。父亲欠下了很多债，从那以后，他一直只维持着小规模的生意，勉强生存。现在他在俄罗斯依旧做粮食贸易，但只是很小的生意。

我的母亲出生在乌克兰，她的整个家庭也在乌克兰。现在，我的外婆、一个舅妈和两个堂兄妹都在乌克兰。但我的母亲视自己为俄罗斯人。小时候，我们每年都会去乌克兰待一周，看望外婆。外婆住在乌克兰

一个叫切尔尼维茨的村庄里，我的外公曾经是村里的兽医，在我一岁的时候因车祸去世了。当时外婆和外公在一辆汽车上，但外婆幸存了下来。苏联时代，外婆一直在一个书店工作；苏联解体后，她就经营自己的小农场，种一些蔬菜、养了几只猪。外婆从未离开过乌克兰，她也说乌克兰语，视自己为乌克兰人。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的时候，她与母亲在Skype上通话，会为俄乌关系而争吵。两个国家各自的宣传，引起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内部的争吵。

我的曾祖母是1996年去世的。小时候去她乌克兰的村庄看望她，那里还没有通水电气，处于一种自然的原始状态。她出生在一个宗教氛围很浓厚的家庭，每年都过复活节，她特别嘱咐我在学校里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那时信教还不太受到宽容。她给我讲过很多关于饥饿的故事。乌克兰曾经有过两次大饥荒，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乌克兰人将这两次大饥荒叫“Golodomer”（饥饿大灭绝）。她曾有过很长时间每天只吃半个土豆的经历，她也亲眼看到很多她认识的人饿死了。曾祖母的母亲有食物的时候，总是先把吃的让给孩子们吃，她虽然是个高大的女人，体重却曾经从60公斤降到35公斤。曾祖母一直觉得自己能活着就很幸运了，因为有太多身边的人死去。今天的乌克兰历史书里，将这两次饥

荒归罪于苏维埃政权。普遍的看法认为，乌克兰本来是粮仓和农业大国，但粮食却都被中央政府征收了，没有给乌克兰人留下粮食。我对此持一些质疑态度，因为这两个时期，很多俄罗斯人也在挨饿，工业化对农业的剥削太厉害。而且，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视角也并不准确，毕竟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而不是俄罗斯人。很多乌克兰人今天将苏联等同于俄罗斯，认为苏联就是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占领和征服；但也有一些乌克兰人，认为自己就是俄罗斯人。今天在乌克兰的很多地方，列宁的雕塑都被移走了；但实际上，正是列宁缔造了今天的乌克兰——正是他将俄罗斯与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划入了今天的乌克兰疆域。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满自相矛盾。

我的父母喜欢苏联。当然，当人的年龄开始变大时，有时也难免美化自己的记忆。父亲觉得，那个时候每个人对未来都很确定：大学毕业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能分配到工作；只要努力工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退休后会有养老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支持。他说，那是一个“未来由政府保证”的时代，你至少确信自己不会被遗弃在大街上。“自由”是一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被广泛舶来而大规模流行的概念，过去只是在一些受西方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中流行。经历过苏联解体所带来的阵痛后，很多人的实际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他们为这样的“自由”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贫穷、政府的继续腐败、各种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寡头和黑帮、贫富的巨大差距……那是一个夜晚根本不敢在街上行走的无序年代。20世纪90年代，苏联到处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俄罗斯，“你这个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骂人的话。曾经一度，俄罗斯的大学里所有的经济学教材都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进入2000年后，大学里重新开始采用俄罗斯经济学家编写的教材了。俄罗斯大概有30%的人感谢戈尔巴乔夫，70%的人则对他持负面评价。他摧毁了一个国家，换来的是并不值得为之那么做的自由。现在，我们又比什么都失去了的90年代好一些，但人们依旧抱怨政府聊胜于无的支持、微薄得难以维持生存的养老金和昂贵得难以支付的医疗费用。普京政府还是逐步改善了苏俄老兵的生活水平，爷爷现在的退休金每月可以拿到3万至4万卢布，基本上是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俄罗斯人亲历的生活，也证明了“民主”与幸福和富裕并没有必然关系，相反，它也可以意味着寡头和犯罪。我们对很多表面美好的概念都曾经存有幻想，现在都

破灭了，“自由”“民主”都是这样，成了虚伪的代名词。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大概是“消费主义”。10年前，可以用奢侈品名牌装点自己是俄罗斯风行的时尚，不过现在又慢慢被视为庸俗了。

对我来说，我还是很高兴没有生活在苏维埃时代。那个时代对外部世界是几乎封闭的，而我们现在有了看世界的自由，也能够享受到最先进的科技。我并不喜欢父母那一辈人推崇的集体主义：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必须对其他人负有责任，参加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邻里关系亲密无间，政府也有很多的控制。我还是更喜欢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不太喜欢必须对周围的人那么负责和什么事情都得大家一起考虑的思维方式。我相信每个人自己的努力，就会让社会总体上变得更好。但我仍然选择做一个俄罗斯人。前年我曾去美国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交换学习过一年。初到的时候，我被那里很高的生活质量和人性化的基础设施深深吸引，一度想过移民美国。但我渐渐发现，那里的人们也有很多生活中的困惑与问题。那儿的人知识水平比俄罗斯人低很多，对美国之外的世界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基本的历史和地理素养，一听说我从俄罗斯来，立马就认为我生活在苏联。

我很欣赏中国政治家的务实，俄罗斯人很容易为某种立场或信仰走到极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对中东和非洲的外交政策。在前几年阿拉伯世界的剧烈变动中，美国总是一跃而起的支持反叛者，俄罗斯则头也不回地站到另一边，只有中国静观其变，选择支持实际获得了权力的那一方。在一个俄罗斯人看来，这种实用主义值得学习。

“我依旧是乐观主义者”

夜间低级层次的大门打开了。我意识到警卫睡着了。于是被关在地牢内受折磨的往昔阴影便出现在梦境中。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这些阴影，以便最终弄清楚在我生命的拂晓之际，在日出之前，所发生的那个悲剧。……我于一瞬间看见了我过去的本来面目——一个愚昧无知的小野人，见到每一个黑影都会吓得魂飞魄散。在我的心中，除了忧郁和疲惫还会有什么呢！理性的光芒照亮了那些可怕的角落，那里潜伏着各种恐惧，成为未开化力量的栖身之处。正是这些未开化的力量使我的一生黯然失色。

我曾在1936年收到过一封可怕的信。沃罗涅什州一个农民为了报复泄愤，用斧头劈死了邻居全家。

……这个人自然被判处极刑。他在死牢里读了一些书，其中一本是我的《重返的青春》。他明白了人能够而且必须支配自己，可是他早先不知道人是可以驾驭自己感情的。不应当让低级力量占上风，理性必须战胜它们。

——米哈伊尔·左琴科

我是伊万的岳母，塞尼娅的母亲。我叫安娜，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1960年出生在莫斯科。我的母亲也是莫斯科人，同样是莫大的心理学家。她最近出了一本俄语著作，研究童年时代的战争记忆对人一生的影响。

我一直觉得自己度过了非常快乐的童年，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和完整的社会当中。童年时我也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里，定居在最好的城市中，生逢最好的时代。我不记得我的父母在我童年时代有任何担忧或焦虑，他们唯一操心和争论的事情，就是周末是不是去远足、去哪里远足，以及如何陪伴我。我的父亲是激光工程师，他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业务到深夜，按部就班。小时候我读过很多善恶力量较量的书，善的力量最后总是获胜的。我至今依然抱着这种乐观主义，相信善最终是会获胜的。

我和母亲都曾在苏联时代教过很多年心理学。那时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马列主义也是指导心理学和人类意识的理论基础。那时我们教授的主要教材是苏联心理学家阿列克谢·梁提耶夫的《人类行为的理论》。他认为，人的意识是在劳动中形成的，意识反映的是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构成了他们的意识。而人的行为又有不同的层次，比如低级的、个人的欲望和高级的、全球性的欲望。这种理论曾一直被应用于儿童心理学，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它解释了人的行为和心理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受马列主义影响很深。今天我仍然相信，马列主义是有真理因素的，特别是他们对于社会经济转型的理论。我至今也很难相信市场经济，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市场经济的缺陷，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我还是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苏联解体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发生了混乱，马列主义不再是指导思想了。但我还是认为，即使马列主义心理学在解释人类的情感上——比如人为什么高兴或悲伤的问题，可以用其他心理学理论替代，但在解释人类行为的社会和经济学动因上，仍然是有效的。现在很多心理学理论认为人的天然倾向是自私的，但

我并不这么认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也可以是无私的：母亲对孩子的无私付出；完全奉献自己的爱情；牺牲自己去救他人，并得到总统的荣誉奖章，这种事也是会发生的。前段时间，有一个女人在莫斯科地铁站里摔倒在铁轨上，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救了，这些行为都不是自私能够解释的。自私与无私，有时不完全能够用理性来解释，有时人的个人动机、欲望和情感比抽象的目标还重要。追求平等和博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不过女儿塞尼娅认为，即使就母亲对孩子无私付出这一点来说，也是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比如从孩子那里获得更长远的好处。

我一直也给一些公司做心理咨询。2005年有一个案例，一家公司想安装一套对员工的控制系统，监控他们的行为。员工不愿意接受这套系统，有些工人甚至与公司的领导层发生了冲突。我的工作，就是向员工解释这个系统为什么是有效的，并说服他们接受这个监控系统。我依旧是计划经济的信徒。我最近读到一个有趣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的失败多半是因为人们的计算能力还不够强大；今天，我们有了超级计算机和大数据分析的方法，说不定计划经济在未来是可能成功的。这个理论我个人很赞同。女儿却争论说，计划经济虽然有利于维持某种状态，却不鼓励创新。

苏联解体以后，梁提耶夫的理论不再讲授，心理学产生了危机。一段时间里没有可以依赖的理论，也涌现出了大量的西方理论和方法论，让人眼花缭乱，一时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大学里每个人都教不同的心理学。也曾有人尝试过为缤纷的流派寻找一种大一统的理论，但都失败了。在我所经历的苏联时代，我认为并没有什么人会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更不会感到有向心理学家求助的必要。我的外婆16岁就结婚了，一生经历很多艰难困苦，却一辈子感到生活幸福，从未有过心理援助的需求。苏联解体之后，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才开始出现在大学里，人们开始讨论人生意义和心理问题。苏联解体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经济变革在一夜间造就了巨富和贫穷，贫富的急速扩大造成了人们的很多心理问题。原来的所有秩序都崩溃了，所有的组织都解体了，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成了丛林社会。但那时大学里，还只有这些古典理论，没有太多的科学文献。

1983年，我的祖父去世，那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变故。那时我很叛逆，想要得到更多的自由，也有更多的机会尝到自由的味道。西方的文化开始不断传



那时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马列主义也是指导心理学和人类意识的理论基础。

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使劲儿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很欢迎这些改变。那时候身边的一些朋友要去美国，我也考虑过移民，但却最终舍不得俄罗斯的白桦林。我不太记得1991年的情形。那时我有了女儿，所有的精力都在她身上，所有的担忧都因她而生。我只记得1991年8月，我还怀着孕，丈夫出去参加了一系列广场集会和政治活动，街垒战之类的，争取自由。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紧接着，我们所有的储蓄变得一文不值，我们不再宽裕。有了孩子以后，生活就更加拮据。家里没有人会做生意，没有和市场经济打交道的经验，做了一段生意，却欠下很多债。过去还算得上宽裕的生活，一下子水平大幅下降。

但我并不想回到苏联时代，我喜欢现在所拥有的选择和旅行的自由，也不再相信有什么人能指引我的未来。那个时候我读了一本书，叫《丈夫与妻子》，讲旧时代的一对夫妇抚养七个孩子长大。他们住在木屋里，生活极为艰苦，但妻子却保持着乐观。马雅可夫斯基有一首诗，叫《好》，是这样写的：

我抓着绿色的小尾巴
提着两个小小的胡萝卜，
不是去做汤，
不是回家，
而是到爱人家去做客。
我曾经送过她
许多糖果和鲜花，
但是这个贵重的胡萝卜
和那半根白桦树木柴
比所有贵重的礼物，
使我记得更为深刻。
我腋下夹着
又湿又细的木柴，
送给爱人去烧。

这首诗描写了我们的国家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人们如何生活。我想到那些穷人，看看自己至少还有现代化设施的公寓，也就不再抱怨。我身边很多朋友那时都有了孩子，我们必须给孩子们做出榜样。我们发明了很多玩具和游戏。到度假的时候，那些做生意赚到了钱的朋友就会邀请我们一起去度假。我们那代人还保留着团结互助的精神，塞尼娅的玩具和衣服都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帮助。那时为了多赚些钱，我一边带孩子一边兼职，比如给议会的议员做一些访谈，收入还算不错。当时我曾经很想要第二个孩子，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要，养育孩子对我来讲还是太贵了。如果想

给女儿不错的教育，让她开阔视野，就得花很多钱，我养不起第二个。我们这代人，在铁幕下生活了很多年，一直渴望看看铁幕那边的世界；等有了孩子，就觉得让孩子出国看看特别重要。

我们这一代苏维埃人还是充满了历史感。就在上个周末，我与一个年轻的朋友去莫斯科的湖边散步，看到有人在破坏湖岸。我的朋友吼他们，质问他们为什么要破坏湖岸。他们说，湖底有一些“二战”中沉没的坦克，对研究历史非常重要，要把它们挖掘出来。我的朋友说：“我不需要你们的历史，我只需要自由和自然。”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历史，而们很希望让孩子们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今天仍会对我的女儿说：“重建俄罗斯的任务就交给你们这一代了。”我相信个人对历史负有责任。

我觉得选举是一种被过于高估的现代仪式。苏联解体前，我们也实行了全民公投，但我们的选票未能实质性的改变任何事情——绝大多数人觉得应该保留苏联，但苏联还是解体了。选举更像一门技术，只要你有顾问提供专业的建议，有能干的竞选团队，有好的竞选战略和策略，以及足够的金钱，你就可以赢得选举，与你本质上是个什么样的领导者关系不大，自由与选举因此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这代人热爱自由，但并不把自由当作终极信仰。生活经历让我想，如果把一些政治权利交给政府，政府则保证经济繁荣和不断变好的生活，这个交易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是苏维埃那一代人抚养大的，但我们更像小时代里的小人物”

俄罗斯人的性格总像孩子一样，期待着礼物和童话。但是，雏鸟的绒毛无法保护年老的身躯。

——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

1. 塞尼娅

我是伊万的妻子，1991年出生在莫斯科。我们一家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人。也许我这代人，是“小时代”里的“小民”吧。在我出生的时候，苏联就已经解体了。那个时候父母虽然经济上很拮据，母亲还是花很多时间陪伴我。我们总是为周末去哪里散步郊游的事情谈论不休。莫斯科的郊外是非常美丽的，有大片的森林和山丘，还有海滩。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去郊外度假，在海边游泳。我的童年记忆是与大自然相连的，而不是都市，也不是历史。6岁的时

候，我有了第一辆自行车。我的回忆里最多出现的情形，就是我骑着自行车穿越森林间的小径，阳光从密密的树叶缝隙间透过来，洒在我的脸上，连那种阳光的味道我都还记得。妈妈说，她当年曾想过移民美国，却最终舍不得俄罗斯的白桦林。我也是这样。当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我思念的是那一片片白桦林。

我没有父母那样的历史感。中学的时候，我最爱读的书是《哈利·波特》，第一本我就读了8遍，几乎倒背如流。我最喜欢的明星，是芬兰的重金属摇滚乐队乐尔迪（Lordi），最喜欢的电视剧是美剧《圣女魔咒》（*Charmed*），那是一部很女孩儿的美剧。我也爱一些俄罗斯电影，比如《神探伽利略》，里面的演员又酷又有幽默感。我童年最喜欢的漫画是日本的“口袋妖怪”系列，小时候，妈妈给我买了很多皮卡丘的玩具。我们是全球化的一代人。也许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了我的丈夫伊万。大学毕业后，我没有从政或进入外交系统，而成为一名科学记者。我曾跟随我的丈夫到中国的成都留学。我感到，中国人非常渴望“成功”，所有平凡的人都梦想着自己能够成就什么，建立一个大公司，赚很多的钱。中国的年轻人充满了希望，这与俄罗斯的年轻人也许有点不同。也许俄罗斯人不总是诚实的，至少他们在嘴巴上总是说，要做这件事那件事，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那个困难。但我并不清楚他们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就像他们嘴巴上总说自己不喜欢权威，更热爱自由，但其实他们本性里又总是期待着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往哪个方向去。

不过，历史仍然在发生着。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处在西方的制裁之下。伊万的母亲和我的祖父都是乌克兰人。祖父和我们一起住在莫斯科，但他的亲戚都在乌克兰。2014年危机发生以后，祖父在乌克兰的家人渐渐疏远了我们，到现在，已经完全不和我们交谈，也不接听我们的任何电话了。祖父对此没有发表过任何一句的评论，他擅长守口如瓶。他一辈子都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安全系统从事秘密工作，这份工作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也许他的内心，是更支持普京的吧，因为他喜欢普京。这一次的危机虽然和“二战”“冷战”不同，但也许很多年后，我们的孙辈仍会向我们问起这件事，认为我们也经历了历史。也许因为乌克兰的危机，爱国主义在俄罗斯现在又有所复兴。前段时间有一个网上的中小學生作文比赛，有很多可供选择的作文题目。最受欢迎的题目是“爱国主义”类的，很多学生都想谈谈“现在的俄乌冲突和



1960年6月1日，苏联第5近卫坦克师的官兵们进行队列训练

西方的制裁”。有很多人比较质疑这种情绪，但主流的舆论是支持的。

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索尔仁尼琴，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他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成名的，我对他的文学成就持中性态度。我不太愿意读那么沉重的作品，不舒适，那些历史离我也有些遥远。我钦佩他作



为异见人士的勇气，他也抱着良好的意图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在我看来，他毕竟只是说话和书写，与真正实干的政治家相比，也许还是幼稚了一些。虽然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这一代人都还知道最初那些革命的共产党人，曾经为信仰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生命。虽然那些共产党人和现在从阿富汗战场回来

的军人一样，都不再被视为英雄，但我仍觉得他们付出了很多。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读卡尔斯·刘易斯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或者鲍里斯·阿库宁的侦探与历史小说系列——他的故事都发生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帝国时代。如果要我选择可以回到某个时代，我最愿意回到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与阿赫玛托娃、茨维塔

耶娃她们生活在一个时空里。

2. 尤里

我是伊万的朋友，现在是俄罗斯一家商业银行的程序员。我1989年出生在俄罗斯北部西伯利亚一个叫塔佐夫斯基的小村庄里。那里太偏远，以至于我的家庭里没有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妈妈是俄罗斯人，爸爸是摩尔多瓦人。因为俄罗斯北部的气候过于严酷，我自幼多病，他们就移居到了摩尔多瓦。但在我14岁的时候，我申请加入了俄罗斯国籍。父母曾经很想改回俄罗斯国籍，他们始终视自己为俄罗斯人，在俄罗斯文化中长大。但他们年纪大了，也就不再想做什么改变了。

苏联时代，我的爸爸在机场做调度工作，母亲是幼儿园教师。在他们结婚的1988年，摩尔多瓦的食物极度短缺，只能吃空投下来的一罐一罐的甜食。妈妈却总是怀念苏维埃，觉得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寓、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更有安全感。苏联时代，幼儿园教师是非常受尊重的工作，收入也很高；苏联解体后，原来的公立幼儿园教师几乎没有任何收入。苏联解体后，摩尔多瓦开始使用一种过渡货币，巴尼。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同时存在过两种货币，然后渐渐由一种货币变成另一种货币，是很奇怪的经历。父母当时有一些积蓄，本来打算购买自己的公寓，但苏联解体前，市面上没有充足的公寓，要排很久的队才能轮到。结果还没有来得及买，苏联就解体了，所有的储蓄也化为乌有。俄罗斯和整个苏联国家都是这样的情况。苏维埃时代，父亲买了一辆汽车，这在当时是很酷的事，小伙伴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很酷的家伙”。苏联解体后，很多朋友的父母去做生意，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只有父亲仍像从前一样在机场工作，那些朋友渐渐也就瞧不起我，与我疏远了。

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摩尔多瓦接受教育的。教我的老师很开明，并不对历史问题上论断，而是给学生一些事实，让我们自己选择态度。但总体上，我所学的俄语学校对苏联还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我还记得中学老师告诉我们，苏联时代，人们一起做好事，周末一起清扫街道，又一起在城中心挖出一个人工湖，没有人要求一分钱劳务费，人们无私奉献，很有爱心，今天已经没有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了。

父亲、母亲那一代人，与我们还是有代沟的。母亲总是觉得苏维埃好，她甚至至今也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想听到别的话。他们年轻时主要的目标，就

是简单的生活，有孩子，有工作，有稳定的家庭就好，没有什么更多的追求。他们也习惯了以顺从和隐忍的态度对待历史。索尔仁尼琴是我们中学课本里会介绍的作家，虽然引用的作品并不是《古拉格群岛》。我17岁的时候，受到课本的指引，在网上搜索更多关于索尔仁尼琴的信息，发现了俄语版本的《古拉格群岛》，读完后让我非常震惊。虽然有人说，索尔仁尼琴对劳改营里死亡的人数有所夸张，但即使把他的数据除以五，也是巨大的规模了。那些在纳粹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人，回到苏联，就被毫无理由地送到古拉格，仅仅因为怀疑他们是叛徒。18、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时代，即使有叛军起义，被处以极刑的也就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已。我想，古拉格的灾难与斯大林个人多疑与残暴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去找父母讨论这件事，他们却认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没有什么改变的办法，不能倒转历史，只要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事了，大家都过得还不错，就不必去刨根究底。父母对能够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感到满足，满足于不知名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但我们可能要求得更多。我大学是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的物理学专业。教授曾告诉我，苏联初期，他们请欧洲人来苏维埃帮他们建立核工厂，苏联人非常小心翼翼，到处都布下了间谍，但西欧人却非常热诚和开放。他们同情苏维埃，支持苏维埃，认为苏联代表了未来世界的一种理想和方向，认为这里的人民都有幸福的生活。斯大林去世后的一些揭露和《古拉格群岛》这本书在美国的出版，彻底改变了这些原来支持苏联的欧洲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态度。

我并不认为自己与历史再有什么紧密的联系。我所理解的好的生活，首先是要有好的收入，这样才能有物质条件让自己做喜欢的事情时不用太考虑钱。比如，我的理想就是全世界周游，我所认为的幸福就是找到真爱，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也许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总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天赋，也更勤奋，那些聪明和努力的人站到了社会的更高处，这并没有什么错。用暴力强行把他们挣来的财富夺走，来人为创造一种平等，只不过是虚构。我相信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集体和国家工作，只要每个人都做好了自己的工作，集体与国家也会更好。我觉得自由是重要的，它让我向内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才能发挥出创造力。我的父母是苏维埃时代的人，他们总是试图用那个时代的谚语教育我，比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他们认为主动进取是会受到惩罚的，过于积极是错误的，满足于

现状就好。但我更相信创造力和首创精神，美国那些伟大公司的创立者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鼓舞，我们在俄罗斯也做着与自由密切相关的“美国梦”。我还是有一些政治热情 and 为国家服务的理想，有想过参与基层政治，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感。

今天，像莫斯科这样的俄罗斯大都会的人，都更有进取心和富有创造力，他们也更笃信自由的价值观念。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在精神上可能更靠近欧洲一些，30%到40%的大城市居民都是自由党派的支持者。但小城市与广大农村则完全是另一番情形，俄罗斯南部的穆斯林群体尤其不同。在那些地方，90%至95%的人都支持现政府，对自由不感兴趣。但我并不相信“民主”。西方人的思维很法治化，法律是他们一切行动的界限和准则。俄罗斯人则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他们也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受到什么法律的限制。俄罗斯的灵魂既深刻，又有一种野性，民主对我们来讲并不适用。俄罗斯人信奉权威，他们总是需要有领袖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往哪个方向走，给他们施加外部的压力，才会被激发出斗志来。

3. 斯塔尼斯拉夫和安娜

我们是伊万的朋友，现在我们是一对恋人。我们一个（斯坦尼斯拉夫）在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一个（安娜）在大学里学法语和德语。我们俩人中，一个人的外婆是莫斯科科学院的航空航天工程师，一个人的外公是苏联第一个宇宙飞船发射项目的参与者，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参与修建发射基地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建筑部门的负责人。现在他们都退休了，回忆起年轻时的岁月，他们都充满热情，非常自豪。在空间领域工作的人，工资水平一直都很普通，他们获得的更多是荣誉感。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行业非常低迷，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收入，现在才稍微好一点。现在，俄罗斯正在远东的斯沃博德内建造新的发射中心，预计在2023年能够完成，将原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发射中心在俄罗斯重建。

祖父辈对苏联的评价是积极和正面的，对苏联的解体也感到很遗憾。他们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好的时光”，食物、工作都很充足，也有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但我们的父辈就要中立一些。20世纪70年代起，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发生了转折，在勃列日涅夫的最后几年情况已经很糟糕了。1973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恢复过来了。苏联在面对经济困境时，却在制度上没有做好

准备，一直都没有恢复。父母有很多食物、服装短缺的记忆，也经历了生活的艰难。我们的一个舅舅在摩托车工厂工作，八九十年代的好些年里，他每天要早晨4点过起床，去很远的城市买些食物回来。很多时候，他什么吃的都买不到，商店里只剩伏特加。20世纪70年代，政治上的高压倒不都是在消退，有时反而加强了。我们的一位祖父还记得，他曾因一次迟到了15分钟而受到严重警告，告诉他如果再迟到15分钟，就会以“蓄意破坏苏维埃”的罪名被逮捕，幸而他并没有再迟到过。即便如此，因为20世纪80年代是父母的青春岁月，他们还是愿意回忆它的美好之处。那个时候，苏联开始向美国开放，各种西方的自由思想都拥了进来。父亲们听摇滚乐和爵士乐，母亲们则对西方的时尚和生活方式充满向往。他们喜欢那时所有的苏联电影和戏剧，还有法国电影。他们最常提起的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爱看谢尔盖·爱森斯坦导演的《伊凡雷帝》。

我们小时候，父母总是在不断工作，打好几份工，经济上很焦虑，始终没有安全感。但在我们看来，他们那一代人仍然是精力旺盛和理想主义的。在我们7岁之前，大概都没有什么关于父母的记忆，我们很多人是在祖辈身边长大的。我们这一辈更加消极一些，只要有工作，有个地方住，能够养活自己，生活得好一些，就够了。也许经历了压抑和混乱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只想在小时代里过安稳的小日子。父母们生活在一个周围相对平等的社会里，他们不太去想也看不到官僚权贵如何生活。虽然偶尔祖母会抱怨科学院里的上级领导把他们的研究占据为自己的成果，但总体上他们对社会的看法比较天真。而我们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巨大贫富差距。苏维埃时代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已经是历史，只剩下一些记忆的碎片，我们与那段历史不再紧密关联。但我们的教育体系也是苏维埃时代留下来的，他们的记忆仍然影响着我们。我们对那个逝去的时代有一种混合的态度，工业化的成就与荣耀混杂着衰退、短缺和解体的痛苦，但我们接受自己的历史。只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像祖父辈那样生活与思考，也不再像他们那样有很重的责任感和理想主义。我们的生活中依旧充满了矛盾、焦虑和紧张，我们就像是被国家和制度忘却的人。我们不知道俄罗斯未来是否会再次成为大国，也许那是在很遥远的未来吧。但我们无论如何不希望再有战争了。■



两位年轻女士走进列宁格勒十月革命大街（今涅瓦大街）的一家咖啡厅（摄于1941年）



圣彼得堡

一座双重人格城市的文学记忆

文 / 肖楚舟 蒲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说，对她影响最大的两个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亚历山大·赫尔岑。这两位作家都是生活在19世纪的彼得堡人。在他们之前和之后，这座城市一直在书写着俄罗斯的神话。这座城市见证了俄罗斯近代历史上所有转向性的事件：在这里，彼得大帝带领俄罗斯驶向西方；也是在这里，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启了“红色纪元”。1991年，列宁格勒居民举行全民公投，恢复了城市原名“圣彼得堡”，似乎希望以此返回俄罗斯的历史轨道。在一次次历史的断裂中，是彼得堡哺育的文化精英们延续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脉络，他们的气质依附在这座城市的石头建筑上，缅怀前朝兴亡，向往着否极泰来。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了《双重人格》一书。这本描写精神分裂病人上路历程的小说并不是陀氏的代表作，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彼得堡史诗》。正是在戈里亚德金分裂的精神状态中，我们恍然看见帝俄之都彼得堡的宿命轮回：它既是革命的摇篮，也是革命的废墟；它的身份不断分崩离析，却又在自我否定与自我治愈中不断自我拯救。

曼德尔施塔姆：列宁格勒的彼得堡人

彼得堡，我还不想去，你那里还存有我的一些电话号码。

彼得堡，你那里还有一些地址留存，凭着它们可以觅到亡人的声音。

——曼德尔施塔姆《列宁格勒》

“彼得堡”——1930年，曼德尔施塔姆在一首叫作《列宁格勒》的诗中，突然唤起了这座北方之都的旧名，此时距离彼得堡改名列宁格勒，已经过去6年。这貌似无意的错位之感，好像对着妻子叫出了初恋情人的名字，同样地突兀、尴尬、猝不及防，却又黯然神伤。

然而回应诗人的呼唤的，只有寂寂长夜中一串意义不明的细微声响，它们重重垂挂在他脆弱的神经之上，让他难以入睡，微风吹动门链的声响，于他如同秘密警察腰间悬挂的镣铐摆动。于是这位木讷又神经紧张的诗人只能苦笑着坐在他黑楼梯上的房间里，“彻夜等待尊贵的客人”。直到1938年，那位“客人”终于带着镣铐来造访他之前，曼德尔施塔姆大概从未获得过安宁的睡眠。而那次造访之后仅仅6个月，白银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就永远长眠在帝国另一端的海参崴。

《列宁格勒》的数个译本中，“地址”一词的复数形式被心照不宣地强调，但其后的连接词“凭着”却因语言习惯问题，被不约而同地忽略。地址的数量之多只是诗人强调的一个方面：根据官方统计，他在彼得堡居住过的地址将近20个，的确称得上“一些”，然而此处的地址远不仅仅指涉曼德尔施塔姆的个人住址——在彼得堡，地址的意义绝非局限于单纯的处所，对于拥有300年历史的彼得堡来说，一两百年不变的门牌号码仍然是编织时空原貌的重要线索。曼德尔施塔姆说，正是“凭着”这些地址，他才能够觅得那些消散在红色时代浓雾中的白银时代的亡人之声。

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起始于冬宫广场，绵延几公里，靠近冬宫的可以称作“上涅瓦大街”，过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花园便是“下涅瓦大街”了。从上涅瓦

向下涅瓦走，途经的三条运河分别叫作莫伊卡、丰坦卡与格里鲍耶陀夫（旧称“叶卡捷琳娜河”）。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大概能从这三个名字里唤起一些亲切的记忆——《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鼻子》和《外套》里的主人公，都曾在彼得堡的寒风中步行经过这些运河。如今，如果循着曼德尔施塔姆那些星罗棋布的住址，漫步于彼得堡的“中区”，在横平竖直的涅瓦大街和莫伊卡、丰坦卡、格里鲍耶陀夫三条运河之间的街区中穿梭，我们也能够在一个个蓝色的门牌

号后，敲响一扇扇白银时代的门扉。

尽管出生在华沙，但5岁就举家迁至彼得堡的曼德尔施塔姆仍可算是正宗的彼得堡人。他有犹太血统，亲近希腊文明，因此作为俄罗斯帝国“欧洲之窗”的彼得堡，与曼德尔施塔姆的血缘关系不止于养育之恩，还包含文化血统上的亲近感。曼德尔施塔姆一生都抱持着彼得堡式的文化贵族精神，即使在列宁格勒时代也是如此，于是这座城市在世纪之初的命运多舛，也投射到了诗人身上。

曼德尔施塔姆一家的第一个住址在涅瓦大街100号，正对熙熙攘攘的莫斯科火车站，年幼的他那时就已经喜欢趴在窗台上观看黑黢黢的人群，沿着涅瓦大街在沙皇的庆典时流向冬宫。9岁到16岁，曼德尔施塔姆的家庭住址频频更换，但他一直在离丰坦卡河不远的捷尼舍夫斯基中学接受教育。这所短命的中学尽管只存在了23年，却培养出了不少文学青年，其中就包括曼德尔施塔姆和纳博科夫。如今取代中学矗立在苔藓街33号的是圣彼得堡国立表演艺术学院及其附属剧院。走到剧院门前，见院门敞开着，我们也悄悄走进那碎石铺成的小院。学校地方不大，主楼爬满了脚手架，正在维修。背着书包的学生出出入入，一切仿佛还是旧时模样。

从中学原址的发散开去，我们能沿着丰坦卡河东岸的小街小巷，大致绘制出青年曼德尔施塔姆与“阿克梅派”诗人交往的活动轨迹。从191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石头》到十月革命前夕，是曼德尔施塔姆快速上升为彼得堡最好的诗人的黄金时期。在这五六年间，结识了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沃罗申、茨维塔耶娃等人，在“阿克梅派”的诗歌运动中写下了那些明晰、优雅、富有哲思的象征主义诗句。在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中，荷马、海伦、特洛伊和爱琴海上满鼓的船帆，常常随风进入诗人的幻想。作为帝俄最接近西方的伟大城市，彼得堡给了他一张想象的床。

游走在丰坦卡河的日子是丰满愉快的。丰坦卡河口的2号住宅是1924年阿赫玛托娃借住的公寓，在这里曼德尔施塔姆将自己新婚的妻子介绍给了彼得堡的诗歌女皇。朝涅瓦大街的方向走，丰坦纳河沿河街34号是阿赫玛托娃故居博物馆，她在那里与第三任丈夫度过了一段时光，曼德尔施塔姆也曾造访此处。如果沿着与运河垂直的方向走两个街区，就会经过工兵胡同10号，这栋平凡无奇的住宅楼里曾经住过另一位俄罗斯诗歌女皇——茨维塔耶娃。1915年曼德尔施塔姆在这里与茨维塔耶娃结识，还好并没有成为她的



俄罗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1891~1938)



1942年1月1日，为了逼迫守城苏军投降，德军对列宁格勒进行了大规模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城市变为废墟

情人之一，而是成为挚友。在邻近的街区，我们还能找到审判布罗茨基的“不劳而获罪”的法院，当然这是后话了。

这段生活终止于革命到来之时。十月革命前夕，当革命躁动的雨云聚集时，诗人们展现出大时代下各自不同的精神气质。在马雅可夫斯基激动地写着“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时，曼德尔施塔姆却从这座心爱的故都嗅出了颓败和死亡的讯息，写下了预言一般的《彼得堡》一诗——“我们将在透明的彼得堡死去，——这里你不是主宰，而是普洛塞耳庇娜”——这首诗几乎能与后来的《列宁格勒》遥相呼应。与彼得堡的石头墙宫殿在红色年代被抛弃一样，固执的、希腊学究似的、西方的曼德尔施塔姆，已经隐隐感受到革命将会带给他的悲剧命运。将彼得堡变成一座废都的革命，让曼德尔施塔姆离开了故乡，在全国游历，同时代作家楚科夫斯基非常精

准地概括了诗人的生活状态：“……他不仅从来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长期的邻居——他过的是近乎流浪汉一样的生活……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条件，他生活在一切制度之外。”

在莫伊卡运河之畔，我们可以找到这位“没有长期邻居”的诗人的好几个住址。十月革命期间，曼德尔施塔姆搬到莫伊卡河畔居住，此后的住址一直离莫伊卡河不远。从涅瓦大街拐上莫伊卡河，在莫伊卡河与涅瓦大街的交叉口，一座白色的四层小楼静静伫立在河边，楼下开着一家时髦的服装店和一家美发沙龙，除了门牌号，很难看出这里是高尔基设立的第一座“艺术之家”。1919年，高尔基决定在此为贫穷的彼得堡知识分子提供便宜的容身之所，于是许多有名头的作家都曾在这栋白房子里短暂停留，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曼德尔施塔姆和左琴科。如果沿着莫伊卡河走一段，在通往伊萨基辅大教堂的路口驻足，那么我们

身后的两栋房屋都与诗人有关：一栋是曼德尔施塔姆1917年曾住过的大海街39号，另一栋是1933年诗人返回彼得堡时短暂停留过两晚的“欧洲宾馆”，据阿赫玛托娃的描述，当时“整个彼得堡的文学圈都来拜访他，10年之后人们还对此津津乐道”。若再沿着莫伊卡河继续前行不远，越过高耸的教堂，便能到达1924年诗人携新婚妻子回到彼得堡时的住处，大海街49号。于是我们仿佛在层层交叠的时光中穿行：1917年在阿克梅派的诗歌运动中声名鹊起的年轻诗人、1924年忙着将新婚妻子介绍给阿赫玛托娃等朋友的青年诗人，与1933年已成为诗坛中流砥柱的中年诗人的面庞在莫伊卡河的波光中相互交叠。

1924年，曼德尔施塔姆终于返回北方，但迎接他的却是一座叫作列宁格勒的城市。被冠以红色政权领导人之名的彼得堡，连同名字在内全部改头换面，各式各样的人涌入这个陌生的“列宁格勒”，他们来自各个国家各个阶层，涅瓦河边穿着礼服的贵族小姐被各种衣着随便的“乡下人”取代，更可怕的是从前的私人住宅变成了公共住房，一栋房子里住进五六十个人，曼德尔施塔姆也不得不辗转租住在各条运河边的小公寓里。在红色革命的巨浪中，头顶滞重皇冠的帝俄重心不稳，被掀了个底朝天。新的红色帝国只给离乡数载的曼德尔施塔姆带来痛苦的错位感和被迫的疏离感，让他备受困惑与恐慌的困扰。那几年他很少写诗，我狂妄地猜测，是由于“独在故乡为异客”的仓皇之感，让他无法精确地进行自我表达，只能转而写散文，用《时代的喧嚣》记录下那个年代独有的种种声响。

1930年一次前往高加索的短途出差之后，回到列宁格勒的曼德尔施塔姆感到这次短暂的离别让他得到一个契机，重新确认了这个城市与自己的关系——表面疏离，血肉相连。他发现自己早已做了一次没有回程的时间旅行，诚实地流下了思念的泪水——他是真的意识到，这个他“熟悉至谩骂程度的故城，熟悉至每一条纹理和童年时发炎的淋巴结”的北方之都，已经永远与它那光辉的名称一同远去了。从那时起，他就已经仿佛嗅到了死亡的逼近，1933年他写了一首小诗讽刺“克里姆林宫的高加索山民”斯大林，尽管只有十几个人读了这首诗的手稿，帕斯捷尔纳克还是称之为“自杀行为”。谨慎怕事的帕斯捷尔纳克嗅觉敏锐，5年后，曼德尔施塔姆的确因此诗命丧远东。

如今的丰坦卡运河与莫伊卡运河均是游人如织，来来往往的异乡客中，少有人能够将目光从大教堂五

光十色的圆顶上挪开，诗人黯淡的命运之光，也就这样沉默地湮没在帝国历史的洪流中。不知该不该为曼德尔施塔姆感到幸运，当镣铐降临时，他身在红色首都莫斯科，而非那忧伤的、褪色的、遥远的北方故乡。在彼得堡的波光中，诗人与镣铐无关，他永远只是坐在河边的公寓里，低垂着他骆驼般沉重的脑袋，反复咀嚼那些不能留下手稿的诗句。

阿赫玛托娃：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

你，没有变成我的坟墓，
石头的城市，地狱与心灵的城市，
你挺立，凝视，不声不响，
我们的分别只是一声咕噜，
我不会与你分离，
我的影子在你的墙上，
我的倒影在你的运河上，
……
沉甸甸的是墓碑，
压在你失眠的眼睛上
……
俄罗斯禁抿嘴唇
还是朝着东方走去。
——阿赫玛托娃

若以格里鲍耶陀夫运河边的喀山教堂为圆心，画一个半径为5公里的圆，向西经过莫伊卡河、伊萨基辅教堂直达涅瓦河边的青铜骑士，向东越过丰坦卡河至莫斯科火车站，便能涵盖几乎大半个白银时代的文学地图。而若要选取一位人物作为整个白银时代文学圈的精神圆心，毫无疑问当属诗歌女皇阿赫玛托娃。彼得堡只是阿赫玛托娃定居过的城市之一，但她对于彼得堡来说绝不是一个过客。

在普希金曾经就读过的皇村中学隔壁，阿赫玛托娃完成了自己的中学教育。彼时已然出落成一个黑灰眸的美丽少女的她，常在普希金生活过的花园漫步，醉心于一个世纪前的文学偶像留下的浪漫气息——倾听那“我们所珍爱的世纪隐隐然的跫音”。从精神启蒙的角度来看，阿赫玛托娃在诗歌性格形成的初期，就全身心浸淫在了纯彼得堡式的氛围中。正是在皇村的花园喷泉旁和树荫下，她迷上了勃洛克，逐渐开始自己的诗歌创作。

此后阿赫玛托娃辗转于基辅、巴黎等地，向整个欧洲播撒自己的美貌与才华。在与古米廖夫结婚之后，



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

仍沉浸于一段段随机却热烈的恋情之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日记般记叙隐秘的情感，写下一大批日后被人们称为“室内交响乐”的爱情诗歌。她那苍白的小手，慌忙中戴错的手套，扭曲的面庞，与恋人争吵后踉跄的步伐，不断闪现在简短的诗行中，明晰的意象如同面纱后少女闪亮的眸子，直击人心。1912~1917年，阿赫玛托娃与丈夫古米廖夫居住于瓦西里岛边缘的小乌云胡同17号和乌云运河沿河街，在这里他们本就不稳固的感情，在各自一桩桩秘密或公开的情事中，终于走向崩塌，但也是在这里，安娜成为一位母亲。如今的小乌云胡同17号已经是一栋残破不堪的黄色小楼，墙上有零星的涂鸦，如瓦西里岛上许多徒有华丽外表的房屋一般，呈现出破败之感。但沿街走几步，就能到达小涅瓦与涅瓦河交汇的河口，面向彼得格勒岛，右手边是气质恢宏的海神柱，站在海神柱下，就能望见对岸绿色的冬宫，左前方不远处就是彼得保罗要塞细长的金色尖顶，在4月乍暖还寒的苍白阳光中，闪着帝俄远去的光芒。这是在彼得堡被红色风暴席卷之前，安娜·阿赫玛托娃眼中最后的帝国图景。

1917年冬天，赤卫军攻陷冬宫，革命将俄国历史生生撕裂为两段，也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命运拦腰斩断。阿赫玛托娃并没有如其他嗅到危险气味的知识分子一样远走欧洲，明确表明“不与抛弃故土的人为伍”，认为“外国的面包充满苦艾味”。她留在了彼

得堡，却无法再置身事外，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历史的当事人的行列，伊莱茵·范斯坦在《俄罗斯的安娜》中写道：“冬宫被占领那天……阿赫玛托娃从斯列普涅沃回到彼得格勒，就在十月革命撵走克伦斯基之际，她站在张开的铸造大桥旁边，凝视着卡车、电车和挂在突然张开的桥梁上的人。”

革命以后，阿赫玛托娃住址的变更似乎暗示着她命运的转折——1918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离婚，嫁给第二任丈夫希列伊科，从遥望冬宫的小岛上迁至临近涅瓦大街的丰坦卡河居住。此后几经迁居，但阿赫玛托娃再也没有回到瓦西里岛上。她曾在丰坦卡河与涅瓦河交汇处的楼房二楼借住过，在那里曼德尔施塔姆将自己的新婚妻子介绍给她认识。她也曾在曼德尔施塔姆停留过的格里鲍耶陀夫运河沿河街9号活动过，那里是高尔基庇护下的“艺术之家”，她与古米廖夫、艾亨鲍姆和左琴科都同属这个协会，从这里作家们能获得一些口粮、衣服、木柴和药品，有时还有住所，以维持风雨飘摇的生活。

1924年，彼得堡更名为列宁格勒，同年阿赫玛托娃搬入第三任丈夫普宁的宅邸。红色政权对全国地名的改造运动，仿佛一场用意识形态谋杀历史感的行为艺术，而在列宁格勒开始新生活的诗人，尚未意识到自己将在这强势的意识形态之下低垂着美丽的头颅，断续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18年。丰坦卡河34号如今是阿赫玛托娃故居博物馆，与所有彼得堡的房屋一样，它是一栋四方合围的建筑，中间有一个大大的花园。4月的彼得堡尚未完全从冬日中苏醒，院落中的树木刚吐新芽，只有从博物馆的解说中，我们才能得知院里那些枝丫繁茂的大树都是枫树，阿赫玛托娃常爱从窗口眺望那些树木。当我们学着阿赫玛托娃的样子打开双层木窗朝外张望，便能从光秃秃的枝丫之间望见零星泛绿的草地，湿漉漉的泥土小路上的长椅边，几个孩子在阿赫玛托娃的铜像边奔跑笑闹。在丰坦卡河34号诗人的卧室床头柜抽屉里，放着几张诗歌手稿——正是在这个美丽的院落中，阿赫玛托娃怀着绝望的心情写下了《安魂曲》。20世纪20至40年代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是苦难的代名词——1921年前夫古米廖夫被枪决，1924年她因新诗《耶稣纪元》而触怒当局被禁止发表诗作，20~30年代她与丈夫普宁的关系不断恶化，1938年心爱的儿子列夫被苏联当局逮捕入狱，1946年她被当局认定为“没有益处”的诗人……沉重的苦难让她从一个唱着忧伤恋曲的女诗人，成长为吟唱着俄罗斯痛苦灵魂的歌者。1938年儿



行驶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莫卡伊运河中的游船

子列夫被捕之后，她与其他绝望的妻子和母亲一同排着长队，日日站在著名的克列斯托监狱的铁门前，怀着微渺的希望，期待卫兵能将装着食物和衣物的包裹递给儿子。在这座名为“十字架”的铁狱面前，诗人仿佛背起了所有俄罗斯女性的哀伤，一站就是17个月。其中一位妇女认出了她，问道：“您能把这一切写下来吗？”她说：“能。”这一幕被记载在了《安魂曲》的序言中。

与阿赫玛托娃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地点正与此相关。在今天的沃斯克列先斯基沿河街的一个小广场上，正对着涅瓦河对岸的克列斯托监狱，站着一位悲伤的母亲雕像——诗人那沉重的等待被凝为纪念，正如她所愿：“倘若有一天 / 在这块土地 / 有人想为我建一块纪念碑 / 我庄重地同意这个建议……在这儿，我伫立了三百个时辰 / 他们就是不肯为我打开门。”

幸运的是阿赫玛托娃怀抱着坚忍的斯多葛精神，熬过了30个苦难的春秋，终于在50年代后期赫鲁晓

夫上台后恢复了名誉。她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个住所位于列宁街34号，这是一栋U字形住宅楼，环抱着一个小小的花园，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孩子奔跑嬉戏的场所。阿赫玛托娃住在二楼一间面对花园的房间里，窗外的景致与十几年前的丰坦纳34号类似，但心境已不同当年。晚年的阿赫玛托娃久居彼得堡，成为许多诗人的庇护者，其中也包括后来的“愣头青”布罗茨基。遗憾的是，1965年阿赫玛托娃进行了一场长途旅行，返回俄国后大病一场，最终在莫斯科的一所疗养院去世。去世前她没有见到唯一的儿子列夫，也没能再见到那威严的、灰暗的、苍茫的，名为列宁格勒的彼得堡。

左琴科：日出之前

把劈柴添进我暗淡的篝火中的不仅仅是诗人和哲学家。说来也怪，在我那个年代，忧伤被认为是善于

思考的人的特征。在我那个圈子里，但凡沉思的、忧郁的甚至厌世的人都备受尊敬。……因此我认为我患有忧郁症是正常的。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就悲哀了。在自然界中，优胜的总是粗糙的生物组织。粗鄙的情感、肤浅的思想总是无往不利，一切纤巧的东西都以毁灭告终。……在战争中我反而不再忧伤了。在枪林弹雨之下，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几乎是幸福的。

——左琴科《日出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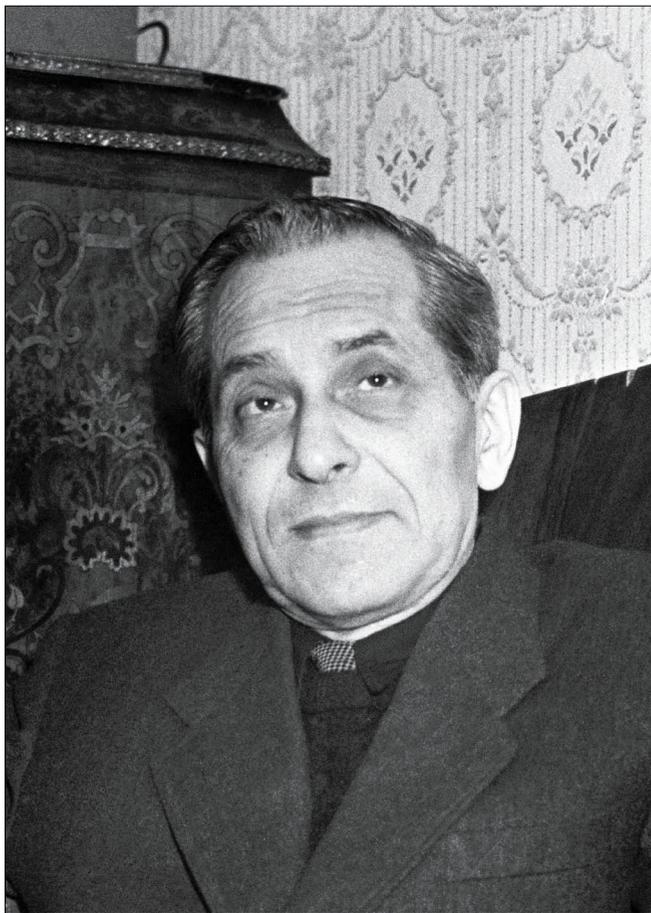
1934至1958年，左琴科一直住在小马厰街4号的119号公寓里。穿过圣彼得堡建筑延续的古典主义立面，临街的门脸背后时常藏着老旧的住宅区，三面小楼围合出庭院。左琴科的公寓就在其中的一间。一进去，狭窄的门厅挤着几个拜访者，显得转身都困难。公寓是两个一望而尽知的小房间，我们一眼瞥见卧室里那张狭窄的单人钢丝床。就是在这里，他写下自传体小说《日出之前》，絮絮叨叨地追忆着似水年华的100多个片段，尝试用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治愈自己的忧郁症。单人床很短，一双黑皮鞋泊在床下，拐杖还搭在床檐上，仿佛在等待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的幽灵从床上坐起来，走到挂着猩红帘子的窗边，凝望外面的格里鲍耶多夫运河。《日出之前》种种风流韵事的回忆里，依稀漾荡着的这个被女人宠爱的、气质忧郁的美男子的影子，散发着乌克兰抒情味的幽默感。此刻，却看不清那已老迈的影子的表情。

那张钢丝单人床一侧的床头，摆着几页他的手稿，泛黄的旧稿纸已有些微微卷曲。也许那是一个幽默的短篇，从流畅的钢笔字迹猜测，左琴科也许只用了20分钟就把它写好了——这么快就写好了，竟让他深感遗憾。这应该是他在床对面的那张窗前的写字台前誊清的，专门用了漂亮、工整的书法，他一边誊清，一边压低声音窃笑，就像他在《日出之前》里写道的模样。在他写作生涯最好的时光里，他是最受苏联人喜爱的幽默讽刺小说家，无论他在哪里出现，人们都会笑逐颜开。他与另外两个苏联幽默作家——任尼亚·施瓦茨和尤里·特尼扬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艺术之家聚会的时候，墙壁可都是要被笑声震得发颤的。那可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往事了。看，他写得多么愉快：

才开了个头，我就忍俊不禁。我失声笑了，越笑越响，临了竟捧腹大笑，铅笔盒笔记簿都从我手中落到了地上。我拾起纸笔来又开始写，于是又笑得浑身发抖。我想，待会儿誊清这个短篇时，我就不会这么笑了。每回写初稿时，我总是笑得不行，肚子都疼了。我的邻居敲了几下墙壁。他是个会计，明天一大早就

要起床。我妨碍了他的睡眠，他今天是用拳头撞墙壁的。

他正写的是一篇讽刺澡堂管理混乱的小品文，就是有名的《澡堂》。他从未攻击过苏联体制，但他看到体制中不断增多的内部问题，创作了关于住房、食物短缺、官僚作风、腐败和其他社会顽疾的讽刺小说。他还以他独特的俏皮和风趣，为那时的圣彼得堡勾勒了一幅文学漫画。在位于莫伊卡大街和涅瓦大街转角上的艺术之家家里，矮小、畸形的列米佐夫活像一只猴子，他的秘书上衣下边戳出一根用绸子编成的尾巴；扎米亚京的脸微微发亮，嘴角挂着微笑，手里拿着一支修长的香烟，插在雅致的烟嘴里；勃洛克站在窗前，脸被阳光晒成了褐色，前额高朗，头发呈卷曲的波浪形，望着涅瓦大街的灯火出神，眼睛空虚呆滞，表情忧郁。在花园街的“十二分”咖啡馆，他在喧闹的醉



1955年，苏联作家左琴科在家中

汉中与叶赛宁邂逅，透过他抹在嘴上的口红，看出他苍白的双唇。在克隆维尔斯基大街高尔基的家中，他坐在高尔基绣花的矮沙发床上，观察到那张令人惊慌的脸，有点儿神经质敲击桌子的手指，窥见传奇式荣誉的享有者的提心吊胆。

1895年，左琴科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市的一个贵族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赴前线作战，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抵抗白军。20岁时，他已有5枚勋章，参加了许多战斗，挂了彩，受到过毒气伤害。当他回到彼得格勒时，革命已经爆发。他没有恋旧的伤逝之情，相反，他希望看到一个“崭新的俄罗斯，跟我所熟悉的苦难重重的俄罗斯截然不同”。革命后，他曾在斯摩棱斯克国营化了的庄园里遇到农民，老远仍对他鞠躬、想舔他的手。他从这些日常生活的缝隙里看到了旧时代习惯的阴影，这阴影笼罩着他。他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但没有拿到学位。又到处调换职业和城市，当过民警、会计、皮匠、家禽饲养家、边防警卫部队电话员、法院书记员等等，1921年，他开始写小说。他一直被忧郁症困扰，笔下却都机智的讽刺和幽默。左琴科写过大量讽刺苏联市民阶层市侩习气的短篇。也许没有任何其他作家，能像他那样，善于捕捉苏联时期生活的对立性、矛盾性和荒诞性。从《鞋套》《贵妇人》《狗鼻子》，到《产品质量》《蓝书》和《山羊》，他不断描写革命后社会生活中遗留的旧痕迹和陈规陋习，为小市民的精神心理特征画了一幅幅漫画。

1943年，《日出之前》完成了。也许因为他太沉醉于自己的创作世界里，他忘记了政治的现实。这本书很快因其“双重人格的路线”，“晦涩与变态”，“阴沉的个人主义”，以及“无聊乏味、恬不知耻的自我暴露”，受到批判和被列为禁书，他也被苏联作协除名。1946年，他的另一篇讽刺小说《猴子奇遇记》（小说里猴子发表议论说：“生活在兽笼里，离人们远远的，要比生活在人们中间强”），被主管苏联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公开点名批评为“野兽式地仇恨苏维埃制度”，苏联文坛对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他被批评为“文学无赖”和“贱痞”。与他同时受到大规模批判的还有阿赫玛托娃。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左琴科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

我从来不是一个反对苏维埃的人。1918年我志愿参加红军，在前线与白军作战半年。我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对于要和谁走——和人民还是和地主——我从来没有过两种想法。我一直是和人民走在一起的。

……我一直渴望去描写正面生活，但是这不容易做到，就像一个喜剧演员扮演英雄形象一样困难。可以回想一下果戈理，他就未能转而描写正面形象……请您相信我，我不寻求任何东西，也不请求对我的命运做任何改善……

左琴科难以让自己的作品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主义写作要求。后来他又写过几个喜剧，都没能通过。所有的刊物都不登他的作品，他只能寻找翻译校订之类的零工，但很长时间内，出版社连最小的任务都不给他，连翻译校对的活儿也没有。面对“亚细亚式的惩罚”，他逐渐认识到“问题不在文学，而在形势”。在他腼腆地不断开始向朋友央求借钱以度日时，他开始意识到“我还是未能改掉天真的毛病”。他曾经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但现实突然不允许他再做慈善家了。常见到的他是一个忧愁的人，时常重复尼采关于“可怜的生活，可怜的享乐”的那些话。就在这间局促的、左琴科租来的小屋里，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活动范围就是那张窄小的单人床和床对面的木制沙发。偶尔，他也许还会放他的留声机，但很可能他再也没有兴致使用那个沉重的金属熨斗了——他曾经是个很看重礼仪，留心 and 喜爱一些细小事物的人，甚至会做皮靴、缝衣裳，还为前来列宁格勒探望他的作家奥列莎缝补过裤子。正如他在给朋友科尔涅·伊万诺维奇的信里写到的那样，他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坏，每早起床很困难，不想起床，极少出门，几乎哪儿也不去，“无望摆脱我已陷入九年的难堪处境”，“甘愿与文学决绝”。他不断地意识到，他已经老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左琴科本有望重新开始写作和出版，但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天真的天性。在一次与英国大学生会见时，他说，他在很多方面有过错误，但是不能同意对他全部作品的批判、把他全盘否定的批判。同时也在场的阿赫玛托娃后来也在回忆中提到，左琴科是个“比我原想的天真得多的人”，“他幻想在这种场合可以向他们说明点什么”，“如果是我头一个回答，他也许可能根据我的回答想到也该这样说，一点话音，一点情绪也不要带。那样的话，他也许能躲过这一灾难”。左琴科的这场灾难，持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他与朋友的信里不再谈及文学创作，他不断谈到的问题越来越只有一个——钱以及缺钱：“依然富不起来”，“人到晚年却变得爱财”，“除了稿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1957年，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写道：“连行将领取的小小的退休金对于我都像是一

大喜讯，足见我活得多么窝囊，思之不禁黯然。……作家整日惶惶不安，这就等于他已经丧失了专业技能。等我的存折上有了不少于十万卢布，我就会把文学再捡起来。不过，我已经感觉不到先前的搞文学的热望。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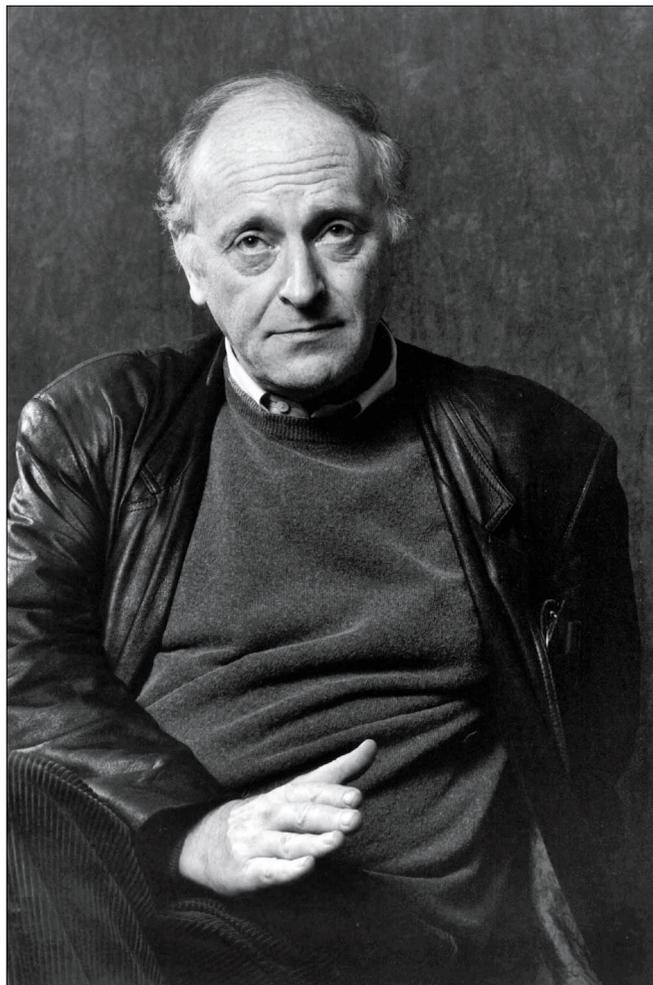
1958年3月，高尔基诞辰90周年时，有人在列宁格勒尼基塔大街高尔基故居的文学界晚会上见到左琴科。在众多名流中，他白发稀疏，太阳穴瘪陷下去，“两眼黯淡无神，一脸受难者的表情，与世隔绝”，说话时再也没有了幽默的才华，沉闷冗长得令人无法忍受。他在《楚克卡拉》书页上为一位与会者写下悲伤的诗句：“我的天才枯萎了，像秋天的树叶……已经失去了旧日幻想的双翅。”那个“闹着玩就能写出好东西”的左琴科已经消逝。楚科夫斯基尝试和他谈论他的作品，他只挥了挥手，说道：“我的作品？我的什么作品？谁也不知道了，我自己已经想不起自己的作品。”那是一幅极为熟悉的俄罗斯命运画——被扼杀的天才：波列扎耶戈，尼古拉·波列沃依，叶赛宁，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

不久，左琴科去世。在他的葬礼上，有致辞者的对骂，有人群的喧哗，也有从莫斯科赶来参加葬礼的肖斯塔科维奇。也许没有人记起，左琴科在《日出之前》里有一篇《值得上吊吗》，那是一段悼念一位因失恋而死于非命的伙伴的回忆：

我们唱起了《似水年华》这首歌。纷纷回忆起他生前各种鸡零狗碎的趣事，大伙儿笑得前俯后仰。笑了一阵后，又开始唱《似水年华》。每当唱到“一旦死去，埋入黄泉，好似从未来过人间”这句歌词，就有人站起来，用手起劲地指挥着。

布罗茨基：凝望神圣世界

这座有276年历史的城市，有两个名字，一个本名，一个化名，而总的来说其居民基本上两者都不用。当然，在信封上或身份证上，他们写“列宁格勒”，但在平时谈话中他们宁愿称它为“彼得”。……“彼得”则似乎是最自然的选择。首先，这座城市已被这样称呼了200年了。还有，彼得一世的精神在这里弥漫的程度，依然甚于新时代的味道……因此“彼得”暗示某种外国性，听起来也较协调——因为这座城市有某种明显的外国和疏远气氛：它那些欧洲式建筑，也许还有它的地点本身，也即位于那条流入有敌意的公海的北方之河的三角洲中。换句话说，在一个如此熟悉



1991年时的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

的世界的边缘。

——布罗茨基《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

1940年，约瑟夫·布罗茨基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列宁格勒家庭。父亲是随军摄影师，战争期间曾经到过中国，1948年退伍后在报社当摄影师，母亲是一名会计。生不逢时，布罗茨基的童年是在长达900天的彼得格勒之围中度过的，没有食物和父亲陪伴的童年让他变得顽固、执拗和早熟。1947年布罗茨基进入学校开始接受教育，开始展现自己的不羁性格，辗转了5个中学才勉强读到七年级，最后终于在15岁辍学。他辍学的原因也如同苏联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样——为了补贴家用进入一家机器制造厂“军械库”工作。

也许正是从这家军工厂开始，布罗茨基标准的苏



位于圣彼得堡开桥大街的布罗茨基故居博物馆

式生活轨迹与来自旧时代的彼得堡之魂产生了交集。在散文集《小于一》中，布罗茨基描述了他生活的街区——工厂的隔壁是医院，医院的隔壁是监狱。那所著名的监狱，正是关押过阿赫玛托娃儿子的“十字”监狱。有意思的是，布罗茨基的人生也顺着这三个场所一口气滑了下去。当他因为想当医生而离开军械库工厂之后，就去了医院的停尸间当解剖助手，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写诗，然而诗歌生涯开始不久之后，医院隔壁的十字监狱就向他敞开了大门。今天我们如果沿着军械库沿河大街，以工厂为起点向彼得格勒岛的方向走去，还能看见与当年一模一样的街道格局。“军械库”工厂如今仍然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工厂，厂房全是红色平房，带着白色的窗檐，一副严整洁净的样子，然而临河那一面的厂房已经是一栋摇摇欲坠的红色废楼，披着半幅绿色的网纱，好像维修进行了一半就被人放弃了，朝向街道的大窗全被木板堵上，只有头顶的“军械库”字样还能表明自己的身份。隔壁一栋淡黄色的五层楼房如今是一家儿童医院，再往前，经过一片小花园，便能看见一截红色的砖墙，于是我们就明白，十字监狱到了。

从工厂到监狱，只有区区500米。布罗茨基从一个普通的工人走到审判席，也不过区区17年。从1955年辍学，到60年代诗作流传到欧洲，成为在国内外声名大作的苏联诗人，再到1964年因“寄生虫罪”被审判，1972年匆忙离开苏联，布罗茨基浓缩了前辈们颠沛流离的人生轨迹，不到20年就完成了“成名—入狱—流放”的标配流程。这17年间，布罗茨基大多数时候都住在离丰坦卡河不远的铸造厂大街

24号。这栋始建于19世纪末的五层褐色砖墙面住宅楼，曾属于穆卢兹公爵，拥有华丽的巴洛克式墙面装饰，同时也是彼得堡文学地图上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如今大楼的墙面上挂着纪念铜牌，写着“1955～1972年诗人布罗茨基在此居住”。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提到，他家住的那个套间此前还住过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事实上，这里是20世纪初圣彼得堡艺术生活最重要的三个沙龙之一。正是在这幢楼里，红砖墙壁，厚地毯，壁炉的火焰照亮全室，暖房的氛围中聚集了诗人、哲学家、教会代表，对礼拜仪式与宗教信仰问题满怀激情的争长论短。如今这栋大楼底层的商铺还在营业，但主入口的灰色木门紧锁着。试着推了推门，上面斑驳的漆面几乎要簌簌落落掉下来。就在这尘埃静谧跌落的瞬间，仿佛传来穿一身白色长衫、蜷缩在一张软沙发上、摆着女学者神气的吉皮乌斯，尖刻俏皮的说话声；夹杂着勃洛克在神学争论中宣扬着尼古丁神秘主义的回声。2015年，在这栋楼里曾经短暂地出现过布罗茨基故居博物馆，遗憾的是很快就因为法律纠纷和建筑维修问题而暂停营业。我们站在马路对面远望着它没落贵族一样华丽的外立面，想象着古米廖夫在这里创立彼得堡诗人之家的场景。

距离铸造厂大街24号两个街区之外，在丁字镐街上淡绿色的圣安娜小教堂边，坐落着如今的239中学，也是布罗茨基上过的第二所中学。沿街走到起义街右转，过两个路口，就能到达审判布罗茨基的那栋三层小楼——起义街38号。如今这里也依然是该区的地方法庭，1964年，布罗茨基正是在这里接受了审判，罪名是“不劳而获罪”，直译为“寄生虫罪”。如果要问布罗茨基作为一个纯粹的列宁格勒人，与彼得堡有什么关系，那么他在这场审判中展示的自由无用的诗人之魂，就正是他作为一个彼得堡人的身份证。

布罗茨基1961年通过朋友结识阿赫玛托娃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了许多献给这位年迈的女皇的诗歌。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塔在自己的回忆录记录了阿赫玛托娃对布罗茨基的格外偏爱——1962年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到访苏联，阿赫玛托娃甚至引用布罗茨基的诗句作为题词。阿赫玛托娃认为布罗茨基的被监视与被捕都与自己有关，一度试图保护布罗茨基，1962年就帮布罗茨基伪造了精神疾病证明，让他在精神病院里躲过追捕。无奈的是1964年布罗茨基遭到群众举报，不得不接受审判，起诉他的罪状达16条

之多，其中包括阅读和传阅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当然也包括写了太多让西方叫好的诗歌。审判记录充满了严肃的荒谬感，仿佛一出天然的讽刺喜剧：

法官：你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布罗茨基：诗人，诗歌翻译者。

法官：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

布罗茨基：没谁。那又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

法官：公民布罗茨基，从1956年起您换了13个工作地点。您在工厂工作过1年，然后又有半年不曾工作。夏天在地质勘察队工作，然后又有4个月不工作……请向法庭说明一下：为什么您在休息期间不工作，并且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

布罗茨基：在休息期间我工作。我从事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我写诗。

法官：这就是说，您在写您所谓的诗歌啰？

布罗茨基：我15岁就开始工作了，我对一切都感兴趣。更换工作是因为我想尽可能地多了解生活和人。

法官：那您做过什么有益于祖国的事吗？

布罗茨基：我写诗，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坚信……我相信，我所写的东西能为人们服务，而且不光是对现在，还有益于将来的一代人。

人群中的声音：好像很了不起似的！自以为是！

另一个声音：他是诗人。他就应该这么认为。

法官：就是说，您认为，您那些所谓的诗歌会给人们带来好处？

布罗茨基：您为什么在说到诗歌时要用“所谓的”呢？

法官：我们把您的诗歌称作“所谓的”，是因为对于它们我们没有别的理解。

……

法官：布罗茨基，请更好地向法庭说明，为什么您在休息期间不劳动？

布罗茨基：我劳动啊，我写诗。

法官：但这不妨碍您劳动。

布罗茨基：我的劳动就是写诗。

……

最终诗人被判5年流放，好在布罗茨基一案引起了国内外文学界一致谴责，彼时苏联国内氛围也比斯大林时期松动许多。1年零8个月后，他被释放，这也许跟萨特写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纳斯塔

斯·米高扬的一封信有关。1965年，距离刑满还有18个月的布罗茨基再次回到了铸造厂大街上的住所。对于这个住所，布罗茨基在去美国后写下的散文集中，将之形容为“一个半房间”，他不无温情地记载了一些琐碎的家庭细节，怀着乡愁回忆起那间房子里的木地板、集体厨房、书架和书桌，也像今天的我们一样，想象着自己能够踏着一个世纪前文学幽灵的脚步在街上漫步。

1972年6月4日，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苏联政府高层突然决定将布罗茨基礼貌地驱逐出境。当局告诉他，“欢迎”他离开苏联，布罗茨基只有很短的时间收拾行李，用那只父亲从中国带回来的皮箱装了些随身行李，就被莫名其妙地塞上了飞机，他甚至不知道飞机开向何方，就永远离开了列宁格勒。此后，无论是关于彼得堡的想象或是关于列宁格勒的回忆，他都只能在大洋彼岸的国度完成。直到去世，他再也没有回到俄罗斯。

如今在彼得堡国立大学语文系的院子里，有一个造型奇诡的雕像。它粗看上去是一只破破烂烂的箱子，细看箱子上搁着一只人脑袋——那是布罗茨基与他的箱子，雕塑传达出诗人临走时仓促狼狈的样子，也仿佛在暗示布罗茨基带着他的才华去了美国，从此以后成为一个美国诗人。但即使后半生一直用英语创作，布罗茨基的所有诗歌仍然以俄语写就。1989年，被称为“阿赫玛托娃的遗孤”的布罗茨基在美国写下了《阿赫玛托娃百年祭》，这首诗既可以被视为一种致敬，也可以被看作布罗茨基对自己身份的呼唤——他在遥远的自由国度，也仍想再次感受那来自寒冷潮湿的，彼得堡的灵魂共振。

书页和烈焰，麦粒和磨盘，
锐利的斧和斩断的发——上帝
留存一切；更留存他视为其声的
宽恕的言辞和爱的话语。

那词语中，脉搏在撕扯骨骼在爆裂，
还有铁锹的敲击；低沉而均匀，
生命仅一次，所以死者的话语更清晰，
胜过普盖的厚絮下这片含混的声音。

伟大的灵魂啊，你找到了那词语，
一个跨越海洋的鞠躬，向你，
也向那熟睡在故土的易腐的部分，
是你让聋哑的宇宙有了听说的能力。■

债券违约潮

主笔 / 谢九

从过去多年来刚性兑付的金身难以打破，到现在债券违约进入高发期，中国金融市场再迎新的挑战。

2014年3月，超日太阳能公司宣布无法按期足额支付债券利息，由此发生了我国债券市场首期违约事件，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债券市场开始陆续爆发出更多的违约。进入2016年之后，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突然进入一个高发期，前4月有大约11只债券违约，而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大约共有20多只债券违约，今年前4月的违约数量就占了将近一半。而更让市场信心崩溃的是，早先的债券违约多发生在民企，而近期的违约则多集中在央企和地方国企，而后两者一向被视为有政府信用背书，这些违约公司包括东北特钢、中煤华昱、中铁物质等等，央企和地方国企纷纷违约，充分说明政府兜底已经成为过去时。

长期以来，我国信用市场一直维持着刚性兑付的怪圈，每当有公司出现违约危机，最后总有神秘资金出面兜底，力保刚性兑付的金身不破，从表面上看，这种刚性兑付维持了金融市场和社会的稳定，但同时也极大干扰了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进而诱发出更深层次的负面问题。在刚性兑付的保护之下，很多有政府背景的僵尸企业都可以继续发债融资，一方面挤占了宝贵的信贷资源，使得原本更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不得不以更高的成本融资，“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难题也始终难以得解，与此同时，大量僵尸企业的存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能过剩的矛盾，地方政府出于就业和税收的考虑，为僵尸企业输血续命，由此制造出大量过剩产能，成为当年中国经济的一大顽疾。

虽然打破信用市场刚性兑付的呼声由来已久，但多年来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2014年才发生首期违约，并在今年开始进入违约高潮，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经济形势倒逼所致。由于我国产能过剩的矛盾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的最大障碍，去产能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之一，而去产能的核心工作就是清除僵尸企业。只有打破刚性兑付的怪圈，僵尸企业失去了政府兜底的信用担保，其融资渠道才能被

以市场化的方式予以斩断，否则，仅仅依靠行政命令的“关停并转”，很多被压制的产能早晚也会死灰复燃。在很多僵尸企业发生债券违约之后，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市场产生震慑作用，僵尸企业的融资能力迅速枯竭，并最终被市场淘汰，去产能的目的也由此实现。另外，政府不再对违约债券兜底，客观上也是因为财力吃紧所致，在经济增速下滑时期，政府无力对所有债券进行信用担保，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政府的包袱。尤其是在巨额的地方债面前，地方政府自身已经压力空前，不得不通过大规模的债务置换来缓解压力，对于那些没有直接担保责任的僵尸企业的债务，地方政府也是有心无力，近期大量地方国企出现在违约名单上，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早在两年前，央行就开始对市场做出风险预警，“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刚性兑付，顺应基础资产风险的释放，让一些违约事件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自然发生”。当年市场上首次出现超日太阳能的违约事件，不过当时超日太阳能只是一家民营企业，违约的性质也只是利息违约，因此市场对于这起事件更多理解为象征意义，并没有从中看到实质性冲击。债券市场并没有因刚性兑付的金身被打破而出现降温，而且，在去年下半年股灾爆发之后，债券市场反而迎来了一轮大牛市，在资产配置荒的压力之下，大量资金撤出股市进入债券市场，公司债的融资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融资利率也屡创新低，甚至有大量资金通过公司债质押进行加杠杆套息，使得债券市场成为新的投机场所，也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进入2016年以来，债券市场风云突变，几乎每周爆发一起违约事件，而且多为央企和地方性国企，使得市场信心迅速崩溃，债券市场大跌，并且引发股市跟随出现调整。从长期来看，打破债券市场的刚性兑付是中国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的必经之路，不过，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集中爆发，短期之内的负面冲击也不容忽视。

在过去刚性兑付的背景下，因为有政府信用的隐性担保，很多资质不高的企业也可以用极低的利率发债，但是随着刚性兑付的金身被打破，投资者必然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近期很多资质不佳的企业信用

评级已经开始遭到评级机构的下调，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会因此上升。据不完全统计，今年4月份，已经有100多家发行人取消或延迟了共计1000多亿元的发债计划，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在当前市场行情下，发行人成本快速上升超出预期，因此不得不取消发债计划，二是投资者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暂时取消了购债计划，认购不足导致发行人发债失败。

债券市场的动荡如果继续升级，甚至有可能对金融市场带来流动性冲击，近期股票市场持续下跌，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债券市场的拖累。今年将是债券市场到期的高峰年，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从二季度到年底的到期债券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两成，其中很大部分来自煤炭和金属等高风险行业，为了应对债券集中到期的偿还压力，必然会对市场的流动性带来冲击，加之去年债券牛市时大量杠杆资金入市，一旦债市违约继续升级，整体金融市场都将因此承压。

在企业违约压力越来越大之际，国内的债转股试点在时隔20多年后开始重新启动，这种时间点上的高度重合或许并非巧合。今年3月份，国内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熔盛重工拉开了债转股的大幕，拟向债权人发行最多171亿股股票，包括向22家债权银行发行141亿股，向1000家供应商债权人发行30亿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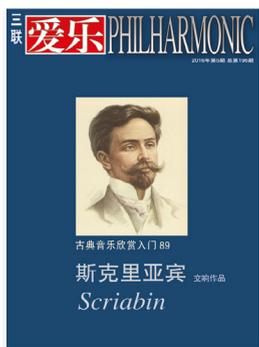
以抵消171亿元债务，如果按计划完成，熔盛重工最大的债权人中国银行将持有其14%的股权，成为其最大股东。

在国内债券市场违约潮如火如荼，以及更大的偿还压力即将到来之际，债转股的推出无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企业的违约压力。企业将不良债务转为股权，既避免了直接违约对市场带来的冲击，又减轻了银行账面上的不良资产压力，看上去可算双赢之举。不过，这显然会极大增强企业的道德风险，鼓励企业变相违约，而银行参与债转股，虽然表面上避免了直接违约的发生，但其实相当于变相维护了此前的刚性兑付。

与此同时，如果债转股规模过大，也不利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去产能，如果大量过剩行业都通过债转股获得重生的机会，而不是以市场化的违约打破刚性兑付，那么，中国经济的去产能之路将遥遥无期，此次试点的债转股公司就是身处产能过剩严重的造船行业。如果未来的债转股大多集中在这些过剩行业，对于去产能的压力可想而知。

从短期来看，近期爆发的债券市场违约事件虽然会对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但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这种阵痛也是中国金融体系乃至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需。■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年第五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89

- 俄罗斯音乐树上的奇异果
- 曹利群、刘青、孙冰洁、袁利军对斯克里亚宾的《狂喜之诗》、《神诗》和《火之诗》等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门德尔松《第四交响曲》的首演

话题 电影配乐中的现代音乐
谈哈农库特风格之一隅

爱乐笔记 键盘好声音之齐默尔曼

精彩回放 巴赫圣乐演出史中的一环

唱片说明书 说不尽的富特文格勒：《“悲怆”交响曲》

歌唱家档案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托马斯·汉普森访谈

作品 小议阿连斯基两首钢琴三重奏

听片购片与收藏 加德纳指挥柏辽兹作品的唱片

《爱乐》2016年订阅须知

2016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6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戚本禹其人其事

记者 / 丘濂 实习记者 / 唐瑶



戚本禹

2016年4月20日，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因胃癌在上海去世。他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牺牲者与捍卫者。他没能走出历史去进行反思，然而他一生的经历却是反思浩劫很好的素材。

走入中南海

如果没有进入中国政治的中枢要地，这位热血青年一生的命运如何，已经很难想象了。

戚本禹是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在上海，早在1947年就读南洋模范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

的学生运动。1949年，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派往北京劳动大学(中央团校前身)进修。据他自己回忆，1950年毕业时正好中南海急着要人，他和另外两个同学都是自己拿着档案去中南海的组织部门报到的。

戚本禹进到了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开始了见习秘书的工作。秘书室和办公厅是两个平行的机构。领导人做出决策不仅依靠各级政府汇总到办公厅之后所呈报的函件，还依靠来自民间的信息。戚本禹先后从事过为毛泽东做读报摘要、管理图书和处理来访信息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思考，也爱观察毛主席的个人喜好。别的老同志认为做摘要时头版头条或者省委书记最重要，但戚本禹觉得那些新闻肯定会有文件上报，就一定要找主席感兴趣的。他准备的淮河流域发水灾时群众受灾的状况就引起了主席重视。至于放松读物，戚本禹说，科室里的高才生爱找名人趣事，倒是他这个中学生选的作家诗词，主席都画了圈。

管理图书时，戚本禹经常能够看见主席阅读时做的批注，很受触动。他便想办法买了一模一样的书，按照主席的读法去读，主席画一个圈，他就来画一个圈。用这种方法他读完了《哲学大纲》《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书，也不乏《西游记》和《聊斋志异》那样的小说。1951和1966年，秘书室主任田家英叫戚本禹去协助他做《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戚本禹说，校对“毛选”时，每篇文章他都要通读通校五六十遍。

1958年3月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这是戚本禹第一次身陷政治风波之中。当时秘书室开展整风活动，几位年轻的党员向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人当中就有戚本禹。何载向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指责这些提意见者是向党发起进攻，于是组织政治秘书室的人对这些人开展批判斗争，不仅要将这8个人停职反省，还要进一步揭发批判他们的反党问题。问题被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改变了这一决定。当年5月初在毛主席的干预下，戚本禹等人获得平反，而整人的干部何载几人则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中直机关党委也被撤销。这件事让戚本禹对毛主席十分感恩。

1962年，戚本禹从秘书室一科科长职位被调去担任中央办公厅内部刊物《群众反映》的主编。他

选登了不少可能引起争议的民间来信。这种直率的风格使得这份刊物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毛主席则在《群众反映》上多次做出批示。

政治新星

戚本禹的名字为一般大众所熟知，缘自1963年写成的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启超、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在此之前，罗尔纲等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大家多认为太平天国将领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的军队逮捕后写下的自述是“伪降”，委曲求全的叙述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而戚本禹的文章则认为那完全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国事业的自白书：“‘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在学术文章中引用诗词来强化其表达力，这是戚本禹的一个创造。而像其中“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则马上在当年的反修文章中有了若干变体，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语言。比如，“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背叛革命之耻辱”。

戚本禹着手写文章时是1962年底。他从主席的阅读书目中得知主席在看和太平天国相关的书，自己便找到一些来读，其中就包括《李秀成自述》。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写文章，戚本禹说：“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在进行严厉的批判。对革命叛徒深恶痛绝的感情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的思想观，并激发我写作的冲动。”在秦城监狱写下的材料中，戚本禹还写到了一点：“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当时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我认为是攻击主席，应该起来作战。”

文章刊登在《历史研究》上，之后戚本禹就被派往闭塞的冀东农村做调查去了，这使得他在最初一个月对文章引发的争论一无所知。等他回来才知道，经过《北京晚报》等一些报刊对文章的介绍，无论社会上还是学术界早已经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历史博物馆把李秀成的画像一度摘了又挂上；中学教师纷纷表示太平天国涉及李秀成的部分不知道该怎样来讲；中宣部部长周扬以及史学界由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著名专家组成的研讨会，都对文章持批判态度。

逆转形势的是毛主席对于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戚本禹开始听江青做口头传达时还以为是“忠王不忠”，后来才知道是“忠王不终”，意为晚节不保。江青告诉戚本禹，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

未能解决，他的文章正好针对这个，为党立了一功。她还转交给戚本禹台湾出版、主席看过并夹了条子的《李秀成供状》，鼓励他继续写文章。

1964年，戚本禹又写下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按照江青的意思，文章拿给康生来润色。康生建议要连带汪精卫一起批评，这样“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彻底化解了”。于是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叛徒问题，从李秀成到汪精卫，再到苏联的考茨基，在国内引起了更大震动。根据《光明日报》在刊登文章后的统计，第一个月收到各界来稿59篇，其中赞同戚本禹的有27篇；等到第二个月，便有来稿76篇，其中赞同者上升到58篇。

这是戚本禹写政治文章的开始。历史为政治服务，这是当时主导史学研究的思想。精通历史、文思敏捷，又善揣测上意，戚本禹为自己的才华找到了用武之地。评论李秀成的文章让戚本禹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康生准备向中央办公厅要人，将戚本禹调到钓鱼台写反修文章的理论班子。想不到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抢先一步，给主席打了报告，将戚本禹调到了《红旗》杂志，担任了历史组组长。《红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担任，而毛主席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这都预示着戚本禹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文革”中的急先锋

1965年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江青在上海找了张春桥、姚文元秘密起草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11月10日刊登在《文汇报》上，从而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索。此时，紧跟形势的戚本禹也急忙写下一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红旗》杂志发表，矛头直指历史学家翦伯赞。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有高于姚文元文章的夸奖。戚本禹回忆：主席在1966年和他的谈话中讲，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这是马克思总结无产阶级斗争得出的经验。等到1966年8月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得“造反有理”成为整个“文革”的口号和行动纲领时，戚本禹才明白主席当初讲话的意味。

1966年5月23日，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室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自杀，戚本禹代替了他的角色。由于戚本禹积极跟随毛泽东搞“文革”，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被选为小组成员，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文革”期间，“文革

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功能，戚本禹也从最早中秘室秘书的十六级干部身份，跃身成为中央首长。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之间，戚本禹就向红卫兵、学校师生、工矿企业代表、各地造反派发表有大约120余次的讲话。戚本禹身材超过1.8米，因为经常抛头露面传达指示，造反派便送了他“戚大帅”的名字。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戚本禹的自我也日益膨胀起来。

戚本禹对于政治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莫过于1967年3月30日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它明确发出了打倒刘少奇的信号。后来毛泽东在与外宾的谈话中多次把它看作“文革”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还是基于戚本禹对于政治的敏感和主席心理的把握——毛泽东曾经多次直接或间接地表示要批判《清宫秘史》，戚本禹找知情人询问，才明白这部片子包含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一个分歧。文章完成，毛泽东亲自做了修改，例如增加驳斥义和团是暴民胡作非为，以及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这篇文章注定会引起全国和世界注意。周总理提出，刘少奇的问题这样一下提出不好，还是署名个人而不以社论的形式表明官方立场。于是这篇署名戚本禹个人但实际经过集体开会讨论过的文章就这样诞生了。

在学者毕唐书看来，如果说戚本禹早期评价李秀成的文章还可能具有学术价值，那么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抓住一点，无限上纲，强词夺理，装腔作势”的文章便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它充分展示了什么是“文革”式的暴力语言，戚本禹也完成了他从自由学人到“文革”打手的转变。“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文章这样凶猛措辞。清华大学教授、“文革史”研究者唐少杰认为，这篇文章的厉害程度就在于将刘少奇问题宣告为敌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他政治上判了死刑。文章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批判王光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薄一波等300多名原党和国家各级重要干部的大会。会上王光美被强迫穿着出访印度尼西亚时的旗袍、戴着乒乓球串成的假项链，受尽了侮辱。

戚本禹曾经辩解，批斗王光美的时候他一直电话掌控着全局，每过10分钟清华的红卫兵就要给他一个电话来汇报情况，因此批斗王光美时用到的手段，“都是删大富他们乱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戚本禹牵涉的其他罪状——如揪斗彭德怀，导致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迫害致死，围攻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

小平、陶铸等等，唐少杰评价他是一名冲在最前的“闯将”。“他揣度上意来具体实施，分寸就很难掌握，群众发动起来也难以管控。”

陨落

犹如彗星划过天际，戚本禹在人生盛年达到权力高峰，然后又疾速坠落。导致戚本禹被抓的根本原因仍然被认为是1967年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的余波。1967年全国都掀起了夺权高潮，毛泽东本以为天下大乱才能带来天下大治，没想到在武汉却碰到了钉子。早在1967年三四月份，武汉的两大派系“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之间就有对峙，“百万雄师”实际是武汉军区、湖北省委为了对抗造反派群众而成立的组织。1967年7月，毛泽东带着王力等人来到武汉来协调派系关系，王力表示支持“工人总部”，而将“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在7月20日，“百万雄师”的群众冲击主席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王力。中央“文革小组”将它定性为一起“反革命事件”。

“7·20”事件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在两个问题上走了极端。一是他们把造反的矛头指向了军队，提出要在军内全面开展“揪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感到造反派在一切领域的夺权都是合理的，这也包括涉及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特殊领域。《红旗》杂志刊登了文章，“文革”的方向要从“党内一小撮”转向“军内一小撮”。外交领域，则发生了有损国家声誉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毛泽东意识到造反派全面夺权、党政机构面临瘫痪的情况下唯有军队才能维持稳定，不能夺权；而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领域更要由中央严密控制。于是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这一连串事件背后牵连的人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晚年回忆，主席“抛出”三个人，特别是王力和关锋，确实是出于安稳军队的目的。“抛出‘王关戚’，后来又搞了‘杨余傅’（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海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这也是一个平衡。”但总体上说，戚本禹并不是能够完全想通自己被抓的原因。戚本禹的逮捕要比王力和关锋晚，并且将王力和关锋带到钓鱼台二号楼隔离，也是戚本禹来处理的。在王、关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给主席写了信，主席回复：“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仍然以同志相称呼。戚本禹最终没有逃脱囚徒的厄运。1968年1月14日戚本

禹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随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

在思索自己被抓谜团时，戚本禹也找过其他原因。比如，所谓的“整江青黑材料”——北京图书馆里有人发现了写有“蓝萍”文章的报纸，戚本禹将此事报告给江青时她就很不高兴。后来上海市委又给过戚本禹一批报道江青的旧报刊，戚本禹没有主动和江青汇报，又被她认为是为自己留后路的表现。最后一件事是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将一封信汇报给她，说有人冒充她，还声称自己参加过军统。后来作为阎长贵领导的戚本禹细看，才发现那是一名叫“江菁”的演员写来的信，只是说她在“文革”的时候受到了批斗，希望江青能够看在都为演员出身的背景上能够帮助她。江青那时已经不愿意听戚本禹解释了。戚本禹回忆，江青最后单独请他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普希金的作品，内容说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男青年千方百计要探女主人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阎长贵不久之后也被抓了，抓之前同样受江青邀请看了场电影，是《一仆二主》。

在史学家看来，戚本禹的结局只是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冲锋陷阵的人，也就会成为最早的牺牲者。“毛泽东发动‘文革’后，对于运动进行的形式和速度，是有一种把控的。他经常引用一句湖南的谚语，叫作‘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就是说草鞋是比着脚来打的，走哪算哪，但是大概的形状是有的。”唐少杰说，“从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是‘文革’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展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第二阶段就是毛泽东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了，要从混乱走向秩序。所以你看第一阶段的风云人物，无论是戚本禹，还是蒯大富、聂元梓他们，都是慢慢被消解掉了。”

一生的烙印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此时戚本禹在监狱里已经被关押了15年，他在3年后出狱。18年的牢狱生涯，正好相当于他在中南海里平步青云的18年光阴。

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在1988年第一次见到了戚本禹。“他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肥瘦适中，身体不错，只是前额有较深的抬头纹，普通话中略带一点山东口音，不像关锋那样有浓重的山东腔……他正在写作，桌上放着许多手稿。稿纸是无格白纸，用蓝黑墨水写，字并不漂亮。桌上放着一个木质信筐，插着一些信和凌乱的便笺。”叶永烈在《追

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一书中这样记录。出狱后，戚本禹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他喜欢历史，叶永烈看到的是他正在办公室里写书的景象。

戚本禹陆续以“戚文”或是“司马琪”的笔名出版了一些和传统历史文化相关的图书。《先秦人物论》《秦代人物论》《两汉人物论》和《三国人物论》就是戚本禹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的一套历史书籍。责任编辑褚赣生说，戚本禹充分利用了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便利条件，对他读史论人有比较深的体会，也能将他的观点渗透在自己的写作当中。“这套书的一个特色就是把毛泽东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观点汇合在一起，配了大量他的读史手记。毛泽东读史擅长活学活用，撇去影射政治不谈，有着不少高明之处。”褚赣生认为戚本禹的写法仍然带有毛时代的烙印，比如会拔高农民起义的地位，或者推崇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是去看一种综合力量，“不过瑕不掩瑜，能看出作者还是具备一定的历史修养”。

戚本禹当年对叶永烈说，他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蛀书虫’”。他断断续续在写和“文革”有关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对这场运动合理性的肯定，有对领袖的效忠和辩白，就是缺乏对“文革”悲剧根源的思考，以及对那些无辜受害者的歉意。他对“文革”的反思有限，始终坚持毛的本意是发动一场“反修、防修”的运动，由于执行的偏差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才会导致失败。

齐鲁出版社总编辑孙言诚经过朋友介绍认识戚本禹后感到他的口述很有价值，想以此为史料来做“文革史”的专题研究。在写下一篇《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的记述后，两人却产生了罅隙，无法继续合作。孙言诚的文章中引用了何载的女儿，以及戚本禹两方面的信息，得出的结论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八司马”把何载等人打成“右派”，是极“左”的表现；年轻人给党组织提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正确。“‘反右’与‘文革’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大多数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个时期不公正地对待过别人，这是事实。”孙言诚这样写道。戚本禹则不能接受这篇文章参考其他人的回忆，他认为他提供的才是最可信赖的叙述。

2008年，戚本禹在朋友的陪伴下重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在1968之后就再也没去过。他告诉朋友：开国大典时，他是青年团校的学员，就站在国旗杆下；成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人员后，他在观礼台服务；到了“文革”初期，他终于能够站在城楼上见证领袖接见红卫兵……戚本禹久久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光影，空间，与敞开的日常

文 / 钟小武

多年以来，我时常想起幼年时在家乡打麦场上看电影的情景。

乡村，在现在很多城市人的想象中，代表着绿意与丰饶，田野的风雨敲打着泥土，充满柴火气息的炊烟，安静地咀嚼着草料的牲畜，坐在树下聊天的村人。坦率地说，隔着几十年的时空，我对此并不反感，记忆中它似乎就是如此。时空塑造着我们的想象与趣味，麦场上的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装置，满足着当时的我对更加辽阔世界的想象。

一般是夏收刚刚结束，秋忙还没开始的夜晚，吃完晚饭，村人带着小凳、零散的吃食，三三两两开始汇集到麦场。等待放映的时间最为热闹，大人们热烈地聊着天，孩子们来回穿梭，不断打闹着。电影开演，放映机的光柱打在一块白色幕布上，人群很快安静下来，心绪随即跟随电影情节起起落落。最让我欢喜的是，与现在的电影院不同，那是真正敞开的空间，幕布前后，都不妨碍观影，区别只在影像的翻转。

那样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确切地说，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但许多乡人迁往城市，乡村的景观也在朝着城市的面目不断跃进，连接着集体情感的那些公共空间多半也变得无从追寻。不难想象，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宏大叙事没有耗尽它已然蓄积起的巨大势能之前，关于历史与文化空间的存留，即使在有心的国人那里，也多半显得步履蹒跚、曲高和寡。

与这些公共空间相伴生的，其实正是今天被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的传统文化。它们代表着历史上对农业作为重要补充、打通城乡区隔的手工艺，以及今日对接或者说对抗工业精神的匠人精神。只是，在剧烈变化的时空之中，它们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却难以左右逢源。这样的感喟，我在采访中时常聆听，心有所感。

去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在皮影制作大师江国庆的带领下，拜访了80多岁的皮影艺人李世杰。在陕西戏曲研究院那栋破旧的家属楼里，这位被称为“碗碗腔之王”的老艺人聊得兴起，抄起墙上的月琴，坐在堆满杂物的阳台上，连弹带唱起来：“我朝也有几

个英雄爷……”那些抑扬顿挫的音调，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畔。直到现在，李世杰仍能记住150本皮影戏的台词。可让他痛苦的是，现在唱皮影的人却越来越少，真正会唱的人则更少。

有时候我也会想，传统技艺与文化的消逝，是否无可避免？艺术与文化原本是写在生活边上的一种调剂与安慰，如果生活方式变了，其自身焉有不变之理？但改变不等于消逝，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仍会以各种变异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日常之中，区别似乎仅仅在于，是有意识地改变，还是无意地流变。

一部文明史，就是不断精致化、博物馆化的历史，千百年来的生命、情感与体验，被压缩为博物馆的一件展品、几页介绍。这当然是种命定的悲哀，然而通过这些简而幽微的东西，空间的幽闭，却被想象解除。现在，更进一步，博物馆所蕴藏的丰饶知识与历史的展示氛围，正在走入社区与楼宇，走入敞开的日常，在向人们昭示：当下就是历史，身边就是历史，你与历史，甚至不到一墙之隔。尽管，这是博物馆化的历史，这是工业再包装后的历史，但是，它至少会触动你集体乡愁中的某一部分，重新激活与庸俗忙碌日常之间的那段距离之美。

几天前，我在华润·万橡府所举办的一场“非遗”跨界视觉艺术体验场的落户仪式上，感受正是如此。主创者所展示的作品，是一幅由皮影、水墨画、金箔银箔三种艺术形式共同组成的，长11.5米、高4米的视觉装置，所呈现的主题是代表北京海淀土地与文化肌理的“三山五园”——香山、万寿山、玉泉山与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圆明园，以及海淀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代表学府精神的清华、北大。画面的主题部分，比如颐和园、圆明园等标志景点用皮影制作，仔细看去，上面有专门敷彩的铜绿色的陈迹之感。铺陈四周的大幅水墨则以流动的气韵营造出一种斑驳的光影空间，金箔银箔用以写实，或者塑造香山枫叶，或者表现散落的屋宇，成为皮影与水墨之间的过渡语言。

为何选择这种跨界的艺术形式？韩非子皮影剧社的艺术总监，也是这幅作品的主创之一韩星介绍：“海淀有丰富的文明历史，用皮影这种古老艺术表现非常合适，此外，水墨阴阳流动的艺术气韵，与以光影为



韩非子皮影剧社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中获取灵感，还原了百年前的“万园之园”

表现形式的皮影非常契合。”在毕业于中央美院的画家赵凯看来，这首先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原来绘画都是正面打光，现在全部是背面打光”。为了创作，他看了韩非子剧社收藏的许多老皮影，发现皮影与传统绘画的语言一致，都追求一种平面的写意。而对于在海淀耕耘 10 年的房地产开发商华润而言，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皮影戏，所凝聚的光影匠心，暗合于自身的人文追求。皮影、水墨画在坚持用自己的艺术形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而华润·万橡府在这片土地上做传承的，从中山讲堂到读书小站、第二书房、字里行间咖啡馆，再到五彩城，10 年来万橡府带给海淀这片土地的不仅仅是一栋栋建筑，更是融会人文、思想、情怀和世界的空间，保留土地值得珍视的记忆，传承这片土地的人文与希望。

事实上，这件社区展品最吸引我的地方还在于，它勾连起我之前对于中国传统艺术可能性的思索。未来皮影艺术将以何种方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其实也是 18 年前，韩迟从父亲手中接任韩非子剧社社长时，便开始考虑的问题。韩迟所学专业为广告，父亲韩非子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皮影艺人，只是源于热爱，离开报纸副刊的编辑岗位，在 1992 年创办“双城民间皮影艺术剧社”，进而把一家人都拉入皮影行。有市场才有传承。韩迟接手剧社后，开启

了一些大胆的跨界实验，2009 年，剧社前后用 3 年时间创作的一部结合京剧元素的皮影戏《灯官油流鬼》，在中法文化之春首演后成为剧社大受欢迎的核心表演剧目。

此次，与水墨画、金银箔等艺术形式的合作，对韩迟及华润来说，也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非物质文化遗产”跨界视觉艺术体验场落户海淀，通过将皮影艺术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结合的中国首个大型当代跨界视觉装置，向世人展现皮影艺术的文化魅力以及百年海淀的文化底蕴。这也是中国皮影艺术第一次以立体装置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多种艺术的合成，让皮影在堪称现代艺术先锋的视觉装置中有了新的活力，跨界不是最终目的，聚合更多社会力量，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让诸多类似皮影戏这样面临消亡的文化艺术形式得以承续与创新，才是活动发起者们坚持的初心。

在关于光影与空间的艺术尝试中，皮影或许仍有可供想象的空间。而作为日常，作为居所，华润对这片土地上艺术与人文的容纳，无疑会开启人们的想象视野。其实，这一尝试从未停止。早在古代，渴慕山水、难以远涉的人们已开始营造假山园林，微型景观，其中的意味相当丰富：如此传统，如此现代；如此幽闭，如此敞开。■



1



2



3

林白曦藏品：

1. 清光绪 黑色嫫妃龙纹褂
2. 清道光 / 咸丰 黑色命妇吉祥褂
3. 清同治 红色命妇吉祥褂
4. 清道光 / 咸丰 四品豹子补子一对
5. 清嘉庆 / 道光 六品鹭鸶补子一对



4



5

芬兰的“中国人”

记者 李晶晶

现在欧美大部分丝织品都在私人收藏家手里。他们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因为纺织品相对偏门，而且这类东西不是很容易保存。从事收藏要认真地对待它、保护它，但凡去收藏的人一定是很爱它们的。

林白曦，很难定义他是芬兰人，还是中国人。

1956年，3岁的林白曦跟父母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母亲在《人民画报》做翻译。林白曦在中国度过了他童年和少年时光。与当时所有经历过社会动荡的中国人一样，林白曦对于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有着一种复杂的记忆，既生不逢时又身逢其时。

1974年，林白曦回到芬兰。1975年，芬兰和中国签署了航空贸易协定，时年22岁的林白曦因其特殊的中国成长背景，被芬兰航空公司看中。当时芬航很乐观，觉得两三年后就能在中国开通航线，没想到一等就是12年。

1985年，芬兰航空开始做开设中国航线的准备工作。芬兰政府和苏联政府谈判直飞的事宜，同时访华洽谈直飞中国的航线。1987年，芬兰与苏联签署了《苏芬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芬航可以使用苏联领空直飞北京。这一年，34岁的林白曦终于被芬航总部派来北京筹备办事处，他又一次在北京定居下来。1988年6月2日，芬航在中国正式开航。从此中国—芬兰航线成为第一条连接中国与欧洲的直航航线。欧洲当时飞往北京的航班要经过中东中转，单程16个小时。芬航要开辟从北京直达欧洲的航班，只需8个小时，这是个创举。在这背后，林白曦功不可没。

或许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结，在1995年林白曦工作调动至新加坡前夕，他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大量购买中国艺术品和家具带去新加坡。“那会儿我疯狂购买，有破烂也有好东西。潘家园、高碑店都去买过东西，那时燕莎对面有一个兆丰古玩市场，还有

潘家园旁边的古玩城、天桥市场，卖古董的地方我都去过。”林白曦说。

到了新加坡，林白曦的时间相对宽裕一些了，周末的时候常去逛逛书店。偶然的一次机会，翻到一本叫《亚洲艺术》的杂志，林白曦清楚地记得，当时里面有一篇文章特别介绍了一个美国律师收藏的补子和龙袍。“我一看，里面很多补子的图案，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非常有意思，而且在当时纺织品的价格亦还合适，于是我就开始关注纺织品的收藏。恰巧那年伦敦佳士得秋拍，专门有一场就是纺织品拍卖。”这一场拍卖，林白曦买到了不少东西，当他满怀喜悦地拆开包装一看时，发现被拍卖公司张冠李戴了。同一天有一场瓷器拍卖，他们把林白曦拍到的纺织品当作瓷器那一场相同号码的拍品给寄来了。“当时我就急了，佳士得使劲道歉，希望能够补偿我，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只需要把你5年之内所有的纺织品拍卖图录寄给我就行了。这对于我研究纺织品及了解它们的市场价格有很大的帮助。”

林白曦的收藏就在这一次小小的阴差阳错中开始了。“我开始主要集中收藏补子，衣服那些收藏得相对少一些，因为比较占地方，也更难保存打理。”补子又称胸背，简称“补”，是中国明朝及清朝、朝鲜王朝、越南黎朝至阮朝、琉球国官员服装上位于胸前和背后的方形装饰。不同等级的官员补子的图案不同，而文官和武将的补子又不同，文官的补子图案用飞禽，武将的补子用猛兽。绣在官服上的补子，是识别官员等级的一种标识。补子随官职而存在，且受到朝廷的限制，不能大量制作。

林白曦收藏有一幅朝鲜一品文官的补子，与中国的一样，也是仙鹤。“当时明朝被清朝灭了以后，朝鲜依然延续明代的礼制。但是他们补子的尺寸比明朝要小很多，明朝的是40厘米，朝鲜的是20厘米。”林白曦说，“这是越南的，在龙的右上角绣有‘日’字，这个龙只有四只爪子，这个可能跟皇家有关系，龙的造型与越南瓷器或铜器的造型一致。亚洲地区在当时多受中国影响。”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



清嘉庆 / 道光 霞帔

补子图案：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绣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罴，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除此之外，还有补子图案为麟、斗牛等题材的，应归属于明代的“赐服”类。一些舞、乐、工、吏杂职人员也可用杂禽、杂花补子，如正月十五的“灯景”补子，五月的“五毒艾虎”补子等。明代逢上元灯节，内臣宫眷皆须穿戴灯景补子蟒衣，以应节令。刘若愚《明宫史》称：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内臣内眷，皆穿灯景补子蟒衣。

清代的补子直接沿袭明朝，但也有所发展和变化，二者的主要区别，首先在于形制上。明代补子施于袍，清代补子用于褂。明服为团领衫，前胸补子是完整的一块，清服是对襟褂，前胸的补子被一分为二。明代的补子既有单独缀织到补服上的，也有事先直接织绣

在补服上的，清代则为单独织绣完成后再缝缀到补褂上的。明代的补子大约 40 厘米见方，清代的补子稍小，约 30 厘米见方。再有就是明代的补子多以红色等素色为底，金线绣花，清代的补子则是以青、黑、深红等深色为底，五彩织绣，色彩艳丽。明代补子四周多为光边，清代补子四周加工精细，多采用花边，并具有装饰效果。明代文官四品以下的补子，多绣有一对飞禽，清代的禽兽均绣单只。明代的补子只饰于前胸后背，清代宗室的圆补有的不仅饰胸，还有的饰于两肩之上。

清早期，只有武官为补服制，而补子可随意缀织于朝衣、短褂、皮褂、马褂之上。到了顺治九年（1652）后，对补服的制作有了改变，几乎全盘承袭了明朝的定制，只有个别纹样有所删改。各级官员补服为石青色，款式也一致，为圆领、对襟、平袖过肘、身长过膝，区别仅在于补子形状和纹样的不同。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补子》记载：“品级补子，定于洪武，行于嘉靖，仍用至今，汪韩门《缀学》言之详矣。”在林白曦的收藏中，可以看见清代各个时期文武官的补子。其中很有意思的是，还收藏有袁世凯“登基”后，新设计制作的补子。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新加坡到伦敦每天都有好几个航班，于是只要有拍卖，林白曦就会直接飞去伦敦现场看东西。“头几年拍卖会我都坐飞机过去，在拍卖会的前一两天先看预展。时间长了，认识了伦敦纺织品部门的负责人，经常跟他沟通交流。只是那会儿资金有限，虽然买得很多，但不是最好的。我是从艺术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纺织品，再加上这又是一个冷门，我想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工夫。我的瓷器收藏肯定比不了，书画我也不想玩，纺织品算是我当时力所能及的收藏。”

在林白曦看来，他在收藏过程中有一个优势，就是能看中文，能说中文。因此每年从新加坡来北京的时候，他就会要求朋友们去找丝织品方面的专家，然后向他们请教。林白曦回忆，在那个时期每次纺织品拍卖的时候，除了有一些香港的行家购买外，整个市场都由欧美的藏家购买，他们非常喜欢这种东方的极为精致的手工艺品。

现在林白曦有了新的收藏标准，第一不能残，第二要保色，第三年份要更好一些。他说：“以前我可能 1 万块钱买 10 件东西，现在说不定 1 万块钱就买一件东西，我希望收到更好的精品。”

瑞典创新哲学的背后

文 / 邢宇 李三

“模范国家”“创新之国”“为人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之间一切保障的国家”……这些，是人们习惯为瑞典贴上的标签。

作为北欧小国，瑞典从19世纪末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跃成为发达的高福利工业强国。现在，它不仅是目前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按人口比例计算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瑞典人乍看上去去安静、内敛、不爱抛头露面，但在这样的表层下，涌动的是瑞典式的激情、疯狂、敏感，以及隐藏在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与意大利的工艺化和美国的商业化相比，瑞典人的创造力是品质与功能、美感与质感的融合。从第一盒安全火柴到第一个心脏起搏器；从随处可见的拉链到摄氏温度计；从单体冰箱到血液透析机；从利乐包装到哈苏相机；从三点式安全带到背向式儿童安



沃尔沃汽车集团中国区研发副总裁沈峰

全座椅……瑞典以其在创新发明领域的卓越贡献，影响着世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彭博社在今年1月底发布的2016年彭博创新指数中，韩国、德国和瑞典排名前三。根据结果，瑞典在研发密度、研究人员集中度和专利等方面都表现突出。在另一项调研中，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也将瑞典排在对全球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的国家的第二名。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的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中，瑞典被评为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排名第三。

对于瑞典人的创新基因，瑞典驻华大使罗睿德先生这样阐述：“传统和创新看起来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但是传统确实是瑞典创新的重要部分。瑞典的创新拥有悠久和光荣的历史，它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些著名人物，例如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这些创新历史为包括沃尔沃、爱立信和伊莱克斯等在内的很多瑞典大型知名企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我们持续地在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瑞典研发投入占经济产出的比例在全球领先。”

究竟是什么构建了瑞典的创新优势？瑞典创新基因的背后，体现了怎样的人文哲学和价值观念？对于这些疑问，瑞典驻华大使罗睿德给出了两个关键的出发点：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

对自然的敬畏

如果一个人被装进了麻袋里，外面的人小心翼翼地打开它，露出一道缝让阳光照进去，里面的人就会开始发疯，他们把雪清理开，昂起自己苍白的冬日的脸朝向天空。如果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看见这样一个如饥似渴地凝视着太阳的人，不用问，准是瑞典人。

——莉娜·拉森（Lena Larsson）

瑞典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广人稀，人口约为900万，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而瑞典近90%的人口都居住在南部，北部被称为“西欧最后的荒野”——占瑞典国土面积近60%的Norrland人口

却不足 100 万。这是因为，瑞典六分之一的国土位于北极圈以北，在所谓的欧洲北部之冠（Nordkalotten）地域之内。瑞典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部分的领土之所以适于人类居住和开发，主要归功于流经挪威西海岸的墨西哥湾暖流，它让瑞典的气候变得更加柔和并适于居住。

瑞典的季节反差极大，致使“夏日的瑞典”与“冬日的瑞典”截然不同，冬日因缺少阳光而令人沉闷，夏季充足的阳光又使人充满活力。瑞典人很享受与大自然这种特殊的关系，他们沿着动物、植物生长的轮回，追随着季节的更替。

保罗·布里顿·奥斯汀在《论瑞典性》一书中写道：“轮回的季节有如此天壤之别，季节的更迭又是那么快捷，宛若一曲动人的诗篇，哪怕是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动容。”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的人们的心情和行为，像居住在瑞典以及更北部地区的人们那样受着季节的影响。“夏日的瑞典人”和“冬季的瑞典人”是那么不同，这一点，没人比瑞典人更清楚了。

对自然与生俱来的热爱与尊崇，成为瑞典民族性格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使瑞典人创造了许多“为环保而生”的创新发明。在瑞典，有一条古老且独有的法律——“自由通行权”：在自然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通行（搭帐篷，采浆果、蘑菇、花朵等），即使是私人物业也不例外，只要保证跟住家保持一定距离，不扰民即可。这一权利基于“负有义务的自由”原则，人们有义务保持自然的美好。正因如此，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瑞典便成为世界上致力于本国和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国家之一。

正因为对大自然的珍爱，瑞典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是狂热的物质再循环利用者，不允许也不赞成通过过度包装的手段使物品升值，并严格限制清洁用品中的化学物质，即使是到期的药品，也要被送回药店，进行适当处理。

沃尔沃汽车集团中国区研发副总裁沈峰以沃尔沃汽车为例，更具象地解读了“对自然的敬畏”。沃尔沃曾发出这样的声明：为了降低汽车油耗排放，保护地球环境，未来不论沃尔沃旗下的任何一款车型，将只使用 2.0 升（包括 2.0 升）以下的发动机。在全球汽车工业逐渐重视环保的趋势下，沃尔沃目前是唯一一家做出此种承诺并付诸行动的汽车企业。这一大胆的决策，则恰好表现出了沃尔沃骨血中瑞典式的环保基因。

对生命的尊重

瑞典平等主义，几乎是掌控瑞典人和瑞典企业创新命脉的基本准则。平等至上的观念，则多维度地诠释了瑞典人对生命的尊重。“自由平等的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瑞典统一和安全法案》，这是 1789 年瑞典的政策制定者们构建的一个细密的法制网络，为保护瑞典公民的平等权利及男人与女人、成人与儿童、瑞典人与移民们平等的合法性。诸如此类的历史律条，至今仍对瑞典法律的制定和人民的生活产生着深远影响，从家庭法到儿童保健制度，平等至上的观念，使得瑞典没有巨幅的贫富差异和阶层分化。

按照哈佛大学布赖恩·帕默先生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平等至上的观念已经是瑞典的“国家宗教”：“人们可以将‘国家宗教’视为一个广泛的符号和传统，它可以帮助我们确认一个集体身份，解释我们共同的历史，感受共同努力的目标。”

在瑞典，有这样一条社会行为准则，瑞典语为“lagom”，大意为“恰好”“中庸”“适当”，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词最大化地体现了瑞典人的处事哲学——平等、中立、不极端，并避免冲突和争论。而“lagom”所代表的平等与中庸，绝不意味着平庸。瑞典人喜欢安静，有时甚至被认为是“缄默”“拘谨”，这种特质的产生实际上主要源于瑞典人更愿意有目的且直率地交谈，并且坚持谈话的真实性，他们不喜欢冲突，也尽可能避免与他人争辩。就如瑞典的国歌里所唱：“你古老，你自由，你多山的北部；你寂静，你欢乐，你美丽的容颜……”

从企业创新力的角度来看，瑞典平等主义作为瑞典人骨血中“对生命的尊重”的体现，也极大地驱动了诸如沃尔沃等瑞典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沈峰介绍说：“自动驾驶是沃尔沃很早便开始着力研究的领域，因为对生命的尊重，沃尔沃对于汽车安全有着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据统计，每年全球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高达 130 万，其中 90% 以上是由于驾驶员的不当操作导致。怎样降低这一数字，沃尔沃再次以瑞典式的创新优势，从根本上寻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自动驾驶。

“当很多汽车企业还在谈自动驾驶的样车试验和概念的时候，沃尔沃已经将自动驾驶量产，真正带入了人们的用车生活中。当沃尔沃 2015 款 XC90 推

出时，这一车型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将‘堵车辅助系统’（ABS 系统）成功投入市场的车型。在堵车情况下，XC90 可以凭借堵车辅助系统跟着前车，以 50 公里的时速实现自动驾驶。很快，沃尔沃全新 S90 以及 2017 款 XC90 则可以在不需要跟着前车的情况下，在 130 公里时速内实现自动驾驶。”沃尔沃日前在华盛顿还宣布，对于汽车在自动驾驶过程中产生的交通事故，沃尔沃将负全部责任，这是首个这样宣称的汽车品牌。

此外，沃尔沃车型标配的自动刹车系统（AEB）即“城市安全系统”（City Safety），从技术层面上，达到了即使在夜视状态下也能够避免任何形式的追尾或碰撞。沈峰告诉本刊：“早在 2008 年，当大量车企仍在针对此项技术开始研发时，沃尔沃便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家将 AEB 系统完善且成功投入量产成为沃尔沃车型标配技术的汽车企业。而今年不久前在美国，20 余家汽车企业才刚刚宣布，美国将于 2022 年把 AEB 系统变成美国汽车的标配技术。”与此同时，“当所有车型的被动安全气囊仍设置于车内时，沃尔沃是第一个做到在车外的挡风玻璃前放置安全气囊的汽车品牌，力求最大程度地保护在车外行人的安全”。可以说，在整个汽车安全发展史中，许多篇章都由沃尔沃书写。

社会保障

从低廉的医疗费用到教育免费，再到完善的儿童保障，瑞典被誉为是“为人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所需一切保障的国家”，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成为瑞典通往创新强国的另一主要因素。瑞典人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担心自己的日常生活，更多地将时间和精力转移在追求其他长期发展的事情上，为不断进行新的尝试所面临的风险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

此外，注重开放性和好奇心的文化氛围，好学与教育密不可分。“在瑞典，我们认为教育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免除学费，并且还补贴学生的生活费用。”根据美国中央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研究显示，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五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全球最高，占据了世界前五的位置。瑞典全国遍布着 1300 多座图书馆，瑞典人平均每天花 21 分钟读书，38 分钟读报刊。

瑞典每年用近 4% 的 GDP 投于创新研发，投入比例位居世界前列。据英国《Wired》杂志的统计显示：“瑞

典是世界上数字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其前瞻性思维文化促进了创新的发展，如今瑞典也是许多成功的创新公司的诞生地。”从历史较为悠久的沃尔沃、爱立信、ABB、斯凯孚、阿斯利康，到新兴的 Skype 和音乐流媒体服务 Spotify 等，创新似乎已成为瑞典企业成功的秘诀和前进的法则。

沈峰介绍说：“并购成功之后沃尔沃汽车投入 110 亿美元巨资开发 SPA 和 CMA 整车模块化平台，这是瑞典工业史上最大的一笔创新投资。SPA 完全是沃尔沃的，CMA 是由沃尔沃主导，沃尔沃和吉利合作开发，双方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打造自己的产品。其次，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讲，SPA 和 CMA 模块化生产平台以及 DRIVE E 动力总成系统，是沃尔沃作为瑞典企业的另一大重要创新成果，它们突破性地兼顾了传统车型和未来新能源车型的生产使用，将生产流程管理和生产效率发挥到极致。”

以约 900 万人口的基数计算，瑞典是全世界专利及专利申请数目最多的国家之一。罗睿德介绍说：“瑞典高度重视创新领域的一个表现就是新成立的‘企业与创新部’——它是通过合并一些现有的部委而成，主要职责就是积极努力推动创新和创业”——它不仅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参与其中（例如提供资金和合作平台），在另一方面，也知道该在什么时候“靠边站”（包括简化规则、消除官僚障碍等）。

瑞典人认为，高品质意味着设计精良并经久耐用。如果你要问一位现在还开着 1981 年产沃尔沃汽车的瑞典人对美国人那么热衷于每三年就要更新一次汽车有什么看法时，瑞典人的答案是：（对于美国产品）这不算频繁。他们认为那些“一次性”产品有着“一旦拥有，哭个不休”的产品特质。而沃尔沃汽车的安全、环保、创新、低调和持久，才是瑞典人认为即有“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也保有了瑞典式的“高品质”和创新的代表。因此，在沃尔沃被中国企业并购后，它仍然在瑞典人心中占据着很高的位置，在车道上拥有很高的比例。在瑞典，人们这样描述他们的“瑞典梦”：“villa, Volvo, vovve”（房子，沃尔沃和狗）。☑

〔参考书目：《论瑞典性》（*On Being Swedish*），保罗·布里顿·奥斯汀（Paul Britten Austin）著；《当代维京文化——关于瑞典人的历史、心理与习俗》，[瑞典] 克里斯蒂娜·J. 罗宾诺维兹 [美] 丽莎·W. 卡尔著，肖琼译；《瑞典史》，[英] 尼尔·肯特（Neil Kent）著〕

NLive：隔岸观“戏”有多火？

文 / 驳静

现实是，两个媒体人碰到一起，话题总会掉到数字化带来的冲击上，同样的，如今两个戏剧人坐下来，多少也会谈到 NLive。



英国国家剧院近30年来首次复排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皆大欢喜》。该剧成为今年 NLive 中国第二季的剧目之一

尽管许多观众不得不承认，卷福版《哈姆雷特》“舞台魅力没有想象中惊人”，但他从《神探夏洛克》开始的高人气，还是兴冲冲地给 NLive——“英国国家戏剧现场”在中国落地带来了第一批观众，随之而来的，是这一年中人们对这个项目的大量关注。因此，

“NLive 卷福版《哈姆雷特》”成为这场戏剧现场影像声势中的高频词。

2009年初夏，英国国家剧院数字媒体播出部门（Broadcast and Digital）负责人大卫·萨贝尔（David Sabel）准备了一年的项目迎来了它的首映之夜，由海伦·米伦（Helen Mirren）主演的《费德尔》（*Phèdre*）在英国国家剧院上演，与此同时，英国各地 228 家影院也坐着将近 5 万观众，他们等待欣赏的是上述同一部剧，只不过看到的是高清影像的现场同步直播。

此后，NLive 一共拍摄了近 50 部这样的高清戏剧现场影像。正如 2013 年 5 月 16 日，杰瑞米·赫林（Jeremy Herrin）导演的《楼》（*This House*）也用同样的方式上演并直播后，导演感受到的兴奋与惊讶一样，NLive 世界范围的成功是一个惊喜。他在纽约的朋友给他发了祝贺短信，他的母亲在自己家乡的影院观看了该剧，还有来自柏林、阿姆斯特丹和布加勒斯特发了推特并@了他，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此前对 NLive 的辐射范围一无所知”。当晚英国本土，这部戏的观戏人数是 4.5 万，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国家话剧院主剧场 5 个星期的满场总量，在英国以外的国家，观戏人数则有 2 万。

从技术上“球赛实况直播”是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因为喜欢 NLive 的观众，常常提及的优点是，“位置不好的时候，不如通过屏幕观看，因为有更多的视角和更清晰的画面”。

不过，在需要“彩排”和“试录”这一点上，“音乐会现场直播”可能是更接近的形式，音乐会转播团队无疑需要艺术涵养，至少需要事先把表演曲目的每个乐章熟记于心，现场转播时，才能在合适的时间，在画面上切换到合适的机位，小提琴独奏时，不至于给大提琴手特写。同样的，戏剧现场导演显然也需要对剧本十分熟悉，画面切换符合戏剧的情绪节奏，景别变化与情节一致，同时，还会照应到观众的现场反馈等。

但 NLive 在 2015 年 6 月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从未实现所谓的“现场直播”，而是像电影一样，由英国方提供直播后制成的数字高清拷贝，送至中国，在能够实现高清放映的剧院里播出。

这几乎是对此种表现形式存疑的观众最大的疑问，即便是不清楚整个环节的观众，还是不太认可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该项目中国区负责人李琮洲在被问及“是否有批评的声音”时，说“冯远征老师和孟京辉导演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而导演田沁鑫倒是为此吸引，并为她的《北京法源寺》录制了高清现场影像。

英国本土对NTLive持质疑态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德高望重的史蒂芬·伍德（Stephen Wood），他是英国历史上创造第一座中心式舞台的史蒂芬·约瑟夫剧院（Stephen Joseph theatre）的院长，他的忧虑在于，“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因为没有人希望未来这种类型的体验，成为人们对戏剧的唯一认知”。

尽管录制版与平时演出无异，只是多了录制机器，而机器的存在所带来的干扰最终也是可以克服的，但相较于观演关系中演员的一环，观众部分的现场感缺失，成了NTLive这个形式最受争议之处。戏剧原本讲究的就是“去到现场”，对观众而言是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坐在第一排时，可以被演员的唾沫溅一脸的体验”。按照波兰导演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的观演关系理论，去除戏剧中的元素，例如戏装、舞台布景、独立的表演区（舞台）、灯光和音响效果等等，戏剧仍然能够在上述元素缺失的情况下存在，但是，失去演员和观众之间感性直接的交流，戏剧就无法存在。完整的戏剧空间就仰赖于戏剧表演时，演员与观众情感交流过程中的构筑。

但不管怎么样，迄今为止，NTLive在中国的落地看上去非常顺利。如果从票房判断，甚至可以用“巨大的成功”来描述。该项目中国负责人李琮洲告知本刊，以卷福主演的《哈姆雷特》为例，它大概创造了首都剧场售票史上的某种纪录，两场共计2000多张票，票价是统一的180元，开票45分钟即宣告售罄。

“我不喜欢戏剧电影这种说法，更倾向用戏剧现场影像。”李琮洲说。既然强调区别，那么它跟电影的不同之处在哪？其实这个问题一旦提出，就已经很遗憾地承认了NTLive与戏剧之间的鸿沟。李琮洲认为区别在于NTLive剧目的“零剪零修”：现场直播时呈现的画面，就是在中国复播（encore screening）时呈现的画面，既不会像赛事实况转播时会有画面再现，更没有电影的剪辑艺术。从剪辑与后期的角度，的确无法将戏剧现场定义为电影。

正是因为其归属伦理上受到的挑战，NTLive的影视指导罗宾·洛（Robin Lough）表示，“它既不是电影，也不是戏剧，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流派”。这看上去像

是一个文化品类里的新生事物。NTLive在中国上映地点的选择，也从侧面佐证上述事实。最开始，李琮洲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电影院线，无论从设备的角度，还是影院数量的角度，院线都是最佳选择。但很快，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原因很简单，院线上映的电影需要经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而戏剧现场影像这个产品，无法在已有类别里找到归属。最后，李琮洲找到了愿意合作的剧院，而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需要购置符合标准的放映设备。

NTLive的全球成绩单：2015和2014年全球收入分别达610万英镑和670万英镑，仅过去的两年，全球2000块合作屏幕前曾坐过120万观众。2015年6月进入中国市场来的数据是，近4万人次的观众欣赏到了英国国家剧院出品的12部戏剧。

NTLive突破原有传播范围，对真正的戏剧市场会不会造成冲击？新涉及的传播对象是些什么人？在中国，李琮洲观察到，30岁上下的未婚男女是观众的主力，一部分人可能的确是被男神季中的国际明星所吸引，因为从上座率判断，获得托尼奖的《女王召见》（*The Audience*），以及《深夜小狗离奇事件》（*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和《天窗》（*Skylight*）都略逊一筹。此外，如果是已婚人士，则一般是为了孩子的艺术素养而来。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二线城市会更显著。

NTLive的灵感源头，来自美国大都会歌剧院高清现场项目（The Metropolitan Opera Live in HD），后者成立于2006年，项目开始以来已制作了10季共计89部作品。它们共有一个类型叫作“Event Cinema”，大规模流行于2001年的摇滚歌手邦·乔维（Bon Jovi）的巡回演唱会之后。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科技发展的大势所趋，戏剧现场影像是不会对戏剧本身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摧毁真正的戏剧，而前去现场观看是否意味着一种堕落、对戏剧艺术的背叛，从本质上讲，都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出现时会出现的质疑。

而戏剧现场体验的发展，很可能并不止步于此。今年2月，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一次发布会上宣传了最新的VR（Virtual Reality），即虚拟现实技术，戏剧界的应用尝试已经开始，英国“Punchdrunk”剧团推出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Sleep No More*）中，观众离开剧场座椅，在一个剧场空间里主动地探索剧情，与虚拟现实设备结合的体验已经开始。■

“我唯一的欲望”

文 / 张宇凌



壁毯《我唯一的欲望》(15世纪末期,长4.5米、宽3.1米,彩色羊毛和丝线织成,现保存于法国巴黎中世纪博物馆)

中世纪流行的“千花”样式 (Mille Fleur), 成为一种象征的陈列清单。

《我唯一的欲望》(Mon Seul Désir) 是法国国家中世纪博物馆珍藏的一组六张壁挂之一。它长 4.5 米、宽 3.1 米,用彩色羊毛和丝线织成。画面中心是一位衣着华丽、表情平和的女子,正在把身上所有的首饰向身旁一位仕女端着的盘子里褪下来。她们的左边站着一只狮子,右边站着一只独角兽。两只

野兽的两只前爪,分别举着带着家族标志的旗帜和揭开帐篷的门帘。帐篷的顶上,用拉丁文标志出“我唯一的欲望”。

这套壁毯制作于 15 世纪末期,纹样的设计者被普遍认为是当时的一位巴黎大师,也就是《安娜·布列塔尼祈祷书》的作者。祈祷书插图常常是中世纪艺术中各种图样的最早来源,因为它们是直接面对文字、诠释文字的。这些插图会成为其他艺术样式:石头雕刻、金属制品或玻璃制品的范本。因此插图作者也常常是非常有创造力的画师,他们总是被邀请去设计同样是贵族定制的热门货:壁毯。

壁毯在最初对石头建筑有着遮蔽、保温和防潮的功能，我们今天也常常发现它们由于墙面水汽浸染而留下的泛白的痕迹。但到了中世纪晚期，大面积和画面精美的壁毯需要一个正常作坊两到三年的劳作，加上使用金线，以及从英国进口的上等羊毛，造价极其昂贵，以至于基本上成为贵族家庭炫耀财富和荣誉的装饰物。

这套珍藏于克吕尼博物馆、被称为“夫人与独角兽”的壁毯，是由当时巴黎的大法官让·勒维斯特家族订购的。至于为什么一整套如此重要的壁毯，却选择了女性作为主角，是艺术史上悬而未决的一个秘密。除了“我唯一的欲望”这张之外，其他五张描绘的是人的五种感官：味觉、听觉、嗅觉、视觉和触觉。味觉中的中心女性是最年轻貌美的，她一手伸向一个盛满糖果的盘子，另一手上停着一只鸚鵡，表情不可捉摸，有的专家说她的脸上挂着两滴泪水。左边的狮子忠心耿耿，右边的独角兽背向着她拧回头来，呈现一种紧张激昂的腾跃状态，体现着一种未被征服的兽性。

独角兽是神话动物中的一种“乌托邦”族群的代表之一。最早的关于它的记载来自一位旅居希腊的波斯作家。它的原型可能是野驴，也可能是犀牛。独角兽的兽角被认为有强大解毒功能，如果放进水井里就可以使被下毒的水井重新变得清洁。它是一种勇猛的动物，只可以被杀死而不可以被驯服。唯一的捕猎独角兽的方式就是利用处女。因为独角兽一旦看到美丽的处女，就会变成温顺的小狗，把头靠在她的膝盖上。这个时刻，躲在一旁的猎人会冲出来杀死它，或者它将彻底被处女所驯服。这种特性被用来跟耶稣和圣母的关系相隐喻，独角兽投入处女怀抱，就如耶稣投入无玷受孕、永为处女之身的圣母怀抱。独角兽故事中蕴藏着两性之间爱与欲求的神话般关系，也暗藏着阴谋、杀戮和暴力的可能。

“听觉”“嗅觉”“视觉”和“触觉”，分别体现了中心女性在弹奏乐器、闻鲜花和牵引着独角兽的角。独角兽在这三张中呈现了彻底转身、躺下、趴在女性膝盖上以及最终被牵引的状态。但几位女性的表情从味觉到视觉都是暧昧不明的，有着一一种怅然若失的哀伤，特别是在“视觉”这张里，独角兽笑盈盈地趴在女主人膝盖上，但它快乐的根源却是镜中的自己，而为其执镜的女子则满脸忧虑，或许是在担心独角兽的命运，或许是在哀叹爱人最终是在自爱，或许是在厌恶自己这个诱捕者的身份。到了“触觉”，女子脸上才隐隐出现了征服者的平和。

最后这张“我唯一的欲望”可以被解释为中世纪道德象征体系下的一种女性乌托邦图像。它代表这五官之外的第六个重要器官“心”（Coeur）。之所以不称为“心灵”，也是因为中世纪的人把“心”既想象为一种跟信仰和精神相关的感官，也承认它在人类爱情和欲望中的作用。女人的行为代表着她彻底弃绝了这个世界中的奢侈装饰，彻底投入心之所愿，这种所愿，可以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被征服的激烈纯洁的爱欲。此处的“Désir”带着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来自希腊传统中的“Eros”体系，如同一切人类，更多是女性的最高的理想：神圣之爱与肉身之爱的结合。一切欲求统一在一个欲求之中，成为“我唯一的欲望”。

这套壁毯很可能是当时的法国北部以及尼德兰南部，布鲁塞尔或布鲁日地区的作品。使用了当时流行的“千花”样式（Mille Fleurs）：用细密的动植物图案铺满整个壁毯来作为背景。这种样式体现了中世纪图像志中来自蛮族文化的因素：“空虚恐怖”，一种要将画面填满的冲动，似乎留白意味着未被征服。也成为一种象征的陈列清单，将带有象征含义的植物和动物作为对道德意义的反复强调。当时的图样被设计出来之后，要送到纺织工坊去由那里的制图师再拓展为壁毯草稿。制图师的工作有一个秘诀：法律规定他们不允许触碰中心人物，但是他们可以自由更改植物、动物和背景。所以“千花”背景一方面是制图师炫技的地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世纪壁毯给人们的视觉感受带来的新体验。因为观者在私人空间欣赏一幅壁毯的时候，会有一种无限走近的可能和冲动，“千花”样式的存在保证了画面有一种扁平、均匀和平稳的节奏，走得再近的观者也能看到跟中心人物同样精美的细节图像，而更奇妙的视觉效果是：不论你多么被中心的美丽女子吸引，目光还是会情不自禁地看到边角上的一朵花或一只兔子。所以“千花”保证了另一种乌托邦的存在：在神的目光中，万物平等。■

法律不允许制图师触碰中心人物，但他们可以自由更改植物、动物和背景。

大众旅游时代与旅游外交

文 / 程清

一年多前，当约翰·奥德姆决定将六旗乐园带到中国来时，这个决策几乎没有费太多周章。谈及原因：“全球经济格局在不断调整，中国已是世界旅游业的中心，我们无法忽视它蕴含的巨大机遇。”

六旗乐园在北美与迪士尼齐名，两家娱乐巨头企业先后聚焦中国市场，同样是以长三角区域为布局目标。作为六旗娱乐集团的国际开发总裁，奥德姆现在是中国的“常客”。最近一次见到他，是一个月前在海南的亚洲博鳌论坛上，当时他正在和澳大利亚联邦旅游部长理查德·科尔贝克热烈讨论“中国机遇”。二人共同认可一个趋势：中国消费者的生活方式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发生快速转变，一个以大众旅游为基础的新休闲时代正在到来。“这将改变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态度，中国的外交也将因旅游产业的崛起而在世界舞台上更具亲和力。”

中国企业已经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作为六旗在华的合作伙伴，山水文园集团将以“全球最多丧心病狂的过山车”而闻名的六旗乐园引进到了浙江海盐，并将于2019年开园。而在与六旗开始的谈判中，他们发现“介绍中国”并没有想象中的复杂。“中国旅游业的影响力在扩大，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旅游增长引擎，世界各国对中国旅游业的期待不断提升，投资热情也不断高涨。”该集团董事局主席李辙也看到了推手的力量：“这也得益于中国国家旅游局常年在境外的推介活动，国际上主动了解中国的意愿在加强。”

这很快从另一个角度得到验证，科尔贝克一方面公开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潜力最大、发展最快的旅游市场，并且已形成经验，全球都在关注。”一方面还邀请李辙等中国企业家前去澳大利亚，考察并探讨跨国旅游项目合作或吸引当地企业来华投资的可能。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工业化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在不断增长，消费者会花费更多的钱来购买旅游度假服务。这在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会发生明显的转变：目前美国人已

有1/3的时间、2/3的收入、1/3的土地面积用于旅游休闲，并创造了全国超过一半的就业。

中国旅游业已经走到了一个特殊的时刻：2015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67.67万亿元，在世界排名第二，而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在发达国家旅游休闲产业成为经济核心驱动力的一切特征。

万豪酒店集团正因为看中中国游客的休闲旅游需求，决定未来5年将在中国内地开设至少140家酒店。全球著名的度假连锁集团Club Med也将触角伸到了北京，成为平谷金海湖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服务管理方。这个会聚了游艇、马术、高尔夫、养生等综合休闲旅游业态的度假区已初具规模，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机构表达了投资参与的意愿。

这些案例只是以旅游合作为纽带让中国越来越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冰山一角”。企业希望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而作为旅游行业的“总管”，国家旅游局还要考虑的是如何将这一机遇与世界“共享”，发展经济的同时让世界了解中国。

5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大会由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共同主办，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旅游部长、部分国家政要、联合国等组织负责人，以及国外旅游界专家学者将受邀参加。大会以旅游促进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期望搭建推进各国互联互通的国际大舞台。

作为大会的承办方，国家旅游局有着更多期许，正如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介绍的：大会要探讨旅游促进可持续发展新的方式，探讨如何更有效发挥旅游业作用，促进就业；要推进国际旅游合作，深入推动旅游区域合作一体化；通过展示中国旅游业发展新成就，借鉴世界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促进中国旅游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这场被誉为“全球旅游界奥林匹克”的盛会已经令业界期待不已。以李辙近两年来与多国旅游部长打交道的经验，他深知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平台、通过一个有效的方式向世界表达中国的重要性，传导到市场后同样也将形成巨大的推动力。“国家旅游局在扩大中国旅游业的影响力上做出了巨大努力，这次大会不



外国游客在前门大街品味北京城的古韵悠长

仅会为中国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机会，也将让外国人通过聚焦中国旅游更加直接、形象地了解中国政策、国情、民生。这些都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旅游将加速融入国际社会，开启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民间通道，为国家战略落实国际推力。”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李世宏提到了一个背景：自2012年起，中国连续多年占据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的称号，对全球旅游收入的贡献年均逾13%。2015年，中国出境旅游1.2亿人次，旅游花费1045亿美元，继续位列世界第一。预计2021年，中国国内旅游规模将达到68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2亿人次。

“国际旅游业重心东移，促进了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李世宏表示。由庞大的中国消费力所驱动的新时代正在发生巨变，居民消费结构从过去衣食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大众型、休闲型、体验型消费升级。与此同时，人们的闲暇时间在不断增多，比如国家旅游局正在鼓励探索夏季“2.5天休假模式”。中国人的闲暇时间正在成为生产力，影响着全世界。

在李世宏看来，这里面蕴含了中国旅游获得巨大的投资资本的机会，以及中国旅游企业走出去分享资源的机会，这与中国旅游发展的经验和巨大的旅游人力、资本市场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国机会”，

这些都将在本次大会上与世界集中“共享”。

国家旅游局将本次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定位为“一次重要旅游外交活动”。旅游业具有很强的跨行业带动作用，人们因旅游而流动起来，因此而产生的活动与消费将涉及各行各业。这产生的附加效应是惊人的，拿山水六旗在浙江的项目来说，预计将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促进400亿元经济增量。而每年吸引的1200万游客，除了经济价值，人们会分享美食与文化习俗，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正是在各种旅游“平台”中完成。

国家旅游局正在试图把握并深挖其中机遇，如同李金早所言：“到海外旅游的中国人、投资海外的中国企业，以及与国外伙伴一同挖掘中国旅游潜力的企业，都是最好的传播中国的使者。旅游已经成为一种超越地域、国界、阶层、种族、宗教和文明的巨大力量，增进世界各国和不同人群的交流、交往、理解与认同。所以旅游业对于打破城乡分割、国家地区藩篱，具有先锋的作用。”

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如此关切之目光、如此复杂之心态审视和解读中国旅游带来的种种影响。国际间的旅游交流直接带动交通、贸易、金融等多个经济领域发展，也是中国的新型邦交模式的开始。而本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正在试图将之推向高峰。▣



社交媒体时代的 符号组合

文 / 杨聃

在社交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
新规则和生态应运而生，
信息的直达和透明保证消费者不会漏掉任何细节。



5

翻转的游戏规则

截至目前，2016年最震惊的时尚故事是什么？答案是 Vetements 的 DHL T 恤。明明和 DHL 官网上售价 4.5 英镑的工作服没什么两样，却可以卖出 185 英镑的天价，问题是居然卖脱销了……事情是这样的。

2015年10月1日巴黎的 T 台上，一位男模特穿着 Dr Martens 的靴子、珠光黑裤子和一件敞怀的亚光黑衬衫。这搭配一点也不出奇，观众一下注意到了里面那件黄色打底 T 恤。明暗色调的对比下让它极其显眼，外面那件衬衫敞开得不大不小，刚好露出三个字母 DHL——快递公司的 Logo。

这时，台下的观众要么在猛拍照上传到 Instagram，要么沉浸在不知所云的惊愕中。毕竟，巴黎是传统的礼服派，满场晃动的 DHL 明显太“接地气”了。

事实上，Vetements 就是这样一个牌子，设计师格瓦萨利亚 (Demna Gvasalia) 出身并不“正统”，以争论性的“把反时尚带入时尚”闻名。在他看来，“他在给现实新生”。借助坎耶·维斯特、贾斯汀·比伯、蕾

哈娜等名人的影响力，Vetements 才有了今日的市场。

这件 T 恤从今年 1 月中旬开始在高级时尚零售店开售，尽管标价 185 英镑，还是被“闻风而来”的消费者抢购一空。有些“粉丝”甚至跑到 DHL 的官网上买一件长得差不多的“仿版”，只需要 4.5 英镑。模特、博主、造型师都穿着它在社交媒体上显摆。

这催生了一系列恶搞的现象，就连 DHL 的董事长肯·艾伦 (Ken Allen) 也穿着 Vetements 的 DHL T 恤登上了 GQ 网的页面。时尚博客“Man Repeller”还发了一条澄清帖：博主本人都没买到原版。

这一系列闹剧的背后却是一种观念的转变。未来实验室 (Future Laboratory) 的趋势分析师希曼斯卡 (Aleksandra Szymanska) 根据近两年的市场追踪得出，即便之前有像 Moschino 借鉴麦当劳的元素、安雅·希德玛芝 (Anya Hindmarch) 借鉴 Boots 等案例，这次 Vetements 之于 DHL 是不同的。“它对超现实的注解加深了。”希曼斯卡对《卫报》说。

她认为和安迪·沃霍尔的那幅坎贝尔汤罐头不同，Vetements 更加酷，它选择的是荒凉的加油站、工业园

1. Vetements 的 DHL T 恤

2. Brian Litchenberg 在产品上印着“Homies”恶搞爱马仕

3. 安雅·希德玛芝借鉴 Boots 的设计

4. 说唱歌手 Kenya West 与阿迪达斯共同设计运动系列

5. 歌手兼社交红人 Pia Mia 加入麦当娜的 Material Girl 品牌

区和企业口号，像极了埃德·拉斯查 (Ed Ruscha)。

1999年，当娜奥米·克莱恩 (Naomi Klein) 撰写《无标签》时表达了这10年间对反公司运动 (anti-corporate) 的感受，但同时发现新一代消费者找到了表达他们对大众文化不屑的方式，一种略带讽刺的方式，就像布瑞恩·里切伯格 (Brian Litchenberg) 在运动衫上印着“Homies”恶搞爱马仕那样。

很明显，这次重新印上标签并不代表潮流的回归。和21世纪的前10年不同，那时路易威登的LV、香奈儿的双C都代表了拥有者的富有，如今的时尚品牌印上非时尚行业的标签，是因为那些标签在“视觉当道”社交媒体上更容易被传播。

拿一个众所周知的图像创作出另一种和它原始意义相悖的版本，这种做法和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文化反堵 (Culture Jamming) 很类似。同时穿上它就像在说：我们自信到可以穿一些有趣的东西而不再搞大牌的标签崇拜。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媒介和传播学教授麦克洛比 (Angela McRobbie) 对“低品位讽刺”的T恤不屑一顾，但并不排斥这种做法。“现在的时尚毕业生是学了不少文化理论，也读了很多英国亚文化，但这种写作剥夺了他们激进、批判的输入，以及对社会历史语境的感知。在社交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有一种对新奇的渴望。”

正是如此，当Gvasalia得知年轻设计师达维·特兰 (Davił Tran) 创作了一件背后印有“Vetememes”标的夹克时，他并没有想要起诉，并对《纽约时报》说：“Vetements 希望特兰能像我们做自己的衣服那样享受他自己的设计项目。”还在纠结它是正版还是仿制？那都是老观念了。在社交网络的时代里，游戏规则被改写了。

多重身份的名人生态

然而，碧昂斯可没有这么“开明”，她起诉了“Feyoncé”，一个以她名字为调整原版的品牌。事实上，这则新闻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她也开始了自己的服装线 Ivy Park。这个系列把运动服与花哨的休闲装组合了起来。虽然碧昂丝有强大的“粉丝”后援团，在 Bloomberg 的评论家看来也不见得是市场成功的保障。

毕竟前车之鉴有很多，比如詹妮弗·洛佩兹。时尚咨询公司 M Shop NYC 的创始人米歇尔·阿莱恩 (Michelle Alleyne) 认为，名人时尚品牌的失败，

往往是因为明星不努力获取他们客户的想法。所有的名人品牌都在推出时大力炒作，但很难保持这种势头，如何让顾客对货架上的商品感兴趣是件艰巨任务。

为此即便是碧昂丝也需要很努力，她对《Elle》说，她亲自和快速时尚品牌 Topshop 取得联系，看看是否有联合投资的可能。每天有数不清的会议，这几个月都在招聘和面试设计师。她也知道材质和剪裁设计对服装品牌来说才是第一要义。

碧昂丝并不是唯一一个进入时尚生态的歌手，在 NPD 集团发布的《最有市场价值名人》(Most Marketable of all Big-name Celebrities) 的榜单上，碧昂丝排名之上只有一人，她就是蕾哈娜。事实上，貌似任何和蕾哈娜沾边的东西都能分分钟售空。因此，LVMH 集团下的 Kendo 美妆部门签下了蕾哈娜，计划在2017年共同推出一个新的化妆品系列，名为 Fenty Beauty by Rihanna。

“Fenty Beauty by Rihanna 将是一艘直接吸引全球蕾哈娜‘粉丝’的美妆航母。”Kendo 美妆部 CEO 大卫·苏利特安 (David Suliteanu) 对《WWD》说。“作为娱乐界和时尚界的权威偶像，蕾哈娜的受众基础巨大。并且她也是一位很好的研发者，借助于社交媒体的开放性，所有消费者都会知道这点。”

新的时代更加是一个互助协作的时代。相比于传统的请明星代言，如今更多品牌选择了和社交红人达成更深入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对于“粉丝”来说，特别容易产生一种共鸣感，好像选择偶像参与设计或制作的商品就能离他们更近了一样。另一方面，很多名人在本职身份之外，仍然有很多出色之处，比如模特凯特·莫斯也跨界到室内设计。

互动成功的例子也比比皆是：Kanye West 帮助 Alpha Industries 品牌的棒球夹克复兴，品牌2015年的营收增长了30%。泰勒·斯威夫特授权在香港时装秀上推出的服装系列立刻被抢订。

所以当19岁的歌手兼社交红人 Pia Mia 加入麦当娜的 Material Girl 品牌时也不会觉得惊讶。Material Girl 的目标客户是16~24岁的女性，零售定价为20~70美元，品类包括连衣裙、连体裤、运动服、内衣和鞋履等。品牌代言人也不乏凯莉·奥斯本、乔治亚·梅贾格尔等星二代。

首先品牌看中了 Pia 在时尚和社交领域的影响力，Instagram 拥有400万“粉丝”。另外作为品牌形象，Pia 的生活起居，也可以变成 Material Girl 的推广素材。时尚视频网站 StyleHaul 制作了6集关于 Pia 生活

右页上图：碧昂丝在“超级碗”(Super Bowl) 中场演唱

右页下图：泰勒·斯威夫特授权在香港时装秀上推出服装系列

的纪录片，场景涉及了她在纽约参加梅西百货举办的设计会议、出席加州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市的Madonna Inn举办的Material Girl 2016秋装发布会等。

初步计算，StyleHaul有超过2.8亿订阅用户，每月页面访问量约为13亿，这都将为Material Girl的曝光做出贡献。然而，Pia与Material Girl只签了16个月，在被KPI扼紧喉咙的营销时代，成功与否数字可以说明一切。

从“时尚界”到“真实世界”

平面时代的时尚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事情：封闭的时装周走秀、垂直的零售渠道、编辑视角的宣传资料。即便到了2010年，Lady GaGa也要穿上“肉裙”才能博得关注。而如今，就算明星随便穿一套运动服和球鞋，也能获得成千上万个赞。这一切也要归功于社交媒体。不仅是红毯，明星们的日常风格也被紧紧地盯着，细细地扒着。

作为Instagram上最受欢迎的垂直分类之一，时尚相关的信息极易引发互动。从2016年2月10日的纽约时装周开始到3月9日的巴黎时装周结束，其4200万用户共发生2.83亿次互动。“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而现在，这张图片所讲述的故事，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都能听到。”Instagram时尚合作伙伴关系负责人陈怡桦（Eva Chen）对《时装商业评论》说。

对比这种直观直达的模式，杂志上那些唯美的画面越发显得有距离感。无论是品牌或是消费者眼中的“权威人士”恰恰是镜头背后那个有血有肉的人。“曾经在Instagram上所有一切都打磨修整得干净整齐，但我现在能看到的是，无论是多娜泰拉·范思哲、泰勒·斯威夫特，还是吉吉·哈迪德在画质不清晰的视频里唱歌、在家里昏暗的地方拍视频，这都统统回到了真实与现实生活中去。”

这就像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曾经强调过的那样：物体和意义构成了一个符号，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这样的符号被反复组合成有特征的话语形式。然而，当拼贴者使用相同的符号体系，再次将不同形式中的表意物体定位于那一套话语的不同位置中，或当这个物体被安置在另外一套不同的集合中，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就形成了，同时传递出一种不同的信息。在这里，我把社交媒体当作另一套不同的集合，而时装本来就是物体和意义构成的符号，如今成了一种新的话语形式。■



抗衰老基因疗法靠谱吗？

文 / 袁越



2015年9月，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帕里什(Elizabeth Parrish)的44岁美国妇女自愿甘当小白鼠，在自己身上试验了两种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新药，成为这两种药的全球首位受试者。2016年4月22日，负责开发这两种药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BioViva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新药在帕里什身上初见成效，前景一片光明。

这则消息初看似乎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其中的细节很有意思。首先，这位帕里什其实就是BioViva的首席执行官，这两种新药都是她负责开发的。不过，读者先不要急着为她唱赞歌，因为这两种药都是抗衰老药，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服药者健康长寿。但是，如果你因此又转而对她嗤之以鼻，倒也不必，因为这两种药都是基于基因疗法的新药，在很多方面存在未知的风险，以身试药确实需要一定的胆量和勇气。

目前最常用的基因疗法就是利用改造过的病毒作为载体，将特定的基因片段运送到人体细胞内，让这个外来基因整合到人体基因组内，永久地发挥作用。此次试验的两种新药其实就是基于这种给药方式的两个新基因，一个基因能够增加受试者的肌肉重量，除了能延缓因年龄导致的肌肉萎缩外，还能治疗某些因病导致的肌肉萎缩，争议不大。

另一个基因则是一种名为TERT的端粒酶基因，这个基因能够延长染色体端粒的长度，其目的就是为了延缓衰老，因此引起了公众的兴趣。熟悉生物学的人都知道，细胞分裂之前先要复制一份染色体拷贝，然后分别分配到两个新细胞内。染色体复制的过程非常复杂，每复制一次都要短那么一小节。为了不让更多有用的基因在这个过程中丢失，生命体进化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新机制，即在

每条染色体的一端多出来一个类似香蕉把儿的东西，称为端粒(Telomere)。端粒内没有任何有用的基因，每次复制后丢失的一小段端粒DNA也就不会造成伤害了。问题在于，端粒的长度是有限的，复制的次数越多端粒就越短，总有一天会耗尽，细胞也就没办法继续复制下去了。

端粒的这个特性让很多人猜测这就是人类寻找已久的生命之钟。众所周知，大部分正常细胞都不能无限分裂下去，而是有一定的上限。有人研究发现，每一种细胞的分裂上限都和该细胞的端粒长度呈现正相关性，端粒越长，细胞分裂次数就越多。细胞分裂次数和寿命有关，因此有不少科学家试图通过延长端粒的长度来增寿。2012年，西班牙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的玛利亚·布拉斯科(María Blasco)博士首次在小鼠身上完成了这个实验，证明延长小鼠端粒确实能增加小鼠的寿命。

上述实验就是用前文提到的基因疗法完成的，理论上可以被用于人体。但这类实验不属于治病范畴，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此类实验的管理相当严格，BioViva公司一直申请不到在美国做人体实验的许可证，无法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即使帕里什本人甘愿当小白鼠，也只能去管理较为松散的哥伦比亚完成这个实验。

从该公司公布的初步结果来看，基因疗法本身似乎是成功了，帕里什体内的免疫白细胞的端粒长度从2015年9月时的6.71kb增加到了2016年3月时的7.33kb，按照人体正常的端粒磨损速度计算，这个增幅相当于回到了20年前的状态。但是，很快就有人质疑说，端粒长度的测量是出了名的不靠谱，平均有8%的误差，帕里什的这个增幅处于误差范围内，还需要更精确的测量才能说明问题。

更重要的是，端粒长度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明确，至今尚未有可靠的实验证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一个人端粒长度很长并不能说明他的身体状况就一定很好，反之亦然。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端粒长度的增加还可能导致癌症发病率的增长。科学家早就知道，癌细胞之所以获得了无限繁殖的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癌细胞内被激活的端粒酶将磨损的端粒补上了。事实上，有人认为多细胞生物之所以进化出了端粒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对付癌细胞。

所以说，BioViva公司的这个抗衰老基因疗法远不如该公司自己宣传的那么靠谱。当然了，这个思路还是有前途的，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梦想照进现实：生活可以更美

“整个世界都好像坐在一列飞速下坡、不断加速的火车上，虽然许多人为自己所走的方向感到惊愕，但他们又似乎找不到安全跳车的方法。”这是艾尔默·斯托尔在《胜过修补》中的一段话。现代人几乎生活在一个既定程序中，工作、挣钱、消费、房贷、医疗保险、纳税等等，享受生活的能力在丢失。

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感受：内心的宁静与重新定义生活的知行合一，越发变得难能可贵。有没有一个地方，远离寒冷、喧嚣与雾霾，可以在湛蓝的天空下自由呼吸，可以在明媚的阳光里拥抱温暖，可以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尽情遨游，可以让心灵宁静与放松，去尽情享受人文与生活内涵，去感受亘古不变的惬意与舒适，去畅享脱离喧嚣的自由另一种人生？

梦想真的照进了现实。

7年前，雅居乐在清水湾这片土地上，开始打造一个旅游度假的典型样本。在这里少了些都市的快节奏，没有纤尘，抬头蓝天，低头沙滩……清水湾每一处角落都充满了纯粹。午后的暖阳，映照在小区里的长椅上、凉亭里、窗台间，有温柔静坐的老阿姨，有摆弄着萨克斯的时髦大叔，还有打着拍子哼小曲的白老翁。浮华褪尽的老一辈人，或许只想找到这么一个地方，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找找那些年悄然走漏的年华。雅居乐清水湾的创始人们，他们从一开始就深知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一所房子，而是在这里所感受到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恰似你的“第二人生”。

综观世界上著名的滨海湾区，悉尼双水湾是伊丽莎白女王眼中“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建筑大师路易斯·海把他的传世作品留在了新西兰的霍克湾；李嘉诚把他的风水宝地选在了香港浅水湾；电影大师黑泽明少年时代生活在东京湾；而沙特王子则把他的度假胜地选在了风光秀丽的马来西亚布茹拉湾……

放眼中国，遍寻华夏1.8万公里的悠长海岸线，海岸线长度虽居世界第四位，但真正适合度假和建房子的海岸线却非常稀少。能够称之为顶级滨海的，恐怕也只有在海南。而清水湾被誉为“海南最令人期待的海岸线”，湾如其名，清澈湛蓝。海水平均可见度为11米，保留了很原始的自然风貌。

清水湾，将这绵延12公里的海南最令人期待的至美海岸线毫无保留慷慨馈赠，打造成为集高端度假酒店、滨海高尔夫、游艇码头、国际学校、疗养院等于一身，集投资、旅游、度假、休闲、居住为一体的超大综合型滨海旅游度假梦想国度。在这里的生活已不仅是一种尊贵的享受，也是一种积极向上追求内心的人生态度。摒弃尘世的喧嚣与嘈杂，回归自然的本真与心灵的宁静，既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也是现代人所追求的终极居住理念。清水湾成为那个让梦想照进现实的灵魂工程师。

住下来并生活着，不辜负这片海

约翰·列侬说：“当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如何让在清水湾的人都成为生活家，如何让他们在享受这片海洋湾区的同时拥有归属感？是清水湾的开发者持续在思考的问题。而这些年，他们用不变的初心，怀着“不辜负这片海”的理念，在给予答案：提供更具有文化基因、更具魅力、更符合现代人需求的生活方式，激发出内心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的力量，让勇锐、热情、自由的氛围渗透进人的生活点滴中。

雅居乐清水湾每年都在举办各类活动，比如海岛音乐节、椰子节、沙雕节、啤酒节，这些都已经成为雅居乐清水湾的品牌佳作。不论慕尼黑啤酒节，还是海岛音乐节，抑或每年一届的沙雕艺术节，这些曾经伴随雅居乐清水湾走向醇熟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同样印入人们的记忆深处，成为他们对雅居乐清水湾随口道出的印象——“清水湾是真正能让人住下来，并生活着的地方。”雅居乐清水湾已经拥有了近2万名业主，每年还有业主运动会、业主春晚。

现在的近2万名业主就是一个大的朋友圈，人与人之间关系单纯而美好，长幼有序，守望相助。

6年前从北京来清水湾置业的王利伟，也是一位清水湾商业的参与者，他说：“这里以后就是自己的另一个故乡了，那一生算是过去了，这一生是一个新的开始。”雅居乐清水湾“第二人生”理念打开了人们生活追求的一扇明媚之窗，恰似一首欢快清新的主旋律，奏出人们心底的最强音。

所以有人说，这里的美，只有葆有一颗享受生命、享受时光、享受生活的心，才会真正懂得。你，可在其中？

（文/小阮）



27年，真相一直都在

文 / 张斌



4月27日，在英国利物浦圣乔治音乐厅外，人们准备了玫瑰和蜡烛，共同悼念希尔斯堡惨案中的遇难者

1989～2016年，27年，分分秒秒，在希尔斯堡球场惨案中痛失18岁爱子的玛格丽特·阿斯佩纳女士曾度过无数不眠之夜。这位母亲与另外95位罹难球迷家属共同组建的“正义96”组织27年间，坚定地要找寻惨案真相，让亲人瞑目。

27年的执著，让希尔斯堡惨案之痛始终阵发于英国国民心间。4月26日11点05分至11点22分，激动人心的17分钟，陪审团以7：2投票裁决，惨案96位死者为“非法致死”，当时的责任人将面临刑事指控，甚至英足总都要因此承担连带责任。此时，尚不是“正义96”将胸中炙热的情绪喷发的时刻，直到下午16点20分，法院正式宣布裁决结果，当庭的“正义96”成员才欢腾起来，自然也有热泪奔流。

当2万多利物浦人齐聚圣乔治大厅门前见证正义和真相终于来临时，世人也再一次意识到，这是球队，也是一座城市27年的心痛历程总算找寻到了终点。1989年4月15日，希尔斯堡惨案发生当天，率领利物浦队与诺丁汉森林队进行足总杯半决赛的老队长达格利什面对公众深情颂诗，告慰英灵。众多政要接力高声念出了96位罹难球迷的名字。“正义96”一直在设想着这样一天的到来，但此前不太敢奢望“击败一个体系”，让警方和官方机构彻底认罪。

27年前的那场比赛选择在第三方城市谢菲尔德举行，下午15点开球，警方曾建议球迷上午10点即可入场。但当天利物浦与谢菲尔德之间发生交通拥堵，导致5000名持票的利物浦球迷迟迟不能入场，场外还有大量没票球迷不断聚集着。14点15分，现场已经出现球迷之间相互推挤，危险降临了。更为糟糕的是，球场入口处的很多入场闸机出现故障，只有七台可以正常使用，照此速度，5000名利物浦球迷全部入场需要至少两小时，到那时比赛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14点35分，现场失控了，最佳的处理方式便是推迟比赛。但14点52分，警方现场最高指挥官达金菲尔德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打开原本作为出口的C门，放场外球迷迅速进场。人潮迅即涌向C门，通过狭窄通道，冲向3号和4号看台。5000名持票利物浦球迷以及不少无票球迷也借机冲入。最悲惨的是，那个时代为了对抗足球流氓，看台之间都设置了高高的栏杆，球迷无法在看台之间随意走动。人潮涌入看台，前排球迷被挤压在前排栏杆和墙边无法动弹，混乱和恐慌加剧了拥挤，挣扎、窒息、踩踏犹如地狱般地惨状上演了，肢体断裂，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咫尺外的亲人死去。

比赛门票仅仅6英镑，吸引了大量青少年入场，96名死者中共有37名孩子。此外，58个孩子也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事后看来，打开C门成为酿成惨案的关键，当年达金菲尔德坚称是球迷冲开了C门，此次出庭，他终于向陪审团承认，是自己下令所为。2012年，英国高院裁决重审惨案，1000多名证人到庭陈述记忆中的真相，达金菲尔德的玩忽职守还牵扯出了南约克郡警方的系统性混乱，时任局长莱特任人唯亲，赛前撤换了原本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换上毫无经验的达金菲尔德，结果酿成惨剧。

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惨案发生后，警方捏造起因是醉酒球迷冲开C门，为此特别下令抽取所有死者的血液检查酒精浓度，即便孩子也不放过。法医认定无醉酒事实，但莱特依旧发动了一场抹黑死者的公关战，100多份证词也被有意修改过。《太阳报》当年曾以《真相》为题颠倒是非，利物浦全城发起抵制《太阳报》行动，至今“正义96”还在仇视默多克。

真相，一直都在，27年，只有亲人才奋不顾身。■

奥巴马的军事遗产就是“撒胡椒面”？

文 / 宋晓军

4月25日，奥巴马宣布将向叙利亚增派250名特种部队士兵，以协助叙“温和反对派”和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兰国”。至此，奥巴马政府已经向今年2月国防部长卡特在说明2017财年国防预算时强调的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和“伊斯兰国”所谓“五大威胁”的方向，都派出了数量有限的地面部队。奥巴马在即将卸任前这种四处用有限地面部队“撒胡椒面”的举动，恍惚让人回到了美国国力和军力处在鼎盛时的20年前。

1996年，美军高层发布了《2010年联合构想》的未来联合作战构想文件。文件在分析了战略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并结合美军可能使用的新科技成果，提出了四个新的作战概念：优势机动、精确作战、全维防护和定向后勤。美军高层认为，只要未来将这四个新的作战概念付诸实施，美军在21世纪就能获得赢得任何战争的全面优势。与此同时，在1996年夏季由美国国防科技委员会推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指出：未来地面部队可能拥有携带重量较轻的重型武器的能力，在需要时可以请求远程精确火力支援。此后，虽然陆军在自己的分报告——《2010年陆军构想》中对传统陆军在大规模联合作战中仍能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观点进行了辩护，但最终，在1997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还是强调了更加倚重空、海军的远程精确打击力量而缩小陆军规模建

立所谓“数字化陆军”的国防资源配置宗旨。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由于“9·11”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绵延持续，临时按传统方式扩大的陆军，实际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大部分时间是在充当“治安军”。那么20年后奥巴马在“五大威胁”方向上用“撒胡椒面”的方式派出少量地面部队的举动，是不是又要回归到20年前的“构想”中了呢？但事实上，此时的陆军已经不是20年前的陆军了。

今年4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推出了一份题为《陆军现代化的挑战：一个历史的视角》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陆军现代化水平下降的三个时段，分别是1969～1975财年、1985～1998财年和2008～2015财年。报告给出的数据是：以2015财年美元计价，陆军的装备采购资金从2008财年的约760亿美元一路下滑到2015年的约170亿美元，下降幅度为78%；而同期研发/测试/评估资金从2008年的约140亿美元一路下滑到2015年的约70亿美元，下降幅度为52%。经过综合评价后，在这个时段陆军的现代化水平下降了74%。而在1969～1975财年和1985～1998财年两个时段，陆军现代化水平只分别下降了64%和59%。据此，“报告”给出的结论是：目前陆军的现代化水平已到了断崖边缘，必须要马上找到一条“少花钱、多办事”提升现代化水平的解决之道。

从CSIS这份“报告”所得出的结论中不难看出，在预算的“刚性约束”下，奥巴马政府不向海外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而对所谓“五大威胁”采用“撒胡椒面”的方式，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然，更深一层的含义是，20年前美国军方设想的“小陆军”的国防资源配置规划是“基于能力”而设定的，即只确定战争如何变化而不考虑是哪个国家、联盟或非国家行为体要发动的战争。而20年后，奥巴马政府用“撒胡椒面”的方式派出有限地面力量的举动，更像是“基于威胁”（当前或即将到来的威胁）而设定的。接下来的问题是：8个月后接替奥巴马担任总统的人会对所谓的“五大威胁”进行国防资源配置的优先排序呢？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抑或是伊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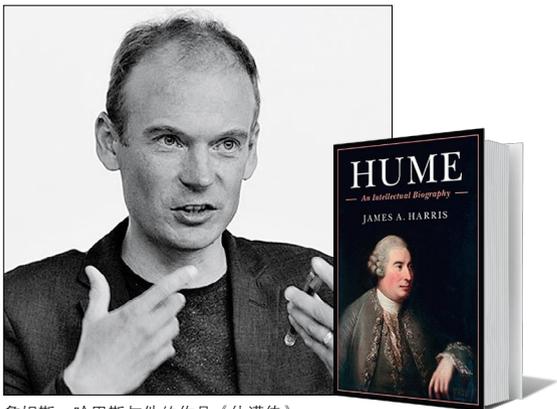


2015年7月6日，奥巴马在与军方高层商讨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后发表讲话，表示对“伊斯兰国”的战斗不会很快结束

回到休谟

主笔 / 薛巍

英国政治思想史学者理查德·伯克说，目前西方政治哲学中康德及其道德理论泛滥，应该向休谟倡导常识的道德理论回归。



詹姆斯·哈里斯与他的作品《休谟传》

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

在思想史上，卢梭、尼采、海德格尔都曾因为对政治运动的影响而成为罪人。但没想到看上去无可指摘的康德也会遭此指责。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政治思想史教授理查德·伯克说：“过去50年间，在美国的文化生活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的哲学家不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杰瑞·福多或玛莎·努斯鲍姆，而是德国哲学家康德。这主要是因为康德对战后道德哲学的趋势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伦理学开始成为政治理论的主要关切。约翰·罗尔斯、罗纳德·德沃金和托马斯·内格尔是这一趋势最重要的代表。道德问题一直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但最近几十年间，使政治学从属于伦理学是向康德式思想的回归。在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思想家如马克斯·韦伯、奥托·鲍威尔、奥克肖特、凯恩斯、哈耶克、雷蒙·阿隆、汉娜·阿

伦特那里，对规范性的探讨相对比较边缘。”

伯克说，关心伦理学的政治理论往往非常理想主义。“对于社会和政治关系该如何加以组织，理论家有一套纯粹的道德概念。由此出发，康德在1793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应该遵守道德法则而非审慎原则。政治中的不诚实也许有好处，但永远都是不道德的。在政治哲学发生规范性转向的同时，美国政治中的一些领域兴起了道德主义，最明显的是在国际事务领域。在21世纪初，切尼和布什开始用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念重新审视国际秩序：把民主视为普遍的规范，认为它能够系统性地取代专制，在武力干涉的帮助下，中东的专制政权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掉。正义的征伐无视那些很实际的障碍。”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治哲学后退到抽象的道德领域引起了很大的麻烦。首先，只关注义务导致漠视人类真实的欲望。其次，只关心正义会导致不关心实际的利益。在康德把政治理论转变成道德理论的一个分支之前，英国哲学家休谟建立了一种与此相反的视角。休谟考察了真正鼓动人们的是什么，而不是原则上他们应该做什么；它计算了一种做法的好处而不是评估其内在价值。“可以把这套理论看作在康德之前对康德式理论的批判。它也拒斥了康德后来复兴的斯多葛主义——康德称赞它把幸福等同于道德上的完美。”

休谟的怀疑论

一般说到美国新保守主义，被问责的都是列奥·施特劳斯。伯克除了问责康德，还提出用休谟来纠偏。他说，詹姆斯·哈里斯在《休谟传》中介绍了休谟对人性的剖析，以及他对斯多葛主义的批评。哈里斯分析了休谟的全部著作，强调了三点：休谟作为作家的雄心，他的多种追求，以及他的怀疑论的含义。作为怀疑论者，休谟对复兴斯多葛主义的尝试提出了异议。休谟去世后一度主要被视为哲学家，有时他又被视为历史学家。哈里斯提出，不应该用现代的学术分工来限制休谟，我们应该把他看作一位对各种领域都做出

了贡献的文人。哲学家的形象过去 200 年间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 19 世纪末职业哲学家兴起之后。在 17 和 18 世纪，哲学家这一身份不是那么明确。洛克的《政府论》是政治檄文而不是学术小册子。卢梭既讨论自然法和政治经济学，也写小说和自传。亚当·斯密认为他的《国富论》是一种哲学活动。虽然休谟想做一个文人，但他是哲学式的文人。他的意思是，他的哲学是他的怀疑论的工具。

在 1739 年出版的《人性论》一书中，休谟指出了教条主义的局限性。教条主义认为它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的限度，揭示了宇宙的根本原理和上帝的本质。休谟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如自然的根本原因或人类心理的终极基础，都是理性无法把握的。他说：“任何假装发现了人性终极性质的假说，都应该首先被斥为自以为是和空想。”不过，休谟虽然认为人类不可能洞穿宇宙的隐秘原理，但可以提高我们对人的认识。他希望根据培根和牛顿建立自然科学所依赖的基础，来建立人的科学：通过对经验世界的观察，施之以适当的注意和细心。休谟的人性论首先批判了用理性解释经验之外的世界的做法。他对之前的尝试的怀疑使他陷入了绝望：“我在什么地方、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由什么原因获得我的存在、我将来会返回到什么状态、我应该追求谁的恩惠、惧怕谁的愤怒、四周有什么存在物环绕着我、我对谁有何影响或者谁对我有任何影响，我被所有这类问题迷惑了。”休谟说，怀疑论动摇了宗教的训诫，破坏了所有的信任和信仰。但幸运的是，我们的本性很快就使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些不确定性移开，使我们安心于风俗和常识的真理。他在《人性论》第四章第七节中写道：“理性虽然不能驱散这些疑云，自然本身却足以达到那个目的，把我的哲学忧郁症和昏迷治愈了，或者是通过松散这种心灵倾向，或者是通过某种事务和我的感官的生动印象，消灭了所有这些幻想。我就餐，我玩双陆，我谈话，并和我朋友们谈笑；在经过三四个钟头的娱乐以后，再返回来看这一类思辨，就觉得这些思辨那样冷酷、牵强、可笑，因而发现自己无心再继续进行这类思辨了。”

在休谟那里，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怀疑以孤立告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哲学上的怀疑冲动从孤独的研究转入更广泛的社会之中。在社会之中，真正的怀疑承认常识的价值又不屈服于它一时的兴致。这种背景下的怀疑论批评而不会破坏批评的条件，即批评依赖的社会和政府的存在。哲学可以揭示伦理学上有害的观念、宗教中不利于社会的态度和政治上的危险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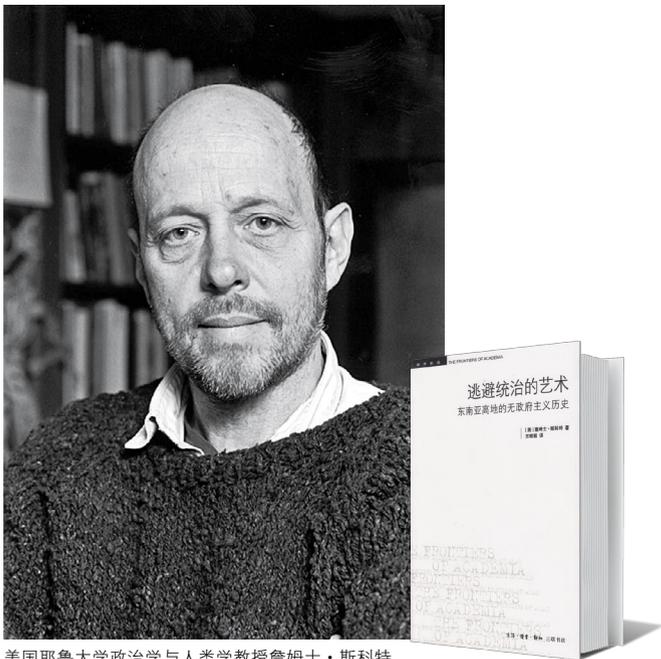
休谟怀疑理性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他针对的人包括试图从心灵能够把握的不变的正义标准中寻找美德的标准的塞缪尔·克拉克。还有后来的斯多葛派如沙夫茨伯里，认为美德观足以激发善行。休谟则认为，道德源自道德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原则。激发行动的是激情而不是关于应该怎么做概念。在此基础上，休谟重新思考了哲学的任务，它不应该是古代学派拥护的“心灵的良药”，也不是保证正义的行为规则之源。哲学的任务是批判地反思，而不是规劝和慰藉。单纯的论证无法打动我们。善的观念必须让人感到可亲。所以这些必须通过趣味来教育人。而且强迫推行在现有的习俗中没有踪影的理想会破坏社会的结构。

在休谟看来，哲学要干预社会事务，它就要去理解社会的当前状态及其变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以历史理解为指导，对它的时代做怀疑性的评论。所以在完成《人性论》之后，休谟从 18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撰写和修订他的论文集，努力去揭示时代的偏见。他的史学著作把这些偏见放到了长时段的视角之中。历史跟哲学意义，不能改变人的行为，却能够深化对我们所处环境的把握。晚近的英美思想往往从实际的分析退回到了对理想价值的玄思。它们需要像休谟那样把哲学跟历史结合起来。■

休谟重新思考了哲学的任务，它不应该是古代学派拥护的“心灵的良药”，也不是保证正义的行为规则之源。哲学的任务是批判地反思，而不是规劝和慰藉。

政治秩序的中层理论

文 / 李伟华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与他的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

詹姆斯·斯科特学生时代忙于恋爱，被导师抛弃，病急乱投医终于找到一位研究缅甸的老师愿意收留他。糟糕的是缅甸发生政变，他又不得不跑到马来西亚做田野调查。误打误撞，早期让他声名鹊起的三本书都是基于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而诞生。有人戏谑他，说这三本书是关于“马来西亚的农民、世界各地的农民、每一处的每个人”。

最后他终于有机会再次聚焦缅甸，《逃避治理的艺术》一书出版后，学界对他的评价达到了新的高度。该书跳出社会进化的分析路径和从国家角度看问题的方式，关注国家以外山地、沼泽等地区人民的历史，这种视角对于整体政治秩序的中层理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书中对国家、部落、认同形成的反思挑战了传统对国家、部落的解读。另外，斯科特广征博引、纵贯古今的行文方式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理解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重点研究东南亚 Zomia 地区的历史，这比单纯研究某一区域的历史要有说服力，比整体史研究更有的放矢。

对整体政治秩序的讨论，民族国家已然成为一个基本的讨论单元，而在此之上，则是对宇宙观的溯源，那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该书始终将国家置于一个比较的位置而非被其包容，同时放弃对各族群的宇宙观泛泛而谈，而是整合全世界各地区的民族志文献，对超乎国家之上的山地民族进行一个全新的解释。从这个方面来说，将该书观点称之为政治秩序的中层理论并不为过。全书旁征博引的不仅仅是东亚与东南亚山地的材料，还包括安第斯山区、高加索山区、阿尔卑斯山区等地的文献。他让这些文献都为他热情讴歌的赞米亚世界背书。

所谓赞米亚 (Zomia)，Zo 是遥远山地，Mi 的意思是人民，包括地理和族群两方面的意义，斯科特使用 Zomia 一词指代从印度北部纳迦和米赞山区及孟加拉吉大港山以东的山地。按照过去对区域的理解，水域可以融合周边地区形成一个区域，山地则有分隔作用。Zomia 是山地，居住其间的百姓在文化、语言上千差万别，作者将 Zomia 看作一个区域，强调其在河谷地区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和一种新的地域研究思考方式，在这里，和他们有关的一切：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颇有争议的口头传承文化，都可以被认为是精心设计来远离国家的控制。”人们更熟悉的观点是山地居民是文明与国家的弃儿，斯科特对此提出了挑战

书中重要的结论是：山地居民是国家统治秩序的产物，并且，是山地居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在国家建立过程中，族群相遇有三种可能的状况，那些被讨伐或攻击的族群，或是留下来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或是抵抗，或是逃离国家。山地居民并非生而为山地居民，他们是在国家的刺激下，或者被迫迁徙，从谷地逃到山区。典型的例子是苗族，蚩尤与黄帝之战就是他们不断迁徙的开始；但还有更复杂的情况，利奇在《上缅甸诸政治体系》一书中已提到，居于山地的克钦人与居于谷地的掸人，他们的族群身份并没有很明确的界定。克钦头人通过与掸人土司通婚，很容易获得一个掸人统治者的身份，而在克钦内部，贡萨（山官等级制）与贡老（人人平等制）制度周期性的摆荡既说明了政治制度的双重性，也提示我们，克

钦族群认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斯科特比利奇走得更远，他认为包括克钦人在内，逃避谷地国家治理的山地居民与谷地国家的辩证关系是赞米亚地区共有的发展关系。

斯科特强调，山地与谷地空间上的双重比较，一是平面上与国家中心的横向距离，比如说边疆，一是海拔上的与国家中心的纵向距离，所以，“与其将缅甸想象成一个遵循现代国家绘图规则被清晰描述的连接成片的区域，毋宁将其看作地势的一个水平切片，大多数地区只是低于海拔 300 米，适合种植水稻且在宫廷控制范围内”。海拔超过 300 米，便不在统治范围了。

在斯科特看来，对农业结构的选择，跟是否接受国家统治密切相关。水稻的出现是国家形成的基础，水稻比以往的作物更有利可图，能养活更多的人，更利于储藏，也更有运输价值。前现代国家往往都在利于种植粮食的地方，国家也倾向于向有利于生产水稻的地方扩展。国家与生产水稻的地方之间是选择性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这种选择背后隐含的是政治关系，即国家需要谷物养活人口，同时需要大量人口居住在王宫附近，种植谷物、参与征战。山地居民选择“逃避农业”，即游耕、采集或游牧，相应的农业作物则是玉米、块根作物特别是马铃薯，这些作物单位价值低，不容易被征收，同时又特别容易保存。书中甚至提供了一份详细的“逃避作物”清单。斯科特完全不考虑农业作物选择的生态因素，而把目光放在集中在政治考量上，为此受到不少批评。

在史无前例的“6 又 1/2 章”中，斯科特做了非常大胆的分析，就如同游耕和散居是为了阻止被征用的生存策略，社会碎片化和没有首领是为了阻止被国家统合，那么“同样，没有文字和文本也使他们可以自由操纵历史、谱系和清晰性，从而挫败国家贯彻其制度”。文字向来被认为是文明的指标，很多山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在历史上被污名化。斯科特用山地民族的口述史诗来说明，很多山地民族其实有文字，但是或者是自己不小心，或者由于缺乏先见之明，或者是背叛者的欺骗，文字和文本消失了。如今很多民族研究者面对此都会表达出历史的遗憾，而斯科特则提醒大家，如果考察山地民族的移民史，表达遗憾将是对历史的反叛。神话中文字和文本的丢失，对很多山地民族来说，是历史的真实，因为他们之前生活在谷底，甚至建立了国家。当迁移到山地时，文字的丢失是一种主动放弃的结果，只留下口述传统。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口头传统比书写传统在弹性与

人类学家通常以个案来呈现世界大一统之下浪漫的逃避，斯科特以赞米亚地区山地人民的群像来说明，逃避国家治理的艺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手段丰富并且分布非常广泛。

适应性方面有更好的优势”，也就是说，你忘了你从哪里来、你往何处去，那么，你的历史可以随时调整，如何调整则取决于特定的历史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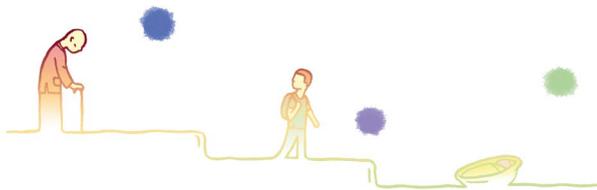
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将会刺激两个方面讨论的热潮。一是对政治秩序中层理论的探讨，即介于宇宙观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讨论，王铭铭新著《跨社会体系》在这方面也是一个积极的尝试；二是对分族写志研究者的思想冲击。现在的民族研究者和民族成员本身更愿意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费老在世，便对分族写志提出了挑战，首先他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但他强调的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互相滋养；其次他倡导藏彝走廊的研究。在斯科特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如今分道扬镳的各个民族，如傣族、景颇族、苗族、拉祜族，他们并非生而为傣、景颇、苗、拉祜，他们在历史上互为彼此。即使他们现在已经有清晰的民族边界，如果把他们的史料做一个综合比较，他们的历史叙述、他们的生计方式，他们的政治秩序，似乎都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思考。这对民族研究是一个极大的补充。

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政治学、人类学双料教授。他很少称自己为人类学家，但该书却浸透了西方经典所焦虑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精华，或者说，走向了人类学对“小而美”的追求的新高度。大部分人类学家通常是以个案来呈现世界大一统之下浪漫的逃避，斯科特则走得更远，他以赞米亚地区山地人民的群像来说明，逃避国家治理的艺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手段丰富并且看起来分布非常广泛。他一半时间做教授，教教课，做做研究，还有一半时间，如他所言：“我是一个农民，有一个 46 英亩的农场，大概养了 25 只羊，最多的时候有 60 只，多了我就卖掉。我还养蜜蜂，卖蜂蜜。还养了大概 50 只鸡。”他让自己也成了一个小山地民族多元认同的践行者，在教授与农民两个身份间自由跨越。■

（李伟华，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讲师，“人类学之滇”编辑）

乡音，渐行渐稀

文 / 孙文辉（慈溪） 图 / 陈曦



20年前，我拖着一箱衣物，回到了大岐山下的母校，开始用一种不分平翘舌音、不辨前后鼻音的普通话授课，孩子们也用类似的普通话与我对话。有时说到幽深微妙处，师生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拈取当地的土词俚语来表达，并在会心一笑间明了彼此的意思。

不久，上头说在编教师要考普通话了。因事关饭碗，老师们无论老少，都练得很用心，努力让自己的舌尖时平时翘，并憋出一种本地方言中极少有的后鼻音来。一段时间里，我竟对自己的故土身份产生了隐隐的焦虑感；面对某种熟悉的事物情理，我常常陷入不知如何言说的困境。待普通话考级过去后，大家才渐渐卸去舌尖的盔甲，陆续回到方言的便衣世界。一切话语才有了根，日常生活也重新明朗亲切起来。

几年后，我调入县一中教高中语文。新的教学环境里，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或硬或软的乡音。虽然同为慈溪方言，但各乡镇的口音皆有差异。日常闲谈，我说师桥话，学生有说龙山话、掌起话的，也有说周巷话、庵东话的，但这并不影响彼此间的深度交流，有时反而更能窥见说话方的性情和思致。可惜好景不长，等我带出一届高三，重返高一课堂时，学生已由“80后”跨入“90后”了，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却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不会说几句完整的本地话了。课外闲聊，我继续使用师桥方言，有些学生试着用他们父辈的方言与我对话，却不时卡壳，真是活活急煞听话之人，仿佛本地话已蛀蚀成一袭破衫，需用普通话不停地打补丁了。

当“00后”的孩子开始读高中，无论讲课还是闲聊，我不得已全部改用普通话了，因为此后的许多学生就连听懂当地的方言都有点困难了。记得有一回教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读及“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便有细心的同学问句中的“息列索落”是什么意思。我讶异地瞟了她一眼，说作者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他所

用的“息列索落”不过是吴方言中最常见的拟声词啊！言罢我用当地方言念了一遍，那学生竟以讶异的目光看着我，似乎在听一种奇怪的日语发音。

遗憾的是，语文课本中更多的方言乡音在不断地转化为古怪而又僵硬的知识。早些年我给学生讲“为伊消得人憔悴”或者“问渠那得清如许”，从不解释其中的“伊”或“渠”，因大家平时就是用这样的方言语词指代他者的；而如今我必得将“伊”“渠”释作“他”后，学生方能读通诗句的意思。至于古诗词中的押韵和平仄处，丧失了方言之根的学生更难有切身体会了。有学生问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句，末字为何读来不押韵。我使用本地方言念了一遍，却押韵了，原来“斜”在方言中读作“xia”或“qia”，自然与“家”（jia）押韵。很多人感到神秘莫测的古音，实际上就活在你我的方言乡音里。偶尔提及古汉语语调中的入声，我用释真空“入声短促急收藏”的歌诀来解释，众人皆无反应；我转而举方言中“吃”（qi）的发音为例，有本地方言印象的个别学生才略有反应，似乎有一种神秘而久远的声音，穿越重重的时空障碍在课堂上复活了。然而，大部分从普通话里浸泡过来的学生，却只能将此视作一种抽象的概念来识记，极难有贴肉般的感性体验。

千余年前，贺知章曾慨叹“乡音无改鬓毛衰”；如今看来，他不过失去了每个人都必然流逝的青春而已，终究拥有一个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乡音和乡音世界。倘使贺知章转世投胎于眼下日益标准化的语言生态中，那么他该用谁也听不懂的越州话怅吟“鬓毛已衰乡音改”了吧？也许上帝阻止人类建造通往天堂的巴比伦塔，是另有深意的，依话是伐？